



邓小南 荣新江 张帆 主编

# 大节落落 高文炳炳

刘浦江教授纪念文集

中华书局

邓小南 荣新江 张帆 主编

# 大节落落 高文炳炳

刘浦江教授纪念文集

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编

中华书局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节落落 高文炳炳:刘浦江教授纪念文集/邓小南,荣新江,张帆主编. —北京:中华书局,2016.1  
ISBN 978-7-101-11369-3

I.大… II.①邓…②荣…③张… III.刘浦江(1961~2015)  
—纪念文集 IV.K825.4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67059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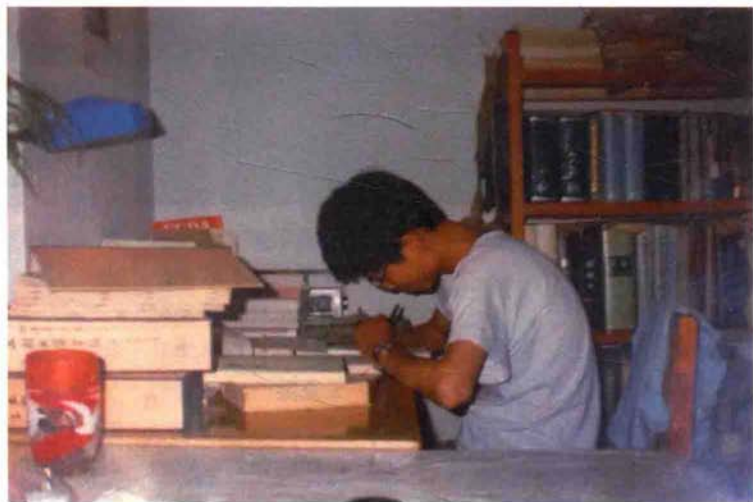
- 
- 书 名 大节落落 高文炳炳——刘浦江教授纪念文集  
主 编 邓小南 荣新江 张 帆  
责任编辑 胡 珂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6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4 $\frac{3}{4}$  插页 2 字数 330 千字  
印 数 1-8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1369-3  
定 价 62.00 元
-



刘浦江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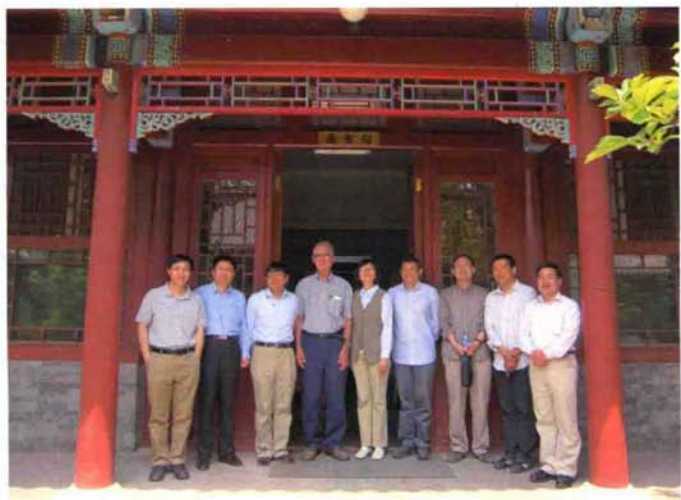
2010年全家福



中央党校大白楼寓所苦读（案首为邓广铭先生所赠《三朝北盟会编》）



与邓广铭等先生合影



与北大中古史中心部分同仁合影





《辽史》点校本修订工作总结会合影



论著书影

## 序

纪念文字从来都不好写，尤其是要纪念一位遽逝于英年的亲密同仁。

刘浦江教授离我们而去，已经整整一年了。今天，我们将这部悼念与追思的文稿祭献在浦江的灵前。

77篇纪念文字，来自我们的师长，来自学界同侪，也来自浦江的友人和学生。追思中饱含着内心的伤恸与不舍，也自不同的角度述说着浦江磊落的节操、炳著的绩业，从方方面面勾勒出浦江不凡的一生。

浦江是如今世上不多的理想主义者，更是孜孜以求的实践者。学问中，他长于思辨，才华警敏；课业中，他诲人育人，为师有道；工作中，他坦诚执著，干练高效。他的信念，他的追求，醇厚清介，高远而切实。他以自己54岁的一生，以自己的学业成就、学术精神、学人气质，诠释着“学者”二字的真切意涵。

今天我们追怀浦江，正是要奋励精神，凝聚力量，像他那样，全身心投入，奉献一流成果，培养一流学生，建设一流的学术群体。

浦江和我们在一起，他永远是我们这个群体中的一员。

编者

2016年1月6日

# 目 录

序/1

刘浦江教授生平简介/1

刘浦江教授学术简历/4

刘浦江先生致弟子书(选录)/14

走出辽金史

——刘浦江先生笃行而未竟的事业/19

怀念刘浦江先生/刘凤翥-24

忆刘浦江教授/宋德金-29

我与浦江的淡如水之交/李锡厚-33

在刘浦江先生追思会上的发言/王曾瑜-36

追思浦江/李裕民-40

悼浦江/史金波-45

置身功利外 心在学问中

——怀念刘浦江教授/张邦炜-50

不虚此行

——从几个侧面看刘浦江的脱俗人生/黄宽重-56

浦江，我们会一直记得你/姚大力-62

回忆刘浦江教授/钱乘旦-66

深切缅怀浦江/王春梅-69

天然清流，不杂渭泾：忆浦江/邓小南-84

怀念浦江/臧 健-92

在浦江追思会上的发言/王小甫-100

忆刘浦江二三事/齐木德道尔吉、吴英喆-106

追念刘浦江君/阎步克-115

相别未尽语，追思无限意/牛大勇-118

心香一瓣：悼念浦江老师/刘静贞-129

忆浦江君/陈苏镇-131

遥祭浦江：生命以另一种形态不朽/王瑞来-134

刘浦江教授追思会上的发言/包伟民-139

悼念浦江/王晓欣-141

畏友浦江/李华瑞-145

君子之善岂止在文章！/彭小瑜-156

忆浦江/赵世瑜-160

追忆浦江/辛德勇-167

一个纯粹的学者

——悼浦江/陈 峰-170

刘浦江忆旧/李鸿宾-172



- 惜才伤逝忆浦江/李剑鸣-187
- 垫江洒泪送浦江/荣新江-192
- 细微处见精神  
——追忆刘浦江与点校本《辽史》修订/徐俊-199
- 史学要向高处走  
——深切缅怀刘浦江教授/姜锡东-207
- 我所了解的浦江同学/刘一皋-211
- 刘浦江同志告别仪式上的发言/程秩-216
- 怀念浦江师兄/李志生-218
- 一位真诚而负责的学者  
——在刘浦江教授追思会上的发言/苗书梅-221
- 中元之夜说浦江/罗新-224
- 永远年轻的浦江兄/游彪-228
- 痛悼刘教授浦江兄鹤归/漆永祥-233
- 从此花开不见君  
——刘浦江教授追思/朱玉麒-235
- 江城子·悼念故友刘浦江教授/曹家齐-241
- 一个学人的境界  
——追念刘浦江教授/王善军-243
- 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纯真与执著/王立新-248
- 悼浦江/张帆-253
- 刘浦江先生在四库学方面的成就/张升-264
- 宽而栗,愿而恭,直而温  
——回忆浦江/何晋-267
- 风物依旧,斯人不再:追忆刘浦江老师/史睿-270

怀念浦江教授/吴国武-274

我与刘浦江教授的学术交往/周 峰-278

师教二十年杂忆

——怀念刘浦江老师/党宝海-282

一位纯学者的生涯

——怀念刘浦江老师/余 蔚-291

不仅仅是为了纪念

——追忆刘浦江老师/刁培俊-295

刘浦江先生：从辽金史进入阿尔泰学/唐 均-303

亦师亦友亦家人

——怀念刘浦江先生/贾彦敏-310

怀念哥哥/刘源远-313

怀念刘浦江老师/谭星宇-324

追悼刘浦江教授/饭山知保-327

追思刘浦江老师/毛利英介-330

黯淡世界中的一道光/陈侃理-332

博大之爱中的一丝微光

——怀念刘浦江老师/李鸣飞-336

不是恩师，更似恩师

——悼念刘浦江老师/孙建权-339

刘浦江，他一直那么年轻/孙 明-347

他的目光如手术刀般锐利/陈恒舒-353

怀念我的班主任刘浦江老师/李怡文-357

追思与怀念:忆刘浦江老师/李根利-362

不一样的感受,同样的关怀

——追念刘老师/马清源-370

形骸有尽而精神不灭

——怀念刘浦江老师/闫建飞-374

远去的“絮叨”

——怀念刘浦江老师/袁晶靖-378

脊 梁

——我眼中的刘老师/吴淑敏-384

师恩未谢,岁月已晚

——怀念刘浦江老师/张晓慧-388

余悲未已,薪火不灭

——怀念刘浦江老师/包晓悦-394

“幸”与“不幸”

——怀念刘浦江老师/张晨光-398

天之高处,魂之所栖

——怀念刘浦江老师/李思成-402

刘浦江先生的学术历程与治学思想/邱靖嘉-405

一部倾注生命的《辽史》

——记刘浦江教授的《辽史》修订工作/邱靖嘉-440

“难以置信”的学术故事

——泣念恩师刘浦江先生/赵 宇-449

痛悼浦江师

——告别仪式上的发言/苗润博-453

挽联、唁电选录/456

家人致谢/460

后 记/462



## 刘浦江教授生平简介

刘浦江,北京大学人文特聘教授,中国著名辽金史、民族史学家。祖籍重庆垫江,1961年生于上海。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中国史专业。1983—1988年在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任教。1988年7月调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副主任暨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历史学会常务理事。2004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2015年1月6日23时57分因病于垫江去世,享年54岁。

刘浦江教授自1988年调入北京大学,在邓广铭先生的引导下,以考证《大金国志》真伪及点校《三朝北盟会编》为契机,逐渐深入宋辽金史研究领域,后来又将研究方向拓展至北方民族史及思想文化史。先后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百余篇,部分文章被翻译成日文、英文,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出版《辽金史论》(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松漠之间: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两部论文集,分别荣获北京市第六届和第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并编著《二十世纪辽金史论著目录》(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契丹小字词汇索引》(与康鹏合编,中华书局,2014年)两部工具书。2007年至2014

年，承担中华书局点校本《辽史》的修订工作，现已完成统稿，即将出版。

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是刘浦江教授最主要的学术阵地。他素以文献考据见长，并能娴熟地运用辽金石刻材料及契丹、女真语文资料进行历史研究，写出了一系列高质量的学术论文，解决了诸多悬而未决的重大难题。更为重要的是，他具有全局性的问题意识与深刻的学术关怀，具备跨学科的研究视野，能够将历史学与考古学、语言学、文化人类学紧密结合，从而将辽金史研究推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刘浦江教授的学术成就并不仅仅局限于辽金史研究。自2000年以后，刘浦江教授逐渐突破断代史的藩篱，敏锐地抓住历代正统论、德运说、华夷观念等涉及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及思想观念变迁的核心问题，进行长时段的系统研究，论证精审，眼光独到，表现出恢弘的学术器局和广阔的学术视野。代表性成果如《“五德终始”说之终结——兼论宋代以降传统政治文化的嬗变》、《南北朝的历史遗产与隋唐时代的正统论》、《太平天国史观的历史语境解构——兼论国民党与洪杨、曾胡之间的复杂纠葛》诸文，在史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刘浦江教授在四库学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他长年开设“《四库全书总目》研读”课程，在四库文献学方面积蓄了深厚的功力。去世前又连续发表《〈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再探——兼谈〈四库全书总目〉的早期编纂史》、《关于天津图书馆藏〈四库全书总目〉残稿的若干问题》、《四库提要源流管窥——以陈思〈小字录〉为例》三篇相关论文，皆选取典型案例做深度挖掘，气象与寻常的文献学研究迥然不同。

在教学方面,刘浦江教授长期为历史系开设《三朝北盟会编》研读、《辽史》研读、宋辽金史专题、中国史学史等课程,为中文系讲授中国古代史,在历届学生中均广受好评。他对研究生的培养极为用心,始终以高度负责的态度,殚精竭虑地给予深入指导,即便罹患重病,仍逐字逐句审订学生论文,用生命诠释了“师道”二字的深刻涵义。

刘浦江教授具有突出的行政管理能力。他在2006—2010年担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主任期间,为本系学科建设、教学改革与科研水平的提升,为历史学系整体学术地位的稳固和发展,奉献了自己大量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卸任之后,他仍积极协助新班子开展工作,并且一直认真负责地主持本系中国古代史方向的研究生招生事务。他担任中古史中心副主任以来,在中心图书馆的资料建设以及其他诸多科研工作方面,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回顾刘浦江教授的一生,他治学擅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既笃实严谨,又不拘一格,擅独断之学,具考索之功。他毕生追求“入于汉学,出于宋学”的学术境界,格调高远。他为人耿介不阿,勇于任事,始终坚守学术原则与道德标准,其品格之纯正堪为世范。

与刘浦江教授能够给社会所做的贡献相比,他的生命是短暂的;但就他已经为社会、为学术所做的贡献而言,他的一生是充实的,他的生命是异常辉煌而富于价值的。

刘浦江教授的一生值得我们深深敬佩。

“史海沉潜探骊得珠同仁常念,燕园训诱斫轮成器学子永怀。”

## 刘浦江教授学术简历

刘浦江 男,1961 年生于上海,籍贯重庆垫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副主任暨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历史学会常务理事。曾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主任。2004 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主要专业领域为宋辽金史、中国北方民族史、思想文化史。

### 学历

1979 年至 1983 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中国史专业,获历史学学士学位。

### 任职简历

1983 年 7 月至 1988 年 3 月,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助教、讲师。

1988 年 4 月至今,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



## 专业特长及研究方向

辽金史、宋史、中国民族史。

## 主要学术论著目录

### 一、著作

- 1.《契丹小字词汇索引》(与康鹏共同主编),中华书局,2014年。
- 2.《松漠之间: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
- 3.《二十世纪辽金史论著目录》,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
- 4.《辽金史论》,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

### 二、论文

- 1.《中华书局点校本〈辽史〉修订前言》,《唐宋历史评论》第一辑创刊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3月。
- 2.《关于天津图书馆藏〈四库全书总目〉残稿的若干问题》,《文史》2014年第4辑。
- 3.《四库提要源流管窥——以陈思〈小字录〉为例》,《文献》2014年第5期。
- 4.《〈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再探——兼谈〈四库全书总目〉的早期编纂史》,《中华文史论丛》2014年第3期。
- 5.《元明革命的民族主义想象》,《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3期。
- 6.《“桦叶〈四书〉”故事考辨》,《田余庆先生九十华诞颂寿论文集》,中华书局,2014年。
- 7.《太平天国史观的历史语境解构——兼论国民党与洪杨、

曾胡之间的复杂纠葛》,《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2期。

8.《金世宗名字考略》,《北大史学》第18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9.《南北朝的历史遗产与隋唐时代的正统论》,《文史》2013年第2辑。

10.《金朝初叶的国都问题——从部族体制向帝制王朝转型中的特殊政治生态》,《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

11.《在历史的夹缝中:五代北宋时期的“契丹直”》,《中华文史论丛》2012年第4期。

12. “The Forenames and Courtesy Names of the Khitans: The Father-Son Name Linkage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Chinese Scholars on Inner Asia*, Indiana University, 2012.

13.《宋、金治河文献钩沉——〈河防通议〉初探》,《舆地、考古与史学新说——李孝聪教授荣休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2012年。

14.《契丹人殉制研究——兼论辽金元“烧饭”之俗》,《文史》2012年第2辑。

15.《邓广铭先生与辽金史研究》,《想念邓广铭》,新世界出版社,2012年。

16.《邓广铭先生学术简述》,《国学新视野》2011年冬季号,2011年12月。

17.《再论契丹人的父子连名制——以近年出土的契丹大小字石刻为中心》,《清华元史》第1辑,商务印书馆,2011年9月。

18.《祖宗之法:再论宋太祖誓约及誓碑》,《文史》2010年第

3 辑。

19.《关于契丹小字〈耶律紉里墓志铭〉的若干问题》，《北大史学》第 14 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 12 月。

20.《穷尽·旁通·预流：辽金史研究的困厄与出路》，《历史研究》2009 年第 6 期。

21.《契丹开国年代问题：立足于史源学的考察》，《中华文史论丛》2009 年第 4 期。

22.「五徳終始」説の終結——兼ねて宋代以降における伝統的政治文化の変遷を論じる，小林隆道譯，「宋代史研究会研究報告第 9 集：「宋代中国」の相对化」，東京：汲古書院，2009 年 7 月。

23.《〈契丹地理之图〉考略》，《邓广铭教授百年诞辰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2008 年 11 月。

24.《金中都“永安”考》，《历史研究》2008 年第 1 期。

25.《再谈“东丹国”国号问题》，《中国史研究》2008 年第 1 期。

26. “The end of the Five Virtues theory: Changes of traditional political culture in China since the Song Dynasty”, *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 vol. 2, no. 4 (October 2007).

27.《契丹名、字研究——文化人類学の視点からみた父子連名制》，飯山知保譯，日本唐代史研究会《唐代史研究》第 10 号，2007 年 8 月。

28.《怀念恩师邓广铭先生》，《中华读书报》2007 年 4 月 11 日第 20 版。

29.《百年邓恭三》，《中国教育报》2007 年 3 月 16 日第

4 版。

30.《宋代使臣语录考》,《10—13 世纪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 11 月。

31.《“亂邻王”与“阿保谨”——契丹小字〈耶律仁先墓志〉二题》,《文史》2006 年第 4 辑。

32.『辽史』国語解から『欽定遼史語解』まで——契丹言語資料の源流,井上徳子译,《研究論集》第 2 集《アジアの歴史と近代》,河合文化教育研究所,2006 年 6 月。

33.《“五德终始”说之终结——兼论宋代以降传统政治文化的嬗变》,《中国社会科学》2006 年第 2 期。

34.《辽〈耶律元宁墓志铭〉考释》,《考古》2006 年第 1 期。

35.《邓广铭——宋代史学的一代宗师》,郭建荣、杨慕学主编《北大的学子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 年 1 月。

36.《正统论下的五代史观》,《唐研究》第 11 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 12 月。

37.《契丹名、字初释——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父子连名制》(与康鹏合著),《文史》2005 年第 3 辑。

38.《金代“使司”银铤考释》,《中国历史文物》2005 年第 2 期。

39.《再论阻卜与鞑靼》,《历史研究》2005 年第 2 期。

40.《从〈辽史·国語解〉到〈欽定辽史語解〉——契丹語言資料的源流》,《欧亚学刊》第 4 辑,中华书局,2004 年 6 月。

41.《正视陈寅恪》,《读书》2004 年第 2 期;收入《2004 年中国随笔精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 年。

42.《德运之争与辽金王朝的正统性问题》,《中国社会科学》

2004年第2期。

43.《近20年出土契丹大小字石刻综录》，《文献》2003年第3期。

44.《宋代宗教的世俗化与平民化》，《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2期。

45.《辽代的渤海遗民——以东丹国和定安国为中心》，《文史》2003年第1辑。

46.《书生本色》，《中华读书报》2002年12月11日第5版；收入《载物集——周一良先生的学术与人生》，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

47.《第三只眼睛看中国历史——评〈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国文化》第19、20期合刊，2002年12月。

48.《文化的边界——两宋与辽金之间的书禁及书籍流通》，《中国史学》(东京)第12卷，2002年10月；收入《10—13世纪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1月。

49.《契丹族的历史记忆——以“青牛白马”说为中心》，《漆侠先生纪念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

50.《李锡厚〈临潢集〉评介》，《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7期。

51.《女真语言文字资料总目提要》，《文献》2002年第3期。

52.《二十世纪女真语言文字研究论著目录》，《汉学研究通讯》(台北)21卷第3期(总第83期)，2002年8月。

53.《二十世纪契丹语言文字研究论著目录》，《汉学研究通讯》(台北)21卷第2期(总第82期)，2002年5月。

54.《辽朝“横帐”考——兼论契丹部族制度》,《北大史学》第8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

55.《辽朝国号考释》,《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

56.《辽朝亡国之后的契丹遗民》,《燕京学报》新10期,2001年5月。

57.《〈金朝军制〉平议——兼评王曾瑜先生的辽金史研究》,《历史研究》2000年第6期。

58.《辽朝的头下制度与头下军州》,《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3期。

59.《河北境内的古地道遗迹与宋辽金时代的战事》,《大陆杂志》(台北)101卷第1期,2000年7月15日。

60.《女真的汉化道路与大金帝国的覆亡》,《国学研究》第7卷,2000年7月。

61.《一代宗师——邓广铭先生的学术风范与学术品格》,《学林往事》下册,朝华出版社,2000年3月。

62.《金代捺钵研究(上、下)》,《文史》第49、50辑,1999年12月、2000年7月。

63.《试论辽朝的民族政策》,载《辽金史论》,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5月。

64.《邓广铭与二十世纪的宋代史学》,《历史研究》1999年第5期。

65.《内蒙古敖汉旗出土的金代契丹小字墓志残石考释》,《考古》1999年第5期;收入《契丹小字研究论文选编》,陈乃雄、包联群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年。

66.《不仅是为了纪念》,《读书》1999年第3期。收入《仰止

集——纪念邓广铭先生》，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不仅为了纪念——〈读书〉精选》，《读书》杂志编，三联书店，2007年；《传灯——当代学术师承录》，季剑青、张春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67.《大师的风姿——邓广铭先生与他的宋史研究》，《文史知识》1998年第12期。

68.《关于金朝开国史的真实性质疑》，《历史研究》1998年第6期。

69.《说“汉人”——辽金时代民族融合的一个侧面》，《民族研究》1998年第6期。

70.《关于契丹、党项与女真遗裔问题》，《大陆杂志》（台北）96卷第6期，1998年6月15日。

71.《最后的时光》，《北京日报》1998年6月4日第7版。

72.《十二世纪中叶中国北方人口的南迁》，《原学》第6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4月。

73.《〈三朝北盟会编〉研究（与邓广铭合著）》，《文献》1998年第1期。

74.《独断之学 考索之功——关于邓广铭先生》，《中华读书报》1998年1月21日第6版。

75.《金代的一桩文字狱——宇文虚中案发覆》，《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2月；《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粹·史学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76.《唐突历史》，《读书》1996年第12期。

77.《辽金的佛教政策及其社会影响》，《佛学研究》第5辑，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1996年。

78.《金代土地问题的一个侧面——女真人与汉人的土地争端》,《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4期。

79.《金代杂税论略》,《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3期。

80.《金朝的民族政策与民族歧视》,《历史研究》1996年第3期。

81.《金代“通检推排”探微》,《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4期。

82.《渤海世家与女真皇室的联姻——兼论金代渤海人的政治地位》,《大陆杂志》(台北)90卷第1期,1995年1月15日;《北大史学》第3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83.《金代户籍制度刍论》,《民族研究》1995年第3期。

84.《“博学于文 行己有耻”——邓广铭教授的宋史研究》,《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

85.《论金代的物力与物力钱》,《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1期。

86.《邓广铭先生与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1994年第11期。

87.《金代猛安谋克人口状况研究》,《民族研究》1994年第2期。

88.《金代户口研究》,《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2期。

89.《〈契丹国志〉与〈大金国志〉关系试探》,《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1辑,中华书局,1993年。

90.《范成大〈揽辔录〉佚文真伪辨析——与赵克等同志商榷》,《北方论丛》1993年第5期。

91.《汉冲帝永嘉年号辨》,《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2年第



4 期。

92.《书〈金史·施宜生传〉后》，《文史》第 35 辑，1992 年。

93.《关于〈契丹国志〉的若干问题》，《史学史研究》1992 年第 2 期。

94.《〈建康实录〉校点本訾议》，《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1 年第 4 期。

95.《再论〈大金国志〉的真伪——兼评〈大金国志校证〉》，《文献》1990 年第 3 期。

96.《辛稼轩〈美芹十论〉作年确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0 年第 2 期。

97.《〈次柳氏旧闻〉无〈程史〉之名》，《中华文史论丛》1989 年第 1 辑。

98.《“春秋五霸”辨》，《齐鲁学刊》1988 年第 5 期。

99.《〈青箱杂记〉衍文发覆》，《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8 年第 4 期。

100.《柳开生卒年辨正》，《中国史研究》1986 年第 4 期。

101.《从〈春秋左传〉看春秋时代的城市》，《齐鲁学刊》1985 年第 1 期。

102.《旧序新说》，《书林》1984 年第 4 期。

## 刘浦江先生致弟子书(选录)

(一)2007年6月3日

各位:

前天毛利在饭桌上无意中说到金陵发掘报告已经出版,于是康鹏今天给我发来了这封邮件。

这样的反应对康鹏来说已经成为一种职业习惯,这就是学术敏感和敬业精神。我认识的日本学者也大都具有高度的敬业精神,所以能把学问做好。广而言之,不管大家以后从事什么职业,最关键的是,每做一件事情都必须全身心地投入。惟有如此,你才能成功,才能安身立命,才能获得尊严。

【缘起:康鹏致函:“毛利君上次所说‘金陵发掘报告’应为《北京金代皇陵》(文物出版社,2006年11月)。目前北大图书馆及中心图书馆均未订购此书。”】

(二)2009年9月11日

各位:

今天曹流发来在网上看到的一篇《松漠之间》的书评,来源不明,是他的同学从某个博客上下载后转发给他的。作者据说毕业于北大物理系、目前从事金融工作。

看了这篇书评,真是令人十分意外。评价之内行,目光之犀

利,见解之通达,怎么看也不像是出自一位业余爱好者之手。这世界上的聪明人真是不少!尤其让我佩服的是,迄今为止能够指出我学术上的弱点而为我服膺的,只有这位作者和钟焄。

【缘起:豆瓣上“维舟”先生发表书评。经核,“维舟”先生实毕业于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

(三)2010年12月18日

润博:

(……)从此事中得出的一个教训是,引用任何材料一定要核原书原文,否则不定什么地方就会留下隐患。上次孙建权来信指出《春水秋山》一文中引用《宋会要辑稿》那条材料的系年错误,则是对史料处理不够细致造成的错误。

我早年写的一些东西,现在回过头来看真是相当粗疏,正所谓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我明年正好五十,这句话用在我身上非常合适。《春水秋山》一文写于1996年,那年我35岁,因我出道很晚,所以这还应该算是我早年的作品吧。你们现在都比我起步早,将来一定会比我更有成就。

【缘起:有弟子指出《松漠之间》所收《春水秋山》文中引用的一处材料出处有误,刘师书此自省自谦之语以激励后学。】

(四)2012年1月25日

诸位:

这个附件,若有兴趣不妨翻一翻。两种截然不同的学术路数,而且常常互相看不上眼。我以为,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取其长而弃其短,追求互补,若是矜己之长而攻人之短,势将不利于学

术的进步。

祝大家春节快乐！

【缘起：有学者立足考据学，对一位以义理、思想见长的学者进行批判，刘师目之为当代版的“汉宋之争”，而他则把理想的治学取径概括为“入于汉学，出于宋学”。】

(五)2013年6月14日

致众弟子函(一)

各位：

历时六年的《辽史》修订工作将于明日结束，今晚翻看这些  
年来的修订档案，感慨良多，把最早的两封邮件分享给大家分享。

致众弟子函(二)

这是收获丰厚的青春，这是无怨无悔的青春！

【缘起：《辽史》修订即将结束，刘师发第一函以志纪念，有弟子覆函回忆总结了各位师兄弟参与的时间起止，并称“这就是我们的青春”，刘师又发第二函。】

(六)2014年4月12日

各位：

我明天去重庆住院手术，术后要回垫江休养几个月，很遗憾不能送靖嘉、晓伟毕业了。我会委托张帆老师替我安排答辩。求职的事还没有最终结果，我还是有些放心不下，有情况及时沟通。润博、赵宇转博的事也都委托给张帆老师了。另外，这学期的读书课如何安排，由你们商定，相信你们会安排好的。我不在的期间，希望每位同学都努力完成自己的学习任务。

【按：此函写于刚刚查出癌症，尚未确诊之时。】

(七)2014年4月13日

各位：

读书课的内容、形式、频率，可根据情况加以调整，由大家共同商定。更重要的是，每人目前既定的学习、研究、写作计划，不能因我不在而受影响，相信大家会处理好的。

【按：此函写于首次入院化疗之前。】

(八)2014年5月27日

靖嘉、晓伟：

明天你们就要进行博士论文答辩了，遗憾的是我无法参加。从七岁上小学，当了二十多年的学生，终于等到了这一天，你们即将获得博士学位，从学生变成教师，这是你们人生中的一大转折。

本来很想在你们举行毕业典礼那天，与身穿博士服的你们一起合影，可惜难以如愿了。如果那时候我在家，你们可以来我家合个影，不过我的头发也已经快掉光啦。

【按：此函写于化疗第一、二疗程之间。】

(九)2014年6月21日

我还是有些放心不下。这一周来，晚上睡觉不能平躺，否则通宵咳个不停，完全不能入睡。我坐着睡，下半夜还能睡一小会。白天也没法睡觉，只要躺下就一直咳，只能坐着，所以只要不发烧，脑子清楚，就可以坚持看看东西，也不觉得困，反而觉得

不怎么咳了,今天已经在做《辽史》统稿工作。赵宇的文章还是发给我,我先大致翻一下,主要是把握一下方向问题,不能再走弯路了,这文章实在是拖不起了。7月10日以后,应该是我下一疗程回家后的低谷,状态不一定好,而且之后一周又该做评效了。

告诉你们我为什么不惧死亡?上次住院时听一位病人家属讲,她邻床一位中年男人整天哀怨,我要死了我挣下的钱都是别人的了,我老婆也是别人的了,我的儿子也要跟别人姓了。这就是因为没有精神寄托,而我和他不同。一个人文学者,有一流的作品可以传世,能够培育出一流学者来继承他的事业,还有什么可畏惧的呢?顶多有一点遗憾而已。

【按:此函写于化疗第二疗程结束后。】

# 走出辽金史

——刘浦江先生笃行而未竟的事业

恩师刘浦江先生离世之后，生前友朋及各家媒体纷纷撰文回忆、评述其生平学术，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多赞誉他为“辽金史巨擘”、“辽金史研究第一人”。先生在辽金史领域的杰出贡献，学界有目共睹。不过，作为受业弟子，在蒙受他言传身教的日子里，我们深切感受到先生并不满足于做一个断代史专家，而是怀有更高的学术追求。先生为此付出的种种以及取得的诸多成果，或许在某种程度上被其辽金史研究的光芒所遮蔽，而不那么容易引人瞩目，这里谨结合先生的相关学术经历略加陈述。

## 一、“入于汉学”：精深的文献功底与通贯的文献意识

先生治学由文献学入门，可以说，文献学构成了他学术大厦的基石。先生对文献的浓厚兴趣，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初求学期间，便已明显展露。他曾对我们讲过这样一件趣事：大学二年级时，邓广铭先生邀请王利器先生到北大历史系讲授文献学，刘师将《汉书·艺文志》所著录典籍的文献源流通梳理一过，完成了一份长达 20 余万字的课程作业。据说当时不少同学纷纷提出共同署名，以避课业之累。这篇长稿虽算不上严格意义的学

术作品，但先生对于文献学天然的兴趣，由此可见一斑。

大学毕业后，先生自称去了一个“说是机关又不是机关，说是学校又不像学校”的地方任教四年，“游离于学术界之外”。但在这四年里先生并未蹉跎岁月，而是自发地对作为文史津逮的《四库全书总目》进行系统、深入研究，并效仿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撰写了若干文稿，这些积累无疑为此后的学术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调入北大后，他持续开设“《四库全书总目》研读”课程长达二十余年。正是在长期浸淫《四库总目》的过程中，先生逐步确立起一种整体通贯的文献意识，并将其内化于具体研究之中。

先生通贯的文献意识集中体现在他这样一段话中：“史料熟不等于文献熟，史料熟只是局限于某一断代，而文献熟则是一种整体的感觉。一旦文献熟了，上起先秦、下迄明清的史料都可以从容处理。”正是这样的意识与能力，才使得他能够在长时段的历史脉络中发现问题，并探寻问题背后的深层意义。

## 二、“出于宋学”：全局性的问题意识与深刻的学术关怀

先生在《松漠之间》自序中称：“对于研究课题的选择，我向来有两个原则：一是追求重大题材，即关注重要的、关键的、核心的问题；二是追求难度系数，偏好难度较大的、前人没有发现或者未能解决的问题。”正是在这种意识的激发下，他写出了一系列高水平论文，解决了诸多“既大且难”、关涉全局的学术问题。

正统与德运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核心问题之一，先生对此有过长期的关注与深入的思考。《“五德终始”说之终结——



兼论宋代以降传统政治文化的嬗变》一文，即对德运学说终结的缘由做了通盘的考察，揭示出两宋时期传统政治文化的重大转型，及其对中国古代后期历史的深远影响。《德运之争与辽金王朝的正统性问题》则以辽金两朝的正统性为线索，系统地剖析了辽金元明清历代对北族政权的政治定位问题，进而勾勒出近千年来华夷观念的演变轨迹。又如阻卜与鞑靼之谜，是困扰自王国维以来中外学人的一道世纪难题，《再论阻卜与鞑靼》通过全面考索辽金元文献及契丹、女真文字材料，终于破解了这一谜团，为阿尔泰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即便是辽金史范围内的具体议题，先生也时时表现出统摄全局的眼光，如《金朝初叶的国都问题——从部族体制向帝制王朝转型中的特殊政治生态》一文，便是将金初的国都问题置于整个北族王朝政治体制变迁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其研究理路颇具启发意义。

不难看出，先生内心深处的学术旨趣在于关注历史发展的核心问题与脉络走向，这种深刻的学术关怀显然已经超出了一般意义上断代史研究的范畴，而是在努力探求一种多元的研究路径和恢弘的学术格局。

### 三、走出辽金：跨断代的学术气局与跨学科的研究视野

针对当今学界在研究视角与学术格局方面所存在的不足，先生曾感慨，如果仅按照目前通行的专业人才教育模式，大概只能培养出“中规中矩的专家”。有鉴于此，他在学术研究实践中，力图突破断代与学科的藩篱，以期进入一种通达的学术境界。

在已发表的成果中，最能体现先生跨断代气局的当数围绕华夏观念与正统问题的一系列论文。《南北朝的历史遗产与隋唐时代的正统论》、《正统论下的五代史观》、《元明革命的民族主义想象》、《“倒错”的夷夏观？——乾嘉时代思想史的另一种面相》（待刊）、《太平天国史观的历史语境解构——兼论国民党与洪杨、曾胡之间的复杂纠葛》以及上述关于德运问题的两文，正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这些研究直接反映了先生近十年来的主要用力方向，其上起魏晋、下迄民国，所涉时段之长，格局之大，在当前严守断代史楚河汉界的治学模式中，显得弥足珍贵。

先生还尝试将传统的历史学考据与语言学、人类学、考古学多学科的研究方法相结合。其中最为典型的要数他对契丹人名、字问题的研究。在《契丹名、字初释——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父子连名制》、《再论契丹人的父子连名制——以近年出土的契丹大小字石刻为中心》两文中，他充分利用契丹语文材料，并结合民族志资料与文化人类学理论，首度揭示出契丹人父子连名制这一不为人知的特殊民族文化现象，是跨学科民族史研究的典范。此外，《契丹人殉制研究——兼论辽金元“烧饭”之俗》一文，在参合传世文献、考古资料的基础上，引入文化人类学中“割体葬仪”的概念，对北方民族的人殉制度做出了全新的阐释。

先生跨越断代与学科的研究，绝非凭空而来，而是他通贯性的文献基础与全局性的问题意识所产生的自然结果。他经常教导我们，治史者应做到“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并在其最后一次学术演讲中精辟地提出“入于汉学，出于宋学”的治学主张。回首先生不足三十载的治学历程，我们隐隐发现，先生一直在用生命诠释着这一学术境界。可惜，一切都戛然而止了！就现有成

果而言,先生的研究早已跃出辽金史的范畴;不难想象,若天假以年,他必然会开拓出更加宏阔的学术天地。其实,恩师病中就曾谈到:“如果我的病能好,今后的研究重心就不想再放在辽金史上面了。”斯言犹在耳……走出辽金史,再看浦江师,或许,我们可以对先生的学术气局与学术追求有一番新的认识。

受业弟子 共书

2015年1月

## 怀念刘浦江先生

刘凤翥

我自己的知识面很窄，除了契丹文字的信息比较关注之外，对辽金史其他方面的人和事，很少关注。1999年，我偶尔去民族所办事，老干部办公室替我代收了一个包裹。我打开一看，是四本《辽金史论》，并有一封信函：

刘凤翥先生：

您好。我新近出了部论文集，呈上一册，请指教。另外几册请分别转赠史金波先生、白滨先生及民族所资料室。

前些年我的精力主要是放在金史上。近年刚开始涉足辽史，研究辽史不懂契丹字是肯定不行的，所以我有一个计划，准备过几年去拜您为师，跟您学契丹字，希望能够做这门绝学的传人，不知您是否愿意收下我这个学生？谨候夏祺。

晚刘浦江敬上 一九九九年七月

我当时并不知道刘浦江何许人也。经打听才知道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教师。以后他经常跟我通电话。2000年，他知道我在民族所申请课题费因我不与本所成员合作而遭拒后，他劝我去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去申请，我有点不好意思，所以

并没有积极办此事，他主动替我与当时的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主任张希清先生联系，张先生主动打电话给我，鼓励我拿着课题去北大做。我当时已经向社科院老干部局申请了课题，但还没有批下来。张先生说不管社科院老干部局是否批下来，都可以到北大来申请，也不要重新写申请了，把向社科院老干部局的申请报告底稿复印一份寄来即可。我照办了。当年秋天在正阳门箭楼有一个耶律楚材家族墓的出土文物展览，在开幕式上，我遇见了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的李孝聪先生。我女儿刘京雨在北大读书时，李孝聪先生是他们的班主任。所以，我与李先生很熟。李先生告知我：中心已经讨论通过了我的申请，批给了一万五千元。这都是刘浦江先生穿针引线的结果。之后不久我就去美国女儿那里探亲，2001年6月才回来。

根据我的记忆，我与刘浦江先生初次谋面是2001年10月29日周一良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我们正在排队，他自我介绍是刘浦江，并指着他身后的一位青年对我说“这位是我的学生康鹏”。从而与他们师生二人结下不解之缘。

2001年年底，北大方面问我课题费为什么还没有花，只有把钱花了才说明课题已经启动。我花了一万三千元买了一台IBM牌的电脑，开了一张五千元耗材的发票去北大报销了。从此我就开始了用电脑写作。

刘浦江先生再三劝说北大历史系领导聘请我去北大讲授“契丹文字研究”的课程。在刘浦江先生的策划和安排下，2004年上半年，我去北大给历史系的研究生开设“契丹文字研究”的课程整整一学期。这在北大历史系系史和契丹文字研究史上可能是破天荒第一次。对我个人来说也是人生中非常愉快永不能

忘的一件事。我讲课时，刘浦江每次都坐在第一排认真听，课下他与学生认真讨论。他从而掌握了契丹文字的知识。此后他就把契丹文字知识运用到科研和教学中去。给每一届学生都传授他学来的契丹文字知识，学生们几乎个个都掌握契丹文字知识，例如康鹏、陈晓伟等都发表了有创见性的契丹文字方面的论著。

刘浦江先生评教授时，北大请我给写推荐信，其中有一栏大意“是否处在学术前沿？”我说了大致如下的话：“刘浦江先生处于学术前沿。什么是辽史的学术前沿？是否运用契丹文字的资料来研究辽史就是是否处于学术前沿的标志。运用契丹文字的资料来研究辽史，刘浦江先生可能是海内第一人。所以他处于学术前沿。”

我家距离刘浦江家很远，所以除了开会之类的活动之外，平时很少见面，而是经常通电话。每次通话的时间都特别长，老觉得有说不完的话。之所以如此是彼此心灵相通，对人对事有着相同的认知。

我与刘浦江先生最后聚会是2014年3月25日。我们应邀去内蒙古大学参加申报“契丹女真传世文献整理与研究”的论证会。我们本应乘坐当日下午14点35分的飞机，但飞机有故障，修好后已经是21点35分了。我们在首都机场等了八个多小时，利用天赐良机做了尽情交谈。26日开了一天的会，晚上内大道尔吉副校长设酒宴款待。刘浦江先生肠胃不好，也没有酒量。但那天他端起一杯白酒走到同来参加论证会的聂鸿音和孙伯君面前说：“我的学生陈晓伟将来去民族所后，还请二位多多关照。”说完一饮而尽。在我的印象中，刘浦江先生比较高傲，我没听说他低三下四地求过人，但那次他为了自己学生的前途却

能例外地放下身段求人，那一幕给我的印象特别深，也使我非常感动。27日的会，刘浦江先生没有参加，他提前离会赶场子去邯郸参加另一个学术会去了，邯郸的会还没有开完，他的病就发作了。他在生病期间仍然从事各项学术工作。他给我打电话说2014年是我80周岁，由他张罗给我出论文集云云。

我接到的刘浦江先生给我的最后一份电子邮件如下：

刘先生：

很抱歉直到现在才给您回信。我上一疗程化疗结束后反应很大，恶心呕吐，加上出院当天又患重感冒，多日高烧不退，在家拖了一周，又于本周二重新回肿瘤医院住院。经过激素治疗，这两天才退烧了。估计要到下周才能出院。

自我生病以来，学生们因为担心影响我的治疗，很多事情都瞒着我，包括晓伟求职的变故，还有我的一个硕士生今年未能毕业，这些事情都是事后才告诉我的。我现在确实也是自顾不暇，就只好由着他们去了。无论晓伟最后做什么选择，我都非常感谢您为我的两位学生康鹏和晓伟所做的一切！

浦江

2014年6月28日

刘浦江先生用功刻苦勤奋，涉猎面宽，论著很多。我认为他的传世之作有下列三项。

一、他和学生康鹏合编的《契丹小字词汇索引》（中华书局，2014年）。这是一部契丹小字字库和契丹小字字典。每一个契

丹小字在传世契丹小字资料中的出处以及能够知道的读音和释义均一一列出。即是一部工具书，又是一部学术著作。是学界必备的工具书。

二、浦江先生用了十年的时间分门别类地编纂了《二十世纪辽金史论著目录》(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为辽金史学界减去了检索之苦,要查阅某方面的研究成果,可以按图索骥,极为方便。这是辽金史学界人人必备的工具书。这种不计较个人名利,甘当人梯、为他人作嫁衣裳治学精神令人钦佩。

三、对点校本《辽史》的修订。2007年至2014年间,浦江先生负责中华书局二十四史点校本修订工程之《辽史》修订。在他去世之前已经完成统稿,并已交稿。这是《辽史》校勘的大工程。

上列三本书几百年之后都会有人读。

刘浦江先生培养了一批德才兼备的学生。如康鹏、尤李、曹流、陈晓伟、邱靖嘉等。这些学生都在中央科研机构和重点大学中担任着科研和教学工作。传承和弘扬着他的学问和人品。

我们怀念刘浦江先生,就是要学习和弘扬他的学问和人品。

原载《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5年2月8日第3版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



## 忆刘浦江教授

宋德金

惊悉刘浦江教授逝世后，几天来一直沉浸在悲痛之中。虽然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就陆续听到不甚乐观的讯息，但总是希冀会出现奇迹，至少能够多维持一些时间。噩耗传来，还是感到太突然了。

我同浦江教授平素交往不多，最密集的日子是十多年前共同参与“10—13世纪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项目那段时间。他那广博的学识，快捷的语速，微微的笑容，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我们联系不多，有事才通电话，而且都很简短，不过我常从浦江教授弟子那里得知他的一些近况。我们之间算是君子之交，有了涉及对方观点的文章，赞同或商榷，曾在公开发表之前互相征询意见，表现了同行之间的尊重、信任与友情。每逢辽金史学会召开年会之前，我大都通话请他与会，但一律照例不去，他说我会支持学生去的，并说宋史会也很少参加。此举未必值得提倡，却是他不想把时间花在不愿意做或者认为不值得做的事情上的体现，这就是他的性格。浦江教授如许多评价的那样是真正的学者，心无旁骛，一心治学，在喧嚣浮躁的时下尤为难得。

我对浦江教授的认识更多地还是从他发表的著述中获得的。他的著述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论文，集中收在《辽金

史论》和《松漠之间：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里。其中许多文章表现出他穷尽史料的功力和善于发现问题的睿智。二是索引，有《二十世纪辽金史论著目录》及同康鹏合作主编的《契丹小字词汇索引》，为研究者查阅辽金史论著及研究契丹小字、进而运用现已解读的契丹小字词汇研究契丹辽史提供极大方便，可谓嘉惠学林，功德无量。三是古籍整理，有目前正在中华书局进行编辑、审读过程中的点校本《辽史》之修订本，是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的组成部分，《辽史》修订本文献材料使用充分，注重吸收相关学术成果，辨析考证精审，质量较高，得到审定者的好评。

许多人都说辽金史研究薄弱，固然有其一定的道理。由于历史上长期以中原汉族为正统的传统观念影响及传世辽金文献记载较少，又无大量新资料问世，大大制约了后人的研究。除一些中古史研究者外，人们对辽金颇觉陌生，也缺少关注，更不了解几十年来这个领域所取得的进展，遑论辽金学术史了，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20世纪上半叶，辽金史研究除了史料整理在前人基础上继续有所进展外，开始出现用近代史学方法进行研究。20世纪后半叶以来，特别是近三十多年来，辽金史研究取得很大进展。从20世纪上半叶仅有屈指可数的几位研究者到如今有许多学人从事这个领域的研究，并相继有经过专业培养的博士、硕士走进这个行列；从过去世人大都是靠杨家将和岳飞的戏曲、小说知道历史上还有“番邦”辽金，到如今已有更多的人知晓、关注辽金；从以往历史书中的辽金不过是附在两宋之后或叙述宋辽、宋金关系时顺便提及，到如今已形成独立的断代研究；从几十年前仅

有几本辽金史专著可读,到当前不断有相关论著问世;从契丹字几近成为“绝学”,到近年有不少学子为之钻研苦读;等等。尽管目前辽金史研究似乎缺乏在学界引起震动的鸿篇巨制,但是无论在拓宽领域、研究深度上,比起从前都有很大进展也是不能无视的。

辽金史研究发展到今天,是经过几代人的辛勤耕耘才取得的。现代辽金史研究,从上个世纪到目前,依学者生年、学术活动时间划分,大体经历了五代,分别为:一,20世纪前叶,或称民国时期,有冯家昇、陈述、傅乐焕、罗继祖等,其中冯、陈、傅被称“辽史三家”,连同罗,称“辽史四家”。二,新中国成立后,有张博泉、杨树森、张正明等;三,出生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文革”前大学毕业的一代及同时期的海外学者;四,当前五六十岁的一代;五,近年经过博、硕专业培养的一代。以上只是约略而言,无法细究,如陈、罗后来与第二代学人共同活跃在辽金史界。20世纪50年代至今,还有多位成绩斐然的兼治辽宋金元史的学者,这里不能备举。

不同时期的研究者具有不同的特点,会留下时代的印记,他们都为辽金史研究作出了各自的贡献。第一二代多已作古,硕果仅存者年事已高,但是他们对辽金史研究的开拓之功,不可磨灭。“文革”前大学毕业的一代,也多已年过古稀,奔向耄耋。这一代人的很多时光是在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中度过的,开始从事辽金史研究多在“文革”之后,其实比第四代早不了几年,除个别方面(如契丹字研究)超越前人外,重大突破不多。辽金史研究的大突破、大发展寄希望于现在的中青年学者,而浦江教授则是其佼佼者和代表。

综观辽金学术史，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史研究包括辽金史研究实现了从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的转变，及20世纪下半叶从近代史学向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转变，从而大大推动了辽金史研究进展，那么，当前我们如何把辽金史研究再推向一个新阶段？对此，界内在某些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共识：比如，纵横比较，三史兼治，即金毓黻早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的治宋辽金时期历史的方法“唯有三史兼治，乃能相得益彰”的主张；又如，利用契丹字解读和研究的成果研究契丹辽史。这两点虽然得到同行的广泛认同，但是鲜有学人能够真正做到，而浦江教授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果。诚如邓小南教授所说，“以他过人的资质，若能假以时日，做出来的成就应该是非常突出的”。惜其英年早逝，岂不哀哉！

浦江教授在短暂的一生里为辽金史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的逝世是中国史学界，特别是辽金史界的重大损失。对浦江教授最好的纪念，就是从他留下来的论著中汲取营养，学习他的治学方法和他那份对学术的执著精神。差可欣慰的是他的几位弟子都很优秀，相信他们会把老师未竟的事业进行下去，发扬光大，为把辽金史研究提高到新水平作出更大贡献。

深切怀念著名辽金史学家刘浦江教授！

原载《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5年2月8日第3版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审）

## 我与浦江的淡如水之交

李锡厚

刘浦江先生英年早逝，众弟子常怀丧师之痛，筹划出版纪念文集，我因此得以有机会表达对这位杰出学者的深切怀念。

我与浦江相识有年，虽相交不深，但彼此相知却可谓不浅。学人发表论著，通常都要声明“敬请批评指正”云云，我与浦江的交谊就是在不断相互批评指正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上一世纪80、90年代，我发表的文章即得到他的批评，随后发表文章，我择善而从，并对他表达了谢意。有时他批评得很不客气，我反驳也不讲情面。例如关于“头下”是否源于契丹语的问题就是这样。在这种你来我往、不讲情面的争论中，我们相互认真研读对方的著述，相知日深，并且建立了互信。

十多年以前，他的一本论文集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他找到我，让我推荐参加北京市学术成果评奖，这表明了我们的论争不但不伤感情，而且还换来了相互信赖。浦江的率真实在令我感动，我在推荐书上特意以他对我的批评为例，指出他是一位勇于明辨是非、学风优良的正派学者。过了几天，他高兴地打电话告诉我，他的书获奖了，我当然也为他高兴。

后来我的一本论文集出版时，在后记中又提及我与浦江在“头下”问题以及关于战前日本辽金史研究评价问题上的分歧，他看到这本书之后，写文章向读者推荐，同时重申他的见解。宋

人胡宏说过：“君子之交，虽相称誉，必以情实。”我们不敢自诩为“君子”，但我们做到了相互称誉“必以情实”，证据就存在于我们相互的论争及推荐对方著作的文字中。我们之间的这种关系，曾获邓小南先生的赞许。

前几年，一位声称自己是日本人的女士，为浦江的一篇文章纠缠不休，说他关于契丹文字的考证，侵犯了她的“著作权”。《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给我看了日本女士的文章。我虽不懂契丹文字，但知道这是一种死文字，它表达的契丹语也是一种死语言。而那位女士的文章竟然直接用拉丁字母拼写出契丹语完整的句子，却并不注明有何根据。一种“死语言”在她那里就这样复活了，这哪里是在研究，简直是在变魔术。我建议编辑部先请她说清楚：她是怎样构拟出契丹小字字母音值的。后来未听说她有何回应。学术是非与学者的政治立场无关，但学者亦是普通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忘记自己的祖国。那位女士的父亲亦是一位大学者，其公诸于世的简历，称其在北京某中学毕业后，于1939年考入“国立北京大学”。众所周知，“七七事变”后北大南迁，在昆明与清华、南开合组西南联大。1939年沦陷区北平冒出来的“国立北京大学”不是中国国立，是伪“中华民国”所立——实乃日本侵略者的“国立”。这所“大学”，是盗用北京大学名义、霸占北大校产的冒牌货。光复之初，当时的代校长傅斯年即通过陪都重庆报界郑重声明：复员后，伪“北大”教职员不予聘用，伪“北大”之学历一概不予承认。随后，邓恭三先生又代傅校长署文，严辞拒绝由汉奸周作人领衔伪“北大”一帮教授的“抗议”。近查该女士等为其父建立的网上纪念馆，简历、年谱之类已不复存在，但其他网站（包括某学会官网）上的相关简历依

然写明 1939 年考入“国立北京大学”。当此举国隆重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之际，凡我中华学子，岂可妄认伪“北大”为“国立北京大学”！呜呼！真伪不分，忠奸莫辨一至于此，岂不愧对无数抗战先烈和在世的抗战老兵。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 在刘浦江先生追思会上的发言

王曾瑜

我确实心里很沉痛，人到这个年纪，说实在的，感情非常麻木，听见死人不会太怎么样，引不起多少悲痛。因为别人的今天，就是我的明天，他早去，我晚去，就是这样。但刘浦江去世，使我心里非常难过，特别有一点非常感到遗憾，就是连他的告别仪式我都没能去，只是请我的同学刘凤翥代去了，所以在此对刘先生的家属表示敬意和歉意。

刘浦江先生可以用一句常用的话说：“生命不息，工作不止，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16个字用在他身上很合适。这几年我老想一件事，现在的条件和1966年以前比，有很多有利条件，也有很多不利条件。有利条件不说了，不利的条件，过去在1966年以前有的事情不大成气候，现在却成了气候。譬如说史学界出现了学术活动家，他们的共同点是什么呢？就是心思不怎么在学问上。我曾经感觉到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长跑，参赛的人都不是乌龟，都是快足健兔，但有的中间要退场，或者有的中间要找窍门，走捷径，各种情况难以尽述，但刘浦江先生一辈子集中了最大限度的精力和时间，认认真真搞学问。他是认认真真从起点跑到终点的一位，确实令人起敬。

目前歪风邪气很多，占第一位的就是趋炎附势风，危害相当大。有一位逝去的，也算是我的前辈，这位先生给胡乔木写了封



信,说多年来,在他的著作引导下,自己才学到了一点马克思主义。胡乔木没什么封赏的,就封赏他一个图书馆系统的高位。这是一个低级的马屁,为什么呢?胡乔木并没有出过类似像布哈林的《共产主义基础》之类的书,他没有写过介绍和引导人们学马克思主义的通俗作品。另一方面,写信的这样一个老学人,也根本不需要胡乔木著作的引导,自己看看马克思主义的原著好像也可以。这样一个低级的马屁,其实是不难看穿,却起了作用。当然,像这位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这样做是否符合北京大学的光荣传统,大家自己考虑和讨论,我不说了。但我觉得刘浦江不会做此类事。我印象很深,他提出要疏离政治,就抵制趋炎附势风来说,是有一点作用。但是有一点,像翦伯赞先生、吴晗先生当时冒着生命危险“反蒋”,争民主,这类事不能够误解。实际上,知识分子和政治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简单的。假如是良性的政治,一般来说是会疏离;但假如是不良的政治,就会出现各种情况。我觉得刘浦江先生提出这个问题,表明他同史学界的歪风邪气大致绝缘。

关于刘浦江先生个人的学术成就,我觉得他的作品相当精致。我特别感到遗憾,当时中华书局让我审读标点本《辽史》的修订稿,我审了大半,就得到了刘浦江先生去世的消息,成了遗著,我当时真有一种没法说的心情和感恻。《辽史》晦涩难读,大家不信,可以翻翻百衲本《辽史》。我那天和刘凤翥电话里谈起,当时我们初看《辽史》百衲本,还不是简直像在看天书。但有了陈述先生的整理,看起来容易多了。刘浦江是在陈述先生的基础之上,又花了很大的心思和功夫。且不说其他,光是我读这十六卷修订稿,自己就费了很大的劲,而且从中受教育,也足以证

明他为此花的心思和功夫有多大。

再说一点，我从刘浦江先生身上学到的一些东西，也使我很感恸。

我很注意刘浦江先生写的东西。他提出金朝入主中原，猛安谋克户占地，就像清朝初年的圈地运动一样，这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过去只是想到金朝强迫汉人改发型，与清朝的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相类似。这使我联想到其他方面，女真族两次入主中原，确有若干重要的共同点。

这次也有两条，是看《辽史》修订稿看出来的。一条应该是说自己犯了低级的错误，有一次，我给人家提意见，那位先生很好，回答我，说是他犯了“低级错误”。在此我也愿意使用“低级错误”这个词。我写《辽朝军制稿》，里面写节度州，大致就抄一下《辽史·百官志》，其实很简单，稍微看一下，陈述先生已经出了注了，有两个节度州，一个是祖州天成军，一个丰州天德军，我漏掉了。这次看了刘浦江先生的修订稿，才知道自己的失误，这是不应该的，属于“低级错误”。我在这个场合下愿意公开检讨，也向逝者表示敬意。

还有一个辽朝部族，叫“乙室巳”，因为古文里面自己的“己”，辰巳午未的“巳”和已经的“已”三个字是不分的。过去陈述先生写的就是“巳”，这次一律改成“己”。我一看不对，连忙给刘凤翥打电话，他说按照现在对契丹文的解读，应是读“己”，我看完以后，二话不说，马上在自己的书上和电子稿里改了。这也是就教于刘浦江先生的。

我最后有一个建议，为了对逝者表示敬意，我希望刘浦江先生这次花这么大力气，写了很多校记，能够尽可能多地发表，我

给中华书局的意见也写了。我勾出了标点本《辽史》修订稿的很多条目,原来他们是准备不出校,我都加了一句话:“似可出校。”就是这个原因。谢谢。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 追思浦江

李裕民

这是我第一次写追思年轻学者的文章。

我一向自认为豁达、乐观，不畏困难、曲折，行事干脆。但这些年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心却悄然在变小，不愿回忆往日伤感事。8月31日，浦江（我一直这样称呼刘浦江教授）的高足苗润博约我写篇纪念文章，顿时感到有些沉重，我说考虑考虑，显然有些犹豫。他小我21岁，竟然先我而去，还不足54岁啊！对文科的学者而言，这是出高档成果的最佳年龄！记得7月1日小苗到家来拜访我，说导师常跟他们说起我和他之间的友谊，还准备带苗到我家来。现在苗为了完成导师的遗愿，特意上门来，并且送我三篇论文的抽印本。这表明浦江在向贯通宋辽金史目标迈进，也想让他的接班人继续沿着这一条路前进。看到浦江有这样一位中意的接班人，看着他们深厚的师徒情，我很羡慕，也不忍心给这位年轻后生留下一点遗憾，于是拿起笔来，写点感想。

我和浦江有相同的学术渊源，我在1963年当邓广铭师的研究生。他则长期在邓师创办的中古史研究中心工作，经常接受邓师的指导。就性格而言，我们三人个性都相当强，说话直率，爱发表独到见解，不愿人云亦云。即使应约写书评，也不随便说好话，有缺点会毫不留情地指出，邓小南说我们三人性格一样，

相当准确。

我们都读过对方的论著，很了解各自的学术状况，但由于不在一地工作，研究方向不同，见面机会甚少。2002年7月31日，浦江和邓小南、田浩、黄宽重、宋德金等来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宴请他们，我是陪客之一，这大概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因为彼此了解，一见如故，不说一句客套话，就拉开话来。我谈起，文革中我的宋史书损失了，就研究古文字，搞了十几年，才回归宋史。浦江说：邓先生见到我发表古文字论文，非常奇怪，就问人，是否就是他的研究生。

2010年，陕西省成立杨家将影视公司，神木县的一个老板投资，老板、导演、编剧一致要聘我当历史顾问。我跟他们提议，还需要一位辽金史专家作顾问。8月5日，我给浦江打电话，请他出任杨家将影视顾问，他很高兴地答应了。我跟老板、导演、编剧说，浦江是目前中国大陆辽金史研究的代表人物，你们应该亲自登门，送上聘书和聘金。不久，他们回复：已登门照办，刘教授很客气。

以后，交往稍微多了一些。9月，他赠我《松漠之间》，我报之以《宋人生卒行年考》。11月6日，浦江来电话，拟写五代十国之名考，问欧阳修何以称北汉为东汉？予云：东汉之称不始于欧阳修，早在宋初陶谷的《清异录》中即称东汉。或许因为汉代建都长安，太原在其东北，故称东汉。

当杨家将电视剧稿写成后，浦江来西安参与审查，我俩难得在一起促膝长谈，谈得很投机。我说：“学术要发展，必须开展百家争鸣，但是现在缺乏这种风气。”浦江说：“上个世纪末，北京开过座谈会，我在会上指出，有的人围攻你，是不正常的。”又说：

“现在学术垃圾太多，这跟评估受权利操纵有关。”我也觉得现行评估体系有问题，它制约了学术水平的提高。谈起辽金史研究，我说：“它与宋史不同，必须文献、考古、少数民族古文字三结合。我曾尝试用四角号码将契丹小字编成索引，后来精力顾不过来，就放弃了。”浦江云：他一直朝三结合方向努力，现正让研究生全面整理契丹小字。

我们都有相见恨晚的感觉，本以为来日方长，有机会再详谈，谁知道，这既是第一次详谈，也是最后一次，奈何，奈何！我手头上留作纪念的只有书上题字：“李裕民先生雅正，浦江谨呈”。以及2012年元月22日除夕之夜的短信：“值此辞旧迎新之际，祝各位友朋节日快乐、随心之所欲。刘浦江恭贺。”

浦江走了，他为我们留下了两部论文集：《辽金史论》、《松漠之间：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两部工具书：《二十世纪辽金史论著目录》以及新近出版的《契丹小字词汇索引》，还有未曾结集的一批论文。数量不算多，但相当厚重。从这些论著中，可以看出其特点：一，创新意识、问题意识强，如《辽朝国号考释》、《再论阻卜与鞑靼》。二，抓大问题，但绝不作空论，如《德运之争与辽金王朝的正统性问题》、《女真的汉化道路与大金帝国的覆亡》。三，充满自信，绝不拉大旗作虎皮，如《辽金史论自序》所云。

就其学术路子看，走得正确。首先，从文献着手，整理《三朝北盟会编》，打好了基本功。然后在这基础上作研究，他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研究宋，二研究辽金。一般多选择宋，他选择研究队伍比较少的辽、金。现有研究辽金史的，以从事考古者居多，他们的优势是考古，缺点是文献基础不足，特别是对宋方的记载发掘不够，少数民族的古文字不懂。而研究少数民族古文字的

学者，基本上侧重文字角度。浦江则综合各家长处，力图穷尽资料。辽、金范围比较大，就分两个阶段进行。首先研究金朝，因为《三朝北盟会编》金的材料相对比较多。浦江的第一本论文集就偏重于金。在研究金史中取得经验后，进而研究辽，就快捷多矣。此时也适当研究宋，目的是贯通宋辽金史，在更高的视野中观察宋辽金史，希望超越当前的整体研究水平。他清楚地看到，当今有些宋史研究者，已在兼治辽金史，但他们的做法算不上贯通，他们写的“宋辽关系史，实际上是宋朝对辽关系史。所谓的宋金关系史，实际上是宋朝对金关系史。”（《辽金史论自序》）也有个别辽金史的研究者写过一些宋史文章，但数量不多、质量一般，也不能算贯通。浦江在治辽金史的同时，写了一些宋史论文，如《祖宗之法：再论宋太祖誓约及誓碑》、《宋代宗教的世俗化与平民化》、《宋代使臣语录考》、《辛稼轩〈美芹十论〉作年确考》，还有兼及宋辽金者，如《文化的边界——两宋与辽金之间的书禁及书籍流通》、《河北境内的古地道遗迹与宋辽金时代的战事》，显然，这就是他追求的“贯通”或“旁通”之路的表现，他说过：“这种治学路数也一直是笔者的学术理想与学术追求，可惜心向往之而力不能至。”（《穷尽·旁通·预流：辽金史研究的困厄与出路》）这话有谦虚的成分，但基本上是事实。平心而论，这些论文是其他治辽金史者所不及的，但比起浦江辽金史论文的质量来说，就显得逊色了。如《宋代使臣语录考》，收入的是宋人出使辽、金的语录，并未收入出使高丽、使蒙古的语录，而所收 24 种南宋语录中，其前 5 种实际上是北宋的作品。因此，确切地说，浦江是正在往贯通方向努力，但尚不能称已经贯通了宋辽金史。当然，如果假之以年，以浦江的功力是可能达到这一目的的，而

现在只能由他的门生去完成了。

从我与苗润博的交谈中，看到苗下决心去完成导师的遗愿，从他的写的论文看，基本功比较扎实，是个好苗子。但我要提醒一句，此事急不得，博士期间不可能一下子贯通，还是得一步一步来。我认为，治辽金史者要贯通宋，不是能够写几篇宋史论文就可以了，而是必须写出高质量的宋史论文，足以使宋史专家折服才行。反之，宋史专家要贯通辽金史，也不是写几篇辽金史论文，就算贯通了，必须写出高质量的辽金史论文，足以使辽金史专家折服才行。我也曾有心贯通宋辽金史，甚至一度有过贯通更大范围的野心，从先秦到明清，都写过一些论文，但真正要贯通，谈何容易。现在年事已老，必须收缩战线，集中到宋史上，贯通的任务只能由年轻人去承担了。

浦江的早逝，也提醒我们，一定要照顾好身体。浦江，他太用功，又太不顾身体了。从小苗处得知，他常常睡不好觉，一度靠吃安眠药维持，而不曾考虑更积极的办法，如加强锻炼，适当休息，注意食补等。一味吃药，副作用很大，结果越吃越多，最后金刚般的身体也顶不住，何况他原本较弱的身子呢！

2015年9月24日于西安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 悼浦江

史金波

2015年元旦刚过数日，就得到学生报告噩耗：刘浦江教授去世了。去年浦江检查出身患不治之症，业内人士都已知晓，无不为之惋惜，对于他不久人世，似皆有预感。但浦江真的离我们而去，又确实是让人难以接受的事实，感到无比痛心，不胜唏嘘！因为他太优秀！因为他太年轻！

我和浦江应是大同行，他主要做辽金，我则多做西夏，研究对象是同一个时代。也许是我比他年长20多岁，也许是我们都不善于交际，我们认识不早，来往不多。在相关会议上见面，时间紧促，多是寒暄问候。最后一次见面是在2014年3月底在邯郸召开的“元代夏汉文合璧墓志铭研讨会”上。那次浦江一方面受邀参加会议，一方面也想借机参观他曾做过研究的邯郸古地道。30日上午一起开会，我和浦江都做了会议发言，他报告的是邯郸南宋地道，向大家介绍那是规模最大、结构最复杂的古代实用战斗地道。下午是考察时间，因邯郸南宋地道不能参观，我们便一起去到距此不远的响堂山石窟和磁州窑参观考察，同行的有首都师范大学的李华瑞教授和一些年轻的专家们。这是我和浦江在一起历时最长、谈话最多的一次聚会，我们还在磁州窑遗址大门外合影留念。没想到这竟是我和他最后一次见面，这张照片也成了最后的纪念。



在这次开会和考察期间我们多次交谈辽金西夏学术，似乎没有学科的畛域，没有年龄的代沟。谈话中他告诉我们，最近腿有些疼，走路有些不便，大家也都没有在意。事后才知道，这可能就是他重病的反映。邯郸会议后不久，就传来不幸的消息，浦江检查出罹患癌症，难以治疗，但其精神尚好，仍未放下手中工作。一位风华正茂的专家，遇此沉重打击，竟然能泰然处之，若无人生定力，难以做到，令我深受感动。

我认知浦江有一个过程。大约在上世纪90年代，浦江在辽金史研究方面崭露头角，受到学界关注。我通过他的文章，看到这位年轻人有深厚的史学功底，有熟练的治史方法，有严谨的治学态度，是一位有前途的青年学者。同时也看到他善考据，多辩证，爱訾议，常发覆的风格。有时看到他为一难题反复议论，穷原竟委，累词千百，讲到妙处，令人心悦诚服，拍案叫绝。

后来从学友刘凤翥兄处得知，他在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

究中心开讲契丹文课，不少师生参加学习，其中就有已经成为教师骨干的浦江教授。浦江作为辽金史学专家，考虑到少数民族文字文献对深入研究历史的重要意义，在已成名之后，能与学生一起从头潜心学习契丹文，是他一次难能可贵的突破性选择，是他学术生涯的一次里程碑式的提升，同时也开创了北京大学古史研究重视少数民族文字文献的新风。

古时辽金与西夏是近邻，现在辽金研究和西夏研究应是“近亲”。我注重西夏文文献，并以此为治西夏史的一方基础，同时也关注多种少数民族文字文献及其对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助力作用。得知浦江带领众学子研习契丹文，觉得多了知音，多了同道，内心十分高兴。此后浦江在凤翥教授的指导和支持下，带出了多名既熟悉辽史，又掌握契丹文的学子。尽管契丹文字至今尚未完全解开，但利用现有契丹文文献资料，结合汉文史料，考究、佐证辽史中的重要问题，已经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听说他后来还参加了《蒙古秘史》读书班、古突厥文读书班，看到他对学问孜孜矻矻的追求精神，也理解他对学术贯通上下的宏观视野，由是我又增加了对这位中年学者的景仰之情。

西夏学与辽金研究密不可分，原来辽金史学会老会长陈述先生筹备组织辽金契丹女真史学会时，我任民族所历史研究室主任，陈先生曾邀我参加辽金史学会的筹备工作。当时陈先生有一个想法：即辽金（契丹女真）史学会也可以包括西夏（党项）史研究。后来我也不止一次参加辽金史学会的学术年会。自2010年开始，便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或我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西夏文献文物研究”的名义，支持或主办《辽金西夏研究》，自201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

研究中心和中国民族史学会辽金史分会共同编纂出版《中国辽夏金研究年鉴》,这样使辽夏金研究有了一个沟通的园地。我和辽金史分会会长宋德金先生都对浦江寄予厚望。

浦江治学严谨,善于钻研,学风清正。他讨论学术实事求是,评价观点不避亲疏,往往直言己见。他这种耿直的作风获得学界的好评。他还能针对学界时弊,发声针砭,虽或有不同意见,也成为当下学术领域的一股新风。

浦江是大学的教师,既做研究,又培养学生。据他的学生反映,他不仅严格要求自己,教书育人也很用心,多亲力亲为,耳提面命,一丝不苟。正是这样严格的要求才能带出擅长考究、利用文献,能够熟悉论证、说理方法,善于通达、明晓表明观点的学生。我想浦江教授找到了培养史学人才的良好途径。

浦江治学专心致志,耐得住寂寞。他曾将治辽金史比喻为“垦荒”。我作为西夏研究者,对此颇有同感。在正史中无一席之地西夏史比起辽金史更显荒芜。浦江治学勤奋,学养深厚,知识宽博。他在辽金史方面,涉猎政治、民族、经济、文化、宗教、地理、人口、民俗、遗民、文献、考古、语言、文字等多方面,且都有不俗的收获。若无长期学习积累,难以达到如此广度和高度。一个学科,一个研究领域,需要国内外很多专家从不同的侧面努力钻研、共同培育,更需要有功底扎实、熟悉全局、贯通整体的学者。我认为浦江是具备这样潜质的人才。

浦江是学术界看好的后起之秀,他年富力强,是辽金史研究的一颗新星,前途未可限量。大家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能在辽金史乃至中国古代史研究方面发挥更多的作用,最终能成为领军人物。

谁料天不假年，浦江英年早逝，使辽金史研究失去了一位英才，遭受重大损失，业内人士无不扼腕长叹。

生老病死，本是自然规律，可视为人之常情。但对于人的去世，是永远的分离，总给亲人、友人带来极大的悲痛。过去我们多是悼念已故的学术界前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是一个老所，也是一个大所，老专家多，特别是我所在的历史室，更是集中了一批知名的学者，民族所三位老二级研究员都在历史室。这些老专家对我们认真培养，谆谆教诲，耳提面命，师生间感情深笃。随着岁月的流逝，老师辈年事增高，陆续离开我们。这些老专家都是我熟识的老一辈知名专家，我从他们身上既学到很多专业知识，也学到了他们的治学理念和方法，更受到他们优良学术品质的熏陶。他们去世时，凡属民族所的老专家我都参加或组织追悼送别，至诞辰 100 周年或 110 周年时，参加追思纪念活动，并撰写纪念文章，感恩他们的教导，继承他们的事业。参加老一辈专家的悼念，是黑发人送白发人。我年事渐高，早生华发，此次悼念小我 20 多岁的浦江，成了白发人送黑发人，心情更加伤感，更加悲痛。

我赞赏浦江的学识、钦仰他的人品，但碍于业务繁忙，机缘悻吝，两人未能多有交流，回想起来，很有惆怅失落之情。浦江给我们留下了浸透其心血的诸多论著，以及他的治学精神和治学方法，我们应该珍视他有形无形的知识遗产，体念他的成就贡献，学习他的治学情怀，光大学术业绩，以为对浦江教授真挚的悼念。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

## 置身功利外 心在学问中

——怀念刘浦江教授

张邦炜

年初，惊闻浦江走了。我悲恸异常，竟仰天长啸：浦江，你走得太早！由于年龄与探讨重点的差异，我与刘浦江教授交往不算多，但印象极好——得邓广铭先生真传，最具书生本色。常言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或许因为了解不多，在我心目中，浦江只有优点，几乎没有任何缺点，形象很高大——置身功利外，心在学问中。在士风卑下，功利至上，读书人大多很现实的今天，太难得。

其时正值严冬，我同众多老年亲友一道，远在海南岛避寒。我们这个非亲即故的过冬群体，来自各行各业，是个“小社会”。我向亲友惋惜地述说浦江，其实不用我说，当时《光明日报》、《东方早报》、《澎湃新闻》、《凤凰新闻》等不少媒体海量宣扬浦江，浦江魅人的人格、精深的学问、脱俗的境界，活灵活现地展现在人们眼前。亲友们阅读后，被浦江的纯真、质朴、豁达深深打动，异口同声称赞这位“真学者”、“好老师”。不知怎的，我不禁想起宋朝人的两句话：“天下之患，莫大于士大夫无耻”<sup>①</sup>；“百物踊贵，只一味士大夫贱！”<sup>②</sup>眼下社会各界均为若干读书人的堕

<sup>①</sup> 游酢：《上徽宗论士风之坏》，赵汝愚编：《宋朝名臣奏议》卷24《君道门·风俗》，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校点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上册第240页。

<sup>②</sup> 朱彧：《萍洲可谈》卷1，李伟国点校，中华书局，2007年，第121页。

落而深感忧虑与不齿，“砖家”、“叫兽”、“无良”一类的称呼，让读书人脸面无光。浦江总算为读书人争了口气，挽回了一点颜面。于是，我在格外惋惜、十分悲痛之余，才平添了些许自豪感。

我与浦江相识较晚，迟至1997年。那年初秋，台湾大学王德毅教授访问北京大学，要专门会会北京地区的宋辽金史青年研究者。我恰好去东北，路经北京。因我与德毅教授在北京和台北曾几度会面，时任北大中古史研究中心主任的张希清教授邀我作陪。在座谈会上，我初次见到浦江。他给我的第一感受是：年轻、睿智且自信。浦江的发言独具一格，主要是感叹辽金史研究受冷落，辽金史学者很孤寂：“缺乏同道，缺乏对话者，与唐宋史学界的风光场面不可同日而语。”发言仿佛很低调，其实内中饱含着拓荒者的勇气和打通宋辽金史研究的雄心。德毅教授大概如此鼓励他：与唐宋史学者同行，就不寂寞；辽金史有待开垦的荒地甚多，正好大展拳脚。和我并肩而坐的辽金史专家李锡厚兄向我耳语：这位年轻人是邓广铭先生老来器重的弟子和助手。从此，我和浦江开始接触，有所往还，诸如互赠论著之类。我偶有所托，如本系同事申请到北大进修等事，他都依规热情尽力办理。据我观察，浦江多有酷似邓先生之处。记得，我曾对邓小南教授说，从性格上看，浦江或许比你更像令尊。小南当即表示认同。

清代史家章学诚说：“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潜沉者尚考索之功。”邓广铭先生引用此语，激励后学，应将“高明”、“独断”与“潜沉”、“考索”作为自己的学术追求和奋斗目标，在这两大方面狠下功夫<sup>①</sup>。仅就选题而言，浦江便是个“高明者”。他有两个取

<sup>①</sup> 《邓广铭治史丛稿·自序》，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

向：一是关键性题材，浦江不会为凑考核数量，去探究“洪秀全的胡子”一类鸡零狗碎的碎屑论题；二是难度指数高，他也不会靠耍小聪明取巧，去做那些“得来全不费工夫”的事情。“取乎法上，得乎法上。”浦江发前人所未发，道前人所未道，在辽金史领域取得开创性的成果和系统性的进展。仅凭正置于案头的《辽金史论》和《松漠之间》两书，也足见其“独断之学”与“考索之功”。这些，辽金史学者多有评论，不用我再多说。我辈“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王曾瑜兄语），理当服气。无论大环境还是小气候，与前辈相比，浦江都是幸运的。他没有遭遇“抗战八年”的艰难，较少经受“文革十年”的折腾。至于四川的“三年饥荒”，他毫无记忆，只是听说而已。从某种意义上说，浦江的成就是时代造就的。

浦江不凑热闹、不赶时髦，是位做“真学问”的“潜沉者”。学问不是开会开出来的。如今研讨会太多，或可称之为“会灾”，更有极少数十处打锣九处在的“积极”参会者。浦江可能又极端了些，他身为宋史研究会会员，似乎从未出席宋史年会。这也是我和他接触较少的重要原因之一。浦江书生气重，就“课题意识”与“人民币意识”两项而论，他是个“双差生”。如果再加上“获奖意识”，浦江还是个“三差生”。据小南介绍，他一生极少请奖和得奖。浦江追求的是“更为恒久的学术价值”。他在《松漠之间·自序》中说：“至于能不能申报什么项目，有没有经费资助，是不是当下学术界的热门话题，是否合乎国际汉学界的口味等等，则只好置之度外了。”浦江宣称：“我的著作是决计不要名家作序的。”熟人皆知，浦江身处北大，又是个出尖拔萃的青年才俊，要请位名家作序，易如反掌。但他在《辽金史论·自序》中说：“既然是学术著作，何须来这种俗套？如果连这点自信都没有，即令



有名家捧场又能怎样？我们处在一个价值判断力彻底沦丧的时代，人们不得不依靠序引、‘书评’或者获什么奖之类的名堂去衡量学术水准。这真是学者的最大悲哀。”<sup>①</sup>有段时间，“唯文凭论”甚嚣尘上，以致文凭真假难辨，于是出现了“假的真文凭、真的假文凭”一类的顺口溜。让我钦佩的是，浦江岿然不动，拒不攻硕，更不攻博。他淡定自若，不图虚名而务实学，坚信“学位不等于学问”。浦江临终，仍然是个活脱脱的“刘学士”。这正是他本色书生的绝好写照。

浦江也有心不在学问之时。他数年前曾担任北大历史系副主任，主管教学工作。那两年，我曾几度访问或顺访北大，传入我耳朵里的是一片叫好声。“在其位，谋其事。”浦江将自己的辽金史研究放在一边，一心扑在全系的工作上，不仅服务态度好，而且办事效率高。这是多么可敬的献身精神。凭着浦江这股劲头，如果假以天年，北大历史系兴许还有第二次“邓广铭变法”<sup>②</sup>。只是其推行者将不是邓先生，而是其高足刘浦江。

邓先生最反感的是：“奄然媚世为乡愿。”<sup>③</sup>浦江同样厌恶“人情练达、乖巧玲珑的那一类人”<sup>④</sup>。他为人耿介磊落，和邓先生一样，敢于并善于开展学术批评。本人就领教过浦江的“犀利”。2005年冬，我以拙著《宋代政治文化史》相赠。他当即来信，不按常规出牌，不用“但书法”，而是批评在先，表扬在后。他

① 刘浦江：《辽金史论》，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3页。

② 上世纪70年代末，邓广铭先生出任北大历史系主任，大刀阔斧推行新政，学界戏称为“邓广铭变法”。

③ 《邓广铭治史丛稿·自序》。

④ 刘浦江：《松漠之间：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第403页。

开门见山：“书名有问题，‘政治文化’一词系误用。”然后再说：“先生的长处在于大局观，值得学习。”我回信说：“批评极是，但我在《前言》开头有解释：‘本书的内容不外乎宋代政治与文化。’”<sup>①</sup>浦江对王曾瑜兄《金朝军制》一书的平议，又是一例。浦江痛感“今日中国学术界书评的庸俗化、操作的程序化乃至语言的格式化”，为避免此类弊病，他动笔之前先致书曾瑜兄，申明书评将是“一篇纯学术性的严肃的文字，不含任何庸俗的成份”。曾瑜兄的态度极端正，立即回信：“欢迎任何批评。”<sup>②</sup>浦江的书评在充分肯定的同时，毫不掩饰地指出《金朝军制》一书的不足。曾瑜兄作为前辈北大人大致是出于恨铁不成钢的心理，素来对后辈北大人期望高、要求严、好评少。然而数年后，他居然在上海宋史年会上，破例公开表扬他的这位批评者。我耳闻目睹后，多少有些吃惊。如果说浦江的《〈金朝军制〉平议》有“高高举起，轻轻放下”之嫌，那么浦江与李锡厚兄的讨论相当较真。在讨论辽朝头下军州的起源时，锡厚兄认为辽朝的头下与唐代的头下户有关。浦江则断言：“（李锡厚先生的论断）没有什么史料凭据”，“是我所不能接受的”。甚至使用了一些较为尖刻的语言，如：“唐朝的‘头下户’与辽朝的‘头下’一词只不过是一个偶然的巧合，前者是汉语词，而后者是契丹语的译音，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就像葡萄与葡萄牙毫不相干一样。”语言虽然较尖刻，但仅限于学术讨论范围。浦江敬重锡厚兄，他赞扬“（李锡厚先生）率真的性格”、“学者的本色”<sup>③</sup>。关于辽朝头下军州的起源，锡

① 张邦炜：《宋代政治与文化史论·前言》，人民出版社，2005年。

② 《松漠之间》，第387—388页。

③ 《松漠之间》，第78、403页。

厚兄仍坚持己见。但他接受浦江对其《叶隆礼和〈契丹国志〉》一文的批评,认为“所言极是”<sup>①</sup>。不久,锡厚兄偕同夫人来成都探亲,趁机与我相聚。二人谈及“葡萄与葡萄牙”这桩学术公案,锡厚兄不是痛心疾首,而是开怀大笑。我问锡厚兄:“浦江其人如何?”他的回答是:“学问好,人品好(大意)。”浦江与锡厚兄的学术交锋,真可谓两位“真学者”之间的“真讨论”。锡厚兄、曾瑜兄和浦江受业虽有先后,都是邓广铭先生的高足,同为宋辽金史研究的中坚。“严师出高徒”,邓先生素以对弟子既循循善诱又严格要求著称。据说,浦江也是一位严师。他日所思、夜所想的是学生,临终向同事托付的唯一身后事依然是学生。他的弟子们如今已崭露头角,日后前程无量。浦江事业未竟,所幸后继有人。

浦江离世已达数月之久,我仍不时想到他,想到他那些超凡脱俗之处,甚至认为他不愧是一位用特殊材料做成的人。浦江是标杆,是镜子,用他做尺子量量自己,深感差之远矣。此生已是西边的太阳,愿来世同浦江一样,做“真学问”,当“好老师”。浦江的高大形象活在我心中!

2015年9月3日凌晨

于成都龙泉驿青苔山村

(作者系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

<sup>①</sup> 李锡厚:《临潢集·后记》,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19页。

## 不虚此行

——从几个侧面看刘浦江的脱俗人生

黄宽重

浦江兄的英年早逝，是中国史学界的损失。他的学术表现自有领域相近的师友评价，其为人处事，也有北大历史系的同事，特别是相知甚深的朋友们撰文。我与他结识近二十五年，对他的学素养为钦服，但因治学领域有别，虽称相知，但实务工作不多，无法贴近掌握其学行精髓，只能就多年往来中，若干侧面所做的观察，来缅怀浦江兄脱俗的人生。

1989年我第一次访问北京大学，当时听说恭三先生向北大力荐浦江兄进古代史中心的事，非常纳闷惊讶；一个没有具体学术表现的本科毕业生，竟劳恭三先生向校方力争，破格任用。以当时台湾学术制度的规范，这类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因此，对刘浦江的名字印象深刻，想看看他到底有何能耐！

接着几年，我都曾访问北大，与浦江兄见过几次面。看他清瘦的身材，理个小平头的白净书生，顶标致的，但彼此不熟，都很客气，交谈甚少；只知道他正帮恭三先生整理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恭三先生早年在李庄史语所读书，知道所里有几种线装的《三朝北盟会编》，问我可否协助向所方申请资料，供他参考整理。经所里同意，印了包括清乌丝栏刻本，共二种本子。在这中间与浦江兄略有联系，对他整理《三朝北盟会编》的进度与内

容稍有了解。但当整理告一段落后，得知由于整理的方式与出版社要求不一致，在邓先生过世后，出版的事遂被搁置。《三朝北盟会编》不能出版，想来是浦江兄的憾事，但他淡然处之。也许对他而言，更重要的是在长期整理的过程中，对宋辽金史扎下深厚的基础，学术识见卓然跃升，已冲破史料整理的囿限。对《三朝北盟会编》整理成果未能面世，固有遗憾，但遗憾的已不是浦江兄，而是未能受惠的整个学界。

1993年，我结合多位宋、辽、金史的学者，在蒋经国基金会的支持下，执行为期三年的“宋代的家族与社会”计划。经邓小南教授的力荐，特别邀请到浦江与包伟民两位青年学者参加。这个计划为当时各种资源匮乏的大陆高校教师与研究者，开启了与海外交流的管道，但更重要的是海外同道得以真正认识中国蜕变的学风与质朴的学者。因为计划的关系，我与浦江兄有较多的接触，虽然话题不多，但已然看到他一篇篇类型有别、史料扎实且具深度创见的论文相继发表，体现了他惊人的学术实力与自信。由多篇论文集结成的《辽金史论》论文集，处处有新见，功力深厚，受到学界肯定。因此，邓广铭学术奖打破以专书为限的规范，特别颁奖给他，这是对他学术表现第一个具体的肯定。

2004年，我因许倬云教授与邓小南、牛大勇、李伯重教授等人的协助，受邀到北大与清华历史系，各讲学一学期。在近一年时间里，与北大、清华师友，有较密切的接触，也与浦江兄时有往来，对他有更多认识。首先，得知他胃肠不好，饮食有节制，应酬较少，身体虽清瘦，但精神奕奕；他平时不多话，但发言坦白真挚，直指要点，不虚应故事，特别对学术质量的要求毫不妥协；对

学生学术报告的评论，绝不敷衍。他对几位高徒，期许甚殷，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康鹏。康鹏因和邓小南教授的几个学生方诚峰、高柯立等情谊甚笃，与我互动较多；可能是他的第一个学生，浦江兄对康鹏经常主动关怀、耳提面命，且照顾有加，新婚的康鹏夫妻倍感温馨；但期许既深，也让他承受学术传承的压力。

浦江兄研究辽金史，用力至深，层面甚广。他藉编纂相关研究论著书目，发掘可以发展的议题；勤搜新出土资料，藉研读史料训练学生，甚至和学生向刘凤翥教授学契丹文；更大量阅读宋人对辽金的史料，从更广泛的角度去理解辽金史。因此，他的论文篇篇都是在坚实史料支持下，所提出的新见解，且不囿于断代之限，而有更宽广的视野，这些都是浦江兄明显超越前人之处。更值得一述的是他对语言学治史有浓厚的兴趣。他曾提及李锦绣教授在中年之后勤学阿拉伯文，深化对唐史的研究，对李教授的用心与毅力深为钦服；认为中国学者若能善用俄文，对辽金史的研究，将更具学术新义。他具体的想法与做法，未与我深谈，但从他希望康鹏着手学俄文的期待，可以想见其学术视野与企图心。不过这一期待，对康鹏产生很大的压力，在当前中国大陆新的学位制度下，很难在三、四年内既要完成学位论文，又学好一种新的语言；康鹏求助于我，我遂以自身在史语所看到前辈利用语言解史的限制为例，请浦江兄从长计议。他可能接受我的意见，没有再要求康鹏学俄文；但康鹏还是修了俄语，并顺利通过考试。浦江师徒对学术的冲劲与热忱，让我既钦佩又惭愧；我自中年以后，已是坐井观天的井底之蛙了。

浦江兄以严谨的态度治学，训练学生颇有严师之威，这是他出于为学术领域发展、建立更坚实的基础，所摆出的明确态度，

也为北大历史系在辽金史的发展，奠定一个可长可久的人才培育准则。但在生活层面上，则以慈父之姿关心、关怀学生，让外地来的学生祛除对异地适应的焦虑，因此，学生对他特别心怀感激。这种以严慈并济的态度，来对待学生、对待学术，让他的学生自然形成内聚力很强的团队，从他亲领学生整理《辽史》所获致的重大成果看出，浦江兄不仅培养出优质的后起之秀，更将其的风格与风范，长留在北大历史系的传承中。

浦江兄对学术的态度与恳切直言的个性，是学界的典型。他不论在课堂、会议，乃至学术评议，所秉持的原则始终如一，在人情浓厚的中国学界，属少数维护学术尊严的学者；是否为此招来困扰我并不清楚，但有一次我突然接到北大历史系学术委员会召集人阎步克教授驰函，邀请我协助评断一件学术伦理的事。我基于维护学术质量，答应协助；接到资料才知道对象居然是浦江兄。经我细细比较陈述与论文的内容，认为此项指控实属于虚乌有，因此写了一份报告，加以澄清。我对涉及学术伦理的事，不论亲疏均认真对待，秉公撰写，一方面期望学界步上正道，一方面也不希望空泛指控，害人名节。以浦江兄治学之严谨，积极维护学术的准则，我要还他一个公道。当然，浦江兄并不知我在此事的角色，至于何以发生这件事，我也完全不清楚。

浦江兄对北大历史发展的关注是全面的。2004年，我在北大期间，与浦江兄的互动虽多，但他居家，少到学校，对他的了解并不全面，只知道他专注辽金研究，为了留住优质学生，相当重视历史系大一通史的课程；至于其他公共事务似乎并不关心，好像是活在以书斋为中心的学者。哪知2009年，我再到北大三个月时，看到的是另一个浦江兄。那时他担任北大历史系教研副

主任，常看到他与大勇兄，筹谋如何增强师资阵容，为强化博硕士生训练而忙碌；见面所听的无非是如何有效提升学术质量，增强学术交流的宏论；从朋友口中更得知他善于筹划、沟通，乃至执行，冲劲十足。与先前所认识沉默的浦江兄判若两人，实有士别三日，刮目相看之感。不过，随着大勇兄任期届满，浦江兄回归单纯的教研生活，更积极以质朴致远的学术训练方式引导学生。听学生告诉我，他上“《四库全书总目》研读”课，要求学生每篇提要乃至版本内容，都做仔细的核对、校正，而且篇篇都是自己先行研究过的；这种训练方式，对学生的研究，奠下坚实的基础。及至承担《辽史》新校工作时，身体已亮红灯，仍亲身亲为，严格把关；如今新校本《辽史》即将出版，不仅见证浦江师生共同努力的成果，也是浦江留给学生和学界，最具体而丰厚的资产。

浦江兄性格乐观、积极进取。他的身体虽微恙，但善于调养，对生命充满信心，与我病态彰著，显有差异。因此，见面时，每疏于关注他的身体，反而劳他关切我的健康。不意，去年春天以来，陆续得到他身体变差，甚或有癌疾的消息；虽然挂念，总认为以今日医疗科技之进步，加以他的乐观，必将克服难关；接着得知他住院医疗，病情似不平稳，深以为念。2014年7月初，我与长庚医学系教授至北大医学部从事学术交流，在北京有一周的停留；本想与同行的医师朋友去探望他。得知他受到北大肿瘤医院最好的照顾，且已返家休养。为避免打扰他的作息，我透过电话慰问。在电话中，本只想以过来人的经验宽慰他，不敢长谈，没想到浦江兄虽在化疗中，仍以充满坚强乐观的语气，述说他对抗病痛的心情，在医院时不但安慰丧失信心的病友，还与往



常一样，定时邀集学生讨论论文与点校《辽史》的问题，丝毫不受病痛的影响。这种在极度危急的情况，仍对生命价值充满信心，对学术传承充满热情的态度，令人佩服；对久病的我更有无限的启发。

北京之行，没见着浦江兄，是我一生憾事。后来，透过邓小南教授的转达，得知浦江兄的病情反复；最后决定回重庆老家安养。2015年1月8日清晨，我有事联络小南教授，却从电话那头意外得知浦江兄的噩耗；原来当时小南教授与北大历史系的师友，正在重庆送浦江最后一程。我心中一惊，北大历史系继田余庆教授之后，又少了一盏为学子指引学术方向的明灯，我也失去一位可以攻错的益友。

浦江兄的一生是充实的。他的英年早逝，固然令人痛惜，但因着邓恭三的慧眼拔擢，进入北大，开启了扎实而有光辉的学术生涯，不仅开展北大历史系辽、金史的教研领域，更在北大传递坚实治学与耿直质朴的风气；而他与邓小南教授在学术、处世的相互砥砺，并及于学生辈，让宋辽金史交互辉映，共谱荣光。

浦江兄承受这么大的福份到北大，也将这份使命无私传承给下一代。浦江兄不虚此行。

（作者系台湾长庚大学讲座教授、台湾中研院  
历史语言研究所兼任研究员）

## 浦江，我们会一直记得你

姚大力

我们正在举行的，实在是一个最不应该召开的会议。整整一个去年，不断听到有关浦江老师的消息。虽然不好，但多少带着让人乐观的色彩。11月份在北京，听说他的病情好像还不坏，也许正面临转入一个稳定时期的最后关口。所以，我一直以为他还会有很长一段虽然艰辛、但尚算幸运的人生之路要走，还能亲眼看见他的好几篇已经被刊用的论文陆续发表出来，甚至可以写出几篇已经酝酿成熟的新论文。

昨天坐在来北京的火车上，我仍恍惚觉得这应该是去参加一个浦江老师本人也会在场的讨论会，讨论他新近出版的《契丹小字词汇索引》，同时也要庆贺他第一百篇论文的发表。邓小南老师说，刘老师的一个可贵之处，是他把辽金宋三史捆绑在一起，当作一部大中国的历史，进行通体的解读和认识。从我自己的专业领域来说，辽金史又与元史是捆绑在一起的，所以我对刘老师的每一种论著都要仔细地研读。他从考订《契丹国志》、《大金国志》两书之真伪，从辑录《揽辔录》佚文的坚实的文献学功底起家，转入对辽金人口、税收、户籍、宗教、内部人群关系等完全历史取向的诸多主题的深入研究，又把自己对契丹社会制度史、风俗史的独特理解贯通到对契丹大小字从事释读的民族语文文献学的领域中去。解读契丹书面语的艰难任务现在远远不能说

已经完成了。不过,将来的人们在追溯契丹语文终于被创通的学术过程时,一定不会遗漏刘老师的独特尝试所做出的贡献。

从十年前发表对辽金两朝德运之争的讨论分析,直到去年发表《元明革命的民族主义想象》,刘老师长期关注中国政治文化中的正统论历史观。对我们深入理解前现代的中国人针对曾经统治汉地社会的各非汉族王朝的历史定位及其在近现代的演变,这确实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提得高一点说,他实际上是在试图纠正这样一种不健康的、但是又十分顽固的历史误解,就是将辽、金、元、清等王朝的族裔主权属性与它们的中国性置于相互对立、相互颠覆的位子之上。历史上的中国性原本所具有的多样化事实既经否定,我们也就很难再看得清内亚因素曾给中国历史带来过的巨大的积极意义,辽、金乃至元、清的历史,于是统统都被视为中国史变迁中一段又一段充满杂音的不和谐插曲。我最近刚刚写完一篇二万四五千字的文章,评论汉语学术界对于新清史的近乎政治讨伐式的大批判。浦江老师是我想到的必须在发表前先请他们审看初稿的几个学者之一。可惜现在这个心愿再也无法实现了。

愈是临近他过早到来的晚期,刘老师似乎愈在努力把自己的学术关注度投向更广阔思考领域里去。我体会这是他在与自己的生命赛跑。为学识所限,我没有能力评论他发表在《近代史研究》上那篇讨论民国时期对太平天国起义的历史定位问题的长文,所以这里仍想围绕着《元明革命的民族主义想象》一文,谈几点粗浅的读后感。

从《皇明诏令》违背依时间先后的顺序来排列篇目的体例,将公然揭出“驱除胡虏,恢复中华”口号的《谕中原檄》冠于全书

之首，他敏锐地体察出这样一个事实，即明中叶以往的人们已把这本文献的发表断为一个全新时代之开端。而此种针对元明革命的“重新解说”，成为清末反满排满时代风潮中的革命者书写这段历史的重要资源。刘老师从扎实的文献学方法切入讨论，实际上已经打穿了从史学通向“知识考古学”的分析路径。通过把处于变化之中的“想象”当作一组互相关联、确凿分明的“社会事实”加以考察追溯，他为我们精彩地证明，历史过程与人们的思想史过程是怎样如影随形般地紧密交织在一起的。

我读此文的另一个突出感受是，浦江老师对前辈学者是充满善意的尊重与同情的理解的。他指出，曾经力倡元明革命论的钱穆，晚年对自己的这一认识“进行了认真的反思”。我自己过去也引述过钱穆在相关见解中所显现出来的困惑，但旨意却着重在批评他以今训诂的时代倒错方面。相比之下，刘老师的评述要更合情合理。

当然，我还不能完全同意浦江老师在这篇文章里表达的观点。这里涉及的一个最基本问题，是前现代的中国到底是否存在如我们今天所界定的“民族主义”这样一种意识形态？民族意识、乃至“伴生性民族主义”在传统中国无疑已经存在了。但是在我看来，19世纪中叶的欧风东来之前，中国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倘若事实果真如此，则西方民族主义思潮的东传对于清末民初反满排满运动的影响，也就不应当在有关讨论中受到忽视。很可惜，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再就这些问题与浦江详商，再听听他久存于胸中、可能还没有被完整呈现出来的种种见解了。

最后我还想说几句可能是很不妥当的话，因此需要事先敬

请大家原谅！并不是每个人死后都会让人感到同情，发生惋惜的追思之情的。即使是一个曾经伟大的人，如果他遗留给后人的负资产过于沉重，仍然会让人觉得他个人的不幸也可能是对整个民族的解脱。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我听说这样一个人物去世之时即刻涌现出来的那种奇怪心情。虽然也会担心此后的中国可能被跋扈于当日的那批“穿黑袍的空论家”完全掌控，虽然在许多人抢天呼地的号哭声中，我也努力挤出一点悲伤，但心里其实是有几分窃喜的。因为乱中求变固然危险，总比在不变中绝望下去要多出几分飘渺不定的希望。现在浦江老师走了，我们在这里怀着真诚的心情追念他。这说明人在做，人在看。他的一生虽然短了一点，但却是有意义、有价值的。

谢谢各位。

2015年1月21日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

## 回忆刘浦江教授

钱乘旦

浦江教授离我们而去，是史学界的一大损失，不仅因为浦江正处在发力的好年龄上，也因为浦江这个人。

我和浦江交往时间不长，是到北大后才认识的，由于世界史和中国史之间的差异，所以我以前对浦江的工作知道不多。到北大后，我开始听说历史系有一个奇人，他不读研究生，可是研究成果远不是一般研究生所能比拟的。他不是考不上研究生，而是不考，据人们传说：他认为读研究生不算什么，有学位也不说明什么，他要自己的工作来证明，不读研究生可以比读研究生做得更好，没有学位也可以做教授。我不知道这个传说是否准确，不过我确实知道：他的研究工作做得很好，人们提到他的名字都会交口称赞，几乎没有人不佩服他的研究成果，而他确实只是本科毕业，并没有博士、硕士的头衔。我印象中人们说：他选择不读学位，是对当前学位体制中种种弊端的抗争，在他看来，学问是真的，学位是假的，而现实中许多人要的是学位、而不是学问。我不知道浦江是否真的说过这样的话，但从我后来和他的接触中确实感觉到，他一定是秉持这个理念的，对现实中发生的许多学问和学位的错位现象深恶痛绝。在我们这个时代，急功近利似乎成为常态，而浦江却是坐冷板凳的，他之选择不要学位，恰恰是浦江这个人的个性之所在。浦江有个性，这是谁都

知道的，他如果不选择不读学位，浦江的个性就丢掉一半了。

不过有意思的是，他在一段时间中是北京大学历史系主管学位工作的最高行政长官——从学士学位一直管到博士学位。我到北大不久他就担任副系主任，主管全系教学工作，学位是其中的关键环节。他主管学位工作，给我的最深印象就是事无巨细，样样都弄得清清楚楚，每一个研究生，无论毕业还是在读，甚至未入学的考生以及已离校的往届生，他们从哪里来，学习或入学考试情况如何，论文是什么内容，论文质量大体如何，他基本上都能说得出口。他自己说：系学位分会讨论学生学位问题前，每一份论文（至少是所有的博士论文），他都会翻翻看看，专家的评语也都会看一遍，所以大体情况他都是知道的。这样细致地去主持他自己选择不要的学位的管理工作，并且做得那么认真，把学位授予看得那么重，又是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我长期担任系学位分会的主席，对他的工作认真深有体会，我们都对浦江有充分的信任，相信只要经过他的手，研究生工作从录取到毕业，每一道流程都会让人很放心。举一个很小的例子，有一次讨论录取问题时，他居然可以说出某某考生已经到北大来考过几次，每一次为什么不录取；她的姐姐和她同时参考却考取了，已经读到几年级、学什么专业、学得如何，等等！我想，能够对每一个学生有这么细致的了解，没有对他们高度负责的责任感，以及对研究生学习的高度重视，是不可能的。人们都说浦江的学问做得好，而用做学问的态度来做日常工作，这就是刘浦江、一个历史学家严格认真的人生态度，也是他的职业态度。

2010年以后他不再担任副系主任，但他仍然参与系里的学位工作，而且热情不减当年，有请必到，有问必答，完全没有“不

谋其政”的避讳。我感到他确实是把培养合格的研究生——全系所有的研究生,当作一项使命看待的。尽管他自己选择不拿学位,但他把拿学位看得很重,决不将其儿戏视之。

关于浦江的学问,中国史的同行人已经说过很多了,我这里只强调一点:他选择辽金史作为主要的研究方向,这又是他的个性使然。辽金史是中国史中一个冷门,一般人都不愿意做,因为吃力不讨好,费的力气大,却不容易出成果。也许正因为如此,浦江才选择辽金史,盖所谓人所不为,我何不为? 因为浦江的参与,中国的辽金史研究放出新的光彩,他把他的人生价值定位在这里。历史学家是用历史的心境来理解人生的,浦江留下的,正是他对历史、也是对人生的阐释。

2015年4月,于北京

(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 深切缅怀浦江

王春梅

54岁,对于一个史学工作者,正是风华正茂的时候,可惜天妒英才,不假其年。2015年1月6日,年轻的浦江走了,走得如此从容!让我无比痛惜和无尽怀念。

浦江是我主管学生工作,79年迎接他入校,83年将他分在中央党校工作的。那时历史系的外地学生能留在北京工作,可谓凤毛麟角,能被中央单位看重接收,学习等各方面表现亦是出类拔萃。88年,邓广铭先生慧眼识珠,将他调回中古史研究中心工作。我74年毕业留校,一直在系作副书记主管学生工作,93年作书记,多次听邓先生说过,浦江的学术研究潜力和成果水平是很好的。2006年,浦江任副系主任,恪尽职守,率先垂范,殚精竭虑,以及在疾病面前的良好心态,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

浦江是有强烈责任感及对工作极端认真负责的人。在我退休前的任期内,他担任副主任,主管本科和研究生教学及承担其他重要工作。我们行政管理服务人员,每天按时到校坐班是基本要求,而浦江也几乎每天骑着自行车从中央党校早早到系,参

加各种会议，处理本科和研究生招生、培养与管理等大量繁杂事务，认真、严谨、细致，从不敷衍。他努力开拓创新，积极改进课程设置，调整培养方案，完善各项制度，使教学培养与管理水平不断提高。

浦江模范遵守《系班子成员行为规范与要求》，淡漠名利，严格要求自己。他上任伊始即宣布不再申请和参加任何评奖。系里有捐赠来的小轿车，他轻易不用。为工作他没有时间概念，不分白天黑夜和节假日。他从未撂下工作和教学及自己所带学生，到校外去讲课挣钱。我因患糖尿病，每天带午饭在系里吃，常见他中午到学校餐厅吃完饭，回到办公室即接待老师和学生，下午有课，洗把脸赶紧去教室，下课回到系里继续工作。有时我下班走时天已经黑了，他办公室还亮着灯，我敲门说：浦江你还不走啊！他总是说还有事没处理完，或是要参加老师和学生的活动。

浦江上任不久，即遇上全国本科教学检查，这是关乎学校和本系建设发展及声誉的大事，学校领导和主管部门都高度重视，要求很高。我和他一起参加学校专门召开的动员大会和培训会，他回系即召开教工和学生大会，认真传达学校部署精神，结合系里实际作出周密安排，提出要求，精心组织实施各项具体准备工作。

按照学校要求，首先要建立本科教学档案室，这是上级检查的硬件之一。浦江带领教务人员和学生，抓紧腾出地下室原来的仓库作为教学档案室，并购置了档案柜和档案册、档案袋，将全系本科学生几年来的所有课程目录、考试成绩、教学及学生参观考察报告、学术活动计划、总结、学生刊物和系的年鉴等等，分门别类归档、装订成册、做出不同标牌。

浦江还和我一起带领所有行政工作的同志与部分学生干部,用下班后的好几个晚上,差不多每晚都弄到十一、二点,对几年来本科学生课程所有考卷逐一核查,对个别老师没有按照学校规定给予考试成绩的卷子一一纠正,对加错分的卷子全部改正过来。浦江还建议和组织搜集了几百张照片,从中挑选出有代表性部分,在二院进门处的墙上,办了本科学生学习、学术活动、教学参观考察、军训、文艺和体育活动及日常生活的专栏。由于浦江对此项工作重视,要求严格,抓得很紧,所有准备工作充分、到位,学校主管领导和职能部门负责人很满意,带领相关院系负责人来系现场办公,借鉴推广。在全国检查组进驻学校后的检查中,获得好评。

浦江任上还赶上全国博士论文质量调查评估,这也是学校非常重视的工作,多次召开全校干部大会动员部署,提出具体要求。在此项工作中,既要求请国内外一定数量的专家评估,也要让本系博士生导师和博士学生们进行自评,工作量之大、程序之多、难度之高,其压力可想而知。那一段时间,浦江不是召集会议,就是与相关人员座谈讨论。浦江还让我从社会学系请人设计了调查问卷,发给教师和博士生分别填写。我和卫茗看浦江太辛苦了,我写了教师问卷调查报告,卫茗写了博士生问卷调查报告,最后交由浦江汇总上报学校。浦江自己没有博士学位,有人说三道四,但他毫不在意,出色完成了这项工作。

浦江率直诚信,知无不言,无论对学校领导还是办公会成员及其他工作,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言无不尽。有时他的建议没有得到认可,则尊重服从大家,绝不“跑风冒泡”。他以身作则,要求别人做到的事,自己首先做到做好。教师最主要的任务是教学科

研及培养学生,他虽担负繁重的管理工作,但教学、科研一点都不比别人少,且都很出色,受到前辈、同行和系内外学生的赞赏。他有全局观念,我退休前一年,向办公会提出建立系的专门培训机构,好有人早熟悉和接替我负责的这项工作,以利年节教工福利的持续。浦江认识明确,大力支持,并毫不犹豫让他的部下即时任研究生教务主管的卫茗同志,任培训办主任,并很快落实了办公室,使系的国内培训工作越做越好,保证了教工福利不断提升。

原在中国社科院工作的辛德勇老师,因学校未落实他要求的房子,一直没有调进来。浦江多次跟我说:辛老师来系工作对学科建设发展很重要,一定要想办法解决他的房子。那段时间,他经常询问我辛老师房子的进展情况,还有什么要他配合的事。在他的积极促进下,我多次找学校领导和职能部门,还和中心主任张希清老师一起,利用周末学校领导在稻香湖开会的机会,直接找校长和主管领导汇报恳请。经过不懈努力,学校终于按照辛老师的要求特批和落实了他的房子,使辛老师能来系安心工作,浦江很是高兴。

浦江在任四年,不仅出色完成所有分管的任务,还自觉地开展了许多其他方面的工作。他呕心沥血,自觉奉献,用行动兑现了自己的诺言,为学科建设发展和人才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

## 二

2014年4月下旬,我们70级同学为纪念毕业四十周年在郑州聚会时,收到学生微信,说浦江患癌症住院了,我很吃惊,不敢也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立即用短信安慰他。回京后即联系

要去看他，他说刚好主治医生批准他周末回家休息，我可以到他家看他。那天我买了鲜花和吃的东西，为放松心情和活跃气氛，一见面我说咱俩用“洋礼儿”拥抱一下吧，他接受了，很高兴。我对他夫人张文老师说：你可别吃醋啊！我们都是属牛的，他和我弟弟同龄，整小我一轮，是小弟弟！她夫人、女儿和从家乡赶来帮助照顾的姐姐被我的话逗笑了。

浦江心态很好，详细介绍了他的病情，说虽然受了一些苦，但医生很好，正用多种办法治疗，是完全有希望痊愈的，叫我不担心。他说：生命不在长短，我已经想明白了，并作好了最坏打算，将电脑里的研究成果和正在做的事交待给弟子，弟子们培养事宜也都作了安排。浦江说这些话的时候，很是平静，不像在说自己，好似在说别人。他还笑着宽慰我：王老师，您为系玩命奉献几十年，什么都没留下，却落下一身病。我和您不一样，我有著作，有文章，还有培养的学生，我不在了，我的成果会流传下去，学生们可以继续我的事业。

我知道浦江已把学术和学生视为自己的生命了，十分敬佩和感动，还是忍不住和他说：你一定会好起来的，不仅为你自己，也为张文和女儿，为学生和你执著的事业，为所有关心你的人，一定要充满信心，好好配合医生治疗，期盼你早日康复！离开他家时，他的夫人非把我们送到楼下路口，边走边讲述医生只告诉家人而未让他知道的真情。我听后犹如一块大石头堵在胸口，喘不过气来。但想到浦江有那么好的心态，有家人悉心呵护照料，有弟子们的热情帮助，还有日渐先进的医疗技术，相信他定会闯过这一关，我的心又轻松了一些。

我去医院看望浦江那次，他说下午有人来探视，要我上午

去。那时他正在化疗期间，头发已经脱光了，但气色还好，心态也好，还和我回忆起在班子共事四年的许多往事，谈我俩参加人文大楼奠基，他很高兴现在系的条件大大改善了，老师们都有研究室了。谈我俩参加授予何兹全先生兼职教授那天的花絮，谈2007年他在新年师生联欢会、2008年教工春节团拜会及离退休教工招待会上的致辞，也谈起我陪他去北医三院做胃镜检查的经历和他天性不服输及要强性格有时带来的麻烦……谈着谈着，他突然问我，是原来的他精神还是现在他精神？我毫无准备，脱口而出：都精神，都精神，现在你更精神了。浦江说我一向都对他说真话，今天可不是，连连说怎么会呢，我现住医院里，一根头发都没有了。我说你现在很像佛啊，时下那么多人喜欢佛，崇拜佛，你头发虽没了很像佛啊！不过你这个佛是暂时的，待头发长出来就不像了，他不置可否。我叮嘱他，一定要多吃东西，增加营养，让自己胖起来，那才真像佛呢。我带了一些吃的东西给他，他说化疗吃不下什么，只能喝些果汁，除了西瓜和桃，其他东西都让我带回来了。

我对病中的浦江，一直放心不下，总想去看看他，陪他聊聊天。9月底，我去香港之前，与他联系想再去看他，他告诉我化疗反应很大，不能饮食，不宜探视，我心里颇为难受。

我从浦江住院后，经常给他发短信，询问他的病况，为他祈福。无特殊原因他都回复，有时回复两次，甚至回复三次，这让我很欣慰。从浦江回复我的短信中，能了解他的病情和心情，有时替他高兴，有时为他揪心。以下是他回复我的部分短信：

4月27日 周日 12:09

王老师,非常感谢您对我一贯的关心和帮助,我已确诊患淋巴瘤,虽然发现较晚,但医生说仍有治愈的希望。此次治病全靠郭海帮助联系医院,令我非常感动,在这种时候能够见到人间真情。您和徐老师下午来吧,明天我回医院,但病房是7人间,探视很不方便。

4月27日 周日 12:57

王老师,最好让陈捷开车带你们过来,他最熟悉来我家的路。

4月28日 周一 20:44

王老师,非常感谢您的关心帮助,我今天正式开始治疗了。

4月29日 周二 11:14

王老师,感谢您的鼓励,昨天点滴完美罗华,腿疼已明显改善,今天正式开始化疗。

4月29日 周二 16:11

王老师,今天下午上化疗,相信病情会得到控制,只是每天都无法入睡。

4月30日 周三 11:08

王老师,谢谢您,刚给我换了两人房间了。

5月1日 周四 16:28

王老师,昨天换了病房,晚上吃了安定后睡得很好。昨天下午输液已结束,因怕胃溃疡穿孔,留院再观察两天。目前病情稳定,您和徐老师就不要来了,这次换病房就是对我的最大帮助,谢谢您。祝您和徐老师节日快乐!

5月2日 周五 20:09

王老师,目前症状均已消失,大夫说化疗后为防止感染,尽量少接触人,所以近期您就不要来探视了,治疗情况我会常向您报告的。

5月4日 周日 18:57

王老师,因今天出院,没顾上给您回复。按计划19日再去医院开始第二个疗程,这期间每周去门诊一到两次就行了。回家能好好休息,心里很高兴。

5月7日 周三 09:07

王老师,我近日情况稳定,明天去医院查一下白血球,结果再告诉您。

5月9日 周五 12:19

王老师,化验的白血球基本正常,打算下周再去查一次,您不用担心。

5月11日 周日 10:16

王老师,我现在除了在电脑上给学生改论文,其它事情尽量放下,您放心!

5月12日 周一 16:25

王老师,今天查白血球仍然正常,这个化疗周期白血球基本没有降低,您放心!

5月14日 周三 11:23

王老师,现在是这个化疗的后期,化疗的不良反应在减轻。

5月19日 周一 08:55

王老师,我今天住院开始第二个化疗,您放心!



5月22日 周四 08:24

王老师,我第二个疗程昨天已经结束了,今天陈捷接我出院,您放心!

5月26日 周一:18:17

王老师,到这个疗程结束,在六月上旬,我要去做一系列检查评估前两个疗程的效果,但愿能不错。

5月30日 周五 10:50

王老师,我化疗期间您还是不要来探视为好。我下周要作几个检查,评估前两个疗程的疗效,到时一定告诉您情况。

6月5日 周四 10:00

王老师,我今天还在医院检查,您不要来。

6月11日 周三 10:19

王老师,复查结果出来了,脊椎转移有好转,但胃上的原发病灶不太见效,所以第三个疗程调整了治疗方案。这次是周一住进来的,下周一才能出院回家。

6月13日 周五 15:36

王老师,您不要来了,我现在精神状态不错。

6月19日 周四 20:52

王老师,这次化疗反应比较大,而且还重感冒,所以近期医生不让探视。

6月25日 周三 09:46

王老师,上周出院回家当天就感冒了,周五开始发烧,今天医院让我回来住院治疗。感冒可能是化疗引起的肺损伤,需要恢复几天。

7月8日 周二 10:07

王老师，我今天在医院复诊，明天住院进行第四次化疗，不管治疗效果如何，我的心态始终很平和，您放心！

7月10日 周四 11:01

王老师，又得向您求助。半个月前换了一个年轻大夫管病房，从此以后每次住院都给我安排在八人间，昨天我爱人去找他求情，希望能换一个两人间或三人间，结果他今天安排我换到另一个八人间，不知什么意思。这个科室只有两个八人间，其它全部是三人和两人间。我昨晚吃了安眠药还是整晚没有睡着，今天上午点滴总是打盹，只好十分钟上一次闹钟。这次化疗要到下周才能出医院，这样下去很难坚持，您看有什么办法？不过为这些事总去麻烦郭海恐怕不太好。

7月12日 周六 8:06

王老师，郭海已给朱书记打过电话了，但这几天确实没有房子可换。我今天是一天化疗，按照医院规定必须呆到下周一办完出院手续才能出院。朱书记考虑到我的特殊情况，同意我下午点滴结束后可先回家，下周一再让学生来办理出院手续，这样可在医院少住两夜。今天您可以来探视，上下午都行，最好是上午，下午有人来。

7月14日 周一 16:48

王老师，周六晚上陈捷接我回家了。今天学生去办理了出院手续，这几天主要是没有食欲，过几天可能就好了，您不用担心！

7月17日 周四 21:04

王老师，今天白血球降到1600，已去医院打了升白针，

需要连打五天，您不要来看我。

7月19日 周六 12:04

王老师，我要打五天升白针，下周一还要去查血，您别来。

7月30日 周三 12:53

王老师，我今天住院开始第五个疗程，但白血球只有2100，要再打两天生白针才能开始化疗。

7月31日 周四 09:10

王老师，我有蜂王浆等补品，但升白血球主要还是靠打针，打两天肯定就升起来了，您千万别再送东西来。

8月5日 周二 09:32

王老师，我今天出院了，主要是胃肠道反应太大，什么都不想吃，回家会好点。

8月30日 周六 13:23

王老师，我目前在家休养，下周住院就准备分血干细胞移植。现在疗效还不错，只是化疗反应大，不能饮食，也不宜探视。

9月8日 周一 11:19

王老师，谢谢，也祝您节日快乐！

10月8日 周三 09:07

王老师，我近日要作一系列检查，对疗效进行评估。如果情况不错，大概本月二十号左右进行干细胞移植，总之治疗已进入尾声，请勿念！您和徐老师在香港也要注意身体。

10月25日 周六 14:35

王老师，我最近正在住院准备作干细胞移植，主要是胃

肠道反应太大。

11月3日 周一 10:01

王老师，我正在做干细胞移植，这次要二十多天才能出院。

11月12日 周三 13:01

王老师：我这次干细胞移植是住无菌病房，不能探视。近日就出院了，回家好好休息一段时间。

12月1日 周一 21:16

王老师，我目前在家休养，春节后再作一次干细胞移植，治疗就算全部结束了。

12月23日 周二 16:32

王老师，谢谢您和徐老师！

12月26日 周五 21:16

王老师，您不要来看我，您不来就是来看我了。

12月29日下午，我回京参加田余庆先生遗体告别后第三天，刚回到香港的住处，即接到浦江电话，他说正吸着氧，让我先听他说话，听了不要着急。他简单介绍了检查后的病情，说既然无治疗价值了，决定放弃治疗。我一听就急了，说没准会有奇迹发生呢，千万不要放弃，千万千万不要！他平静地说：王老师，您知道我对现在的结果是有心理准备的，既然没有治疗意义，我不愿再遭受痛苦和浪费时间，决定回垫江老家走完生命的最后历程，我听后泪流满面，心在淌血，怎么会这样？为什么是这样？好一会儿我说不出话来。浦江接着说：王老师，我拜托您一件事，请您帮助我在万安那里买个墓地，钱多少没问题，我要陪着

邓先生。那里距学校也近，方便学生来看我，我也能经常看见他们。我十分震撼！浦江啊浦江，你在绝症无望治愈之时，在生命之火不久将熄灭之际，唯一的愿望就是陪在恩师身边，就是能经常看到自己的学生，这是何等的境界呀！我努力控制自己，哽咽着说：你放心，我马上飞回北京帮你落实。他坚决不让，说只要我帮助联系好了就行，他的学生和女儿会去办理的。我立即与在北京公墓管理部门作领导的系毕业学生干部联系，说明浦江的愿望，他也很感动，承诺一定落实，并告之办理相关手续的具体事宜。我将此信息电话告诉浦江时，感受到了他的一丝欣慰。

那一晚，我几乎彻夜未眠，怨恨老天的不公，责怪医疗的无能，担心浦江怎么经得起乘救护车回垫江一路的颠簸，牵挂他如何度过生命的最后历程，闭上眼睛即是与浦江在一起工作的画面，去他家和在医院与他聊天的情景。我十分自责 26 日晚从香港回到北京，虽与他联系，打算 27 日上午参加完田先生遗体告别，下午或 28 日上午去看他，可他坚持不让我去，说我不去看他就是看他，没有去成。我越想越后悔和遗憾，但仍心存侥幸，祈盼奇迹发生，浦江好起来。

下面是浦江回到家乡垫江回复我的短信：

2015 年 1 月 1 日 周四 13:23

王老师，昨晚到家，已病重，以后可能回不了短信了。

1 月 3 日 周六 13:18

王老师，我的时间不多了。

4 日、5 日、6 日，我给浦江五、六个短信，都没有收到回复，

电话无人接听，不祥预感笼罩在我的心头。

7日00:39，陈捷发来短信：“刘老师已于6日23:57分逝世了。”我双手紧紧攥着手机，泪如泉涌，悲痛不已！

浦江辞世后，他的爱人张文老师专门打电话告诉我，说浦江在弥留之际嘱咐她，一定要代他向我对他的珍爱及多年的关心帮助表示敬意和感谢。浦江对邓先生的知遇之恩及对前辈老师们的栽培之恩，心存感激是应该的。我几十年在系工作就是一个服务员，为老师和学生服务是我的天职本分，帮助别人，特别是能帮浦江做点什么，是我的幸运。我已退休好几年了，浦江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念念不忘，他如此做人，让我又一次深深感动地流下了眼泪。

### 三

2015年1月21日，历史学系和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举行浦江追思会，很感谢小南老师电话嘱我出席和发言。会上，许多前辈、领导、同行朋友及学生充满深情的讲话，许多人满含热泪甚至泣不成声地叙述浦江生前的点点滴滴，让我更加全面地了解了浦江，重新认识了浦江。浦江执著学术，开拓进取，奋力攀登史学高峰，取得诸多创新成果，学界同行给予极高评价；浦江对工作极端热忱，顾全大局，任劳任怨，忘我的奉献精神；浦江为人做事诚信，坚守师德，深受学生尊敬与爱戴的风范；浦江表里如一，言行一致，永存感恩之心，大情大义的人格魅力；浦江用实践对生命价值的诠释和对病痛死亡的坦然，都令大家赞叹不已，对他英年早逝倍感惋惜。

浦江的不幸辞世，是中古史研究中心和历史学系的损失，是北京大学的损失，也是中国史学界和教育界的损失。在当下，有的人不讲诚信，只追求个人利益，见利忘义，甚至贪赃枉法，致使社会道德严重下滑。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浦江却始终以一种纯粹的心，潜心学术，甘坐冷板凳，精心培养人才，为天地立心，为往圣继绝学。正如原系老书记、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郝斌老师在浦江追思会上所说：他是历史系的“清流”。浦江用自己的实践，有力地回应了当前知识界已“官僚化、帮派化、货币化”的说法，他用年轻宝贵的生命，为学界增添了光彩。浦江不仅是中古史研究中心的骄傲，是历史学系的骄傲，也是北京大学和中国史学界及教育界的骄傲。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浦江虽身归道山，但他仍在我们中间，还微笑着和我说话，他永远活在我心里！

2015年2月20日 于鞍山

（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前党委书记）

## 天然清流，不杂涓泾：忆浦江

邓小南

### 一

初次感觉到浦江身体欠佳，是2014年的4月5日。当时我在哈佛任教，北大的几位老师和学生们照例相约在清明时节去万安公墓为先父邓广铭先生扫墓。群发的邮件中写明了集合的地点：骑车去的同学在西门集合，和刘浦江老师一起出发。当晚的邮件中，得知浦江突然腹痛而没有去。我深知浦江对先生的情感，担心他的身体状况，心里顿时“沉”了一下。后来听说他又参加教学活动，以为应该没事了。孰料当月12日，就得知了他罹患癌症极度羸弱的消息。接到这越洋而来的电话，当即泪如泉涌。

我不知该如何宽慰浦江，也不知该怎么克制自己。不敢直接和他讲话，只能在邮件中跟他说：“这些年太辛苦了。……人生中总有一些‘坎’，你是意志力很坚强的人，一定能迈过去。只是别急。”

此后的几个月，一直在煎熬与希望交错中度过。去医院探望，8人一间的病室，浦江坐在走道位置的病床上，因化疗反应而只能喝些果汁；即便这样，也未改变他爽快的谈吐风格。接下



来出院，入院……直到12月29日。当天本来以为浦江是要出院的，没想到情况突变。晚上7点多，意外地接到浦江的电话，他边吸氧边讲话，声音低沉而断断续续。他说：“小南，我的病情现在全面复发了。我决定放弃治疗了。”我意识到浦江是来告别了，不禁脱口而出：“浦江，你别……”哽咽着再也说不下去。第二天，我和宗成、新江、大勇、罗新一起赶到医院，见了浦江最后一面。12月31日，浦江回到家乡垫江。1月6日深夜得知他辞世的消息，一夜无眠。尽管早有思想准备，却无论如何不能想象我们之中从此没有了浦江。

冥冥之中真是会有惊人的巧合。17年前，浦江写过《不仅是为了纪念》一文，说“谨以此文纪念我的恩师邓广铭先生”。文章的最后一段，浦江说：

最后一次见到邓先生，是今年的一月七日。元旦前后，就听说医生已经给邓先生下了病危通知，这次去，是向他作一个最后的告别。当时他已昏迷多日，我真不忍心正视他那枯槁的容颜，默默地站了十分钟就退出来了。

那是1998年。没想到17年后的2015年1月7日，我们一行数人奔赴垫江，去与浦江“作一个最后的告别”。

1月9日东北义园与浦江的告别式、21日北大人文学苑的追思会，许多朋友称之为“精神的淬炼”。系里世界史专业的许平教授在邮件中对我说：

跟浦江的接触不多，只是他做系副主任的时候有些工

作上的联系。但就是那一些工作上的联系，我看到他极其认真的做事风格，也认识了他没有任何矫情伪饰，真诚坦荡的品格。他对学问的执著，面对生死的那份浩然正气更是深深触动了我。这大概是我们面对他的离世之所以这么悲，这么痛的原因。……本来相信他能走过这一劫。没想到天妒英才！心里真的很痛，很痛，为他惋惜！但在追悼会上，当你和学生致悼词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浦江这一生值了！我身旁的徐健和潘华琼都这么想。

记得你说，准备出浦江的纪念文集，应该！不仅光大他的学问，更光大他的精神，他是一个有精神的人。期待！

浦江生命中最后的九个月，集中凸显出他的性格与特质。他离开之后，网上、微博、微信，多年的同事、普通的教师、往日的学生，一片痛悼。作为一名教员，这就是最好的安慰与表彰。

## 二

我和浦江同是北大历史系中国史专业的学生，先后只差一届，在校期间却并不认识。1987年，在先父邓广铭支持下，他从中央党校调入北大中古史研究中心。浦江曾说：

每一想起邓先生，总是心存一份深深的感激，刻骨铭心。可以说是一种知遇之恩吧。一个普普通通的青年，没有高学历，当时也还没有在学术上做出任何成绩，仅仅见过一面，晤谈了两个小时，就能预卜他未来的发展前景，看出

他的学术潜能。我想说，邓先生确实不愧是一位大师。

这一段话，在当时曾经引惹非议，但从中正可窥见浦江的自信与率真。他纪念我父亲的文章，题为《不仅是为了纪念》。其中的深意，今天我才更加明白。他对我父亲的理解，超过朋辈学生中的任何人。看着他写的《百年邓恭三》，感觉中恍如昨日。“恩师”这两个字在浦江心目中的位置，如朋友们所说，构成了现时的一段学术佳话。

当年我父亲鼓励浦江做辽金史研究，并且把自己下过多年功夫的《三朝北盟会编》交给他，请他继续完成整理校勘工作。记得开始样稿部分时，我父亲要求浦江逐段抄录《会编》文字，在此基础上进行点校。周围一些同事建议浦江与邓先生“通融”一下，若能复印，则可省去不少时间。浦江执意按先生意见办。一次我回到家中，正逢先父批评浦江字迹不够清晰。送浦江出门时，我宽慰他说：“我父亲可能过于苛求，你别在意。”浦江微微一笑，说：“邓先生说得对。”看着他坦诚的目光，感觉到他心地的澄澈，真是十分难得。

十多年前，意识到国内学界对于学位学历的重视，我曾经劝浦江趁年轻时在职申请博士学位。他的回答十分简单：“谢谢小南。我不相信北大也没有学术判断力！”浦江在北大工作27年，他通过27年的精诚努力证明了自己。他本科毕业，没有高学历，却取得公认的成就，成为一流的学者和优秀的博士生导师。

“学术判断力”在浦江心目中占居重要的位置。他的学术判断力，来自于“独断之学”与“考索之功”。在辽金史研究中，他揭示出一些重要的议题，而且善于点破关键，对于繁难重大的问题

往往有独到的见解。他将一时代的王朝史与北方民族史结合认识，对于辽金史的定位，以及如何深化相关研究有清晰的概念。他力图读“透”辽金史的文献，而且充分利用宋人记载，充分利用契丹等民族文字和考古材料，真正具备了对宋辽金史进行通体研究的眼界和学识。

浦江一方面学术敏感性、悟性突出，另一方面学术自觉性、自律性很强。他对学界整体脉络、演化趋势的把握，以及对个人治学目标、学问路径的认识都了然于胸，毫不混沌。浦江觉得，长期浸淫于一个学术领域未必是好事，可能意味着学术创造力的枯竭。他希望挑战重大题材，追求更为恒久的学术价值。他任教后，挤时间去中文系旁听音韵学的课程，请社科院民族所的刘凤翥先生教授契丹小字，与学生共同研读，力争把语言学、人类学与历史学紧密结合起来。早在2004年，他就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了《德运之争与辽金王朝的正统性问题》，后来又在《唐研究》上发表了《正统论下的五代史观》一文。他力图突破王朝断代史隔离的界限，力图突破民族史和中原王朝史研究的藩篱，从更为宏阔的格局中深入观察古代中国的发展历程。他希望能对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整体脉络做一梳理，无论做哪一时期哪一方面的研究，都朝向这样一个通达而实在的目标。这些年里他以华夷观念为切入点，关注历史学视野中的正统论；他对前段的政治文化史包括南北朝隋唐的正统观念，后段像元明之际的民族主义想象乃至近代特定的历史语境之类，都有敏锐深刻的研究。以他过人的资质，若能假以时日，做出来的成就应该是非常突出的。

### 三

90年代中期到2005年，我和浦江在历史系共同开设“宋辽金史专题”课程；其后我们也在宋辽金史方向共同招收研究生。在中心小院里，我们的办公室门靠门，学生们也都相互熟悉不分彼此。指导学生的事，在浦江心中份量很重。招生时的“挑剔”，刨根问底的了解，对于学术潜质的重视；学生正式报到前的“小灶”和入学后的“补课”，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从基本文献入手训练学生，标准从不含混，要求明确严格而具体到位。2005年，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前所长黄宽重先生来北大讲学，辞行时对我说：“北大历史系的博士，应该形成品牌。目前是好的很突出，却也有很差的。”其后我和浦江谈及这一评价，他沉吟良久没有说话。他自2006年担任历史系副主任，对于海内外历史学界的优长及短板一清二楚，对于学科发展不仅认识深刻而且路径分明。他为本科与研究生教学的改进殚精竭虑，对古代史博士论文的指导也不遗余力。他开设的“《三朝北盟会编》研读”和“《四库全书总目》研读”，是文史方向研究生收获最为丰实的课程，研读与实践结合，将学生们切实引入了“研究”的门径。2007年以来，他负责中华书局二十四史点校本修订工程中的《辽史》修订，每个周末都带领学生集体读《辽史》，追踪史源，穷尽史料，逐字逐句讨论校订，非常有意识地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带出一批辽金史研究的新军。

浦江开口见心，坚持己见、善于争议是出名的。但他争的，不是自己的地位和待遇。他去世后，大家才惊讶地发现，这么多

年来，他竟然没有获得什么重要的奖项。他所坚持的，是心中的原则。事情堆到他面前，他处断迅速而从不推诿；面对学术议题，他畅谈所见而从不犹疑。2004年我们中心“唐宋时期的社会流动与社会秩序”项目组去山西考察，随同参加的有考古文博学院的青年教师和博士生。回校总结时，他们印象最深的就是沿途听到王小甫、刘浦江等教授充满学术价值的高谈宏论，争议中处处是学术的锋芒与亮点。我和浦江同事多年，彼此的默契，并非来自行事风格的近似。恰恰相反，我做事优柔寡断而浦江则是思虑细密而行事果决。许多时候，我们对问题的看法并不一致，争执过后，有时他退让一步，说“谢谢”，这就是婉拒而暂停争议了；有时我沉默了，他会笑着对旁边的同事说“小南她不会这样做”，这是表示他理解我的想法而他的意见最终胜出了。凡此种种，无须解释，都凝聚为心领神会的感觉。我时常庆幸身在中古史中心这个纯净的环境中，同道之间的坦荡情谊，全然建立在事业的基础之上。

我们的同事说，刘浦江教授是真正学者的表率。确实如此。浦江是真学者，好老师。他有思想，有风骨，有干才，有境界，在喧嚣的环境中能够出淤泥而不染。他是非判明，勇于是是而非非。借用宋人的话说，就是“质犹近古，纯正笃实”，“天然清流，不杂渭泾”。他面对学术议题的敏锐犀利，面对烦剧工作的尽责担当，面对挑战坎坷的达观执著，乃至他的严厉，他的风趣，他的脾性，都使他具有特殊的人格魅力。

浦江是个纯粹的学者，他的追求清清楚楚，人生干干净净。他对学术事业，对学生倾注了自己全部的心血。在最为痛苦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他念念不忘的，是《辽史》校点整理的收束

工作，是尚待刊发结集的篇章，是学生的论文和今后的安排。他割舍不了的这一切，是在最后的时光中支持他顽强治疗的动力。浦江就像一支蜡烛，为学术，为学界，为学生，燃尽了自己。

2015年1月28日于北京大学朗润园

原载《文汇学人》2015年2月6日第2—3版

（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 怀念浦江

臧 健

我一直不觉得浦江真的走了。

大概因为我 2011 年底退休后不再常见浦江的缘故，也或许因为我没有见过浦江生病后的样子，他刻在我心中的模样还是那个一脸朝气的大男孩，是个永远不会老的大学者。

我和刘浦江共事了 26 年，从他 1988 年调来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我们就成为了同事，我和他共事的时间不是最长的，也是最长的之一。

第一次见浦江是在文史楼，我都不能相信他已经是老师，因为看上去实在太年轻！一张典型的娃娃脸，个子不矮，人瘦瘦的，说起话来语速很快。和我身边熟悉的年龄较大的 78 届之后的研究生相比，我很难适应把他和“学者”这个词联系起来。

浦江刚来中心时，邓广铭先生曾对我说，中心是靠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的经费得以成立和发展的，可是现在没有人专门做古籍整理研究，希望以后你和刘浦江能在古籍整理上多下点功夫。当时中心在邓先生的领导下，已经先后开始了两个大的古籍整理项目：其一是《国朝诸臣奏议》150 卷的标点校勘工作，主要参加者是当时中心的正式成员，以及刚刚毕业的邓先生的宋史研究生；其二是初期与哈佛燕京学社合作的《宋人文集篇目分类索引》的编制工作，主要参加者有中心成员张希清和我，还有



7—8位从北大图书馆请来的熟悉古籍和文献学、目录学的老先生。此外，我和戴济冠、李秀钵老师还合作完成了《国朝诸臣奏议篇名著者索引》的编制。可以说，从80年代中期开始，在高校古委会的经费支持下，在邓广铭先生的直接领导下，中古史研究中心的古籍整理与研究逐渐步入高潮。那时，邓先生几乎每天下午都要到文史楼的中心图书馆来转一转，看看中心又进了哪些新书，大家做项目的进度怎么样，有什么样的问题。刘浦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来到中古史研究中心的。

认识浦江最初的那些年，我一直把他看作是一个勤奋的大男孩，因为和荣新江一样，他也是经常光顾文史楼中心图书馆的人。每一次见到我，总是微笑着问很多问题，开始是关于图书分类，为什么用中图法而不是用北大图书馆古籍文献的皮高品分类法？如何使用四角号码查阅工具书？等等。熟悉中心已有的图书之后，浦江开始关心中心正在做的两个古籍整理项目，特别是对于《宋人文集篇目分类索引》的编制，他非常关注。当时为了老先生们使用古籍方便，北大图书馆古籍部特别批准，除了少量宋元版本文集之外，允许我们分批将善本宋人文集借到文史楼，用完再换一批（这在现在已经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正是这样难得的机会，让我有机会接触到几乎全部北大图书馆所藏宋人文集的善本。在500多种宋人文集中，北大馆藏的善本占有多一半。每次浦江到文史楼，都要借机会翻看一下这些善本宋人文集，有时还要记录下一些需要的资料。让我觉得浦江既是一个有心人，也是一个能抓住机会的人。

文革后，中国学术界的古籍整理工作重新启动于80年代初，但到了90年代初，出版社积压的稿件已经90%是古籍整理

稿，几乎来不及编辑出版；加上古籍整理的文献部头越来越大，出版之后除了图书馆收藏，学者个人难有能力购买，因此销量并不是很好。而编书和攒书，例如编集各类辞典和类书，成为当时学界出名最快和赚钱最快的路子，许多学者和研究生都随潮流而动，加入其中。而浦江调入中古史中心之始，就依照邓先生的嘱托，全身心投入了点校《三朝北盟会编》的工作，一干就是很多年，其细心与认真的程度，以及以《三朝北盟会编》为基础，对于所有相关文献的广泛查阅与研究，让我开始对他刮目相看。

浦江不是一个随大流的人，还因为我曾多次和他讨论过攻读研究生学位的问题。这是我的一个心结，因为多种多样的原因，我自己没能考取研究生，其结果就是必须离开教师队伍而转入图书资料系统，成为图书馆员。在北大，特别是在院系，这是一个被人看不起的岗位，是1957年安置“右派”和文革安置“反革命分子”的地方，虽然可以继续做研究，虽然有可能藏龙卧虎，但其身份已然不同。进入90年代后，我多次建议甚至告诫浦江，学术界的大势所趋，是对于研究生学历和学位的追逐和看重，有可能成为提职晋升的硬指标，也有可能关乎你的学术前途。我曾对浦江说，我老了，可以安于现状，但是你还那么年轻，你现在不考研究生以后会后悔的。对于我的苦口婆心，浦江态度始终很坚决，他不愿意把有限的时间浪费在为考试而学习外国语上，他也不相信没有研究生学历就不能做好学问，他只认准一条，踏踏实实地努力地做学问，这是最重要的。

10年之后，我承认浦江是对的，他成功了。

中古史研究中心创立者邓广铭先生在中心建立之初，最为关注的就是对年轻学者认识文献、熟读文献的培养，要求所有人

必须参与古籍的标点校勘、考订训诂的训练,使其在做任何专门或断代研究之前,首先要打好文献、版本、目录学的基本功。浦江在治学上一直遵循邓先生的教导,从未放松过对于古籍文献的考订和研究。他爱书,在重视查阅文献资料的同时,对中心图书馆建设更是始终倾其心力。

《四库全书总目》是邓先生规定必读的书目,也是浦江一生的研究,对此他倾注了全部心力。他的成就除了研究论著,更体现在他所开设的“《四库全书总目》研读”课程上,在历史系的年轻学者中,他是第一位敢于并能够开设这一课程的人。2010年,《文津阁四库全书》经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浦江深知此书的重要性,多次和北大图书馆采购部联系,终于以北大图书馆和历史系共同出资的方式,购买下了整部 1500 册精装本,现藏中古史研究中心图书馆。据我了解,使用《文津阁四库全书》来和《文渊阁四库全书》作比对的,主要是浦江和选修他的课程的研究生。

浦江对中心图书馆的文献采购十分重视,哪些书缺了应该补齐,哪些书是必须购买的,即使北大馆或其他分馆已有,我们也应购置复本等等,都是浦江所关注的。例如,2011年1月,他给我的邮件中提到:

江苏古籍出版社影印浙江书局本《玉海》缺了4册,估计是配不上了,学校图书馆这套书也缺一册。广陵书社2007年也影印了浙江书局本《玉海》,共5册。现在可能还能买到,定价好像是三四百的样子。这是常用书,如能买到应设法买一套。

两天之后我回信给他:

你嘱咐购买的广陵书局影印浙江书局本玉海5册已经完成编目,现已上架。特此告知。

2011年3月16日,他在给我的邮件中强调:

下面这本书请注意购买:《大兴北程庄墓地——北魏,唐、辽、金、清代墓地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

除了纸本文献,浦江对已经发行的古籍电子文献数据库也十分关注。在2011年10月18日,他给北大图书馆学科馆员周慕红老师的电子邮件中写道:

周老师:由爱如生数字化技术研究中心制作的下面几种数据库非常有价值,均为文、史、哲、考古各个学科常用的资料,强烈建议图书馆购买:

中国方志库:

<http://www.er07.com/product.do?method=show-Product&id=18>

中国金石库:

<http://www.er07.com/product.do?method=show-Product&id=19>

按:此数据库收录金石拓本20余万件、金石志书2000余种。北大图书馆现有的“历代石刻数据库”仅收录部分金

石志书,而且均无拓本。

中国类书库(含永乐大典等):

<http://www.er07.com/product.do?method=show-Product&id=21>

中国丛书库:

<http://www.er07.com/product.do?method=show-Product&id=28>

请周老师代为转达采访部。谢谢。

刘浦江

多年来,浦江和我就中心图书馆的事情常常通电话,而且一打就很长。最近两次让我记忆深刻的电话,一是2013年10月,浦江给我打电话,讨论中心图书馆各项规章制度的修订。一个月之后的11月12日,他就给大家发邮件:

各位:现将新近修订的中心图书分馆阅览规定发给大家,并请各位转发给自己的研究生。

刘浦江

二是2014年3月,浦江打来电话,询问了解“余嘉锡读已见书斋藏书目录及手书题跋”项目的整理情况,电话一打又是很长。而让我无论如何想不到的是,4月过后他就病了。

浦江对图书馆馆藏文献建设的关注是一贯的,不仅仅因为后来他担任历史系和中心的副主任,职责分管图书馆,而更多缘于他对文献的喜爱,对文献研究的乐此不疲。我很赞成彭小瑜

老师在“浦江追思会”上说的话：浦江一生能取得那么多的学术成就，就是因为他喜欢做这件事。

最后和浦江的通信是在2014年5、6月，得知他生病的消息后，我写给他：

浦江：

我很久没到中心，前些日子见到荣新江，才得知你生病了，我几乎不能相信，因为3月的时候我们还通过电话，讨论图书馆的事。

大家说你最近化疗后好了很多，我很高兴。人吃五谷杂粮，谁都不能保证自己不生病，生病了也要靠自己。你还年轻，有生命的活力，一定要相信自己身体的自我康复能力。

我不去看你，怕看望变为打扰。有需要我做的事，请尽管告诉我。只是希望你坚强地面对一切，争取赢！

你不必回信。

臧健

尽管我告诉浦江不要回信，但他在6月26日还是给我回了信：

臧健：

谢谢你的来信。我是淋巴瘤，是一种治愈率很高的肿瘤，但我发现得太晚了，已累及多种脏器，前两个疗程之后的评效结果不佳，现已改用其它方案化疗。从一开始发现，

我的心态就很平静,积极治疗,能够治愈当然很好,治不好也算是一种自然归宿,任何结果都是正常的,生老病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自然的规律。

浦江发自我的 iPad

浦江走得匆忙,但走得镇静、从容,愿浦江在天堂好好休息。

2015年4月写于中关园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研究馆员)

## 在浦江追思会上的发言

王小甫

惊悉浦江去世，不胜哀痛！当年浦江应聘正高职，系学术委员会命我为之写鉴定，后来我曾对浦江开玩笑说：“鉴定可供学生为你写学述。”浦江可能无缘读到这份鉴定，他后来的学术成就也远远超过了我当年的评述。现在浦江西归道山，我把这份早年的鉴定发表出来，寄托对他的哀思！

### 刘浦江申请教授鉴定

我认识刘浦江有二十多年了。我知道他是北大历史系83届(79级)毕业生，毕业后到中央党校工作，但不久就被调回了本系工作，做邓广铭先生的助手。我后来听说调动他工作的原因就是，邓广铭先生认为他是当时青年学者中对宋辽金史史料最熟悉的。这样的评价由邓先生说出来(这已为浦江本人在本系教授会作申请职称陈述时所证实)，实在是太难能可贵了！

我记得刘浦江最早的学术领域是文献学，尤其是宋辽金史史料辨正、整理。除了协助邓广铭先生整理《宋朝诸臣奏议》、《三朝北盟会编》等史料，还分别写了多篇有关《契丹国志》和《大金国志》证伪的文章，解决了学术史上的重大问题。其实，刘浦江后来的好些文章也都是针对相关领域的



学术难题而写的，发表以后在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我的印象刘浦江还写过对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纠错的文章。总之，文献学和史料功底如此深厚，在其同辈中恐怕真是非常少有的。最近他在政治文化研究领域连续发表有关历代“五德终始”说的研究文章（如提交评议的两篇都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显然十分得益于他在文献史料方面的功力。

刘浦江的另一个学术领域是辽金史。我的印象他最先开始是做金史研究，这个领域虽然资料寡少，但毕竟是我国史学的一个传统领域，之前已有不少积累。然而，刘浦江凭借他深厚的文献史料功底、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和勤奋刻苦的努力，先后发表了一批重头文章，很快就在学术界占有了一席之地。送交评议的这本《辽金史论》出版于1999年，其实主要汇集的是刘浦江在金史研究方面的研究成果。以后他的研究重点进一步转向辽史，同样取得了骄人的成绩（送交评议的发表在《历史研究》上的两篇文章都与此有关）。举个例子，据说他有一篇论文投给《中国史研究》，编辑部请辽史前辈学者李锡厚审稿，尽管其中观点与李先生相左，李先生仍然认为文章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同意发表。刘浦江学术服人就到了这样的水平。现在，国内辽金史学界的前沿，恐怕就得看刘浦江的研究成果了（关于这点，他本人在教授会议上有所陈述）。

刘浦江第三个学术领域是做民族史，这个领域当然和他的辽金史研究有关，但是他非常清楚自己的发展方向。做民族史研究要想有所突破，掌握和利用研究对象本民族

文字的史料非常重要。刘浦江大概三、四年以前就开始学习契丹文字,还专门请了契丹文著名专家刘凤翥来给学生上课。他现在又在参加古代蒙古文和《蒙古秘史》的研读学习。刘浦江在这方面的努力已经见到了成效,最近公示的北京大学第十届人文优秀成果奖名单有他的《契丹名、字初释——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父子连名制》(发表于《文史》2005年第3辑),据我所知就是他主要利用契丹文墓志进行研究的创获。我可以这样说,刘浦江现在已经站到了国际学界的前沿,他能把契丹语文、民族史志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这样的学者在国际契丹辽史学界恐怕也是少有的。

鉴定内容还有教学能力和指导研究生能力,这么说吧,据我所知,刘浦江是本系少有的挂名指导博士研究生的副教授之一,他指导的博士生康鹏好像都快毕业了;他也是社会上知名的北大历史系三名教授级副教授之一(还有两名是罗新、张帆)。刘浦江曾积极投入本系民族史教研室创建工作,现在承担着重大的学术创新任务,故强力建议本系将其聘为正教授,安排在学科带头人的岗位,以为本系、本校贡献更大的力量。

这份文档原形成于2006年5月9日。浦江2006—2010年间担任历史系副主任。大概因为忙,我们私底下的交往很少。讣告发布那天,学校宣传部门的记者电话采访我,我说我已经发了微博(即上面的内容),他说想问问学术之外的一些印象和看法,我仓促之间竟无言以对,建议他去采访小南或浦江自己的学

生,他才说小南已经去了重庆。现在又回想起来几点活动交集,其实还是和学术有关:

一是2004年他主动提出参加了我主持的中古史中心项目“3—14世纪中国历史的多元文化环境研究”,发表了署名的相关研究成果。但是那年暑期项目组织的赴蒙古国野外考察他却没有参加,原因是此前不久他去内蒙古赤峰地区开会,发生了肠胃过敏,担心蒙古国的餐饮条件更难适应。我当时不太理解,现在想来,可能也和他的身体状况和病情有关。我们几位同事在考察中还开玩笑说,我们以后申请科研项目一定要拉刘浦江一起参加,我们分工负责野外考察,他负责提供研究成果和应对各种填表检查。我的印象是,刘浦江有很强的事务处理和应对能力,我们有时候开玩笑说:浦江有治繁理剧的“吏干”之才。

一是2013年11月中赴西安参加《中国史研究》杂志社与西北大学历史学院举办的“中国古代国家治理与边防”学术研讨会,我们都在会上作了发言,我讲的是“中国古代传统的边疆族群对策”,记得他讲的是宋辽对峙之际河北中部的一种地道工事。其实,在整个参会过程中,浦江几乎都在不停地和人进行谈论:在赴会的高铁上,他本来和我并排座位,因为不断地和邻座首师大李华瑞老师交谈,我看他不方便,就主动提出和李老师换了座位。从北京到西安5个小时,一路不停,而且几乎主要是浦江在讲话。在西安时,会议安排了到秦岭山里参观考察,我看浦江又是和荣新江一路走一路谈,来回不停。返京时李华瑞老师要去别处开会,只剩我和浦江两人坐高铁,5个小时,各种话题,基本都是他说。现在回想起来,浦江确实太过劳累!

浦江有书都送过我，有的论文也送我抽印本。浦江有一篇《契丹族的历史记忆——以“青牛白马”说为中心》，收在《漆侠先生纪念文集》里，该论文集于2002年10月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以后，浦江复印了一份题赠给我。我仔细拜读了这篇文章，觉得浦江的学术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似乎是民族志（人类学、社会学）方面的倾向更明显了。当时我正在撰写后来以《契丹建国与回鹘文化》为题发表的那篇文章，刘浦江对契丹和辽史的研究信息和史料掌握都要比我全面得多，所以我在文章中特意注明：“这里我要感谢刘先生惠赠大作，该文资料丰富，令我受益匪浅。”

还有一篇是他2013年发表在《文史》上的《南北朝的历史遗产与隋唐时代的正统论》，抽印本至今还放在我的案头，因为该文和我承担中古史中心项目的结项工作有密切关系，经常都要拿起来翻看阅读思考。

最后收到的就是去年5月由中华书局出版的那部巨著《契丹小字词汇索引》，拿起来沉甸甸的，简单翻看，虽然一个字不懂，却是由衷钦佩。因为我曾不止一次对浦江说过我对契丹语文研究长期停留在“以已知推未知”状况的不满，认为至少应该像女真文那样编出字典甚至语法书出来。现在，浦江和他的高足康鹏编出了《词汇索引》，为进一步的词典编纂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就改变了学术现状，是重大的学术突破，它将给契丹语文、历史、文化研究带来极大便利，会对相关学术发展给以有力推动。可是，沉甸甸的，是浦江心血的巨大付出啊！

54岁，浦江确是英年早逝，但作为学者，他也充分实现了其

生命的价值。所以，我相信他走得从容，走得心安！浦江兄，你安息吧。

2015年1月9日星期五夜草于五道口嘉园寓所  
原载《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5年2月8日第4版  
(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 忆刘浦江二三事

齐木德道尔吉、吴英喆

内蒙古大学的民族史研究人员结识刘浦江是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事情。当时他研究金史，发表了《再论〈大金国志〉的真伪——兼评〈大金国志校证〉》（《文献》1990年第3期），《范成大〈揽辔录〉佚文真伪辨析——与赵克等同志商榷》（《北方论丛》1993年第5期），《〈契丹国志〉与〈大金国志〉关系试探》（《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1辑，中华书局，1993年），《金代户口研究》（《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2期），《金代猛安谋克人口状况研究》（《民族研究》1994年第2期）等文章，在金史学界引起了轰动。1998年在《历史研究》杂志刊登《关于金朝开国史的真实性质疑》，更使我们对这位金史学界的新秀刮目相看。他还很快地将自己的学术研究领域扩展到契丹辽史研究和契丹文、女真文研究领域，其成果集中体现在他的《辽金史论》（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松漠之间：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二十世纪辽金史论著目录》（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等著作中。此间，我们在各种学术会议上见面认识，逐渐相互了解，最后变成同行朋友。

刘浦江教授非常重视与内蒙古大学的合作与交流，尤其与内蒙古大学的吴英喆教授率领的契丹文研究团队建立了非常紧密的联系，经常指导他们的研究工作。记得去年3月，内蒙古大

学组织申报教育部重大攻关课题《契丹、女真传世文献整理与研究》，刘浦江应邀来到内蒙古大学，为课题设计建言献策，并亲自参加课题组，承担研究任务，准备开展工作。不久我们听说他得了病，但不严重，正在治疗中，在治疗的过程中还在指导研究生，要求他们多写文章，多出成果。9月2日，我得到他的《契丹小字词汇索引》，我发信息给他：“浦江，今天吴英喆将你的大作《契丹小字词汇索引》交给了我，无限感激，无比感慨。听说你身体不好，特别为你担心。不管遇到多大困难，千万别垮下来，要坚强，要乐观！我们祝你快快康复，苍天会保佑你！内大老道。”他马上回复：“我目前正在进行化疗，疗效不错，如果一切顺利，十月底即可完成全部治疗。浦江。”我们为他祈祷，祈望苍天能够保佑他，让他尽快恢复健康，为我国的民族史研究继续做出贡献。结果病魔还是夺去了他的宝贵生命，苍天无眼，折我学界俊杰，太不公平了！他那永不改变的“小白脸”和风风火火的身影，眼镜后闪烁的智慧之光和谈吐之间表露出的坚定信念，以及留给我们的学术遗产，将永驻于我们的记忆之中！

## 一、他为中国的金史研究填补了空白做出了大贡献

刘浦江的学术生涯始于金史研究，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我国的金史研究水平的提升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我记得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一次金史研讨会上，有位日本学者对中国的金史研究不屑一顾，并扬言日本的三上次男、外山军治、田村实造等学者已经将金史研究得差不多了，再也不会会有什么新的研究成果可以期待了。刘浦江的研究粉碎了日本学者的预言，将我

国的金史研究提升到更高的水平。他的研究方法、研究态度以及发现问题的敏锐性,观察事物的准确性,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是我们学习的楷模。这里仅以他的一篇文章为例,谈谈他如何利用史料,如何辨析史料,如何解决金史研究中重大问题的。

我们拜读刘浦江的大作《关于金朝开国史的真实性质疑》(《历史研究》,1998年第6期)时,正是我们对努尔哈赤的建国问题进行研究的时期。努尔哈赤1616年建立“金国”(Aisin Gurun),最初并没有年号,以干支纪年,“天命”(Abkai Fulingga)年号是皇太极建元“崇德”以后才补授的,就连皇太极的“天聪”年号也是后来的改正,当时纪年以皇太极的尊称 Sure Han 加年代序数词表示之,如 Sure han—i duici aniya(“聪睿皇帝第四年”)等。国号“金国”(Aisin Gurun),只是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统一女真诸部落后,依据其对祖先的历史记忆所起的政权名字,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号。皇太极于1635年征服漠南蒙古后,于1636年才正式立国号“大清”。刘浦江在此文中考证出的12世纪初女真建国时期的过程与17世纪初建州女真建国的整个过程几近一致,而且他能够发现多少代学人不能发现的问题,并能够认真辨析史料加以证明,这使我们对刘浦江的过人功力深为折服。刘浦江敏锐地发现了金史研究史料中的歧异,把别人不屑一顾的资料加以厘正,相互比较,再佐以契丹文碑文,最终得出了女真建国初期的“国号”与“年号”的比较接近历史实际的结论:完颜阿骨打起兵于1114年,1117—1118年间建立了国家,国号“女真”,年号为“天辅”,1122年改国号为“大金”。“收国”年号并不存在,“收国”年号是金代官修史籍《金实录》的创造。



从他的文章所用的史料看,都是似曾相识的记载,我们并没有从中发现什么问题。他却能发现问题,并能解决问题,表现出他对金代史籍的掌握程度和对重要史料的比勘之功力。相对于传统的关于金朝开国史的记载,刘浦江发现了南宋绍兴七年(1137)吕颐浩疏文《上边事善后十册》中被《三朝北盟会编》所略去的原注“女真于宣和四年方建国号大金”,从而动摇了以往相关记载的可信度。他还从范成大《揽辔录》中注意到“虏本无年号,自阿骨打始有天辅之称,今四十八年矣”,经过推算得出天辅元年当为1122年,这与吕颐浩所记宣和四年(1122)女真改国号为大金的时间相吻合。更值得注意的是他所利用的1993年在内蒙古敖汉旗发现的金大定十年(1170)博州防御使契丹小字墓志资料。该墓志中出现的三处“女真国”的字样,正好能支持吕颐浩金朝原称“女真国”的说法。虽然当前学术界对该两个契丹字的基本释义是“女真国”还是“金国”,仍有意见分歧,但他勇于探索的精神是值得令人钦佩的。基于这样的史料发现,刘浦江进一步搜寻有关金朝开国史料。他对《金史》的主要史源《金朝实录》、《三朝北盟会编》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所引《金太祖实录》的佚文做了考察,得出《金史·太祖纪》的关于金朝开国、国号为金的记载脱胎于此的结论。他依据苏天爵的论断,认为元修《金史》还参考过金世宗朝以后修的金朝国史。金朝《太祖实录》二十卷,由完颜勛领修,于皇统八年(1148)成书进呈,由此他确定传统的金朝开国史的说法是在皇统八年《太祖实录》成书后定型的。他还列举了《大金集礼》以及其他文献中的相近记载,并极力寻找到其史料来源,一一辨析清楚。然后他从《辽史》的记载中寻找与传统说法不同的证据。《辽史·天祚皇帝纪》天庆

七年(1117)下的记载为：“是岁，女直阿骨打用铁州杨朴策，即皇帝位，建元天辅，国号金。”说明金朝没有“收国”年号，但天辅建元的年份与《金史》一致。这是金朝建国于1117年之说。又宋元文献中还有金朝建于1118年的记录，如《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东都事略》、《中兴御侮录》以及元代文献《契丹国志》和《大金国志》等。对这些记载，后人不以为然，只是相信《金史》的记载，以至于影响了对重要史事的判断力。刘浦江却批判地对待史料，认真细致地辨别真伪，以求得出真实的结论。

为了澄清阿骨打究竟何时称帝建国，国号是什么，有没有“收国”年号，“天辅”始于何年的问题，刘浦江对辽末金初的历史做了细致的回顾和分析，认为1114年阿骨打起兵后好几年内，都在与辽朝谈判，目的在于寻求妥协。女真起初只是为了获得独立而“自立国”，所以自称为“女真国”。他考证杨朴的劝进是不早于辽天庆六年(1116)，随着天庆八年(1118)宋金协商联合夹攻辽朝和天庆十年(1120)双方达成“海上之盟”，才最终促成阿骨打下定灭辽的决心。至此，刘浦江得出如下结论：“完颜阿骨打起兵之后，由于女真人与辽朝实力相差悬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阿骨打是以争取女真的民族独立并获得辽朝的承认为其奋斗目标的，所以他最初建立的国家可能是以‘女真’为国号的。而且即使在他称帝建国之后，仍与辽朝进行长期的和谈，希冀得到辽朝的册封，直到与宋朝达成海上之盟，阿骨打才决意灭辽朝并取而代之。乃至女真人灭辽宋，建立了一个庞大帝国之后，就对当初那段开国的历史讳莫如深了。于是他们在实录、国史等官方文献中重新塑造了一部开国史，要让人们知道，完颜阿骨打起

兵伊始即称帝建国，并以取代辽朝为目的。”

这是一篇文献功底过硬的学者才能完成的文章，为研究民族史的学者提供了范文。该文向我们提示，中国的任何断代历史中的任何封建政权，都有可能篡改历史。金代有，后来的爱新国直至大清王朝也有同样的问题，需要我们掌握足够的史料，并要辨析史料，去伪存真，以恢复其历史本来面目。

## 二、他为我国的绝学契丹、女真文研究增添了光彩

为了提升我国辽金史研究水平，从1990年代开始，刘浦江教授另辟蹊径，将其研究领域拓展至契丹、女真文等民族古文字的研究，以期通过释读民族古文字来补充民族史史料。他希望搭建一个“跨语种、跨学科、跨领域”的民族史研究平台，旨在打破相关学科间的壁垒，将中国民族史研究水平提升到新的高度。现在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已成为享誉海内外的国际一流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我们认为，刘浦江教授通过其出色的民族史研究成果为该中心的崇高学术地位的确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刘浦江教授契丹女真文研究方面的学术贡献尤为突出，为我国的绝学——契丹女真文研究增添了光彩。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培养新生力量。刘浦江教授一边自学契丹、女真文，一边聘请知名专家任北大古代史研究中心客座教授，为硕士生和博士生开设古文字研究课程。这一举措对契丹文研究的传承，新生力量的发现、培养及成长营造了良好的氛围和条件。刘教

授还充分认识蒙古语对契丹文研究的重要性,鼓励与倡导其学生学习和掌握蒙古语,甚至干脆派遣他的学生到内蒙古大学学习蒙古语,要求熟练掌握学科急需的民族语言。

(二)主持完成重大研究课题。“契丹文字与辽史、契丹史:跨学科的民族史研究”是刘浦江教授主持完成的一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该项目之研究成果,在学术界产生的积极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该项目的立项与结项,标志着该领域研究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契丹语文研究与辽史契丹史研究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时代。此外他撰写《穷尽、旁通、预流:辽金史研究的困厄与出路》等文章,旨在呼吁与动员研究人员去熟悉契丹、女真文知识,深化相关领域的研究。

(三)发表高水平学术论著。刘浦江教授先后在国内外公开发表《关于契丹小字〈耶律糺里墓志铭〉的若干问题》(《北大史学》第14辑,2009年12月)、《契丹名、字研究——文化人类学视角下的父子连名制》(《文史》2005年第3辑)等近十篇契丹文研究论文,其中,契丹族“父子连名制”,《耶律糺里墓志铭》命名问题,以及关于“东丹国号”的认识等一系列原创性学术观点,可以代表该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和学术水准。其中契丹人“名与字”的阐释颇有学术见地,可以集中代表他对契丹文研究所做的卓越贡献。刘浦江全面考察契丹字碑刻文献后,敏锐地发现了契丹人的命名习俗中存在的一种特殊现象。刘教授总结道:“虽然契丹人的小名和第二名被辽代汉文文献分别称之为“名”和“字”,实际上并不具有汉人名、字之间那种词义上的相关性;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契丹人的某些父子的第二名和小名之间,存在着词法意义上的相同形式的关联,即父亲的第二名与其长子的

小名是同根词,前者的惯用词形均为后者添加属格附加成分的形式。这种情况提醒我们,在契丹的历史上,一定存在某种从不为人知晓的父子连名制。”

其《再论契丹人的父子连名制——以近年出土的契丹大小字石刻为中心》(《清华元史》第一辑,2011年9月)为前文的续篇。刘教授基于新发现资料,吸收各家最新解读成果,以诸多实例进一步论证了契丹社会中父子连名制的存在。文中举出的主要实例有:

长子小名	父亲第二名
𠄎𠄎(何鲁不)	𠄎𠄎𠄎(曷鲁本)
𠄎𠄎𠄎(国隐)	𠄎𠄎𠄎(国宁)
𠄎𠄎(查刺)	𠄎𠄎𠄎(查讖)
𠄎𠄎𠄎(特末)	𠄎𠄎𠄎(特兔)
𠄎𠄎(蒲鲁)	𠄎𠄎𠄎(蒲邻)
𠄎𠄎𠄎(窝笃斡)	𠄎𠄎𠄎(窝笃盥)

长子小名	父亲第二名
𠄎𠄎𠄎(窝笃斡)	𠄎𠄎𠄎(窝笃盥)
𠄎(海里)	𠄎𠄎(孩邻)
𠄎(直鲁姑)	𠄎𠄎(直鲁袞)
𠄎𠄎(敌烈)	𠄎𠄎(敌犖)
𠄎𠄎(胡都古)	𠄎𠄎(胡都董)
𠄎𠄎(敌烈)	𠄎𠄎(敌犖)
𠄎𠄎(低烈)	𠄎𠄎(敌犖)

当然,目前各家对“父子连名制”及其文化内涵持有不同的看法与解释。从新发现资料看,除他提出的父子连名与兄弟连名外,似乎还存在父子同名制。如契丹小字《萧胡睹董太师墓志铭》(1091)之志主胡睹董(名)之父亲的字(第二名)亦作“胡睹董”。后也有人提出契丹文中还存在“妻连夫名”的现象。受制于契丹文解读水平,该文化现象短时间内不可能得到完全解读。

不管怎么说，如果没有刘浦江当年的勇敢探索，日后的各种学说都很难应运而生。

(四)编纂辽金史研究目录和契丹文索引。刘浦江重视学术研究信息的获取，很早就编纂《女真语言文字资料总目提要》(《文献》2002年第3期)，《二十世纪契丹语言文字研究论著目录》(《汉学研究通讯》21卷第2期，2002年5月)，《二十世纪女真语言文字研究论著目录》(《汉学研究通讯》21卷第3期，2002年8月)，《二十世纪辽金史论著目录》(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为学界提供了可靠的文献检索工具书。刘浦江与他的学生康鹏主编的《契丹小字词汇索引》(中华书局，2014年)，更是一部契丹小字字库和契丹小字字典。全书收契丹小字词汇达9104个，以词目、编号、出处及参考词义四项为该索引的框架，附录《参考文献》和《石刻录文》，为研究者提供了丰富和可靠的研究参考资料。该索引中蕴藏着巨大的劳动和智慧，它既是一部工具书，又是一部学术著作，是学界必备的工具书。

契丹、女真文研究虽然不是刘浦江教授的主攻方向，他在该领域辛勤耕耘的时间比我们的期盼要更为短暂，但是他所做出的贡献是巨大的，他所指引的方向是正确的，所倡导的学术精神与思想是永远值得后人去学习和发扬的。

(作者系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教授)

## 追念刘浦江君

阎步克

刘浦江君去世，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的师生陷入了悲痛。从事历史学这个职业，看过了数千年的生生死死；而浦江君的意外罹疾和英年早逝，还是给这个多年合作的学术集体，留下了一个无从弥补与永久感伤的空缺。天妒英才。“斯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这句古语，就是此时的感受。

虽生命无常，无常而有限的生命如何书写，是个人可以选择的。当年邓广铭先生的慧眼识才，在很多年后被验证了：邓先生把浦江君调入北大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由此，用浦江自己的话说就是“纯属偶然，走上了辽金史研究的道路”；而他的多年学术生涯，不负邓先生的慧眼，其两部文集和近百篇文章。赢得了相关学者的高度评价。我不是辽金史领域中人，不具备评价资格。但若说到个人的阅读感觉，就是其文章清晰精细、要言不烦，展示了出色的文献功底和难能可贵的辨析力、洞察力。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浦江最初所接受的研究任务，是解决《大金国志》一书的真伪问题。由文献学而进入史学，有时需要跨过一道门槛，否则就容易局限拘泥于史实细节的推敲考订。然而才气使然，在论史之时，浦江随即就展示了其出色的思辨能力，展示了其理论思维和把握宏观、揭示线索的能力，在辽金史政治、制度、民族、语言等多方面，做出了一系列贡献。而且其思考不断拓展，上及

南北朝隋唐，下至近代，在这个漫长时段中，深入考察了若干重大政治文化现象，如正统、五德、史观、民族意识等。我个人对政治文化有较多兴趣，所以浦江在这方面的相关成果，对我启发尤多，很赞赏他的辨析、提炼和表达的水准。

给我启发的，还有日常聊天中听到的浦江对学术、学者、学风的私下评价，多切中肯綮，每每让我开阔了眼界。而且作为一个普通教师，浦江对各个学术单位的潜力、特点、方向和学科发展，竟然也相当稔熟，闲谈中一一道来，脱口而出。后来，浦江担任了北大历史系的副主任，他的行政才干得以发挥了。在组织协调历史系的科研教学时，他的工作作风是认真负责、简练高效。不止一次听到学校行政人员的私下议论，说历史系刘浦江的开会发言锐利清晰，有见解有想法，总能说到点子上。浦江行政能力强，但并非那种老练圆滑，而是不迎合不调和，富有原则性，不失书生本色。面对各种烦杂纠葛时，时时能感觉到他的一种气质，我觉得就是理想主义的气质。私下听他谈看法，总是说要坚持学术标准，坚持纯学术的价值观。学者的品性，当然也将表现在学术之外的各种事情上。有同事追念浦江，说他学术、品行，做人、做事都令人钦敬；说到品行和做事，我个人觉得，他做行政领导时的表现尤为可贵，值得敬佩。坚持原则和标准当然很不容易，然而那能给人建立一个预期，怎么做、结果会怎样，没有例外。事情真实就简单了。浦江有原则的工作风格，维系了一个学术单位的可贵传统，那种让教师在忙碌嘈杂中又感觉宁静单纯的传统。

在已知大限将至的严峻时刻，浦江自然而然地回顾自己的人生。他觉得，没有什么遗憾，想做的事情都做了。这让人想起



死于癌症的维特根斯坦，其临终遗言是“告诉他们，我这一生是美好的”。浦江戛然而止的人生，给同仁和学生留下了深深惋叹，不过仍可宽慰的是，他没有虚度人生、埋没才华，其学术生涯留下了光彩。有这么一句话：希望在我离开这个世界时，这个世界会比我到来时美好一些。浦江做到了。斯人长逝，但他给史学宝库增添了财富，并肩前行者和后继者记住了他的身影。

原载《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5年2月8日第5版  
(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 相别未尽语，追思无限意

牛大勇

去年12月30日中午，忽接小南电话，说浦江病情急剧恶化，他已决定放弃治疗，明晨回老家垫江去。自4月11日接到浦江夫人张文的告急，次日进一步得知浦江是癌症晚期，全身扩散，我心里就已有准备。但在郭海、朱军等同志的帮助下，住院、治疗安排都很如意，近期一直听到的是他病情好转的消息，这绝望来得太突然。下午和小南/宗成夫妇、新江、罗新赶到医院，才知道他这些天病情急转直下：28日走不动路，29日在床上难以起坐，30日说话都困难了，要吸着氧才能说几句。回垫江是为了在行医的亲人护理下走完最后一程。

见我们站到了急救病房窗外，他打起精神，戴上氧气罩，开始和我们隔窗说话。生死问题他早已谈透了，这次没再谈。他跟小南、罗新说的几乎都是弟子们的情况，拜托各位悉心指导，其中有的弟子很有希望在学术上超越自己，更望着意扶持。要跟我讲话时，已是气喘吁吁。我猜他大概要讲些感谢和告别的话，怕他太累，就抢先说浦江你什么也别讲了，我们是好兄弟。我们永远在一起，你永远和北大历史学系在一起！他“嗯”了一声，就转向新江去讲了。事后我想，为什么打断他？为什么不听他讲一讲？也许不应该。反正彼此心知，是诀别！

傍晚上课，有些走神。听着学生做报告，想着浦江，有些迷

糊。学生们看我恍惚，有些奇怪。我只好如实说了浦江的情况。下课后，我还是想再去医院看他一眼。知道他应已入睡，但不求交谈，只为再看一眼。有位同学自愿驾车送我去了医院，颇费周折地进到黑灯瞎火的病房，站在老地方，默默注视着窗内他安睡的身影，心里默念：浦江，永别了！

他去垫江后，我知道不会再有奇迹发生，每天总会想到他。翻着他赠送的新著《松漠之间》，想着和他携手共事的那些细节，叹息这位极富才干又配合默契的好同事竟然不治，觉得应该把我的感念这时就告诉他。遂草成一诗，1月2号下午发给了他和已去垫江陪侍着他的张文：

潜然举目叹穹苍，此别何须太匆忙？  
相知始信流风远，共事尤钦意气昂。  
松漠无垠垂范典，燕园有尔著荣光。  
我心也随垫江水，一路伴君渡海桑。

他随即回我一短信：“大勇，来生再做朋友！”

我和浦江原来并不熟悉，完全是因公务走到了一起。按说我们本科只差一年级，应该在上课或课余活动中有所交集。但可能因为他年纪小，不活跃，我对他竟毫无印象。直到多年后听说邓广铭先生从中央党校要回来一个刘浦江，我才感到：此人恁的了得！邓先生是有名的严师，对自己的门生和助手还常有不满，怎么会看重这个小青年？

我担任系主任后，阎步克有一次在学术委员会中提出：要注意发展新的学科方向，我系的刘浦江、张帆、罗新等青年学者在

民族史方面做得不错，加上中年鼎盛的王小甫，可以组成一个很有实力的民族史研究团队。我马上成立了民族史教研室，在本系网站和通讯录中单列其机构。由此也感到步克对这几人很器重。

不久，在一次会后的饭桌上，目睹了浦江和小甫的一场学术激辩。好像是为契丹史上的一个问题，双方各持己见，互不相让。小甫本科时和我同班同宿舍，雄辩之才早有领教。浦江可是第一次在我面前展露机关枪式的辩才，双方争得面红耳赤。小甫情急之下，抛出一条“钢鞭”，厉声质问：“XXX 碑的碑文就是这么写的！这个碑文我看过！你看过吗？我敢说你就没看过！”满桌人作壁上观，浦江默然，显然是没看过。他不再强辩，但也没认输，或许是想看过材料之后再同小甫 PK？我心想：“这浦江，有意思！”学者之间的淳朴求真，给我深刻印象。后来看到小甫在推荐浦江申请晋升教授职称时写的高度评价，更让我感慨！

大概是 2005 年评教授职称时，浦江和一位系领导形成竞争。他们之间自行做了坦率友好地协商，浦江主动退出竞争。我闻之深感佩服。他还是有些委屈，向我提出，以后应该从制度上解决这类问题，系领导成员最好不要由副教授担任。我深以为然，觉得当了正教授的应该有义务为大家担当些公务，为副教授们多腾出些时间，也避免在职称晋升上出这样的矛盾。

这时期在系内有关教学科研的一些讨论会上，听到浦江的几次发言，发现他对全国各重点高校历史学科的短长和动向非常了解，对本系的发展思路也很清晰，提出了一些很切实的建议。我对“学科”的概念，原本稀里糊涂。到研究生院工作后，才

算入了门。特别是2001年那次13年一遇的全国重点学科评估，我参与协调全校的学科申报和评审，对每个希望上报的二级学科，逐一摸底和帮助审订材料，总算弄清了中国的学科划分标准、北大各二级学科概况及其在全国同行中的地位。回历史学系主持工作后，深感以往不注意按国家的学科标准进行建设，吃了一些亏。没想到浦江竟然对全国历史学及相关学科的情况，了解得如此清楚，因而对本系学科建设问题颇能洞悉，我内心感到这是个人才！

2006年我任期届满，自知变革的力度大，动了些既得利益，不想再干了。但是民意测评尚好，校领导的态度也较硬朗，遂勉为其难，再度“组阁”。和春梅书记商量后，提名已是教授的刘浦江和彭小瑜担任副主任。二位都有公益心和责任感，有变革的思路，价值观高度默契，是我理想的搭档。

我们价值观的默契，集中体现在坚持学术标准上。以学位论文评审为例：自王天有主任第二届任期起，历史学系逐渐形成一个不成文的“惯例”，几乎每年系学位分会在审议学位论文时，总有若干论文在会上因得票不够三分之二而未能通过。换言之，有些一路过关的论文，在分会上被合法的少数票（即三分之一多一票）否定了。记得有一年竟有两篇博士论文、三篇硕士论文、四篇学士论文被否掉。相对于导师、评审专家、答辩委员们来说，系学位分会委员来自不同的专业方向，应该不如前者更“专门”，凭什么以少数票就否定人家层层评审过关的论文？据我体验，这个程序设置的初衷，是让学位分会可以不形同虚设。那时分会一些委员对评审标准掌握得比较严一些。他们提出的异议主要集中在三方面：题材的原创性、原始材料的可靠性和丰

富度、有“硬伤”。为此而否决，自然影响了作者的就业，也给导师、作者和相关的教师们造成更多负担，屡屡发生作者和导师不服并来“讨说法”的事，还造成个别人结怨。这不是自找麻烦吗？

有次系里开研究生座谈会，有位学生因论文需要打磨，已经延期毕业两年了，今年准备毕业，又很难找到工作，发出上百封求职信都没有结果。她在会上哭着问：历史系为什么对论文要求这么严？知道我们学历史的（博士生）有多难吗？

这确实是个问题，需要我们深入分析和耐心解释。好在广大师生是理解和支持维护学位论文质量的，明白坚持学术标准是为了保持北大历史学系的学位品牌，保持全体毕业生的名誉。诚如一位来我系执教过的海外名家的坦率批评：你们的学位论文水平参差不齐，高低程度相差很大，形不成一个品牌。我们看到你们的博士，很难确定他是什么水平。

浦江作为分管研究生培养与本科教学的副系主任，在这个难题上从不动摇。他操作下的博士学位论文双向匿名评审工作，从来没有出现跑气漏风的情况。我作为系主任和学位分会主席，也绝不回避责任和麻烦。小瑜和班子成员们都高度共识，配合工作，从无二话。

我和浦江都不认为姑息袒护质量低甚至抄袭的论文是什么“人文关怀”。这样的“关怀”，对作者本人是一种误导，对扎扎实实地撰写高质量论文的学生不公平，对以往在各环节上未能过关的同学也不公平，对本单位学位获得者的整体信誉势必造成伤害。开此姑息风气，后果很难收拾。

记得某年有位博士生的论文被分会否决后，由太太陪着来讨说法。因其已联系好的工作待遇要因此被打折扣，谈到伤心

之处，他太太泣不成声。我当然也难受，但还是尽力开导。他改进了论文，半年后再来校答辩，终获通过。我本以为，至此事情已过，但春节前意外地接到他从南方某大学寄来一张诚挚热情的贺年卡。感动之下，我赋诗相赠：

感君南国送馨香，九曲奔流是珠江。  
千山万岭遮不住，直下瀚海阅天长。

的确，他值得自豪，因为拿到的是足金的北大史学博士学位。他前后的同学们也会自豪，因为那时期发自北大的历史博士学位是有品牌信誉的。“人文关怀”，此不宜乎？

我们卸任后这几年，北大历史学系的学位论文再没有一篇被学位分会否决过，匿名评审中跑气漏风的事也时有发生。

浦江做学问，极为勤奋扎实，追求甚高，但不图虚名。曾有多人（包括我）劝他一边执教，一边攻读博士学位。他认为在有志攻读的辽金史方向上，没有人能切实指导他做博士研究，若另请关联方向的前辈挂名指导，在这个严谨的学术圈内，恐会有累前辈清誉。更重要的是他不信不能自学成才，也不信学术界会重虚名而轻实才。我并未听他以“辽金史第一人”自诩过，但要超越前人，进占前沿，并要带出超越自己的弟子来，其志高远，众所周知。

实际上他的治学范围已走出辽金史，扩及宋史、政治文化史、概念史、历史文献学等领域。去年甚至在《近代史研究》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辨析国民党领导层对近代革命正统观的困扰，在我们现代史学术圈深受好评。他以艰辛的努力和踏实的脚步迈

进到学术最前沿，这是他死而无憾的。但不图博士、硕士学位，在日益看重虚名的学界与社会，多少影响到他接掌历史学系主任的愿景，这是我们不愿相信，他本人不无遗憾的。

尽管如此，甚至不被选入一直缺少中国古代史学科代表的后任班子，他在系务工作上，对后任班子仍是积极帮助，有求必应。我通过这类事情感到，他个性虽然很要强，但坦荡、天真，不计嫌怨。

浦江在治学上追求卓越、精心耕耘，在治系上也秉持同样的精神。作为中国最具传统的史学重镇，北大史学系同仁在努力治学的同时，也容易产生优越感，对自己在国内外同行中的实力地位认识不清醒，没意识到这个百年老系一直是全国同行奋力赶超的目标。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全国同行几乎都从非常接近的状态下开始新的起跑。群雄并起，各领风骚。如果不认清现实，靠吃前辈的老本而自命不凡，故步自封，真好似“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2005年1月，我和本系两位年轻同事在一个专业会议间闲聊，一位坚持说本系学术水平保持全国第一没问题，一位深入追问各个分支领域，目前全国最优秀的人才究竟有谁？分布在哪儿？哪位是北大培养的？一番“煮酒论英雄”，盲目性少了很多。

浦江对此和我认识很一致：本系亟须反骄破满，励精图治。他担任副系主任后，又兼任了北大历史学位分会副主任，主管本科教学和研究生培养。这是一副既要有通盘战略，又要能细心操持的重担，一般是由两位副系主任分管，他二话不说就一肩挑了起来。他像做学问那样，热情、精心、严谨地为广大学生和教师提供管理和服务，把一般人感觉很繁杂的事务办得有条有理，



有声有色。有些事，例如给教师临时调换教室这类琐碎的细节，他都亲力亲为。

他根据对兄弟院校同行专长和教学路数的广泛了解，吸取本系人才培养的历史经验，分别调整了本科教学计划和研究生培养方案。加强培养学生的古汉语、民族语和外国语专业文献的阅读能力，把保研、直博、硕博连读的选拔程序做得更为严密。进一步规范学位教育的各个环节，严格实行博士论文匿名评审和淘汰机制，把这个百年老系的人才培养和学位教育制度推向精细化。

他积极配合学校的教学改革，巩固和提高通选课的教学质量。协助教务部和兄弟院系组建了文科大类平台课系、元培学院跨学科教学项目、古典学珠峰人才项目。改进专业课教学体系，协助小瑜他们完成了世界通史基础课体系的改革。承担了学校的博士生导师评选机制改革试点，使更多的副教授得以招收博士生。

这些建设和改革，有风险，有困难，有抱怨，有失败。但他一贯把个人得失置之度外，迎难而上，勇于探索，注意纠偏。

他任职期间正赶上全国高教界评估频繁。为了不辜负北大历史学科的传统地位，也为认真地全面地总结多年来的学科建设经验、成就与不足，他倾尽全力地协助完成了2006年全国重点学科评估、2007年本科教学评估、2008年全国一级学科评估、2009年北大学科自评和调整全国一级学科设置等等工作，在各项评估中都保持了北大历史学科全国第一的传统优势，为本系增加了两门全国精品课、1个国家级教学团队、1名国家级教学名师，1名北京市教学名师。在全国及北京市优秀博士学位论

文的评选中也获佳绩。还严密组织和完成了国务院学位办布置的中外史学博士学位论文质量的比较研究任务。

办这些事,细琐而繁重,但我们都倾向于从总结提高的角度积极对待,而且尽量自己动手写材料填表格,不给教师们添麻烦。

我们另一高度共识,在于认定建设一流学科的根本问题是建设一流师资。我们对在学术界公认度高的一流人才,无论系内的还是系外的,都衷心敬佩。系内的,我们尽量提供与其业绩相适应的治学条件;系外的,只要得知其有来意,我们一定尽力促成。个别人才年龄已过了50岁,超越了校人事部掌握的进人年龄界限,因得到校领导的大力支持,也破格引进了。那时做得实属不易。有的学者才华出众,个性也出众。系内有的同仁,对引进的人才颇有保留意见。好在史学研究实质上是必须在自由的学术环境中独立思考、自主创新的个体劳动,不是非得结队抱团地工作不可。浦江对外引教师的教学研究,竭力协调安排,务使人尽其才,还一再声言:“对人才的容忍度,要同他们的才能成正比。”老实说,这样的话,我还不肯讲。

他对学术水平高、深受学生们喜爱的教师,尽力协助解决一些具体问题,安排他们在教学第一线主讲基础课和特色课。鼓励所有课程都努力体现最前沿的学术成果,形成科研与教学水平的良性互动。积极扶持并参与学生们的课外学术活动。在研究生招生环节上纠正对外校、外专业、残障、大龄老龄考生的不公正对待。另一方面,对于违犯教学纪律和学术规范的行为,他坚持原则,严肃批评,秉公处理。像后来发生的教师旷考而不受处分的怪事,在他治下是不可想象的。

我和浦江在系务方面总体上很默契，但也时有争执。据我印象，每遇分歧，在摆明意见后，经常是他让步。我有时为求效率，脾气急，不耐心。前后共事的班子成员们对我多能谅解、忍让。但有次为了一事和浦江通电话，我没说几句又急得发脾气，话筒那端传来他略带川音的直率抗议：“大勇你怎么这个态度啊？你急什么嘛！你最近怎么越来越爱发脾气呢？怎么回事啊？”一番话让我认识到自己的老毛病又犯了，顿时改变了态度。其实类似的批评，其他同事、学生也不同程度地给我提过，甚至校领导也评说我“太冲！”但他这次顶撞，让我特别警醒，话音一直难忘。

浦江卸任以后，仍然关心和参与历史学系和教务部的许多服务工作，这主要是出自对学生深挚的热爱。即使在身患绝症即将住院的前夜，还忍着全身疼痛，彻夜不眠地在家中处理学生们的各种作业。次日清晨，临出门去医院时，也许意识到自己的使命将告一段落，也许不甘心就此放弃心爱的事业，也许不知道此一去还能否再回到自己的岗位、自己的家，他终于罕见地痛哭了一场。然后，擦干眼泪，排门而去。

1月7日凌晨噩耗传来，我辗转反侧，难以入睡，把消息转给各位友人。有短信来劝我休息。我闭目冥思，浦江犹在眼前。心中和他对话，不禁感吟：

夜半应眠亦难眠，哀思无尽忆当年。  
 坷坷坎坎登山路，点点滴滴印心田。  
 挥笔勤耕真才俊，仗剑敢为好儿男。  
 汝今一梦乘风去，天外流霞可壮观？

1月9日的骨灰告别式，来了那么多人，我没想到。21日北大中国古代史中心举办追思会，我在国外不能出席。请他的学生苗润博转告中心：

“我虽然不能参加你们的追思会，但心和你们在一起追思。浦江之为人、治学、育才、理事，体现了北大历史学系的百年流风，凛然正气。人们如此怀念他，可见他的精神感人至深。他不是完美的人，但他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有执着的学术追求并能坚持学术标准的人，一个纯真的学人。我们今天多么需要他这样的人，可是他竟然在54岁硕果频出的时候被病魔夺去了生命！令人何等痛惜！何等哀伤！”

我相信浦江的精神会在北大历史学系得到传扬，浦江的业绩永远是我们系的荣光。在我们心里永远有一个质朴、好学、开朗、而又总是有些急急忙忙的刘浦江。”

（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 心香一瓣：悼念浦江老师

刘静贞

2014 岁逢甲午，时不时就听说某某人走了。盼到进入 2015，正想说历史学界该安稳了吧。1 月 7 日便接到邓小南老师的电邮。简简单单的一行：“浦江走了。昨夜 23:57。”是的，2014 虽然走完，甲午仍在。

回想去年夏初，也是从邓老师处确认浦江老师罹病的消息。听说他入院前夕，熬夜处理了学生的作业，听说他进行化疗后恢复得不错，听说他还把学生叫到医院去上课……

北京追思会后，收到学生们编的纪念文集，封面上“大节落落，高文炳炳”的八个大字旁，站着微微驼着背，双手握着拳，两眼正正直直的浦江老师。翻读着一篇篇的报导与追思文字，缕缕丝丝地描说着他们曾经接触、体会的方方面面。我时而羡慕他的学生能明白他讲课时思考跳跃的逻辑，时而感伤累积了那么多年学力，那么认真又执著的学者，就这么离世而去。

就在情绪起起伏伏间，忽然发现，无论是聊天还是讨论问题时，总是意气昂扬，急着把脑袋中所有想法倾尽，以至话语不及，有点口吃的浦江老师，形象虽然那么地清晰，却实在没有什么直接的接触。是因为领域不同吗？为了教书、研究，也出于好奇，我认真拜读过不少篇他的大作，论文当然是条理细致，一篇《唐突历史》更是文如其人，直言不讳。不过，那个曾经一起开过会，

一起出行考察，来台湾时被我和雅婷领着逛了北埔、鹿港，到了北京有机会，总要一起吃个饭的浦江老师，在我记忆中，除了他因为胃肠不好，对于饮食特别当心之外，怎么完全想不到学术和教学以外的枝节。而他的种种件件，似乎也都是从北大的老师、同学们处听来：他不答应学生转系的坚持，在历史系当副主任时的用心，病中的坚强……只有学术讨论时的较真劲，是我的现场亲闻。喔不，连吃饭聊天话题带到，他都是认认真真地要说个明白。

去年暑假，雅婷和我计议着是否将北京列入行程，最后因着听说化疗效果不错，又被俗务牵绊而打消。而一个心里的念头则总是想着：浦江老师那么坚毅的一个人，一定会战胜病魔的。

据说，他曾宽慰大家：“人活着不在长短，关键是生活要有质量，我想做的已经做了，这一生值得。”又说：“一个人文学者，有一流的作品可以传世，能够培育出一流学者来继承他的事业，还有什么可畏惧的呢？顶多有一点遗憾而已。”

但是，当我读到那句：“临走，也没坐热历史这张‘冷板凳’。”又怎能相信他真的只有那一点遗憾而已。更何况，少了他，又是多少人莫大的遗憾啊！

心香一瓣遥送天际，而今我只能相信邓老师说的“天国自有读书处”。浦江老师，甲午带走了大师成群，我仿佛看到你时而蹙眉，时而昂扬地与大师们一起认真地思辨、论说着你最爱的学术话题。珍重！

（作者系台湾成功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 忆浦江君

陈苏镇

浦江是1979年考入北大历史系的，比我们晚一届，当时就知道他是79级中国史专业最出色的学生。1986年我毕业留校，在中古史中心任教。不久，浦江也从中央党校调到中心，作邓广铭先生的助手。他常去邓先生家，偶尔在校园里见他匆匆走过，但从未交谈过。上世纪90年代初，北大一年级本科生都住昌平校区，我和浦江曾经在同一时间去昌平上课，因此有了较多接触。后来浦江出任系副主任，分管教学，最近几年又担任中心副主任，和老师们打交道多了，我自然也对他有了更多了解。在我印象中，他是个很有特点的人。

浦江很健谈，说话滔滔不绝，虽然总是嗽嗓子，几乎一句嗽一次。有一次我们聊起备课写讲义的事，我上课前是要把所有内容都写在纸上的，而浦江说他从来不写讲义，包括“中国古代史”这样的基础课，也只用一张纸写个提纲。我没听过他的课，但能大致想像出他在课堂上的样子。所有内容都不是从纸上念出来的，而是从肚子里掏出来的。这需要极好的记忆，深厚的积累，和临场应变发挥的能力。听学生们说，他的课很受欢迎。

浦江的著作我都有，也拜读过他的一些论文和发表在《读书》一类刊物上的文章。知道他思维敏捷，文字流畅，语言犀利。他长年跟随邓广铭先生，还做过几年古籍整理工作，所以受过很

好的文献学训练。傅斯年曾说“史学便是史料学”。学界对此有赞成的有不赞成的。浦江是坚定的赞成者。邓广铭先生曾对我们说，他年轻时靠一部《四库全书总目》查到了别人没查到的史料，因而写出了超过前辈学者的文章。浦江对版本、目录等文献学知识也很重视。他在系里给研究生开了一门“四库全书总目”的课，我的学生也选了这门课。听他们说很有收获。每年的研究生入学面试，我和浦江常常一起参加。他对考生的提问，总会包括是否读过某书。考生若说读过，他就会追问是什么版本，那个出版社出的，封面是什么颜色等等。考生经常被他问得支支吾吾。

浦江是优秀的学者，也是很好的组织管理者。当年他出任主管教学的副系主任，进入情况极快。一个多月后，系里开教工会，浦江说他分管的工作，已经如数家珍。他不仅熟悉系里所有老师的学术专长，对其他大学和研究所的有关科研人员也很了解。研究生入学面试时，他会问外校考生听过什么课，对涉及的外校老师，他大多是知道的。这说明他很注意掌握这方面的信息，因而对其他学术机构的情况也心中有数。这对他分管的工作当然是有帮助的。这些工作要花许多时间和精力，浦江从不计较，而且热情很高，甚至兴致勃勃。有件小事让我印象深刻。中古史中心作为教育部文科基地，每年都要申报两个重大项目。有一年轮到我和罗新承担此事，需要填表，还要准备其他材料，很是麻烦。一天，浦江来电话，说罗新的材料需要修改，其中有几个问题要问我。我问他：“这不是罗新的事吗，怎么是你来做？”浦江告诉我，罗新去美国了。又笑着说：“罗新是做大事的人，这种小事他是做不好的，得我帮他。”对罗新没有丝毫抱怨，



还流露出发自内心的欣赏。

浦江事业心极强，抱负很大。做学问是他人生的最高追求，成为大师则是他给自己定下的学术目标。当年他申报教授职称，在全系教授会议上做业绩陈述。谈到学术道路的选择时，他说怎样怎样做能更快更多地出成果，但那只能成为专家，成不了大师，所以他不那样做。执著和自信溢于言表。当年在昌平上课，午休时和浦江闲聊，他说正在写一篇文章，总结中国近代史学家的学术成就，并将最有成就的学者分为两个档次，第一档是大师，有王国维、陈寅恪、陈垣等，第二档是专家，有邓广铭、唐长孺、韩儒林等。我当时问他，某某某等，你归入哪一档？他不屑地说：“不入流。”由此可知他的学术标准和他心目中大师的含义。在我认识的学者中，很少有人给自己设定如此高的目标。这些年来，他的确在循着自己选定的道路，勤奋治学，努力拼搏。我虽不懂他的专业，但知道他发表了大量文章。浦江去世后，有人称他为“辽金史第一人”，这是很高的评价。若非英年早逝，谁敢说他日后不会成为大师呢？

（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 遥祭浦江：生命以另一种形态不朽

王瑞来

过了知天命的年龄，也就迎来一个不想面对的季节。在这个季节里，不是迎来，而是送往，为先走的师友送终。几年前，在参加了一位朋友的葬礼之后，写下过一篇短文，题为《失去了永别的感觉》。是说在节奏很快的现代社会，大家都十分繁忙，朋友之间，难得经常从容相聚，除了偶尔匆匆一见，大多是从其他朋友的口中，或是从报纸杂志，乃至网上，可以获得一些对方的信息。因此，朋友就像是一处固定的景点，似乎会永远存留在一处。即便是真的走了，也就犹如平日都在各忙各的而难得见面一样，不相信已经永远地离开我们，去了另一个世界。仿佛在某一天、某一个学术会议上，还能像以往那样，偶尔再见。

浦江走了，我也完全没有永别的感觉。我宁愿让繁忙抹杀掉生与死的界限，我宁可相信虚幻的永恒。我在东京，他在北京。我守望宋代，他在辽金纵横。

从微信、从网上获悉浦江去世的噩耗，十分震惊。自从一年多前从朋友那里得知浦江患病的消息，便一直关注，还曾向在网上联系到的浦江弟子打探近况，得到的都是比较乐观的信息。直到最近几个月，我还在网上看到他有关于近代史的论文刊布。我相信他已经康复，甚至以前的病况都是不实的传闻。所以，我不相信，不愿相信浦江已经远去。

我在微博写下的悼念文字，称浦江是我的朋友、同行和同学。这句话被媒体报道加以援引，讲他的同学如何如何说。其实，我跟他的学长邓小南、荣新江才是同一个教室上大课的狭义同学，跟浦江，因为是同在北大一片天空下，又同研文史，自谓是广义的同学。说是同行，倒是更为贴切一些。我主做宋史，浦江主做辽金史。对彼此的研究动态都很关注。我欣赏他的五行始终论，相信他也了解我的皇权论。

至于称为朋友，由于学习、工作、研究领域乃至海天睽隔，其实我们彼此交集很少。记忆中最为清晰的较早接触，已经是2007年邓广铭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了。那次较多地看到作为副系主任的浦江忙碌的身影。最为近距离的接触，是2010年春天应小南、新江之邀，在古代史研究中心做完《唐宋变革还是宋元变革》讲座之后，一起在勺园共进午餐。忙碌的浦江也是餐后匆匆先行离去。而最近一次接触，则是在2013年9月“宋代政治史研究的新视野”的研讨会上。在其他学术会议上或有相逢，但印象最深的几次交往都是在北大。朋友、同行、同学云尔，此之谓也。

浦江为人热情，初次见面，伴随着握手，一句“我知道你”，顿时拉近了彼此的距离。此后，在不多的相逢之际，都是远远地迎上来，热情握手。那一张生气勃勃的青春娃娃脸，永远定格在脑海之中。

交集虽少，人前人后，生前身后，我会称呼他“浦江”，这不仅是因为我痴长几岁，更缘于我对浦江的学问人生的敬重。接触虽浅，心仪则深。

浦江去世后，网上悼念文章很多，于辽金史研究，有赞誉为

泰斗者，有推崇为第一人者。其实，这些赞誉，浦江未必乐于接受。了解一个人，无需过从很密，遥遥相望，也能从本质上把握。以我对浦江的了解，他或许只是会这样说，我用心地做过，尽全力地做过。

学如其人。浦江个性鲜明，学问也有特色。我一直有这样的印象。前几天收到浦江弟子润博寄来的追思会纪念册，看着一篇篇回忆文章和浦江的论著目录，更加深了这种印象。病中的浦江如是说：“如果我的病能好，今后的研究重心就不想再放在辽金史上面了。”其心存高远，其志向宏大。浦江从辽金史研究发轫，上下纵横，南北驰骋，从魏晋南北朝到元明清近代，从文字到文献，有微观考证，有宏观高论，宏微相济，博大精深。立足一家，却不固守家法。

我是北大古文献专业出身，属于浦江讥为没文化的中文系。我在日本，也给研究生开过四库提要课。除了宋史，我的另一个研究领域就是文献学。我很钦佩专攻历史的浦江对文献学拥有强烈的意识和精深的造诣。他有一段话说得很好：“史料熟不等于文献熟。史料熟只是局限于某一断代，而文献熟则是一种整体的感觉。一旦文献熟了，上起先秦，下迄明清的史料都可以从容处理。”浦江可谓深得先师真传，这段话正是对邓广铭先生强调治史要拥有年代、地理、职官、目录“四把钥匙”中目录学的具体阐释。纯治史者，往往缺乏文献学根柢，学问格局受限。纯治文献者，又易溺于文献而难以自拔，学术视野缺乏宏阔。因此，浦江此语，无论治史者，还是治文献者，皆当奉为圭臬，接受启发。

物伤其类。在学术取向上的类似性，使我对浦江的去世格

外悲痛。我常跟学生讲两句话，一是先做杂家，后做专家；二是做断代史，须拥有通史视野。这也是我心向往之 and 身体力行的方向。看浦江的学术业绩，可以说上述两点都做到了。他是博而反约的杂家，又是气象宏阔的专家。以浦江这样的知识结构与见识学养，如果假以天年，那可真的是不可限量，会在没有大师的时代创造奇迹。

三十而立。不满三十年的学术生涯，已让浦江矗立于一览众山小的学问峰巅了。在浦江的学术业绩面前，不敢沾沾自喜，只有自惭。这是一面高扬的旗帜，召唤和激励同行与后学奋进。

人生不满百，却期待长生不老。徐福没有给秦始皇找来不死的灵药，于是竹帛烟消帝业虚。不过，中国古代的知识人却找到了不朽的路径，立功、立德、立言。欧阳修写过一首《重读徂徕集》的五言长诗，其中有这样几句：“人生一世中，长短无百年。无穷在其后，万世在其先。得长多几何，得短未足怜。惟彼不可朽，名声文行然。”学者在学术中寄身，在文化中不死。在历史长河中，人如沙砾般渺小而微不足道，但却传承了几千年的文明。一切的社会进步都是由一个渺小的人创造积累而来。数十年的人生，数千年的文明，这是一个伟大的生命链。浦江就是这链条中的一节，没有他的贡献，文明链条就有残缺。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短暂的人生，浦江活出了生命的质量。学术含金，人生辉煌。“有的人死了，却还活着。”在前面援引的欧阳修那首诗中，还写有这样的诗句：“如闻子谈论，疑子立我前。乃知长在世，谁谓已沉泉。”生命以另一种形态不朽，

浦江不死,他的学术成果生气勃勃。翻开论著,浦江那张亲切的娃娃脸,笑吟吟如在目前。

2015年2月13日写于丝绸之路上空,前往土耳其途中  
(作者系日本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 刘浦江教授追思会上的发言

包伟民

浦江走了以后，我读了他的弟子们替他整理的一些信札，就一直在问自己：如果我面对死亡，能不能如浦江那样的从容与坦然。我怀疑自己大概无法企及浦江的境界。他的这种境界，来自对人文学术研究价值的一种从不动摇的自信。正是这样一种深藏于心灵而又从不张扬的自信，造就了如浦江那样的一位“纯粹的学者”。

浦江的自信，还在于他对自己从事人文学术研究工作所已达到高度的冷静评估。那就是他所说的，对于死亡，“一个人文学者，有一流的作品可以传世，能够培育出一流学者来继承他的事业，还有什么可畏惧的呢？顶多有一点遗憾而已”。这样的评估，当然恰如其分。但我仍然自问：如果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我能不能如浦江那样，冷静坦然地做出这样的自我评估？这绝非是一个学者对自己的某本著作、某篇专文，从局部的视角所表示的自我陶醉。这样的评估是必须站在全局的立场，在对学术发展了如指掌的前提下，才能够客观评判自己的研究工作是否具有领引性的意义。事实上，如我们所了解的，浦江的学术路径正是如此。所以他把理想的治学取径概括为“入于汉学，出于宋学”，从基础出发，统观全局。他从金史研究出发，进一步扩大到辽史，更进一步扩大到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及至近代关于太平

天国的史观。他的那篇《“五德终始”说之终结——兼论宋代以降传统政治文化的嬗变》一文，我一直将它作为本科生中国古代史课程的必读文献。

2009年10月，我协助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组织“中国古代史学科建设高峰论坛”，请浦江出席。在那次会议的发言中，浦江对当今国内各高等院校历史学科建设的现状之了如指掌，对各种制度利弊分析之深入到位，切中肯綮，以及其所建议的关于学界应对之道之实际达观，使我第一次认识到，浦江原来是一位极具行政组织能力的学者。后来不断了解到关于他承担北京大学历史系行政工作的勤勉与成就，更深化了我对他的这种认识。

这样一位“纯粹的学者”，一位正处于学术创造高峰期的学者，一位兼具学术研究与行政管理一流水平的学者，却不幸英年早逝，这不仅是北京大学历史系，也是中国历史学界，乃至整个中国学术界的重大损失。

在此，我只能表示深深的悲哀。好在，我相信，浦江的学生们一定能够将他们老师所开创的学术事业不断向前推进。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 悼念浦江

王晓欣

浦江教授遽然走了。2015年1月7日凌晨，接获润博短信，得此不幸消息，一时难以接受！去年突闻他查出患癌症，为他担忧，给他发了一封长信，说癌症以现在技术已是可以战胜的，要相信自己的体能和保持精神强大。他很快给我回信说医生也告诉他这种病可以治愈，让大家放心，也不要去看他。之后听说他的治疗常需要绝对隔离，为让他保持静养，也就没有赴京看望。大半年来从润博、张良等处也常能得到他的治疗进展，我祈盼他早日康复，认为以他这样的精神和体力应该可以战胜病魔，而从他的学生和北大一些老师那里得到的消息也一直较乐观，说医院采用了最先进的干细胞疗法，只要下半年移植成功，就可以痊愈了。11月份有我和外地的朋友询问，我也乐观告诉听说现在正在干细胞移植，可能是最难受的一段，但只要扛过去，就是胜利。后来他的学生们那里也没有更具体的详情传来了，听说他回四川了，我还以为是移植告一段落，可以回去静养了。不料竟是移植失败，他自己决定放弃，回家乡以一个学者的尊严迎接死神。病魔还是没有放过他，真是天妒英才，天道不公啊！浦江教授是我国中国古代史尤其是宋辽金元领域杰出的历史学家。他的去世，不仅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重大损失，中国历史学界的重大损失，也是我们这些朋友同行心中的巨痛！

我和浦江先生见面次数并不频繁，但相识以来，交流甚为投契，常有一种知己之感。2013年11月，在西北大学参加“中国古代国家治理与边防”研讨会，11月16日会议结束当晚，他和我在宾馆屋内长谈了4个多小时。他畅谈当年邓先生对他的提携扶植；他在北大工作的管理思路；他的最新的学术考虑和设计；现在他所带的几个学生的培养前景。等等。直到子夜，意犹未尽。我颇有胜读十年书之感，却不料这是我和他最后一次晤面，他的敏锐见解，他的音容笑貌，宛如昨日，现在回想，直令人潸然。

浦江是北大公认的好老师。他对学生的认真负责，细致关爱，北大、历史系和他的学生们这些天在不同媒体上已为我们介绍了许多的事迹。我以为在当今中国的大学里堪称最高楷模。我在南开大学指导毕业论文的几个学生如苗润博、张良现在都在浦江名下读研，从他们那里我得知了许许多多浦江令人感动的言行。他多年负责北大历史系招研的面试，各校送来的保研生推荐书和资料他真是逐句细看，认真分析对比，还要和保送单位反馈核实，这样仔细认真负责的态度，我在我们学校真没有见过。他病重后，无法亲自参加学生的讨论课了，可每一节学生自己讨论后，他都要求把记录报上，然后他再打电话逐条评论并做出新的部署要求。记得我去年听到这个情况，感动之余，托学生转告他，养病为重，可他显然有他坚定的信念，不会改变。苗润博说刘老师在去年后半年的时间里给四位学生修改了6篇论文，逐字逐句，大到布局，小到标点，加上密密麻麻的批注，一直改到去世前不足一个月。人常说军人死于战场，教师倒在讲台为分内最壮烈之事。浦江无法上讲台了，但他为研究生操劳到生命

最后一刻，也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教师的最高境界！正如邓小南老师所评价的，“他真的就像一根蜡烛一样，把自己烧干了”。浦江担任北大历史系副主任期间为自己定了不参加任何评选的规矩，以至于他甚少荣誉称号。但我以为他是名副其实的全国优秀教师，是真正的国家级教学名师！

浦江的学术成就是辉煌的，我总对从南开到他门下的学生说，你们太幸运了，跟刘老师，一步就跨入了辽金史学界最前沿的领域。许多学界同仁称浦江先生是当今辽金史学第一人，是名副其实的。他在辽金史众多领域的开创性贡献是举世公认的，这一点许多专家都有评述。我们还要特别重视浦江先生在长时段研究的独特眼光和打通断代史的魄力。不仅在他的贯通辽宋金，也在他的有关华夷理论、五德终始与正统论的精彩论述。更在他勇于实践打通辽金元。我在前面说他是宋辽金元领域的杰出历史学家就是指此。他发表的《再论阻卜与鞑靼》、《契丹人殉制研究——兼论辽金元“烧饭”之俗》、《元明革命的民族主义想象》等这方面的论著独辟蹊径，给我们元史研究以很大启发和推动。他不止一次地要学生考虑“辽朝对元朝的影响”，他和我们的谈话中多次提到对辽金元打通、联系研究的关注，他在生命的最后时期将学生委托给张帆教授，无不透露出他在这方面的前瞻思路。我们注意到，北大的教授们已不止一位在这方面有所实践了，浦江教授无疑是先行者。我们做元史的也要加重对辽宋金和明的贯通关注，这是我们特别要向浦江先生学习的地方。

浦江教授驾鹤西归了。这些天许多媒体一窝蜂地炒作某艺人的离世，而前些时中科院一位院士的去世，还有我们浦江教授，在大众传播系统中却显得冷清，以至于有中央媒体发文不

平。我们对逝者都持敬意，无意非议其他领域。但正如赵冬梅老师所说，“学问是学者的荣光”。也正如浦江在病中说，“一个人文学者，有一流的作品可以传世，能够培育出一流学者来继承他的事业”，足以自傲于社会。与学术之树的长青相比，一时的社会喧嚣是无法相匹的。浦江为中国史学做出的巨大学术贡献将传之后世，永为学界敬仰，也永为社会铭记！他的才华，他的音容，将永存我们心中！

（作者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 畏友浦江

李华瑞

1月6日晚不到10点我就关机了，当时曾下意识地想，要是紧急消息会不会耽误，以前关手机时从未有过这样的念头。7号早7点半突然想到昨晚关机前的想法，赶快打开手机，果然一下映入眼帘的两条短信噩耗，都是关于浦江病逝的消息，一条来自邓小南老师：“浦江走了。23:57。”一条来自浦江的学生陈晓伟：“刘浦江老师于1月6日23时57分逝世。”这个消息太突然了，尽管在此之前我已知浦江回垫江做最后的准备，但是我还是希望他能坚持，能有奇迹出现，我在6号早上刚买了28日回四川绵竹的火车票，是经过重庆去成都的车次，就是想在29号停靠重庆市时顺便逗留一天去探视浦江，可是这一切都不可能了。于是我当即决定飞去重庆垫江送他最后一程。

## 一、从相识到相知

我知道浦江的名字是我到河北大学以后。1987年9月我考入河北大学，跟随漆侠师学宋史，1988年4—5月浦江从中央党校调入北大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成为邓广铭先生的助手，这一消息很快就传到河北大学宋史研究室。特别是他不愿攻读学位而又立志做好学问的行事方式令人称奇，漆侠师就很称赞。

我们初次见面很晚，记得是1998年邓广铭先生去世后，漆侠师带领郭东旭、姜锡东和我参加北大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举行的悼念活动，那天北大中古中心的几位老师来接我们，一位长着清秀娃娃脸非常显年轻的年轻人走到我身边，“你是李华瑞吧，有很多人在说你，你挺有名啊”，但我不知道他是刘浦江，站在旁边的张希清老师说“他是刘浦江，邓先生的助手”，我赶快伸出手说“你就是那个不拿学位的‘牛人’？”初次见面后，没有更多的寒暄，再去北大也只是跟他点头招呼而已。1999年暑假过后，刚开学便收到浦江寄来的大著《辽金史论》，扉页题签“李华瑞先生教正，刘浦江谨呈”，从题签上看我们的关系还比较生分。

我们关系热络起来是在2002年9月10—21日，我随北大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组织的“10—13世纪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课题组一行九人访问台北中研院史语所，顺便去台中、台东、宜兰、花莲、南投等地的高校参访，一路上不仅整天一道参加各种活动，有时还会和浦江住一个房间。这时我才知道他是重庆垫江人，我对他说几年前要不是重庆成立直辖市，咱们还是四川老乡，我祖籍是四川绵竹。他说那你说句四川话，我说从小没在四川长大，不会说，他便打趣说连四川话都不会讲，还算四川人吗，充其量是个冒牌老乡。我说你的大名浦江不也说明你不生在垫江，他说三四岁后他就回到了垫江，他是从垫江考入北大的。我们肠胃都不好，都带着必备的止泻药“盐酸小檗碱片”，感到很有意思。他有一些洁癖，我有时故意捉弄他，他也一笑置之。以前仅看面相，我以为他比我至少年轻十岁，实际上他比我只小3岁多。这次近距离的交往使我们有了一见如故的感觉，我们的话题始终围绕学人、学术史、学术八卦，无话不说，常常聊

到半夜两点。他的坦率、机智，聪慧中略带几许狡黠和从不认错  
的个性给我留下至深的印象。

其后又多次参加北大中古史中心组织赴山西五台山、大同  
及赤峰的考察或会议，只要同行，浦江与我常常是形影不离。  
2004年我调入首都师范大学，与浦江见面的机会更多起来。06  
年浦江出任北大历史系副主任，上任不久就给我打电话，他说他  
刚接到系副主任的任命，对行政工作不太熟悉，你在河北大学担  
任过多年人文学院院长，以后要向你多请教。当时我在祝贺的  
同时还挺认真地讲了一通大道理。事后想，浦江是以一种委婉  
的方式告知我他出任系副主任了。06年以后我几乎参加了所有  
北大中古史中心的宋辽金史方向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和论文  
评议，起初是邓小南老师跟我联系，近几年都是浦江直接跟我  
联系。

我们每次见面都少不了长聊，或辩论、或争执、或打诨，有时  
我们还会在夜里十一二点打电话神侃互通有无。2012年3月  
12日，与浦江一道应邀参加电影频道《中国通史专题片》100集  
座谈会，会后电影频道招待晚餐，主人问喝不喝酒，浦江滴酒不  
沾，却指着我说他肯定要喝，并大声说华瑞酒量大，那天他兴致  
很高，拼命给我添酒，我虽然能喝点酒，但是不适应喝急酒，大概  
喝了有半斤就有些醉意了，然后我就告辞了。后来浦江再见到  
我的酒友就说李华瑞酒量大，名不副实，半斤酒就醉了。我听了  
一笑了之，不喝酒的人怎懂得我们的饮趣呢？2013年11月  
15—17日西北大学历史学院院长陈峰兄主持“中国古代国家治  
理与边防”学术研讨会，15日下午2点与刘浦江、王小甫同乘高  
铁，从北京至西安将近5个小时，原本我和小甫坐在一起，为了

浦江和我说话方便，小甫主动跟浦江换位子，浦江与我一直在说话。车过邯郸时，浦江说这里有宋金对峙时期的地道，问我看过没有，我说没有，他建议请河北社科院孙继民先生召开一次宋辽夏金史的小型会议，顺便考察宋金地道。浦江对宋辽和宋金时期的地道都有深入研究。我与孙继民先生联系，孙继民先生告诉我宋金地道没有开放，现在仍封存着。浦江要去邯郸主要是想亲眼看一下地道，但是浦江很少给我提要求，难得他主动提出，我很想满足他的要求，也很想跟他一块出来开会，于是跟孙继民先生多次协商，会议名称为“邯郸市大名县新发现元代夏汉文合璧墓志铭研讨会”，时间定在2014年3月29—30日。我告诉浦江会议日程时顺便撒谎说考察宋金地道在议程上，他听了很高兴。没想到这次善意的撒谎竟促成了浦江生前出席最后一次学术研讨会。

## 二、生病前后

2014年3月初，陈峰兄来京参加社会主义学院培训班学习，3月中旬的一天陈峰兄招呼浦江与我到他下榻的中协宾馆餐厅聚会，下午5点多浦江骑车从北大赶到中协宾馆，晚上八点多吃完饭他又骑车回中央党校的住家。3月29日下午3点多我和浦江坐高铁去邯郸开会，一上车浦江就说，最近半个月腿一直很痛，我当时调侃说“是不是那天骑车太多，平时不锻炼，一增加活动量身体就不行了”，然后劝他今后要多锻炼。浦江没有接我的话，便开始神侃。这时我才告诉他宋金地道没有开放，看不到，他哈哈一笑说你还真会撒谎。不过还是表示了一点遗憾。



当天晚上邯郸学院高规格招待会议代表，浦江只吃了一点饭菜便告退了。我追到他的房间，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没有任何食欲，有点累，腿也有点痛。我说你可能劳累了，又顺口说平时缺乏锻炼，嘱咐他早点休息，这是我们见面在一块时第一次没有像往常一样彻夜神侃。第二天上午开会，浦江专门向邯郸地方文物局和博物馆的同道介绍宋金地道遗址的形成、构造和考古意义，建议邯郸地方将宋金地道申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邯郸地方文物工作者和研究者很受鼓舞，很感慨地说眼皮底下有这么好一个文物遗址却得不到当地政府的重视。下午我们参观峰峰矿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响堂山石窟（南庙），磁窑博物馆、磁窑艺术馆。磁窑遗址上的博物馆艺术馆主要是从事艺术品市场化，与学术研究相差较大，这里的人倒是非常热情推介他们的产品，在博物馆看到的新产品有标价近30万元的。大家都觉得很贵，浦江说艺术品销售的行规一般可以一两折。整个参观过程浦江都显得很疲惫，并说腿一直在痛。由于要急着赶回北京参加第二天我们学院的研究生复试，当天晚上8点多我先乘高铁返京，临行前我一再叮嘱他回到北京后赶快去检查一下，我对他说，“这次你看上去不是缺乏锻炼的问题，当年我弟弟腿痛后发现是脊髓空洞，所以你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3月31号晚我打电话问他是否去医院检查了，他说很快要参加北大例行体检。此后就没有消息。4月15日晚，突然从信箱接到远在美国哈佛讲学的邓小南老师的来信：“华瑞：浦江病了。你知道了？我真的非常非常为他担心。数日前曾想给你打电话，后来又忍住了。”当天晚上11点我立即跟浦江联系，他很镇定，很坦然，说他在北大体检后发现胃部有阴影，情况不太好，

做了切片，但报告要一两周才能出来。体检完第二天就飞回重庆垫江在家乡医院做了全面检查，结论可能是胃癌，但不能确定，还要等一等切片的报告。紧接着“刘浦江老师得胃癌”的消息在京城高校间不胫而走。4月17日上午我回复邓小南老师说：浦江生病的事对我来说太突然，起初“我以为他是属于亚健康状态，注意休息，就会没事的。所以当看到您的信第一时间打电话给他，听着他镇定的讲话，我根本就没想到严重的后果。最近一段时间老有不好的消息传来，现在浦江病了真是不敢再往下想，只能默默地为他祈祷为他祈福。多保重，已成为最真挚的问候语，真的要多保重。”当天，邓小南老师又回复说：“华瑞：浦江生病，我真的非常非常意外！他还那么年轻，生机勃勃的。我听说消息算是早的，当时系里大多数人还不知道。顿时无法平静，泪如雨下。我想给浦江打电话，又怕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曾经拨了你的手机，一看晚上11:45了，赶紧挂断了。我跟宗成说：浦江就是我弟弟。几天里多次发邮件与浦江联系过，他也每次都回复，看上去也还淡定。内心希望是一场虚惊，只怕天不如人愿。”

4月24号，我在首都机场跟浦江联系，这次他的声音明显轻松了许多，仿佛又回到正常的从前，说切片报告否定了恶性胃癌晚期的结论，而是胃部淋巴瘤，医生说治愈的可能性有50%，听了这个消息我也顿感轻松了许多，觉得浦江有救了。7月上旬得到浦江的许可，我去肿瘤医院探视浦江，正巧碰上陈侃理和他的同学也来探视。浦江除了没有了头发外，其他一切如常，他还是那样的健谈。天南海北谈了一个小时多一点，他就赶我们走。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生前的浦江。其后虽有电话联系，但

一直不容许再去医院探视。11月下旬,知道浦江做了干细胞移植手术,初期感觉还不错,我又提出探视,他回复短信说,刚出无菌舱体质较弱需要休息,过段时间再来吧。可是12月29日晚我与学生新年聚会结束时,突然得悉浦江病情恶化的消息,并且准备返回垫江做最后的了断。我很想与他在返回垫江之前跟他见面,但是他除了学生和北大中古史中心的几个老师外不再见任何人,他给我的短信是“最近病重,估计时间不多了,不宜探视,不宜电话”,我只能默默祝福他。直到1月7日早晨得悉他遽归道山的消息。

### 三、敬畏学术

浦江的学生对我说,从我的处世风格和脾性来看与浦江有诸多不同,我们能成为好朋友实属难得。想想我和浦江之间既不是同事也不是同学,除了学术交往外,在其他方面也很少有共同的世俗爱好和兴趣。我们的友情是纯学术性的。邓小南老师在《痛别浦江》中说,她与浦江的交往,没有过登门造访,没有过礼物往来,清淡如水,却又深切似海。其实我与浦江也是如此。我对浦江的敬重是从2000年他参加首届邓广铭学术奖励金评奖活动开始的,浦江以《辽金史论》参评。这部书在此之前浦江曾赠我,但我还未来得及拜读,他要参加评奖,我是评奖委员会的秘书长,所以赶紧拜读。说实话此前我也读过《金史》和《辽史》,也发表过几篇文章,但绝没有下深功夫研究,所以我并不能评价只是了解而已,而他为《辽金史论》所写的自序挺让我钦佩。一是他的自信,那种做好辽金史舍我其谁的霸气,二是他对待学

术的那种严谨、严肃，孜孜以求的精神，给我留下至深印象。邓广铭学术奖励基金评奖活动迄今已评了八届，只评出3名一等奖。但就学术水平来说，浦江的大作完全可以置身其列。由于那次评奖是首届，评委们都很谨慎，加之浦江的著作是论文集，故按论文类而不是专著类评，也有评委说他的自序锋芒太露，不能助长他的自傲，要先挫挫锐气，以利于他将来的成长。因而虽然评委们的评价很高，但是最终还是评为二等奖。后来我见到浦江，问他对得二等奖是否有意见，他说他参加评奖主要是因为这个奖是以邓先生的名义，所以得不得奖不要紧而是参与这项活动很重要。2000年年底读到浦江发表在《历史研究》第6期上《〈金朝军制〉平议——简评王曾瑜先生的辽金史研究》，令我刮目相看。这篇书评不仅仅在于他敢于正面批评权威令人钦佩，而且更在于透过他对辽金史问题症结的准确把握、对当时辽金史学科发展的准确定位所展现出执未来辽金史研究牛耳的态势更令人望而生畏。后来又读到他发表在《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7期上的《李锡厚〈临潢集〉评介》，这种印象更为加深了。

2006年浦江晋升教授，北大历史系请我做通讯评议。对于浦江的科研我选择了所有的第1项，我用了“刘浦江为当今辽金史研究之翘楚”这样的评语极力推荐他教授升等。在教学一栏上，因为那时我知道浦江的本科课有很好的口碑，但是对他的研究生教学情况知之甚少，所以没有给以最高的评价。从那时起到他去世前过去了快九年了，随着相知日深，对浦江的教学我也有了深切的了解。据我的了解，像浦江那样，不惮烦劳，真能最大限度地时间和精力投入培养学生的工作，在同辈学者中比率不

会高，可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浦江逝世后微信、网上他教过的本科生、研究生和同事发自肺腑的一片痛悼，足以说明他的教学之成功，不用我再多言。我只是想说三点：一是招生绝不滥竽充数，我有一个硕士很爱读书，基础也可以，前两年想考他的博士，让我给浦江打个招呼，浦江未置可否，后来我追问他为什么不考虑呢。他说你的学生对辽史感兴趣是从学习宋史的立场对辽史感兴趣，而不是对辽史本身感兴趣，因而对辽史文献接触甚少，以后培养起来很困难。听了浦江的解释我很释然，也对他多了一份敬重。同年我的另外一个硕士生要考邓小南老师的博士，当时邓老师硕博连读已有两位，招生只有一个指标，我的学生考试只考了第二名，面试时，浦江发现我的学生宋代文献基础较好，他积极协调北大中古史中心的招生指标，使得我的学生如愿以偿。后来邓小南老师告诉我，浦江为给我学生争取指标，还给她“华瑞跟伟民（包伟民的学生考第一）都对中心工作相互支持，不能厚此薄彼”，浦江就是这样一位既坚持原则又不失古道心肠的人。

二是高标准严要求，参加北大中古史中心博士论文答辩，答辩进入最后阶段，有几次我按照全国大多数高校历史专业博士论文分等的作法，希望给出优秀、良好、合格，浦江总是坚持不能轻易给优秀，他说北大的优秀博士论文一定也要是全国同类论文的优秀才可以，否则不论是中心哪位老师的学生也不能给优秀。而且他的坚持很固执，直到最后他的坚持得到大家的认可为止。所以北大的宋辽金史方向的博士学位论文，被答辩委员会评议为优秀的无疑在全国都是名列前茅的。

三是浦江有很强烈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感包括两个方面，其一，通过自己的努力，缩小与中国古代史其他断代史研究水平

的距离，正如他自己所言“辽金史学要真正赢得史学界的尊重，必须证明自己的实力。”其二，一个人再努力也是孤掌难鸣，只有建立起来一支高水平的队伍才能支撑起辽金史学科的整体发展，从而从根本上缩小与其他断代史的距离。近十年来他的研究生培养就是围绕着这个大目标在进行。我们平素聊天时，他经常会主动说起他的学生的专业特点，对于学生的每一个进步他都会表现出特别的愉悦，对于学生的优势和短板如数家珍。浦江对学生的专业发展也有自己的估价，认为大多数学生若只在辽史和金史方面兜圈子将来就很难超过他，但是打通辽金元三史可能会更上层楼，因而寄希望于学生们在这些方面努力从而做出比自己更大的学术建树。

我和浦江专业相近，除了评议博士论文外，常有其他方面的互动。浦江在专业交流上非常强调“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学风，辽金史方面的论文他很少让我提意见，他写的宋史方面的论文则经常会询问我，如他的《宋代宗教的世俗化与平民化》一文发表后，曾多次问我读过没有，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尽管批评。2009年撰写的《祖宗之法：再论宋太祖誓约及誓碑》发表前，他嘱咐我一定要帮助认真看一下，我说你都是大教授了，还需要看吗，他说“你对宋史研究的学术史很熟悉，帮我看看我的引文是否有遗漏”。2012年我到首师大学报任职，辽金史方面的稿件我都请他审查和评议，浦江每次都极认真地寄回审查意见。

有一件小事，让我很感动。2013年9月北大中古史中心召开“宋代政治史研究的新视野国际研讨会”，浦江主持辽金政治史分会场，会上有日本学者在论文中将人名中的“覃”字读作“tan谈”，我以为“覃”作为姓多读“qin秦”，但浦江支持日本学

者的读音。对此我没有跟他在会上争论，会下我问他为什么那么肯定，事前查过字典吗？他的回答令我很吃惊：“我也没有查过字典，但是日本学者做事很认真，大凡有异议的问题一定会在公开发言或发表之前搞清楚，所以我相信日本学者的读音。”后来回家后我查字典，果然可以读作“tan 谈”。这虽是一件小事，却折射出浦江对日本学者了解之深入，浦江在十多年前认为国内的辽金史研究水平不如日本，尽管有学者激烈反对，但是浦江既然立志要赶超国内外辽金史的最高水平，当然要对他认为高水平的日本学者的研究做到知己知彼，方能做到真正的超越。

我爱读浦江撰写介绍和纪念邓广铭先生的系列文章，前后他一共写了13篇。如《大师的风姿——邓广铭先生与他的宋史研究》、《不仅是为了纪念》、《邓广铭与二十世纪的宋代史学》、《独断之学 考索之功——关于邓广铭先生》、《“博学于文 行己有耻”——邓广铭教授的宋史研究》、《一代宗师——邓广铭先生的学术风范与学术品格》等。我是邓先生的再传弟子，当然希望对老师的老师有详尽的了解，这是我喜欢读的原因之一。原因之二是在读的过程中，除了感知浦江知恩必报的情怀外，浦江通过描述邓先生的学术经历、治学方法乃至心路历程展现出的那种敬畏学术的精神，引起我的强烈共鸣。

浦江走了，我失去了一个好朋友、好兄弟，更失去了一位能够相互砥砺的畏友。痛哉、惜哉！

浦江，安息吧！

原载《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5年2月8日第5—6版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 君子之善岂止在文章！

彭小瑜

2007年出版的《北大史学》第12辑登载了余大钧和何芳川两位先生的著述系年。一起做编辑的郭润涛和我商议后决定，以后历史学系任何一位教师，不论声望大小，故去之后都要在这本刊物上发表他或者她的学术成果目录，以志纪念。不过君子之善，君子之德，又岂止在文章。古代文人的理想，是不论穷困还是通达，都希望本着仁义做人。文人如果能够做到这样，无论是他们的文章还是他们的精神，都能够流传下去，所谓“一世之短，万世之长”。古话说文人“独留文章，照耀后世”，其实留下来为后人怀念和长久记忆的不仅是他们的著述，还有他们的品德和人格魅力，对家人、同事和朋友还有他们音容笑貌和无数的细节。

浦江教授于今年1月6日去世了。他是79级北大历史学系本科，我是77级的，一起在38楼宿舍住过。我看到他毕业后在中央党校工作时伏案读书的照片，样子好像还是一个在图书馆自习的学生。我们这些懵懂同时好学的青年，都是在历史学系的4年训练之后，走上学术研究道路的。他与邓广铭先生的师生情谊，最近常常被提到。这让我想起在静园二院遇见邓先生打招呼的时候，他老是笑眯眯的眼神。浦江折服在先生的魅力之下是多么自然的事情！我和浦江再度相见和开始有比较多



的交往，是在 98 年我回到历史学系工作之后，他在 88 年就从中央党校调回系里。我记不清我们是如何见面的，但是记得世界史专业许多学生向我赞扬他，提到他在上古代史课程时候犀利到位的言论和追求学术纯粹的风格。

历史学系多数同事的风格是含蓄寡言。我和他虽然都算得上行文细密，却是话很多的人，所以在系里撞见时，互相的调侃和揶揄是经常有的，互相都告诫对方要“管住嘴巴”。当然下次见面还是老样子。因为静园二院靠近勺园，离学生食堂也不远，所以一旦在二院门口撞见，如果他是准备去吃饭，会问我是否可以请客，或者我会这么问他。如果我请他到康博思吃饺子，他会说，“哇，这次给你省钱了。”如果是在稍贵一点的勺园 7 号楼餐厅，他有时会争着买单，一般是说，“下次到贵的地方你再请”。他对系里的同事很关心，譬如他知道有哪几个老师有体育锻炼习惯，知道我跑步，总是鼓励和表扬说，“小瑜是天天跑步的，有好习惯。”我和他抱怨，在燕北园小路上有很多人吐痰，跑步很不愉快，而到学校操场又很麻烦。浦江于是透露给我他在家使用跑步机的秘密，告诉我买什么价格的机器才好用，并把他买的机器品牌告诉我。这就是我现在家里的跑步机的由来。我把这个建议告诉自己几个已经毕业工作、经常觉得锻炼没有时间的学生，他们也都买了，并经常使用。

2006 年起，浦江和我担任过几年历史学系副主任，他负责教学工作。之后在世界史专业有过两次大的教学改革。其一是多年制世界通史课程被取消了，代之以欧洲史、亚洲史、古代东方史和古希腊罗马史等多门专业课，增加了多门专业外语的课程。浦江协助我们重新设计课程，安排和引进任课老师。每当

遇到困难，他都会焦急地来协调。我曾经与元培学院和外语学院老师一起建议在北大设立外国语言和外国历史专业，目前这已经是在教育部备案的跨学科专业。每当我们需要提交计划或者修改方案的时候，浦江总是来指导和帮忙，编写教学计划，生怕耽误了申报和工作，当然同时也会调侃和催促我几句。这两项世界史专业的重要工作，背后有浦江很大的付出和勤劳，我想大家应该知道和记住。

大家说到浦江，经常会说他很有个性。在现在这个时候，在北京大学这艘业已在市场潮流里颠簸多年的船上，“有个性”可以作何解读呢？现在社会上流行的观念是讲效率，计算要精准，要尽可能少为他人和集体去花费时间和精力，要全心全意地把自己的小天地，包括学术的小天地经营得尽善尽美。那样做人做事似乎也不是罪过。但是在北大历史学系，还有很多人不是这样，不是那样冷漠。不少老师会为了工作和为了同事学生，做很多看似“多余”的事情。浦江尤其是这样。有的同事和我说，也许我们还保留了一点“士大夫”的性格。浦江除了为历史学系做大量的工作，他也做很多很小的、他本来可以不管的事情。我想系里每个人都可以讲出很多这方面的故事。我自己经常和朋友们说的，是一个和修电脑有关的故事。我和他曾经用过同样型号的笔记本电脑，硬盘偏小，内存也太小，上网的速度很慢。浦江找来懂行的学生，给他的电脑增加了内存。他还专门打电话给我，约好时间，让这位同学帮我也把电脑整修好了。这样一件事情，浦江可以完全不操心，但是他却关心了，还细心地把它做好了。他做过很多这样的小事，他的生命因此增加了生动的浪花，增加了点点星光。

大家都知道浦江勤勉于学,有多部精深专著和百篇学术专论发表。写作、培养学生和教学管理是他喜欢做的事情;他对夫人和孩子也无微不至地关心,事无巨细都亲自用心办理。他很辛苦,但是也很快乐,因为他从来都是出于爱心才勤勉和欢快地做这些事情。

大家都知道他为人刚直,有原则和立场,说话不客气。他会批评学生,顶撞领导,会和意见不同的同事争辩,内心却温柔细腻,希望把事情做好做妥当。他这位辽金宋史的专家,不正是苏东坡所推崇的那种,因为刚毅而懂得贯彻仁道的君子吗?

原载《文汇报·笔会》2015年2月15日

(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 忆浦江

赵世瑜

无论是在学术上还是在私人交往上，我与浦江都没有太多交集。

浦江是研究辽金史的，我是研究明清史的，虽然都在中国古代史的圈子里，但几乎没有在学术场合碰过面。其实，在北京的历史学术界，不同单位或不同专业领域里的学者相互认识还是不难的，但在我调到北大历史系之前，除了明清史的王天有、徐凯、郭润涛老师之外，北大中国古代史的邓小南、阎步克、荣新江等等学者，大多是久闻其名，却少有机会谋面的。

大约是2002年前后——因我记性不好，也没有写日记、记日程的习惯，所以记不清具体的日期了——浦江不知从哪里找到我的电话号码，问我是否可以给《燕京学报》写一篇关于《剑桥明代史》的书评，那应该是在我记忆中我们的第一次联系。我答应了。《剑桥明代史》两卷，上卷讲明代的通史，下卷讲不同的专题，当时只出了上卷的中译本，下卷必须读英文，后来干脆一起读了两卷的英文本。书评的稿子按时交给了浦江，写得未必好，但却被逼着读了两本英文书。

这之后一晃就是几年，其间除了他把出版了的刊物寄给我外，并没有任何联系。到我们成为同事之后，竟也忘记问他，当初他为什么约我写这篇稿子，因为我以为他对我的学术研究未

必有多少了解,就像我不太熟悉他的研究一样。我私下猜测,也许是他知道我可以读英文书、对国外的中国史研究略有所知的缘故吧。

后来我却发现,浦江对我的研究领域还是有所了解的。2011年4月17日,他曾给我发来邮件:

世瑜:

请教一个问题。我最近在研究契丹人殉问题,注意到人殉的变相形式——人类学称之为“割体葬仪”。但我发现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在研究这个问题时概念不清,如容观夔、黄展岳等人在谈及“割体葬仪”时,举出的考古学例证多为死者割体,而举出的人类学和民族志资料则均为生者割体。我理解生者割体(包括送葬者切断指骨或趾骨,刺破头皮,抓破面孔,烧烫胸、臂、腿、股,打掉门牙,割舌,切耳,或撕破耳垂等等)应是人殉、人牲的一种变通形式;而死者割体(主要是切断死者的指骨或趾骨,或肢解身体的某一部分)显然应具有别样的宗教意义。似不应统称为“割体葬仪”。关于这个问题,很想听听你的意见,或者是否可以给我什么建议,读什么书或请教什么专家?

浦江

浦江是知道我读过民俗学的学位,对人类学稍有涉猎,也比较关注信仰问题,才不耻下问的。这不仅让我见到了浦江对学术的严谨态度,见到了他研究视野的开阔,也见到了他宽广的胸

怀。不过，他显然是高看我了，因为我对此毫无研究，不敢信口开河，只能回复说：

浦江，

我问了一下，中大容观夔先生虽已年高，但仍在世且精神极佳。你可将问题书面请教于他（因他只会讲广东话）。

世瑜

也不知他后来与容先生联系过没有，更不知他此项研究进行得如何。这期间我们的碰面虽说不少，但都是公事，竟没有机会一起讨论学术。读了他关于元明之际和清末民初的两篇宏文，发现在他生前未能在一起有所切磋，实为憾事。

浦江是重庆垫江人，说话时有明显的川音。我也是川人，听到乡音总会有亲切之感。多年前忘了开什么会，听罗荣渠先生侃侃而谈，也同样有这个感觉。四川人也许因吃辣之故，说话行事都比较率直，但同时又比较操心，所谓劳心劳力，兼而有之。

记得我的一个博士生开题，我请了四位中国古代史的同事帮忙，其中包括浦江。当时浦江说，“世瑜你真浪费人力，为一个人开题，请了四位老师，要知道大家都很忙的！”我看了看他，并不像开玩笑的样子，事后便认真地想了想，知道浦江是在提醒我，应该与同事们加强沟通，最好能凑更多的学生一起做，以便节约大家的时间和精力。我之所以会这样理解，是因为我知道，浦江不仅非常支持我调动来北大历史系（他自己在生前从来没对我提及过此事，这正体现了他的品格），而且自开始就设法解决我的学生所面临的困境。我刚来北大时，不可能立刻获得导

师资格,招生目录上也没有我的名字和所招专业方向,这样,当时北师大历史系的本科生陈雪推免到北大,就没法填表,只好写信问主管这项工作的浦江。浦江不仅立即和我商量,而且亲自给陈雪回信,告诉她可以采取变通的办法,报名时先报“专门史”下的“中外关系史”(因为当时考虑以后如设“社会史”方向也应在“专门史”下),具体录取选拔时由中国古代史代为操作,入学后再根据情况调整专业方向。事情就这样解决了,我相信浦江为素不相识的学生所做的事情,绝非这一件两件。

浦江这种任劳任怨、因公废私的精神,为全系老师所共睹,许多与他有更长时间共事的同仁比我有更多的体会。但仍令我吃惊的是,在浦江不再担任系里的行政职务之后,他依然不因事不关己而不闻不问,而是满腔热忱地投入到系里的学科建设工作中去。

2012年夏,正值原历史学一级学科一分为三、并据此重新调整二级学科的时候。由于对当时上面的精神理解不同,各个高校的做法也颇多差异,但相同的是都要在原有的基础上重新调配力量,这就要有人负责先提出大致框架,与各方面进行反复沟通。虽然浦江已不在其任,但因他对系里的情况比较了解,而且素有想法,起草框架的事就落在他和元周的头上。在此过程中,我因系里安排参与中国史下专门史二级学科的设计,开始对他们的工作有所了解。因我新到北大不久,对以前的情况和相关老师各自的意愿不太了解,因此只能向大勇和浦江求助,才能填写那些表格。

“专门史”这个提法本来就是个“奇花异果”,在国外的大学中几乎找不到这样的学科名称,应该也属于“中国特色”。其实

每个老师除了从事具体历史时段的研究与教学,也都有自己侧重的特长,比如政治史、经济史、外交史、思想史等等,既可归于断代史,也可归属专门史。惟中国需定出“学科目录”,且有数量限制,还与招生相连,故很难兼跨。由此,我除自己征求相关老师意见外,大勇帮忙了解以前专门史老师的意愿,浦江帮忙了解中古史中心那边的老师的意见,感到这真是一件复杂而很难说有多大意义的工作。

恰在为难之际,浦江又率先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模板。

各位:

我昨天已经把“中国古代史”的表填完了,结果发现人员问题其实并没有那么复杂。这与评重点学科的情况完全不同,对于中国史各个学科来说,此次只是因为一级学科调整,而将原属教育部1997年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历史学一级学科下的若干二级学科改列为中国史一级学科下自主设置的二级学科而已(只有“历史文献学与史学史”才能算是新的二级学科),几个表中都没有涉及具体人员的问题,只有论证方案中“本单位设置该学科已具备的基础”一项,列出该学科专职教师人数(并说明教授、副教授、讲师分别有若干人)即可,任何一个表中都不需要列出名字。另外备案表中“该学科学术带头人和学术梯队简介”一栏列出两三位学科带头人就行了(这个表只是供研究生院备案,而且此栏空间很小,只能填下两三人)。按照要求,每个二级学科有五位以上专职教师、其中教授不少于二人就行了,因为这是被作为新设置的



二级学科来要求的，所以门槛非常低。

鉴于这种情况，我觉得没有必要再讨论人员配置的问题了，只需注意各个二级学科备案表中填写的学科带头人不要重复就行了。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此次自主设置的二级学科并不需要审批，只是报教育部备案，但因为材料要上网公示，所以还是应该认真填写。

刘浦江

浦江的认真工作让大家松了口气。据此模板，我向浦江、元周、大勇征求意见，定下专门史下各个方向的名称和带头人，并且求得七位校外外审专家的签名，算把表填上了。

为此项工作，仅我这边，相互往返的邮件就不下数十通，相信别的老师那里也是同样甚至更多。虽耗费很大精力，但对此事的价值，我心中颇不以为然。我曾给浦江、元周、大勇写邮件说：

……我了解的情况，因为国家的趋势是淡化二级学科，国家只管一级学科，二级由各学校自己管理，最后直至取缔统一的二级学科目录。……我们还在这里折腾这个已经过时的东西，费时费力还是无用功。

浦江给我的邮件中也说：

……我认真看了教育部和学校的所有通知，按照教育

部的意思，只要有一级学科博士点，如何设置二级学科那是你学校自己的事，教育部不干预。

但是，像这种上面一纸文书、下面就要折腾不已的事情，浦江及许多老师还是不得不去认真地完成，因为万一出现问题，就可能影响系里的学科建设和全体老师的利益。

我确信，我只是偶一为之的事，浦江和系里的有关老师不知已做过多少，不知占去他们多少做学问和休息的时间。我之所以回顾这段经历，不仅是因为我自己参与了此项工作，也不仅是为了向浦江和所有为“公事”劳神费力的同事们表示由衷的敬佩，而是想说，国家有关部门能不能多从实际情况出发，多给大学和教师自己处理学校和学科发展事务的自由，让学者们多有一点潜心学术和休养生息的时间，不要让浦江这样英年早逝的事再发生！

我和浦江虽然没有很多交集，但我知道，在我来北大历史系的前后，他对我有许多关照。也许对他来说，这只是他的职责所在，理所应为，但对我来说，却给我的内心留下了难以消失的温暖。

相交固短暂，相知可永恒。

（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 追忆浦江

辛德勇

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有同学、同事、友人离世而去，不一定太过哀伤。因为已经到了相继走向归宿的时候。浦江兄到底还是先一步走了，心却很痛，很痛。

学术生涯是清寂的。长年累月，走在这条路上，既需要有探索的情趣，也需要学者之间的相互印可。到北京工作以后，从浦江那里，我得到了最多这样的激励。

我刚做《中国史研究》的主编不久，召集过一次在京学者座谈会，请大家帮助出主意，办好刊物。浦江在与会者中年资最轻，发言却最为犀利，率先当面厉声斥责主编失职，所刊发稿件，竟有人使用了晚出的伪书，而把握不住史料，就不可能办好刊物。当时就有朋友小声对我说，浦江太狂傲失礼。我却很高兴，因为浦江指出的失误，正是我想竭力避免的，而且我也常常这样讲话。浦江直言不讳的批评，警示我工作要更加仔细，要更努力学习相关知识，而我从中感受到难得的真挚。

浦江对人、对学术的真诚，常常体现在认真对待他人学术见解这一点上。固执，是浦江性格中另一项突出的特征。对待与自己不同的看法，有一些学者采取的态度是不屑一顾，一概不予理睬，“知名”学者尤甚。浦江虽然会很坚持自己的观点，但却一向仔细审视歧异的说法或是反对意见。我很赞赏浦江这一点。

在纪念邓广铭先生百年诞辰的学术会上，组织者安排我为浦江的《〈契丹地理之图〉考略》等四篇文章做评议。我查阅相关资料，总共写了8,000多字的评议意见，其中评议浦江文章的篇幅，占一半以上。虽然正式发表时并没有吸收我的意见，但他理解我的憨直，不为怪罪，要去底稿，做了认真的思考。浦江就是浦江，有他自己的道理。换了我，没准儿也会这样。

浦江的坚持，是因为别人没有足够强硬的论据能够说服他。我研究阜昌石刻《禹迹图》，指出内藤湖南先生因没有看懂《新唐书》句读而错误地把贾耽的《海内华夷图》理解成为双色套印地图，并将其视作后世朱墨对照古今地理图的鼻祖。浦江初读，以为奇谈怪论，当众责问我说，以内藤湖南先生学养之深，岂能不辨这样简单的句读？待仔细审辨之后，则又恳切认同拙见，赞许我的文章论证广博深入，诚属难得。

我从社科院历史所转入北大历史系工作，签订的合同，是担任历史地理学和历史文献学两个学科的“带头人”（这种名堂当然十分荒唐）。浦江当时是系副主任，负责教学。我请示浦江开什么课好，他不假思索地说，先开版本目录学。我知道浦江以《四库全书》为中心，对目录学花过很大功夫，本来他可以自己来讲相关史科学的课程，却不挟任何私心，把这样重要的基础课来让我上，着实很受感动。

浦江患病住院后，我去看望过他两次。病房闲谈间我提到，最近着手整理历史系收藏的晚清珍稀史料，其中有一部分是用满文书写，要是能够像他研治契丹文字一样学懂满文就好了。可惜我无此能力，只好特地招收一名学生。浦江很诚恳地说，他和现在很多学者一样，只能在很小领域内做一名专家，做不到像

我那样在古代史诸多方面和清朝学者对话。浦江对我的印象，当然只是对朋友的期望，并不符合实际，而对他自己学术局限的认识（这更多地是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的历史烙印，在我身上，更深、更重），却发自内心，坦诚而自然，如鉴中清水。

浦江走了，但留给我的理解，留给我的鼓励，仍时时温暖我的心，让我对学术付出更多一分努力，做出更多一分坚持。

2015年2月23日记

（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 一个纯粹的学者

——悼浦江

陈 峰

去年3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我正在京学习，刘浦江与李华瑞等几位朋友专程来看我，大家吃了顿饭。浦江还是烟酒不沾，但依旧是谈笑风生。席间，说到邯郸有宋金时期的地道，他希望有机会看看。不曾想，一个多月后得知他染上癌症。五月底离京前，打过两次电话，都未能联系上。六月底的一个晚上，才终于打通电话，听得出他状态不佳。此后，又通过几次话，得知治疗有效，也感觉到浦江情绪越来越好，想到现在医学的进展，我深感欣慰。

但他还是走了，得悉辞世消息，至为心痛！

浦江是一个认真的人，一个纯粹的学者。这在时下热闹的社会，并不多见。他在学术上极为认真，真正可称得上潜心治学。浦江在辽金史领域成就斐然，早已得到学界的公认。他是邓广铭先生的高足，于宋史研究也极有见地，如对宋太祖誓碑的长篇论文，条分缕析，令人折服，我常在课堂上引为范例。

浦江高度自信，当然是来自学养深厚的缘故，熟悉的朋友都知道他善于辩论，喜好较真，常常不依不饶，透出的其实是对学术的虔诚。有一年，我们一同去内蒙古赤峰考察多日，印象最深的便是他与几位同行争辩一些问题。他又待人真诚，乐于助人，

毫无虚伪应酬，我本人与我院都受益匪浅。记得两年前，他曾推荐一位高足到我院工作，并不厌其烦介绍弟子的专长，遗憾的是因这位学生后来另有高就而未果。听北大的朋友讲，浦江在历史系兼任副主任期间，工作极为认真负责，我去北京的几次，傍晚打电话联系，便发现他还在学校。

虽然我与浦江主要还是在学术交往上接触，彼此平时联系并不算多，对其他方面也就了解的有限。但依我所见，浦江身上已体现出正直而纯粹的学者风骨，正与历史上那些令人起敬的学人契合。

作为专门研读历史的人，当然清楚生死不可违的规律。浮华、权势在历史的长河中转瞬即逝，唯有道德文章可以传世，浦江因此不朽！

2015年1月11日

（作者系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 刘浦江忆旧

李鸿宾

对学术界同道的各种事儿，我都有关注的癖好。譬如他（她）研究的领域、讨论的焦点、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乃至他的学术人生，都能引起我强烈的好奇心。一两年前逝世的法理政治学者邓正来（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美国史学者任东来（南京大学历史学系），还有更年轻的张晖（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等，虽不在我的研究视域之内，但作为学人，他们的一言一行，似乎都有“勾引”我注意力的“魔杖”。我这里只说这些学者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英年早逝”。

刘浦江本不在这个行列。直到两天之前（我写这句话的时间是2015年1月9日），我也没有把他放在这个里边去，相反，我想到他的时候都在考虑他应该在什么时候开始恢复工作了。至少在他生病之后的8个化疗和干细胞移植手术的成功，都让我对他的康复而非恶化充满着期待！另一个让我信心倍增的事例就发生在上个月的第一个周末：跟浦江患一样病的一位朋友出席了一场我也参与的研讨会，他的出现令我心花怒放！他恢复得与常人无别，浦江不也应该尾随其后进入到原来的状态吗？当1月7日早上8点之前钟焓打电话告诉尚在朦胧睡意之中的我刘浦江就在几个小时之前（6日晚近24时）离世的新闻，我的直觉是不相信，但马上意识到了情况的真确。看来，两天之前我



抱持的那种坚定的想法在事实面前轰然垮塌了。尽管如此，直到现在我仍旧认为他也没有离开这个世界甩手而去，他还在家里继续写作、看书，或偶尔来个电话跟我热聊在我妻子看来“尽是车轱辘话”的学术圈的那一套。我这种与事实相反的判断里面蕴藏的是我跟他自1979年以来先是本科同学、后是断断续续的学术交往但却不言自明而心领神会的默契所结成密切关系的情感性延伸，这种情感告诉我理智是没用的；他原本就没有走，他还是他，固执又很自信地保持着自己的生活方式。

—

在我的这篇忆旧中，我对他的印象主要停留在两个层面上：他的学术和他的生活。我先说他的生活与我有关的两个痕迹。

痕迹之一：

1983年的夏天我们毕业，他分到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我则继续上硕士研究生。这段时期我们交往最密切，我隔一段时间就去他那里。我们在聊什么呢？学术界的事儿首当其冲，他和我一样，对学术圈有着强烈的猎奇心。记得上学的空档，我们两个查阅历史学系诸先生谁发表的著作最多，结果邓广铭以8部专著居冠，次之者为周一良。从北大西门，我们一路走一路聊，朝向他的工作单位党校奔去，然后他再送我返回北大西门，类似的经历至少有好几次。我们聊着聊着，就不自觉地将话题转移到女朋友身上。实际上，此时的我俩无论谁都没有这方面的切身经验。就我而言，我恋爱的念头突然而至。他的情况与我差不多，至少我没有察觉到他有过这种情景。既然聊到了这

个话头，我们又缺少历练的经验，索性就海阔天空，任思绪发泄。不着边际的臆想、意念式的交流使我们常常产生无以自断的憧憬，放肆地想象着未来的我和他的那个女友。刘浦江拿出他一贯的举事实、摆道理的招式，夸夸其谈，一路走来一路描述；我也不甘落后，但总是他话头抢先，我则随声而附。

终于（实际上是不久之后），我与历史学系 80 级中国史专业的梁民谈上了朋友，这是我研究生的第二年即 1984 年的事情。刘浦江仍旧落单一人于党校，此时的我则进入到了热火朝天的学习和恋爱相得益彰的状态之中。记得 1984 年“十一节”之际，赶上建国 35 周年，天安门广场举行阅兵，晚上则鸣放礼花。我、梁民，还有她同班同学孙顺华一起去党校他那里相聚（是否还有其他人，我忘记了，好像是有），先是看电视上的邓小平阅兵；礼花开始后，我们跑出门外，在党校校园内（也许是颐和园）找到一处高地观看焰火。那情形仿佛如同昨日，但诸多细节却无法追寻。记忆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当你感觉的那个人或那件事，你似乎清醒地把握了那个环节的时候，你却遗失了许多细节，甚至张冠李戴而不能自知。这种记忆的可怕就在于它令你印象深刻却虚无缥缈。那时的我、刘浦江、梁民、孙顺华，还有我想不起来的其他人，就处在这样的状态中。

然而我也不得不说随后出现的不仅是我记忆追溯不了的、但事实本身告诉我的另一件事儿，即刘浦江向往的谈女友发生之迅速，令我瞠目结舌。至少在我的眼界里，他的恋爱过程短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他与分到党校的北大中文系 84 届毕业生张文结婚、他们的女儿刘畅（后因与别人过度重复而被迫改叫刘以哲）迅速出生，而我的女儿李安琪也追其踪迹来到人间，但终

归晚于刘以哲 5 个月之后，恨呢！我记忆中的事实应当是这样的：刘浦江从单身汉到热恋的男青年再到女儿爸爸角色的转换，其速度之快，超过我所知道任何人。如此快捷的角色转换所节省下来的大量时间，他虽然没有告诉过他此时在干嘛，我与他相处的四年以上的经历让我直觉地想象出：这些省下来的时间应该都用在了读书上。人们回忆他惜时如命、重视生命的质量不惜缩短长度而凝聚其中的有价值与分量的东西，就是由看书、写作、培养学生等组合的学术品性构成的。在他人生的价值上，他所有的其他方面倘若与学术追寻相碰撞的时候，似乎都被后者掩盖了。

#### 痕迹之二：

是他与我分别有了自己的女儿之后为数不多的彼此交集。

这两个女孩儿同年生（1987 年），同时上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除了初中同上一所学校（北京第 19 中学）之外，她们直接的接触非常有限，但这种建基于我们二人联系之中影印在彼此内心的痕迹却很清晰。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工作的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本科生经我报考或免试推荐给北大历史学系继续深造这件事，成为他与我联系的主要内容。通话更多地夹杂着彼此获得的学术信息，譬如共知的同道学人的研究、人品和学问、国内或港台学界的近期发展、本科硕士和博士生发展的潜力等等，成为半小时甚至一小时谈论的焦点。我们的女儿只是这个谈话中间的插点。不过，2004 年至 2005 年 6 月我们之间沟通的内容，则转移到了女儿的身上：她们都在为争取选择一所既能符合她们各自分数、又有知名度的大学而摩拳擦掌。在此期间，我为女儿参加高考、拟报大学之事连续几次参加她高中的

家长会。

此时的刘浦江也在为自己女儿的高考出谋划策。在我看来,刘以哲应当是那届高考生中最幸运的一个:他的爸爸为此而倾注的努力超出了我所知道的任何人。他到处查找适合他女儿报考最佳大学和专业的咨询。他的查阅非同一般而颇有专业精神(他患病之后阅读淋巴瘤的书籍亦非普通而属医学专业),这应是他治学谨严和细致的延伸。他在电话里跟我分析适合他女儿相关学校和具体的院系与专业,熟悉的程度如同与我叙说全国高校历史专业一般。对我而言,历史专业因是自己安身立命的研究领域,熟悉的是多少问题,但除此之外尤其是他最终为刘以哲选择的金融专业,则是我们这些学历史的人非常陌生的领域,他的了解和据此产生的分析,用“行家里手”做评判,绝非虚言。他最后为女儿敲定的大学是他家乡所在的西南财经大学,专业是金融。他为女儿预估的高考分数与实际所获分数之差仅在2分之内。这个情形用在我自己身上显然是做不来的。事实上,我女儿李安琪高考的参考数据、指标等等,很大程度上参考了刘浦江对他女儿资料的统计和分析。他不经意的一句话或一段说辞,常常成为我跟我女儿、妻子琢磨的依凭。就此而言,我也应当属于家长协助女儿报考大学受助于他人指点的那个获益者。

## 二

浦江跟我的交流还是学术的为多。彼此家庭沟通产生的联系,从早期的直接接触逐渐演变为后来的记忆或学术聊天中的

内容了。正是凭借这种接触及其产生的记忆，成为我撰写此文怀念他并涉及彼此家庭关系的主要依据。这种所谓的人之常情也是我怀念过世的浦江的直觉性感受。虽然他在人们的心目中是一个将自己全身心地交付给学术的典范，也是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学术中人，但彼此的女儿、各自的家庭，依然排在我怀念他的居首，似乎能够反映像这样交托于学术的能人同样有其非学术的人生，我们交际的 20 世纪 80 年代的中期，如同上文所示，恰是各自幸福家庭生活构建的开始。

现在将我的话题转移到他的学术层面。

在以断代史为鹄的的学术界，养成的是投入其中的学者审慎地把握自己的领域而拒绝涉及与此不搭界的前段后代，这已成为人们恪守的习性。在自己长期研磨并在本断代之内的若干领域出产质量上乘的研究成果而获得专家称号的这个时代，精深细致且有创新价值的研究，是人们据以判定学者高下的关键指标。刘浦江的成功，得益于此。而这也正是我议论他学术的一道屏障。对隋唐五代史诸多领域的研究尚显生涩的我而言，涉入浦江的辽金史乃至宋史领域做有价值的评议，显然超出了我的能力。所以我下面还是采取稍微熟知一点的一个题目做我的申说。

《南北朝的历史遗产与隋唐时代的正统论》，这是他发表在《文史》2013 年第 2 辑上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刘浦江辽金专业以外的学术拓展性尝试中的代表作之一。

此文议论的核心是隋唐王朝法统地位的获得、维系以及后世对此的价值评判。作者取材于文献资料记载中的不同观点，总结出隋唐正统的讨论主要源自于两个阶层，即政治集团和知

识群体。这两个阶层是当时社会最具有影响力并代表那个时代的主旋律。作者抓住主宰现实政治发展的政治集团与反映社会观念、意识的知识群体之间既相互契合又龃龉矛盾的博弈而展开论述，勾画了政治现实不可变异的事实与对事实做出虽不能改变但却表达出歧异观念这二者之间的张力。隋唐政治体消解之后的历朝历代对其法统迥然有别的判断，也是这种张力的具体体现。

其文章由“北朝正统论之成立”、“寻找北朝历史的‘入口’”、“南朝正统论之潜流”、“径承汉统说的提出及其政治实践”、“走出魏晋南北朝”和“余论：从南北正闰之辨看宋元以降华夷观念的演变轨迹”6个章节组成，又可分成3个部分：1、2节为第一部分，3、4、5节为第二部分，第6节为第三部分。

1、2节讨论的核心，是隋唐法统确立的基础——北朝正统论。

这个问题的本质是政治的现实与观念形态之间的契合度。从中原文化传统出发，对建基于此的任何朝代法统地位的承认与否，其自身的文化属性始终是判断的主导。自从秦始皇建立一统化王朝之时，尤其经过两汉的衍变，中原法统地位的认可就成为人们评判的标准了。隋唐法统地位的承认之出现问题，就在于它构成的王朝虽然覆盖了中原而它自身却源自于这个传统之外，即它的政治基础与文化传统呈现出对立的状态。

隋唐二朝源自不被中原正统论看好的北朝夷狄，而它们却实实在在建构了中原王统，这个法统争执的焦点恰恰集中在北朝。我们看到，中国历史上但凡正统论的出现，大多集中在两个或多个朝代并立的时期，譬如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宋辽金等

等。在多个王朝并存的状态下,谁是合法谁是非法的问题才得以出现。作为一统天下的隋唐二朝,其自身的法统地位本不存在问题,只是非华夏正統的北朝源头,才使其地位蒙受质疑。刘浦江讨论这个问题的思路就是隋唐的合法性如何从事实本身衍变为唐朝前期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的主流观念。这是他此文的主要贡献。那么他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呢?

他发挥了长于文献解读和分析的手法,主要依托于官方的史学描述。

既然唐源于北朝的法统多被诟病,那么如何寻求补救使其地位获得正解就成为当务之急。受阎步克魏晋南北朝“出口”讨论的启发,刘浦江试图解决的就是北朝的“入口”,这是隋唐正統论能否立得起来的关键。根据他的研究,倘若按照《魏书》的说法,北魏的法统应直接继承于西晋而省略了中间环节,这叫“越近承远”。但这个承继的法统却忽略了东晋,而“与西晋一脉相承的东晋具有无可置疑的政治合法性来源,同时代的五胡十六国也普遍认同东晋的华夏宗主身份”(刘浦江语)。对这一缺憾的弥补,他采用的是隋朝王通将东晋和刘宋纳入到隋朝法统承续的行列,连接了南北两个体统,完成了“入口”的对接。

3、4、5 节讨论的核心:正統的争执与弥合。

北朝的政治现实与正統意识虽然可以做到契合,但这并不意味着南朝的地位在人们心目中的自然丧失。这是因为构筑正統论之政治体统、华夏种族血统和儒家文化道统三个层面的内容东晋南朝具备了占有后二者的优势,隋唐的政治体统虽然能够主宰和决定其法统的确立,却不能消解南朝后二者的地位。但这种地位也无法通过隋唐的正规渠道传递,就只能以“潜流”

涌动的方式流布于士人中间。现在的问题是，这些士人是怎么解决南北体统弥合的呢？他列举唐人费长房的《历代三宝记》，将西晋、东晋、宋、齐、梁的法统直接续到周、隋，为隋唐继承南朝的法统找到了入口，这一北一南的“入口”似乎弥合了两个迥然有别体统的缺憾。然而中期以后，士人中又出现了企图否定北魏法统的声音，例如皇甫湜的《东晋元魏正闰论》以为东晋正名的方式明确拒绝了北魏道路，这触及到了唐朝政治合法性的根本。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的断裂？作者认为，这是唐朝后期社会内忧外患的局面在士人思想和观念中的反映，他们的内心普遍怀有异族威胁的焦虑与戒惕的心理，这就将种族之别的思想纳入到了正统论之中。

如上所述，隋唐的北朝正统论尽管能够主宰社会，但其源头的正当性无法获得澄清而遭受诟病；南朝正统论虽潜藏于士人之中，然而若想获得政府的认可也希望渺茫。二者的纠结引生了一种略过魏晋南北朝而直接与两汉法统挂钩的调节论的出现。然而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这种涉及政治立场、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强烈反差的历史遗产引起的正闰之争，虽然曾长久持续在隋唐士人的争执之中，但在隋唐雄厚宽阔的政治实体的挤压下，它所发挥的效力始终局促于主流社会之外，由政治体带动的北朝正统观念的强势局面及其释放出来的建基于实力基础之上的能量也逐渐在消解以华夷正闰为核心的南北政治文化传统之差异。

以上是刘浦江就隋唐北朝正统问题阐述的核心思想。他讨论的法统虽未直接回应唐史学界相关的问题，但其焦点无不集中于此。隋唐史学界公认的研究中，以陈寅恪的关中本位政策



主导下的关陇集团开创的王统政治持续影响西魏至北周、又主导隋唐的脉络,成为人们认识和把握6世纪中叶至7世纪中叶这100多年中国政治的主线索<sup>①</sup>;谷川道雄的隋唐政治渊源北魏道路的揭示,又为人们了解隋唐的正统地位提供了明确的方向<sup>②</sup>;而唐长孺有关唐朝中期以后社会的南朝化议论则为这种偏离主流的王朝找回了方向从而走上了中华体统的“正道”<sup>③</sup>。实际上,无论陈寅恪还是唐长孺(尤其后者)都将北朝非汉文化的政治体视作中原王朝的偏外之路,唐朝若要回复正路,即所谓正统地位的获得则必须通过回归中华文化之渊藪——南朝的发展路径中才能实现。刘浦江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唐长孺的观点。但他不是从政治体自身的角度着眼,他关注的是知识群体对正统问题的意识、观念和价值的判断乃至选择,而能够反映这些的几乎都集中在文本的书写中,这也正凸显了他熟稔文献史料的长处。

我之将他的论文分作上述两大部分,是这两个部分讨论的问题既前后有别又相互衔接。第一部分论述的宗旨是北朝法统地位的确立及其维护,第二部分则是对此问题的反弹与正统意识的归结。前一部分的贡献体现在依托于政治体之道路形塑的正统论的建构。如果说陈寅恪、谷川道雄从历史发展过程中归纳和总结了隋唐政治合法性通过渊源、建构政权等方式确立起

① 参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5页。

② 参见〔日〕谷川道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李济沧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4页。

③ 参见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中华书局,2011年,第468—473页。

来的话,那么刘浦江此文的功绩就表现在对这种政治合法性赋予了思想、观念和价值上的认可。这也意味着政治家追寻的道路获得了士大夫为代表的社会舆论的支持和配合。只不过这种支持是由政府控制下通过史学著作描述而建构起来的。就此而言,我们将它视作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华王朝正统地位的话语系统。刘浦江的学术功劳应当是在这一话语系统内的添砖加瓦。为什么这样定位呢?

在以一个王朝为中心的叙述中,人们惯常的举动是以自我为核心进行描写和概述,对其他异己的对立物均视为他者或边缘。这虽说是人们的普遍行为,但并不意味着其他中心的不存在。中原为主体建构的汉系王朝在通过内部更改统治集团不断延续的同时,北方草原也不停地传递着种性不一的游牧政治体。这两种政治体相互交往所引发的对异己的冲击,也无时无刻地影响对方内部政治的发展。上文所说隋唐北朝正统论的出现,其本质的表现,就是北方游牧系统的政治通过北魏建国南下与汉系传统结合,赋予中原文化以异质因素。在这里,我们分明看到的是鲜卑拓跋及其身后映现的草原余续,如何在宇文泰胡汉凝聚的运行中逐渐渗透并转而步入中原的汉系王朝之中的过程。欧美日本学界近年就隋唐王朝的拓跋化倾向进行的讨论,足以说明北方非汉系文化对隋唐造成的冲击。如此看,从北方草原向中原王朝注入异质文化因子的观察,实际上突破了中原单一或自我为中心的窠臼。

现在让我将话题再回复到刘浦江的学术贡献上来。

如上所说,他的贡献就是从观念和意识形态上强化了隋唐北朝正统性的政治进程。隋唐王朝的合法性主要建基于自身的

政治实践,其次才是为自身张目所进行的舆论性宣传。这二者合作的重要功效就在于它能够支配主流社会,但能否裹挟整个社会特别是人们的内心世界,那就很难说了。譬如他所讨论的流散在民间尤其知识阶层内秉持南朝法统的各种议论就是主流宣传控制不了的鲜明例证。当作者议论到唐后期士人中出现明确否定北魏正统进而强调东晋南朝体统的时候,他说这些思潮与当时社会的发展与转型有密切的关系,他虽然没有展开,但研究唐史的学者对安史乱后唐朝社会的转轨几乎不持异议,不论是上文陈寅恪、唐长孺的学说,还是像傅乐成那般专门性的讨论<sup>①</sup>,都承认后期的唐朝整体上出现了与前期差异甚至迥然有别的发展趋势。以韩愈批判佛教主张道统为例,展现了士大夫阶层对中国传统意识形态的回归和阐扬。陈寅恪曾说唐代“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sup>②</sup>,这句话虽属一般性概括,然而唐后期社会的发展与北宋建国态势的衔接,诚如刘子健概括的那样,其国家的整体运作采用“转向内在”去描述<sup>③</sup>,的确道出了王朝的特性。

正是面对社会局面的转型,知识阶层有关唐朝法统地位的讨论才有新思潮的酝酿和复出。南朝正统论引发的南北法统的争执,一直游荡在唐朝前后敏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那些士人中

<sup>①</sup> 参见傅乐成:《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氏著《汉唐史论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5年,第339—382页。

<sup>②</sup> 陈寅恪:《论韩愈》,氏著《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96页。

<sup>③</sup> 参见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赵冬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

间，这些内容经刘浦江的讨论被清晰地呈现出来。然而作为兼统南北已整合为王朝国家的现实，也产生着制约正统性争论的趋于消解而非激化的能量。是否可以这样认为：一统化王朝自身的兼纳并不刻意地强调自身法统地位的彰显，因为它能够容纳各种不同的政治诉求而不至于构成对其地位的挑战。这样的想法在文章的第5部分“走出魏晋南北朝”有针对性的揭示，这也蕴涵着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同层面：一统化的王朝既有能力化解南北分裂引生的法统地位争衡导致的紧张局面，也存在着它解体之后争执再度出现的可能性。

果然，作者在第6节“余论：从南北正闰之辨看宋元以降华夷观念的演变轨迹”接续的就是这一理路。他是这样认为的：为解决隋唐王朝政治合法性的来源而提出的南北正统之辨，在唐朝解体以后并没有时过境迁，然而吊诡的是，南北正闰争议的焦点却从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的纠缠中游离出来转而步入到了它所承载的价值判断与选择中去了。之所以发生这样的转移，就是宋元明清以降的历史进程中孱入了汉系以外的北方异族势力（譬如蒙古和满洲就是典型）。如果说隋唐的统治集团因杂有鲜卑拓跋成分使其形成了胡汉混合的政治体，但其异质因素并没有成为入主中原的障碍；而来自草原的蒙古和东北边隅的满洲势力，无论是其迥然有别于中原的生计方式还是思想意识，他们对中原介入、控制所造成的冲击，使他们建立的王朝在中原人的观念中从（唐朝）南北的文化之争迅速演变成为华夷（种族）之别了。这就是刘浦江认识的唐朝与此后时期法统论争议的本质差别。

考察中国古代历史的进程，在汉系与非汉系的相互交织中，

始终存在着文化与族性的“天下一家”与“华夷有别”的认识。不妨可以说文化之别与族裔观念随着历史的递进呈现出前弱后强的趋势,这样的演变也同样影响了近代的过程。一个有说服力的解释,就是中原周边的其他势力自我意识和族属认同的上升导致其政权的建立(尤其表现在北方)并对中原造成的冲击。诚如魏特夫概括北族王朝从早期对中原的渗透转变成后来的征服全国的趋势那样,周边异质力量的壮大,随历史的发展而增强,至蒙古、满洲势力对中原的全面覆盖而达于峰巅。这种前所未有的力量带给中原的震动,迫使中原在遭受异己冲击的过程中必须面对和解决族性的张力。这种张力,从两宋与辽、西夏和金的对峙,到蒙古势力南下统一元朝的建立,再到满洲贵族入驻北京建构幅员广袤的帝国,给后一阶段中国传统王朝自我更替的历史注入了北亚异族主导的王朝建构的因素,从而将学者所概括的外儒内法的专制君主官僚制与内亚边疆帝国这两种类型的王朝结合在一起了。

正是这种非汉族裔建构的王朝参与了中原王朝承续的进程,才使文化的差异衍变成了华夷族性之别,华夷之辨由此支配了中原土人的思想观念。然而族裔王朝的更替嬗代也使这种观念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诚如作者所说,在汉民族处于强势地位、民族矛盾趋向缓和的时候,人们就比较容易认同文化至上的华夷标准;而当汉民族遭遇异族威胁、民族矛盾非常尖锐的时候,人们往往就会强调种族至上的华夷标准。这个变化的着眼点还是建立在汉人的基础上,它所宣示的仍然是汉人的立场。然而入主中原的非汉系的清朝,到了乾隆时代,作者认为其统治者的正统观念已经发生蜕变,即他们从北方民族王朝的立场转

向了中国大一统王朝的立场，因此才出现了清高宗高调地捍卫“中华正统”的宣泄。这套话语涵盖的是满洲贵族的清朝已从北方王朝脱胎换骨衍变成为中华王朝的逻辑。虽然此文不是直接回应“新清史”之疑问，但却暗含着对后者有关清北方王朝主体性的否定。在正闰的问题上，早于乾隆的雍正正在反击明朝遗民持守华夷之辨要比遵守君臣之义更为重要的责难时，他通过撰写《大义觉迷录》，证明清朝统治的合法性来自君主的“圣德”而非“籍贯”所表明的地域。在这里，他将非汉系的“夷狄”转化成为籍贯，采用英雄不问出身的方式，企图化解前朝遗民所秉持的种族差别的指责<sup>①</sup>。这种将族性转移为地域说辞的意图就是模糊二者的本质差异从而将其与隋唐的北朝正统论挂钩，进而消解汉人心中存留的“夷狄”情绪。乾隆的“中华正统”的观念只有建立在雍正的积累上，我们才能获得更为清晰的承接轨迹。也只有在这种语境下，早已成为历史烟云的北朝正闰之争，才能与其自身相脱节，变成人们“借助它去表达某种价值主张和文化立场”（刘浦江语）的话语了。

原载《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5年2月8日第7—8版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

<sup>①</sup> 参见刘禾：《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杨立华等译，三联书店，2009年，第115—121页。

## 惜才伤逝忆浦江

李剑鸣

我认识浦江未出十年。我调进北大的那年，正赶上系里行政换届。大勇连任系主任，小瑜和浦江是新任系副主任。他们几位照例要发言表态。浦江的话不长，但很幽默，也很实在，因此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他借用前人的话说，一个人如果想要几个月不得安宁，就买套房子来装修；如果想要四年不得安宁，那就去做一届系副主任。大家一听都笑了起来。他接着表示，尽管如此，他还是会尽力把工作做好。我听他说话这样别致有趣，便联想到几年前读过他的《正视陈寅恪》，在当时一片热捧的风气中，能中肯地讲出陈寅恪的局限。看来他是个有见识、有品位的人。于是，在任命会结束后，我上去和他打招呼，并提到了他那篇文章，话当然说得很客套：“久仰大名，早就拜读过大作。”我只记得他满面微笑，两眼放光，具体说了什么话，却一点也想不起来了。

在这以后的几年里，我跟浦江也谈不上有多密切的交往。专业不同，兴趣也不一样，除了在系里的会上碰面，几乎没有单独做过深谈。不过，常听系里了解他的同事说，他遇事有主意，做事极认真，待人也热诚，应是下一任系主任的主要人选。我亲身领会他的认真负责和与人为善，是在北大首次评人文特聘教授的时候。在学校的评审会上，因大勇外出，浦江代表系里说明

每个候选人的情况。我大约是填表不仔细，有评委误以为我是南开“双聘”，这样就可能对评审结果产生不利影响。浦江当即找人核实，证明只是表上没写清楚；他还让系里经办此事的人在会场外盯着，如果有人再提这一点，也好及时做出回应。这时浦江卸任在即，跟我也没有特殊的交情，竟能这样细心地对待这件事，不免让人感念不已。

在浦江卸任之后，我和他的往来反倒多了起来。这其中有一个重要的机缘。虽然多年来大家私下都认定浦江会接替大勇做系主任，但换届过程几经波折，其结果也出人意料。现在看来，那次换届对历史学系是影响至深的，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转折点。此后不久，系里的风气就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在一些问题上产生了尖锐的对立，而且大家对这种变化和对立的评判也是截然不同的，最终发展到系里十几名教授集体向校方交涉，强烈要求扭转这种反常的局面。关于这场风波，有人把它说成是单纯的人际关系冲突，但浦江不这样看，他几次说：“这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我很赞同他的说法。因为我们都觉得，一个系本是一个学术单位，应当学术优先，鼓励进取，开放包容；不宜看重“门户”，向外“闭关”，对内“拉平”，在同事中间以亲疏和恩怨来划线。有一段浦江常和我通电话，就系里的近况交换信息和想法，有时能聊上一两个小时。

说到底，我同浦江毕竟是“君子之交”，平时很少在一起聚会，也难得坐下来闲谈。交往固不频繁，不过，有些小事让我更深地了解到浦江为人处事的风格。在北大第二届人文特聘教授的评审中，我虽未申报，但仍在系学术委员会获得提名，只是得票并不理想。事后浦江两次对我谈到：“我就跟人说嘛，你在系



里大家都是认可的,为什么会缺了几票呢,这是挺奇怪的。”当时系里情况复杂,投票难免牵扯到非学术的因素;浦江这样说,表明了他待人的善意,并且他还希望其他人也能有同样的善意。其实,若论学问成就和在系务方面的付出,浦江自己早就应该是人文特聘教授的人选,但他关心的仍是别人是否得到了更公平的对待。前年岁末,浦江得知我要南下的消息,便给我打了电话。他开始对我的选择感到惊异,听了我的解释后,他说:“哎,能走也好。”记得系里风波初起时,有人议论说,最好是真有几个人要调走,这样可能就会引起学校的重视,促成问题的解决。浦江听了这话,连声不迭地反对说:“这不行,这不行,代价太高了!”这几乎是他本能的反应,因为他一直胸怀大局,希望系里能聚集更多人才。这次他竟对我的苦衷表示理解,看来对现状多少是有些灰心了。

我到复旦报到后不久,就接到立新的电话,得知浦江重病的信息。我不免十分震惊和担心,便给浦江发邮件问候。随后我又去北京,同立新夫妇一道去医院看他。那时他正在做第一期化疗,疗效显著,他的情绪也很饱满,谈兴不减当初。他谈起自己的病情,引经据典,口若悬河,好像在说别人的病一样。他还称自己是病房里的心理治疗师,能用轻松、乐观的心情去感染别的病人。他说,自己即便遭遇不测,也没有多少遗憾,因为“做学问的能力发挥了百分之七八十,带学生的能力也发挥了百分之七八十”。我们在病房里坐了半个多小时,基本上是听他在说。我不禁暗自感叹,浦江的内心真是强大,在生死问题上这样看得开。我们要离开了,他坚持送到门外。握手道别时,他笑着对我说:“如果是照重庆医院的诊断,那咱俩就见不着了。”这是我最

后一次见到浦江，他依旧是满面微笑，两眼放光。这张善良而明亮的笑脸，便牢牢地定格在我的脑海里。

得悉噩耗以后，我找出浦江的几篇旧作，细细地读了一番，以排解内心的哀痛和惋惜。但越是读他的文章，我的哀痛和惋惜就越是加深。我不禁有一种强烈的憾意：过去对浦江的著述关注不够，未能充分理解他的学问功力和学术成就，错失了向他讨教和请益的机会。

我早先读过他的《金中都“永安”考》，深为他的精湛学识所折服。他在文中逐一辨析前人立说的主证和旁证，再详陈自己的理据，要言不烦，细致缜密，结论给人坚不可摧之感。我对他研究的题目所知甚少，但很喜欢这种“新考据”的学问路数，便把文章推荐给学生看。我还跟浦江本人提过这件事，当时他脸上露出了惊讶的神色，大约是没想到做外国史的人还会留意这样的文章。这次，我读了他的《元明革命的民族主义想象》和《太平天国史观的历史语境解构——兼论国民党与洪杨、曾胡之间的复杂纠葛》，更是大受震撼，似乎是见识了一个崭新的浦江。

我原先跟很多人一样，把浦江看成一个出色的辽金史专家，觉得他的长处是文献功底扎实，深谙传统学问的家法。没想到，他的问题意识、视野、方法和识见，竟大大突破了断代史的藩篱，如此贯通，如此醒豁，如此深邃，如此前沿。这样的文章，可以说是政治史，也是思想史，还是史学史。他在方法上既有传统的文献学和史源学的底蕴，又借用了后现代的意识 and 技巧。他采用“想象”、“语境”、“解构”这样的字眼，并不是刻意显示一种趋新的姿态，而是昭示了一种新的方法论和历史观。他没有把这些新词当作标签，而是化为一种方法论意识，天衣无缝地糅合在他

论述的理路当中。这种运用新理论、新概念的方式，正是前辈学者所说的“水中盐味”，而不是“眼里金屑”。

从这里，我对浦江的学问有了新的认识。他曾谈到，理想的治学路径是“入于汉学、出于宋学”；我觉得，如果应用到他本人身上，还应当加上“旁及西学”。这就是说，他晚近的文章表明，他已经把扎实的考据、精审的义理和前沿的意识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在中国古史领域极少见的学问气象。显然，他的尝试刚刚开头，如果再给他十年、二十年的时间，他一定能写出让人更加吃惊、更加赞叹不已的文章。浦江说自己的学问潜力已经发挥了百分之七八十，但我认为可能只发挥了百分之三四十。他在学术上究竟能达到何种高度，取决于上天留给他多少做学问的时间。未料上天竟是这样的吝啬，让他过早离去，使我们无法看到一个更加“朴实而有光辉”的学问大家。

浦江在重庆老家过完了最后的日子。山水迢遥，重城远隔，我未能去见他最后一面。这是一个遗憾，也是一种幸运。因为这样，我记忆中的浦江，就永远是那个满面微笑、两眼放光的浦江。我总觉得浦江并没有谢世，只是由于京沪之间远隔千里，一时不能相见而已；如果哪天我去北京，说不定就能在人文学苑5号楼的走廊上碰到他，亲热地打声招呼，随意地聊上几句。

2015年2月10日于上海

（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 垫江洒泪送浦江

荣新江

去年4月初，有一天我接到我们中古史中心副主任刘浦江发的一个短信，说是要请个长假回重庆垫江老家，我略感突然，马上拿起电话问他怎么啦，他说要做个手术，可能要把胃切除一部分，然后休息一段时间，因为有亲戚在那边医院，所以做手术方便一些。我印象里他是常年肠胃不好的人，滴酒不沾，吃饭也非常注意，而许多人做过胃切除，似乎也不是太大的事，所以就放下心来。

可是4月中旬的一天晚上，接到牛大勇的电话，说浦江手术前检查出癌症，重庆那边治不了，马上就回北京医治。17日下午，浦江已从重庆转回北京，住进北大肿瘤医院，说是癌症晚期。我与大勇、阎步克、林宗成一起去看他，精神还好，下周一检查结果才出，但他已做了最坏打算，和我们说了一些对人生长短的理解，我相信他能挺过去，但心里觉得很不是滋味，他比我还小一岁，怎么可能这样。

随后几个月的治疗，颇让人欣慰，但时而也有反复。7月初情况有些不好，12日我和邓小南、朱玉麒、方诚峰一起去看他，医院的环境很差，但他的精神尚佳，告诉我们又做了一个疗程，换了些药，周一即出院。随后的消息一次比一次好，9月1日我给浦江一信：“最近还好吧？听说第三疗程后效果不错，希望一

步比一步好。假期带学生去黑城、敦煌，刚刚回来。拙著《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一册请苗润博带上，请指教。”他还是一贯的风格，当即回信：“近几个疗程效果比较明显，如果顺利的话，十月即可结束治疗。我听苗润博谈过你们的西北考察，谢谢你的新著。”到了9月27日，我当时在日本，接到朱玉麒的来信说：“今天刘浦江老师来和学生上课了，令人感动。”后来我统计中心下学期的课程，他还报了要开“《辽史》研读”，我更加感到振奋，觉得浦江这下子是挺过去了，一旦他回到教学、科研岗位，他就又会变得生龙活虎一般。

万万没有想到，12月29日邓小南来电话，说浦江病情全面复发，他要回垫江老家。30日下午，我和小南、大勇、罗新一同赶到肿瘤医院。看到隔离病房中浦江消瘦的样子，心里非常难过。隔着玻璃窗听他说，他已下定决心要回老家，他姐夫已经带了一辆救护车来接他，他觉得时间不长了。我们希望他不要放弃，说不定换了环境，又是一番情形。他让我们来，是要拜托大家一件事，就是托付他的学生，希望我们着力培养，接过他辽金史学科的班。这时的浦江，已经完全不是平日说话那样快刀斩乱麻，而是上气不接下气，但他最后要说的话，仍然和平日那样，是学术，是学生。

第二天，浦江离开北京，回到垫江老家，我们的心也跟着到了垫江，每天传来的消息越来越糟。2015年1月5日，先期赶到垫江的学生传来那边不太好的消息。中午，消息更不好，我到历史系和系领导商议，准备预案，随时启程去垫江。下午，原本说我和小南、张帆明天一早过去，傍晚又有消息说浦江又平息下来，他夫人说先不要过去。6日，我们每个人都忐忑不安，希望

浦江能够再次逃过一劫，起死回生，可是夜里从垫江传来消息：浦江于23点57分去世。虽然这消息已在意料之中，但一旦成为事实，悲从中来，泣不成声。

7日上午到系里商议浦江追悼事宜，拟写讣告，发到网上。下午1点半，与小南及历史系领导高毅、王新生、张帆一起出发，乘4点班机飞重庆，晚点，7点才到，转乘汽车，深夜抵垫江。浦江的好友王子今、李华瑞、李鸿宾三位也在下午赶到，浦江的新老弟子都在。

8日早上8点，在垫江的殡仪馆举行浦江遗体告别仪式，高毅代表历史系致辞讲浦江生平事迹，我代表中心致辞讲浦江学术成就，小南代表生前好友致辞，垫江教育局长是浦江的中学同学，他代表垫江教育系统致辞，垫江县长和浦江的家属、友人约一百人来为他送行。我自认为是个坚强的汉子，但浦江的去世实在让人心痛，在这个告别仪式上，我的泪水如泉涌一般，我为失去这样一位好同事、好朋友，也为我们的学生失去这样一位好老师，而感到十分哀痛。

在告别仪式上，我除了对浦江的不幸去世表示沉痛哀悼外，特别希望对他家乡的父老乡亲们说，浦江是垫江人民的骄傲，也是北大的骄傲，是北大中古史中心的骄傲，浦江虽然走了，但他留给我们十分丰厚的学术遗产。

刘浦江1979年从垫江考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中国史专业，毕业后到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任教。1988年破格被北大中古史中心主任邓广铭教授调入北大中古史中心从事研究工作，并协助邓先生整理古籍。

浦江的主要专长和研究方向是辽金史、宋史、中国民族史，

在相关多个领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先后出版《辽金史论》、《二十世纪辽金史论著目录》、《松漠之间：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契丹小字词汇索引》，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他在辽金史的许多方面，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有着宽广的学术视野和深厚的文献功底，近年来，他突破断代史的藩篱，从长时段的视角出发，对中国古代的华夷观、正统论等问题加以深入研究，发表了一系列高水平的论文，格局宏大，眼光独到，在史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的一些论文，已经翻译成日文、英文，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广泛注意与好评。

浦江勤奋好学，刻苦用功，治学从不懈怠，即使已经是名教授，我们在北大图书馆、中古史中心图书馆，仍然经常看到他读书的身影。他为了深入钻研辽金史，还刻苦学习契丹文、女真文。他不仅可以通读考释契丹文字材料，而且编纂出版了《契丹小字词汇索引》这部巨著，相当于一部契丹文词典，对学界使用契丹文，贡献极大。他还把语言学、人类学与历史学紧密结合起来，完成了一系列跨学科的研究，如对辽金从部族体制向帝制王朝的转变，对契丹人的父子连名制等问题的研究，都有卓越的识见，在学界引起强烈反响。每个周六，他都和学生们一起，在中古史中心的教室中，一起校读《辽史》，度过愉快而紧张的一天，保质保量地完成了二十四史《辽史》的修订工作，获得同行专家的好评。

浦江和我、罗新三人搭班子负责中古史中心的工作，他分管教学和图书馆，特别是在中心图书馆的建设方面，他以自己对文献的专业知识和对学界行情的深入了解，为中心图书馆置备了许多好书。中心原有台湾影印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是上世纪

80年代初邓广铭先生创办中心时购买的，为中心的科研工作和古籍整理提供了资料基础。几年前，当浦江听说国家图书馆藏文津阁《四库全书》影印出版后，他认为两者有很多不同之处，所以想方设法最终给中心购置一部，使得我们中心图书馆成为少有的一处拥有两部《四库全书》的单位，为研究者对照两部所收图籍的优劣，提供了巨大的方便。

我从电脑中找到浦江2013年3月31日给我的一封信，说到：“国图08年出版的《明清以来公藏书目汇刊》（全66册）是一套非常有用的工具书，但北大各图书馆均无此书。建议中心买一部，此书定价35000元，史睿恐怕不能做主，需你定夺。”中心这套书现在仍然是北大的独一份，但开放的图书馆使每一位使用这部工具书的人获益。这些我们要感谢浦江对中心图书建设的关怀。我的电脑里还保存一些浦江为中心图书馆勾选的书目，其方面之广，其选择之精，都让人钦佩。有的书他还特意提示购买的理由，比如2013年9月24日的勾选书目中，他勾选了文物出版社的《中国古代地图集》（共3册），并写到：“其中第1册可能只有孔网上有，后两册容易买到。此书中心过去买过一套，但可能长期外借，学生无法使用，因是常用书，最好再买一套。此书使用频繁，将来可放工具书室。”这表现出他对学生用书的关心，这也和他平日非常关注研究生的培养有关。他勾选的另一种是《俄藏黑水城文献》，并简要说明理由：“中心只有前6册汉文部分，第7册以后西夏文部分也应该购置。”这部书每册定价在1700多元到2200元之间，对于中心日常拥有的购书经费来说价格不低，但浦江从学术出发，再高的价钱也不在乎，也要设法购置。我们中心也没有人研究西夏文，但他知道这是文



献的基本建设,而西夏文就像是契丹文、女真文一样,将来一定有像他一样要深入钻研西夏史的年轻人会来学西夏文,会来用这些西夏文的图书,其学术眼光之深远,由此可见一斑。我们随即从命,陆续购置了第7册以下,直到2013年12月出版的第22册,今后我们也将此类基本典籍购置下去,以满足浦江的心愿。

浦江对中心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他对中心创办人邓广铭先生学术理念的整理。他作为邓先生的助手,对于邓先生学术思想、学术方法的理解非常深入,先后撰写了多篇文章阐述其中的要旨。比如他在《不仅是为了纪念》一文中说到:“邓先生的学术品格一如他的个性。他治学以考据见长,以史识出众。”又说:“邓先生的耿介在学术界是出了名的。比如说他历来主张老老实实做学问,反对各种好大喜功的文化工程、出版工程。”(《读书》1999年第3期)他在《邓广铭先生与辽金史研究》一文中说到:“衡量一位学者的成就和贡献,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那就是他对学科的推动作用。我觉得,若是要论邓先生对辽金史的最大贡献,应当首推他为建立和传承北京大学的辽金史学统、为培养辽金史的新一代学人所做出的努力。”(《想念邓广铭》,新世界出版社,2012年)其实,邓先生对于宋史、唐史、中古史,乃至历史学的方方面面,都有同样的理念。

邓先生创立中古史研究中心,是秉承傅斯年办史语所的理念,给学者们提供一个安静的环境和藏书丰富的空间,让他们老老实实做学问,不必去参加非学术的文化工程。对于年轻学子的要求,既要有实证性的硬功夫,也要有史家的识见。这些无疑成为1982年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创建以来的“家训”,而且经过

浦江的整理弘扬，成为中心所奉行的圭臬。我想这份邓先生主张、浦江所弘扬的精神，一定会弘扬下去。

2015年2月1日完稿

原载《文汇学人》第185期，2015年2月6日第4—5版

（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主任）

## 细微处见精神

——追忆刘浦江与点校本《辽史》修订

徐俊

得知浦江生病的消息，太过意外，当时的感觉就像是自己一下子站到了断崖边。几次想去看他，都被婉拒。后来的一段时间，因为《辽史》修订、《契丹小字词汇索引》编辑出版，以及《史记》、两《五代史》修订本审稿等事务，浦江仍与我们保持着联系。我内心一直往乐观处想，浦江一定能够挺过这一关。

浦江与中华书局的交往主要是在这几年，我正好是当事人。浦江和我同龄同届，自相识就没有距离感。和浦江比较多的接触，是从商讨《辽史》修订开始的。在着手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之初，我拜访蔡美彪先生，谈到辽、金史修订，蔡先生就首先推荐了浦江。因此，在2006年我们做第一轮调研的时候，《辽史》修订就已经基本确定由浦江来承担。在此期间我们有过比较多的交流，开始我们非常希望由浦江和张帆一起承担辽、金二史，后来因为张帆与陈高华先生共同主持《元史》修订，这个计划才作罢。在《金史》确定由吉林大学承担以后，对《金史》修订方案和修订样稿，浦江贡献了很多意见。一次我在中古史中心参加其他活动，会间在浦江的研究室，针对吉大的学术特点，他还就《金史》的修订跟我做了深入的交流，意见和建议都非常中肯。

2007年5月，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第一

次修纂工作会议召开，确定北大历史系为《辽史》修订承担单位，浦江主持并担任修订工程修纂委员。同年10月19日，召开《辽史》、《元史》修订方案评审会，蔡美彪先生任评审组组长，刘凤翥、周清澍、王曾瑜、许逸民等先生参与评审，讨论通过了两史修订方案、凡例。按照修订工作程序要求，2008年5月，《辽史》修订组提交了修订样稿五卷，样稿由我们分送蔡美彪、陈高华、崔文印、许逸民等先生进行书面评审。6月26日，《辽史》修订样稿评审会在中华书局召开，蔡美彪、刘凤翥、崔文印、张帆、许逸民等先生参加评审，浦江和修订组康鹏等与会。9月，《辽史》修订样稿印制完成，寄送相关专家学者进一步征求意见。

《辽史》修订前期规定动作和必备程序，极其顺利，各史无出其右。其中有史书差异、原点校本差异、修订组准备等各种因素，但主持人的学术积累和修订力量组织起了关键作用，而浦江在这两个方面的优长都非常突出。

就整个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来说，相对于其他各史和各史主持人，我们与《辽史》修订组的工作交流机会是相对少的。修订工作顺利，反复讨论就少；修订工作周折，相互探讨甚至开会就多。《辽史》从开始阶段的修订方案、修订样稿，到中间阶段的二次样稿，没有任何磕绊，意见一致，省去了很多功夫。而且《辽史》修订组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在各史初期摸索阶段，还起到了样板示范的作用。

简单举个小例子。如何吸收前人成果，包括断代史研究成果、与本书密切相关的文献研究成果、针对点校本的校勘成果，等等，是修订最基本的准备工作。修订工作总则对此提出了明确的普查和吸收的要求，但怎么做并不清楚。《辽史》修订组的

做法非常有启发性。在2007年10月讨论修订方案时，浦江已组织人力对前人有关《辽史》的校勘、勘误论文进行了全面搜集，整理装订成《辽史勘误》一册（250页），收入1942—2007年间散见于报刊、文集的论文、札记，共62篇。做到这一点，似乎很平常，关键是下一步，他们把每一篇文章里面涉及的校勘点，都在文章的显要位置标出，然后再将各篇文章所涉及的《辽史》卷次，统编为《辽史各卷勘误索引》。这样《辽史》某卷有哪几篇文章、在什么位置，涉及某个校勘问题，一目了然。每个参与修订的人，都可以由此几无遗漏地掌握前人对某一校勘点的意见。另外，针对原点校本对新出考古材料和石刻资料用得较少，《辽史》修订组还编制了《辽代石刻新编》，以供修订采用。如何统一把握参与修订的人在资料获取上的均衡一致，一直是我们关注的问题，所以，当我听浦江介绍这个做法，并把已经完成的《辽史各卷勘误索引》交给我们的时候，我是由衷地叹服浦江的工作成效。我们后来在各史都推广这个做法。这看起来只是一个具体改进，但却是如何减少重复劳动而又消弥遗漏的非常有效的办法。

再如修订长编，按照修订要求，每史修订在校勘记撰写之前都要撰写修订长编，记录所有校勘点的文本差异、文献依据和考辨过程。当我第一次看到《辽史》修订长编的时候，也为长编的深入和细致深为叹服，长编不但对每一条校勘的文献引用、考证过程有清晰记录，引述今人论文，都一一注明篇名和页码，真正实现了我们提出的一切都可回溯的目标。

最近看参与修订的邱靖嘉、苗润博等几位同学的记叙，回顾《辽史》整个修订过程，前后六年的不懈坚持，对于工作要求和标

准，可以说一以贯之。因为工作需要，为推进度，我曾一再与各个修订组交流，包括浦江也经常交流，我觉得浦江的工作特点，一是细腻，一是冷静，二者又都建立在周密计划的基础之上。浦江一开始就设计好了读书班的方式，自始至终按照规程来做，实践证明，工作推进行之有效。

《辽史》在2013年完成修订初稿，并且在浦江病后化疗过程中开始做统稿定稿工作。2014年7月22日，浦江交来《辽史》全部116卷修订稿（每卷有校勘记和长编两个文件），11月18日交来前言、凡例及参考文献三个文件。可以说，浦江用最后的生命冲刺般地完成了《辽史》修订，没有留下任何棘手的难题。浦江在病中还最后嘱咐：修订组成员中，邱靖嘉从始至终参与修订，对情况最了解，今后有关《辽史》后续事宜，由邱负责。《辽史》修订稿交来后，我们陆续约请了蔡美彪、刘凤翥、王曾瑜、陈智超、宋德金、张帆、吴丽娱、王素等先生外审，其中蔡美彪、刘凤翥二位先生的审稿意见于10月返回，并已转浦江和修订组参酌。浦江在前言、凡例及最后一批稿子交来以后，曾经与我们的责任编辑通电话，特别关心外审专家的后续意见。他最后的电话就是问《辽史》修订的反馈意见，而且希望在春节前要开一次修订组内部会议，安排春节过后化疗平稳期间的最后修改定稿工作。

1月6日浦江去世，我看到同学们的帖子，2013年6月，浦江在《辽史》第一遍修订稿完成后，写给同学们的信，充满热情地讲道：“这是收获丰厚的青春，这是无怨无悔的青春！”让我非常感动，在浦江离世的痛惜中，分享到他和同学们收获的快乐，让我对浦江在病中艰难而冷静地完成定稿，有了更深的理解。

最近一年《辽史》编辑审读加工和修订组完善修改工作，总体顺利。在结束统稿工作之后，浦江把后面的审稿和定稿工作都作了安排，修订组不负嘱托，通力合作，保证了最终的修订质量。按计划我们将在2016年初，也就是浦江离世一周周年纪念的时候，完成《辽史》修订本的编辑出版。关于《辽史》修订本所取得的成果，需要学术界来检验和评价，不是我一个外行所能评说，但我觉得修订本《辽史》作为辽史研究和辽史文献整理的一个标杆，是不用置疑的。

作为“二十四史”修订工程修纂委员，浦江还参与了《金史》、《元史》以及率先出版的《史记》、两《五代史》修订稿的专家审查。这里从2014年3月浦江返回的两《五代史》修订稿外审意见中摘录一条校勘意见，以见一斑。

《旧五代史》卷137 校勘记〔一〕：

习尔之，原作“萨勒札”，注云：“旧作习尔之，今改正。”按此系辑录《旧五代史》时据《辽史索伦国语解》所改，今恢复原文。（点校本第1837页）

浦江意见：

按：“此系辑录《旧五代史》时据《辽史索伦国语解》所改”的说法不妥。其一，索伦语与契丹语无关，《钦定辽史语解》也并非据索伦语改译而成。因高宗认为索伦为契丹苗裔，故编纂《三史国语解》时声称“以索伦语正《辽史》”，辑本《旧五代史》卷首《编定凡例》亦谓“凡纪传中所载辽代人名、

官名，今悉从《辽史索伦语解》改正”云云。今检《钦定辽史语解》共计 1639 条，其中据索伦语改译的词汇仅有 38 条，仅占总数的 2.3%；而根据满洲语和蒙古语改译的词汇倒有 1306 条，占到总数的 80% 以上。故知“以索伦语正《辽史》”之说只是一个幌子而已。其二，当时《三史国语》解收入四库时称《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后来单刻时分别称《钦定辽史语解》、《钦定金史语解》、《钦定元史语解》，所谓《辽史索伦语解》、《辽史索伦国语解》等等都是指《钦定辽史语解》，是四库馆臣的一种不规范的说法。其三，辑本《旧五代史》完成于乾隆四十年，契丹语名的改译工作当时也已基本完成，而《三史国语解》成书进呈已在乾隆四十七年，今天我们看到的本子则是乾隆五十二年以后的修订本。也就是说，各书改译在前，辑录编纂为《三史国语解》在后（虽然有《三史国语解》成书后再回头挖改诸书的情况，但像《旧五代史》这样大量出现契丹语词者不属于这种情况）。此处宜改作“此系辑本《旧五代史》所改”，以下三条同此。

可见浦江的专业积累和认真细致，没有些许浮泛之论。

浦江去世后，我们“二十四史”修订办公室梳理出了《辽史》修订大事记，我也把最近一年多时间浦江给我的邮件看了一遍。浦江最后给我的四封信，都是推荐学生的文章。浦江推荐书稿论文，都是直接寄给编辑部，同时告知我予以关注。其中就包括刚刚印出来的《辽史百官志校正》，可惜浦江已经看不到了。浦江的推荐信，邮件正文会讲清楚这篇文章的主要学术贡献，在附件里必定有两个文件，一是文章本身，一是作者的学术简历，非常



规整。在此我将 2014 年 6 月 18 日浦江给我的邮件与大家分享：

徐俊兄：

我的学生苗润博新近在湖南图书馆发现了《续资治通鉴长编》的四库底本，目前通行的《长编》五百二十卷本皆出自四库阁本系统，民族语译名及违碍文字已遭清人大量删改，而湖南图书馆收藏的这个四库底本，其中译名皆未经改译，违碍文字亦多仍原本之旧，据他判断，此本系自《永乐大典》辑出后的二次修改稿本。此本抄成于乾隆四十三年，修改工作持续至乾隆五十二年，较为完整地反映了《长编》辑佚、整理的过程，是最接近《永乐大典》所收《长编》原貌的版本。

附件即为苗润博有关这一四库底本的研究成果，他已将此文寄给《文史》。相信这一发现将会在宋史学界引起不小轰动，毕竟《长编》是研究宋史最重要的一部史料。另外我还有两个建议：第一，中华书局应设法将此本影印出版，以取代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的浙江书局本；第二，书局应利用此本对点校本《长编》加以全面修订，或以此本为底本，对《长编》进行重新整理，以期最大限度地恢复该书的原貌。

祝好！

浦江 2014 年 6 月 18 日

写这封邮件的时候，浦江刚刚查出癌症两个月，经历了第一期治疗。我注意到同学们的回忆，其中谈到，三天后的 6 月 21 日，浦

江开始做《辽史》统稿，在他给同学的信中留下了当时的身体状况和所思所想，浦江说：“这一周来，晚上睡觉不能平躺，否则通宵咳个不停，完全不能入睡。我坐着睡，下半夜还能睡一小会。白天也没法睡觉，只要躺下就一直咳，只能坐着，所以只要不发烧，脑子清楚，就可以坚持看看东西，也不觉得困，反而觉得不怎么咳了，今天已经在做《辽史》统稿工作。”“告诉你们我为什么不畏惧死亡？……一个人文学者，有一流的作品可以传世，能够培育出一流学者来继承他的事业，还有什么可畏惧的呢？顶多有一点遗憾而已。”在这样的病情状况下，学术事业和学生的学业，是他最欣慰也是最关切的事。

接到浦江邮件后，我们联系了上海师大古籍所戴建国先生——因为《长编》是上师大古籍所整理的，希望对《长编》进行修订。同时我们也联系了湖南省图书馆，现在已经完成这部书的版本复制，会很快影印出版。浦江在这样痛苦的时刻，除了学生论文，还关心这部书应该怎么做，给我们详细的建议，带给我们的感动，无需用更多的话来表达。

追思浦江，是一次心灵的净化，也是一种激励，更重要的是要转化成我们的一份责任，以出版好浦江遗著作为对他最好的纪念。

2015年1月21日刘浦江教授追思会发言

2015年11月18日夜补充整理

（作者系中华书局总经理）

## 史学要向高处走

——深切缅怀刘浦江教授

姜锡东

听说浦江住院，就与单位几位同事商量，打算择日赴京探望慰问。后北京朋友告知，浦江和医生谢绝探视，并说使用进口新药治疗效果尚佳，此事就放下了。现在想来，追悔莫及。噩耗传来，先是诧异，不太相信。核实之后，立刻陷入哀痛之中，久久不能自拔。直到赴北大参加浦江教授追思会、略表哀悼之后，心中的沉痛才稍减一分。至今想起浦江，仍然隐隐作痛，难以释怀。

首先是为失去好友而痛。因邓广铭先生和漆侠先生的缘故，我与浦江兄相识较早，时有来往交流。他的三部论著《辽金史论》、《二十世纪辽金史研究论著目录》和《松漠之间：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出版后，都送给了我。其中，《论著目录》的出版，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是资助方之一。我们中心之所以资助该《论著目录》出版，一方面是相信浦江先生治学严谨、该书肯定是质量过硬之作，另一方面是相信该书广惠学林、利在千秋。按照签订的资助协议，该书出版发行一年之后，我们宋史研究中心将该书电子版发布到中心主办的网页上，以便学界更加广泛而便捷地加以参阅。浦江曾与北大中古中心的一批师生到保定周边进行学术考察，就住在河北大学招待所。那次考察，时值隆冬，冰天雪地，汽车屡坏抛锚，给我留下很深印象。浦江和几位

专家顺便为河大宋史研究中心师生作学术报告，当年情景，历历在目，那真是一段坐而论道、其乐融融的美好时光。我和浦江也有过一些当面、电话交流，或长或短，或公或私，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是直来直去，客观公正，没有一丝不快。约在他住进医院之前的几个月，有一天突然接他电话，很高兴地告诉我：你们河北省在北京召开的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特别奖评审会刚结束，你们中心申报的《辽宋西夏金代通史》通过了，表示祝贺；该书确实不错，在评审会上颇获好评。他对中心邀请全国几十位专家学者集体攻关的作法，格外予以赞赏。这次喜讯之后，我再也没有听到浦江的声音，也永远听不到浦江的声音了。失去了一位好朋友，失去了一位始终友好的老朋友，是人生一大憾事。之所以为浦江逝世而格外悲伤，像是遭受一次重大刺激，还有一个原因：我俩同岁，都是1961年出生，颇有同病相怜之感。有时甚至会想：为什么是浦江先走？

浦江走了，但他的成果不会走，将永远留在学林、嘉惠后人。在中国古代史学界，在辽金史学界，浦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高手。他的学术研究成果和贡献，可分两大类：一是基础类，二是评论类。前者是对史料的搜集和点校整理，他在辽、宋方面用功颇多，对辽代史料的搜集整理，大家有目共睹，在此不必再述。据我所知，他在邓广铭先生指导下，对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的点校整理花费大量心血，已经撰成书稿，可惜因出版社的原因而付诸东流，这是史学界的一大遗憾。他在辽金史论著目录方面用力尤多，迄今为止无人能出其右。浙江大学方建新先生曾说：编写史学研究论著目录这活儿，好汉不愿干，赖汉干不了。这项工作确实细致烦琐，费时费力，成果被广泛、长久使用却不注明

出处。但缺乏耐力和学识的人，难以胜任。我们时常看到，不少论著自称“填补空白”、“前人缺乏研究论述”，但若全面查询就会发现，那个问题前人早已解决。因此，可在方建新先生这两句话后面再补写两句：“谁肯认真干，一定是好汉”。编写研究论著目录，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工作。包括刘浦江先生在内的目录编写者，永远值得读者尊敬、感谢。

如果说基础类研究只要勤奋、博学就可胜任，那么，评论类研究除了勤奋、博学之外还必须具有高识。泛泛而论，发表一得之评，并非难事，中才即可，这样的专家学者比比皆是，随处可见。但是，敢在那些疑难问题、较大问题上发表论断，并且是论之有据、断之如山，则需高手杰才，这样的专家学者非常罕见。我认为，浦江兄的学术研究成果除基础类外，评论类成果多属高端论断，多是在疑难、较大问题上做的确定论断。在浦江兄同龄、同辈人中，在基础类研究成果方面超过浦江也许不难，但在评论类研究成果方面超过浦江则很难。像浦江兄这样既勤奋、博学又具有卓见高识的专家学者，实在太少了，人才难得。但浦江走了，这既是北大中古中心的损失，也是中外史学界的损失，令人痛心。目前，中国史学界中低端成果太多，高端成果太少。我们应该向刘浦江教授学习，努力攀登史学高峰，尽量多出一些高水平论著。自甘平庸、长期在低端徘徊，是浦江所弃。“会当凌绝顶”，是浦江所取。我们怀念浦江，最重要的是记住他的这种精气神。

大家知道，邓广铭先生见多识广，眼界高远，一般学者难入他老人家的法眼，不少著名学者，都受到他的严厉批评。浦江兄是极少数有幸得到邓广铭先生欣赏并招入身边工作的学者，而

那时的浦江只有 27 岁。后来的事实证明，邓广铭先生确实慧眼识珠；把浦江调入北大中古中心工作，不论对邓先生还是浦江、北大，都是英明之举，都是一大幸事。而浦江的迅速成长、一流贡献，除他自身的勤奋博学善思外，显然有邓先生的高明指点。登山要登高山，投师要投名师，这是浦江留给后人的又一启示。浦江英年早逝，令人惋惜，如果假以时日，贡献将是更加巨大而非凡的。浦江英年早逝，也会引发人们的很多深思。

清明节将至。浦江兄，愿您安息。

2015 年 4 月 1 日

（作者系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教授）

## 我所了解的浦江同学

刘一皋

浦江的离世，令人毫无思想准备，噩耗传来，心中一片茫然。学习历史多年，各种各样的回忆纪念文章读过许多，可是，浦江是那样年轻，还有许多人人生空白尚待填补，更有许多新奇留待创造，现在来写回忆文章，心绪难以平静，实在不忍动笔。系内同仁发起编纪念文集，作为同学义不容辞，只能就仓促中写下一二，是为纪念。

我和浦江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79级中国史专业同班同学。那年，来校报到时，我由于地处偏远，办理各种手续又多有延误，到校时晚了几天，已是入学教育末尾，班里正在组建班委，临时班主任徐万民老师见我长的稍许高大强壮一些，便委我做体育委员。我已离开学校多年，也没有什么体育专长，几番推辞未果，答应先过渡试试，没想到干了本科四年，由此也和同学有了较多的接触。

79级作为“新”三届中的最后一届，同学结构较之77级、78级有了较大变化，最突出的就是高中应届生比例大增，年龄结构下降。在同班同学中，个人经历差异较大，如我既下过乡又做过工人，可谓未上大学前先上了“社会大学”，对于社会有了一些了解，但文化基础较差；也有一批似浦江这样的，刚刚高中毕业或高中毕业不久，有良好的书本学习基础，可塑性很强。两部分人

凑在一起，在当时浓厚的学习氛围下，倒也相安无事，平平稳稳很快便度过了大学四年。现在回想起来，四年集体生活尽管也有小的磕绊，正面的相互促进则是主流，至少我时常感觉压力巨大，有许多东西需要补课，需要从同学身上学习他们的长处，其中就包括浦江。

当时的北大学生，相当部分是每天背着碗袋，在教室、图书馆、宿舍之间行走，各忙各的。不过，相对而言，集体活动较多。当时，学校中并无多少社团，所谓集体活动，多是系内以班级为单位的各种活动。每周六下午不排课，供政治学习之用，时常会开全系学生大会，还要分区就座，检查到会人数，评比会场纪律。集体活动中最多的，当属体育，有校、系、班各级比赛，参加者踊跃。遗憾的是，浦江不喜运动，尤其是热闹的集体项目，有时差不多是班级全体男生倾巢出动的比赛，他也不大参加，即使参加也多是在场边助阵。当年，体育与政治紧密相连，因国家男排的一场比赛胜利，北大学生喊出了“振兴中华”的时代强音，又以我们所住的38楼最活跃。国家男排的北大之行，引起了校园一场不大不小的骚动，班内有同学激奋异常，浦江的表现却很淡定。可能也是此种原因，使我们在同学时期少了一些直接交往的机会。对于班级事务，他也不大发表意见，尤其是在人数较多的场合，总是默默地听着。这种情况，即使是在毕业后多年，每当同学聚会，他都热情联络、参加，但又总是十分低调，多数时间静静地坐着。故此，我一直认为，浦江是一个身体文弱、性情喜静的内秀之人。

然而，浦江也有咄咄逼人的时候。当时，同学中专业学习氛围浓厚，绝大多数同学都是以第一志愿录取，并未受到后来“史学危机”的影响，所以，饭后、睡前宿舍中的闲聊，往往会牵涉专



业学习中的问题。遇有浦江感兴趣的问题，他都会积极参加，而且时常会将讨论推向热烈。诚然，此类讨论往往只是一个话题，或是上课、读书时的灵机一动，可浦江的参与态度十分认真，辩到兴起之处，语速快而嗓音尖，往往波及隔壁宿舍及楼道内，听起来声音有些稚嫩，但却言辞滔滔。更可贵的是，面红耳赤之后，浦江会继续查找资料，寻求解释的合理性。待再度聊起这个问题时，无论材料是否充实，观点是否服人，他的认真探求态度，着实令我等折服，大有川人锲而不舍的韧劲。

本科毕业后，浦江分配到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工作，不长时间便恋爱、结婚。党校的教学工作，对于浦江的历史专业研究挑战并不大，他能够全身心地投入自己喜爱的专业研究中去，个人生活的稳定感，也许更为重要。在党校工作的几年里，奠定了浦江不长的学术生涯的基础。首先，他确定了从事专业学术研究的志向，并为之投入全部心血。其次，他找准了自己有兴趣的研究领域，并努力创造条件实现目标。第三，他从史学研究的基本功入手，借以不断完善对于史料的收集、阅读和解释的水平。几次去党校同学聚会，言谈中都显露出他的成熟。功夫不负苦心人，浦江的研究成果，得到学术界的好评，他并得以调回历史学系，我们又再次成为同事。

虽然作为同学加同事，由于研究领域不同，专业问题的交流并不多，现在看来确是一件憾事。在我的印象中，浦江对于学术研究之投入，在两个方面可谓深刻：

一是他的执著，坚持走自己的学术之路。在重返北大前后，社会上已刮起一阵猛烈的学位热，无论社会风气，还是评价标准，均追求高学位，甚至有时成为不可不攀的硬性指标，不但高

等院校、科研机构在岗人员争相提高学位，就连政界、商界人士也以博得高学位为荣耀。浦江却不为所动，认真坚守自己的工作岗位，相信凭借大学学习的基础，工作期间的积累，加之良好的学习、科研环境，通过自身的不懈努力，也可以完成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没有理由中断自己的研究计划和节奏。浦江算是幸运的，他的执著得到了回报，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也得到了学术界及官方评价体系的认可。

一是他的刻苦，三十多年不懈地勤奋工作，并不断地开辟新的研究领域，提出更高的要求。自大学毕业之后，他就始终保持着高强度的工作节奏。在孩子尚小时，为了在繁重的家务之余挤出更多的读书时间，他通常是在孩子熟睡后开始工作，由此形成了熬夜的工作习惯。在担任系副主任期间，需要处理各种日常琐碎事务，在教育规范化管理的要求下，检查、评比、填表、申报等活动大量增加，势必消耗体力和精力，他的学术研究工作也就只能更多地放在夜间进行。刻苦、勤奋有了研究上的收获，当然，有所得就有所失，长时间的高强度工作，无疑对他的身体也造成了损害。

作为一个历史研究工作者，勤奋只是出成果的条件之一，更为重要的还是对历史发展脉络的把握，也就是所谓“史识”。浦江是很敏感的，能够始终站在史学研究的前沿。说实话，我对浦江的研究了解并不多。2014年4月间，由信箱中获得浦江赠阅的一篇论文，就是发表在《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2期上的《太平天国史观的历史语境解构——兼论国民党与洪杨、曾胡之间的复杂纠葛》一文，拿到后看到文章标题和期刊刊名，心中有些疑惑，不解浦江如何有兴趣向中国近代史领域转移。仔细拜读

过文章，才体会到浦江用心之深。历史解释与现实政治紧密相连，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改革开放后，古代史相较于近现代史，似乎取得了更大的学术独立空间，记得在研究生入学考试时，导师还问了一个在政治意识形态严重影响的情况下，是否有决心学习近现代史的问题，古代史可能根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尽管如此，现实社会发展提出的历史研究新课题，研究中所涉及的大量词汇、概念、方法，都是近现代的，其中许多在近现代历史的不同时期曾经有着不同的解释，浦江关注的“革命”、“民族”、“民族主义”等即是如此。显然，简单地搬用部分时髦词汇、概念去拓展古代史的研究，或是在传统典籍中寻找部分言辞加以附会充作现实社会发展的本土资源，都只是停留在表层上不能解决问题，更容易造成误读和曲解。所谓语境解构在近现代史研究中并非新问题，浦江的文章，不但揭示了语境变化的复杂性，更重要的是在进行一种贯通式研究的尝试。

在学科细化、专业壁垒加深的今天，学术研究在不断深入，可学贯中西、文通古今的理想却渐形远去，使得许多结论有隔靴搔痒的勉强之感。浦江的尝试，展现了他对史学发展见识之深刻，视野之广阔，以及大气魄的研究格局。然而，还未来得及有当面交换意见的机会，便听到了浦江因病住院的消息，在他患病期间，通过几次电话，言语中可以感觉他的精神状态良好，对于治疗充满着自信。虽然天不遂人愿，可同学加同事的友情依然令人怀念，他的执著、勤奋将激励我等做好本职工作，而他对史学的真知灼见，也将会成为公共的知识财富留存下去。

（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 刘浦江同志告别仪式上的发言

程 秩

今天，我们在这里与浦江同学做最后的告别，寄托我们无限的哀思。一个历经艰辛而奋发有为的生命，一个热爱生活而背负众多希望的生命，一个正值盛年而灿烂的生命，转眼间便与我们阴阳相隔。我们倍感悲痛欲绝、撕心裂肺！

浦江同志，是一个秉性耿直、至情至性的七尺男儿，是我亲密无间的同窗、和蔼可亲的兄长，是我们垫江恢复高考后，第一个从母校垫江一中考入北京大学的状元，是我们同学的榜样、是垫江学子的楷模！他是一个很有思想、卓有建树的历史专家，是一个正义凛然、作风正派的优秀共产党员。就是这样一个叫人难以忘怀的人，在人生最灿烂的时候却遽然离去了。离开了他白发苍苍的老母亲，离开了他深爱的妻子和女儿，离开了他关爱多年的亲朋好友，离开了他热爱的父老乡亲，我们深表悲痛和惋惜。他的离去，使学界失去了一位不可多得的英杰。他不愧为同学们最敬爱的老师，他不愧为真正学者的表率！

浦江仁兄的人生虽然很短暂，但他给予组织的是信任，给予家乡的是骄傲，给予父母姐妹的是自豪，给予妻子女儿的是情意，给予朋友的是质朴，给予学生的是敬重。他短暂的人生旅途，完美地诠释出什么叫孝顺，什么叫信义，什么叫智慧，什么叫信仰，什么叫贡献！

此时此刻，最深切的悼念是我们最自然的表达。感谢你，浦江仁兄，我们的好同学，是你带给我们与你相处时的欢乐；怀念你，浦江仁兄，我们的好朋友，是你带给我们与你相逢时的欣慰。你匆忙地走了，留下了怀念，留下了眷顾，留下了追忆，也留下了我们。高风亮节传梓里，美德风范昭后人。浦江仁兄和我们永别了。你的英名、你的业绩、你的思想、你的风范将永载史册，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

浦江仁兄友，你安心吧，天堂路上，愿你一路走好！

2015年1月8日

（作者系刘浦江高中同学，现任垫江县教委主任）

## 怀念浦江师兄

李志生

浦江师兄看似严肃，但实是心直心热，这就是他留给我的印象。

1月7日，浦江师兄走了，走得很突然。在他走的前一个星期，刚问了班上的助教，助教说“刘老师应该还不错，下学期的课都排了”。噢，心里踏实了，并将此消息转告了浦江师兄的同窗好友李鸿宾夫妇。不料，几天后，浦江师兄离世的消息传来，甚感意外。

浦江师兄的学术成就有目共睹，无需多言，我只想说与浦江师兄交往的几件事情。

浦江师兄做过历史系的副主任，且兢兢业业、严谨认真、心思细腻，这也是有目共睹的。在浦江师兄的任上，我曾就申请学校的教材基金，与浦江师兄通电话，他表示大力支持，虽然最后在学校讨论基金时，他因事不能参加，但他特别委托张帆老师出席会议，代为争取。最后在他和张帆老师的努力下，基金获批。对此，我一直心存感念，并在《中国古代妇女史研究入门》一书的后记中，对他们二人表达了谢意。由此，我一直称浦江师兄为我学术道路上的“贵人”。

另外一件事，则说明了浦江师兄的心思细腻。2006—2008年，北大历史系和美国 Skidmore 学院协作，由历史系的老师为

对方开设英文课程，对方学校的学生在历史系修习学分，并最后记入其本校的总学分。2007—2008年，我和赵冬梅老师都参加了这一项目，分别开设了课程。浦江学兄在繁忙的研究、教学和管理的同时，依然惦记着我们这种“非主流”课程，并在北大年度教学成果奖的申报中，将我们两人的教学合并，以“中国历史文化的双语教学实践”之名，申请奖项，最终我们获得了“2008年度北京大学教学成果奖校级一等奖”。这个奖真是一个意外的奖励，也是浦江学兄关照、提携后学的一个表现，对此，我也同样一直深存感念。

在浦江学兄的最后生涯里，我与他在教学上也有了些许交集，那就是他和我同开的“中国史学史”一课。此课开课的传统是两人轮流上课，一人一年。浦江学兄接手“中国史学史”一课的时间不长，记得他在开始上这门课前，专门到我的课上来听课，但事先并未与我打招呼，突然而来，并且坐在第一排认真地听，说实话，当时我倍感紧张，因为浦江学兄对学术的严格、认真颇为出名的，好在我讲授此课已20余年，基本的内容几可背诵。当“艰难”地捱到下课铃响，浦江学兄和我聊了几句离开后，我真感如释重负。浦江学兄对待学术和教学的认真态度，从这件事上，也得以体现。

浦江学兄罹疾的消息，最初也是因“中国史学史”一课而知。在学期中排课时，教研室主任张帆老师致电于我，说希望我能在下学期开此课（依照惯例，此年应由浦江学兄开课），因为浦江学兄病了，当时心里咯噔一下，并提出到医院看望浦江学兄，张帆老师回复说浦江学兄不希望别人打扰，想安静养病，其后，又再提过几次看望浦江学兄，但依然是同样的理由。作为前后届的同

学和同事，我深知浦江学兄的为人，不重表面文章，做人、做事实实在在，所以，既然他说了不让探望，那一定有他的想法，我必须尊重他的想法，直到他离世，也未能最后见到他，说遗憾，也没有遗憾，这就是浦江学兄的风格！

浦江学兄，虽然在生前不能到医院探望你，虽然未能在你最后远行时送你……但你点点滴滴的“好”，将深留在我的心里，永远铭记。也愿浦江学兄在天堂安好！

2015年2月

（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 一位真诚而负责任的学者

——在刘浦江教授追思会上的发言

苗书梅

我和刘浦江教授见面较少，应该不超过五次。但是，他给我留下的印象却非常深刻，就是邓小南老师的那个评价：“质犹近古、纯正笃实”。他是一位认真而负责任的纯粹的学者。

我们两个谈话时间最长的一次应该是2006年夏季在日本长野的日本宋史年会期间。当时，我在日本做访问学者，会议主办者邀请浦江教授作主题报告，会后，我们在一起聊天，他给我介绍了国内辽史、金史研究的最新进展，契丹大小字等罕见材料的存世、出土和释读情况。

通过谈话，我有两点印象至今仍很深刻，一是有真诚的纯净的心境，对外人了解甚少的辽金史的学术动态了如指掌，且非常享受自己的学术研究。二是他积极负责的工作态度。当时他说，如果他不担任历史系副主任，他准备就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史做更宽范围的系统研究（如他发表的正统论、德运说等政治文化的系列成果），但是担任了历史系的副主任后，行政工作可能会占用很多时间，他可能就没有太多精力做这些大课题的深入系统研究，只能就辽金史原有的课题继续做。这反映出他对学术的敬重，对系里行政管理工作的热情和认真负责态度，没有任何推托应付。

作为专业教师,浦江教授是优秀的,他的辽金史、文献学研究,他以传统政治文化史为切入点贯通南北朝直到近代的学术气派,都取得了公认的突破性贡献;他给历史系、中文系授课的良好效果也得到了不同学科学生的好评。

担任历史系副主任期间,浦江教授也很负责任,他愿意牺牲自己的时间,为行政管理工作投入大量精力。从北大老师们的纪念文章来看,他为历史系的教学规范、学科建设、研究生招生等各项工作付出了大量心血。关于教学工作他投入了大量时间潜心研究,并不断提出改革建议。这反映出他的使命感、责任心和勇于担当的精神。

浦江教授曾经担心他兼任行政工作会耽误学术研究。但是,从兼任历史系副主任那几年他发表的20余篇分量很重的文章看,他很勤奋,他在做好行政工作之外,还不断推出新的科研成果。尤其是在患病以后,他还继续发表论文,听研究生们讲,他去世前的下半年还坚持指导了4个学生的6篇论文,真正的是用生命在研究,用生命在作育英才,培养学术继承人。他做的这些事情是常人难以做到的。

浦江教授是认真负责的好老师!他已经培养了很好的学术后继者,并得到了学生们的一致好评!

他是旷世不遇的好学生!他撰写十多篇文章怀念恩师邓广铭先生即是最好的写照!他是细心负责的教学管理者,是工作中的好搭档!

他是好同事好朋友!网上有邓小南、阎步克、荣新江、辛德勇等同事的深切怀念文章,都很感人。

他是为辽金史、民族史、传统政治文化史研究等学术活动献

出生命的卓越学者！

他永远是激励我的榜样。我会永远怀念他！

2015年1月21日

（作者系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 中元之夜说浦江

罗 新

“最悲伤的泪水洒在英年早逝者的坟头，他还有很多话没有说，还有很多事没有做。”斯托夫人(Harriet Beecher Stowe)这句话最适合用在浦江身上。今年1月6日我在普林斯顿收到几个老师几乎同时发来的短信，知道浦江已在垫江去世，到办公室枯坐一天，什么都做不下去，只在微博上发了一条：“失去他，是北大中古史中心三十年来最大的损失。浦江走好，天国也有读书处。”那以后每逢有人让我写点什么，我都推辞了，即使不得已而答应下来的，也迟迟无法动笔。刚刚承受了田余庆先生的远去，再经历同辈人的长别，回忆和纪念无疑是一种我竭力想要回避的折磨。

最后见到浦江，是元旦前他得知病情恶化动身回垫江老家的前一天，我跟着邓小南和荣新江等去肿瘤医院，隔着监护室的大玻璃窗用对讲机说话，那真是一种无法描述的诀别。但见浦江说对自己的人生很满意，唯一托付的事情只和学生相关，我又感到莫大的震动。我不知道自己若是躺在那张病床上，面对前来告别的多年同事，能不能做到如此平静、如此从容。从医院回家，凌晨两三点因时差醒来，我从书架上找到浦江的《松漠之间》，读了其中的《春水秋山》和《再论阻卜与鞑靼》。浦江的文字和他说话有点像，简明平易，节奏飞快，读的时候就想象他正在

会议上宣讲自己的论文。

其实《再论阻卜与靺鞨》我是很熟悉的，这正是他2004年10月间提交给由刚成立的民族史教研室主办的一个小会的论文，此前他的论文我只认真读过有关辽代横帐的那一篇。我和浦江熟起来也是从那时开始。这之前虽然做了近十年的同事，却没怎么闲聊过，甚至也没有谈过彼此的研究，只有一次他提起我在《中国史研究》上那篇讨论十六国历运的小文，表示不大同意，但也没有多说。我对他的印象，是比较书生气。我读过他在《读书》上那篇《正视陈寅恪》，没有太多共鸣。最早的印象则是我刚留校时，参加年末的青年教师座谈会，听过浦江的发言。记得那次他火气不小地批评学位制度，强调学位不等于学问——当然批评的对象很明显是当时的提职和评价体系。此外我对他似乎就没有什么印象。听几位同事说他的学术特点是文献底子特别好，我想他既然很受邓广铭先生器重，那必是有某方面的过人之处。

对浦江的学术开始了解得多一点，是我把学习重点确定在民族史之后。因为本科不是学历史的，我的专业知识有很多缺陷，对契丹女真史就是略知皮毛。有一次系里开会，我恰好和浦江坐在一起，聊起某个跟契丹史料有关的问题，我引陈述的说法，他嘲笑了我。那以后我才开始读他的论文，一读之下，惭愧我对辽金史的进展全无所知，也惊叹浦江不止在文献方面出类拔萃，分析和阐释能力亦不同凡响。那以后我有机会就会和他聊几句辽金史，我注意到，虽然他常常一开口多作惊人之语，但接下来他会平心静气、条分缕析，见解常常很通达。

2004年，在锐意改革的系主任牛大勇的支持下，我们几个

偏重古代民族问题的断代史教师考虑成立民族史教研室，主要人员是王小甫、刘浦江、张帆、党宝海，再加上我。我不记得是我还是浦江先提出这个想法的，但推动教研室成立则主要靠他。他在系领导主持的一次座谈会上，如数家珍般分析全国各高校的民族史教学、科研和人员现状，听的人无不赞叹他竟然掌握这么多信息。那时他已经下了很大功夫学习契丹文，我在学习突厥文，张帆、党宝海也开始重视蒙古文和波斯文，加上王小甫长期以来本就重视民族语文，所以我们这几个人确有一点志同道合的意味。浦江不仅重视语文和文献，而且还很注意理论，特别是重视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很多研究。他关于契丹父子连名制的两篇文章，可说是他多方面学术优长的集中体现。几年前他忽然夜里来电话，和我谈契丹的人牲人殉问题，谈了个把小时，其中涉及语文学分析和人类学数据，范围很大，材料丰富，显示他的研究方法可能正在转型。

这几年大家都称赞浦江出众的行政能力，希望他出任系主任，谁知“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殒”，令人嗟伤。2006年浦江初任系副主任时，说过愿意做出牺牲的话，我感觉他比我境界高。时下很多人以为担任行政领导就是做官，做官还有什么境界？殊不知官与官差别可大了，浦江做官，你会感觉他真是一个服务员，有这种领导，绝对是一个单位的大幸。不过从学术发展上来说，我觉得浦江更应该集中精力做研究，把自己的优长发挥到极致，那样必定可以大大有助于提升我们的辽金史和民族史的整体水准。

浦江去世后，我读了能找到的几乎所有悼念文章，发现涉及私人情感的文字很少。这也许是浦江的另一个特点。我自问算

不得浦江的朋友，我们之间的谈话从未及于彼此家庭，一直到最后诀别时，我才知道他的夫人原来是中文系高我一届的同专业同学。他到了最后，仍是一言不及于私。但是，那么多人对他的去世所表达的悲痛却说明，私交之外仍然可以有真挚而深切的情感。这又是令人羡慕的。

今天是七月半，一个特别的月圆之夜。纳兰词有句，“莫对月明思往事”，何况在今夜。正如杜甫的诗句：“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如果真有另一个世界，大概浦江还是在读书写作，还是穿着他那件淡蓝色的休闲西装。也许在医院告别时浦江自己的总结很有道理，既然能够自由地读书，无论生死，都还是幸运的。

2015年8月28日午夜于北京五道口

（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 永远年轻的浦江兄

游彪

2015年1月21日下午，参加过浦江兄的追思会，回来之后想来想去，得写点怀念他的文字。其实，从浦江兄刚一查出病来，当晚他的学生陈晓伟同学就给我打了电话，当时正和几个朋友聊天，接过电话后，我半天没说话。想了好一阵会儿，他居然查出患了癌症，我无论如何都不信。医学科学证明，即便是得癌症，也应该是我这种又抽烟又喝酒的人患病的几率高得多，咋可能是浦江兄这样生活习惯如此好的人呢？我当时沉默了好一会儿，心情顿时低落下来，便与在场的几个朋友谈了自己的所思所想，真有种莫名的人生无常的感伤。次日，我给浦江兄打电话，本以为他在医院，我准备去看看他。他告知我不在医院，且坚决不要我去看他了。加之从内心来说，我希望他能治愈病魔，晚一天去见见老友也未尝不可。其后多日，还是放心不下，更想了解了解他的病情，于是再次电话联系。浦江兄在电话中说话非常平静，说是在化疗，我又一次提出要去探望他。他跟我说，我在无菌区，去了恐怕也是不让进去的，并一再说不用来了。此后看望浦江兄的事情只好作罢了。现在想来后悔无尽啊。1月6日晚，浦江兄的高足陈晓伟同学再次来电，说浦江兄已经在垫江遽然仙逝。我当即决定要飞过去送老友最后一程。但陈晓伟说刘老师家属正在办理丧事，人多事杂，他劝我就不要再去重庆了，



等回北京以后再说。潸然之后，还得接受如此残酷的现实，我的老友浦江兄居然就这样驾鹤西去了，且我最终未能见他一面，惜哉痛哉！

说起来，我与浦江兄相识已经将近二十年了。跟他第一次见面，交谈之中知道他是重庆垫江人，于是攀起了乡党关系，恰好我的一个大学同班同学来自此县，出乎意料，在北京又遇到一位垫江人，真是件幸运之事。浦江兄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年轻，尽管他比我大几岁，但却是一张“川军”中时而可见的娃娃脸。我过去多次与浦江兄开玩笑说，你这张脸太嫩了，他总是回击道，我比你大多了，你还说呢。其实，每次他都是笑着跟我斗嘴。我也自嘲道，浦江兄，咱们俩到街上去转一圈，一问路人便知，看是我这张老脸岁数大，还是你岁数大。可以说，从我见浦江兄第一面到交往近二十年，浦江看上去几乎没有啥变化，永远是娃娃脸形象，显得格外年轻，这是让我羡慕不已的。直到前年即2013年，北师大的博士生答辩，我们请浦江兄和另外几位先生来师大把关，浦江兄来得很早。我还曾经说他，你这家伙还是这么年轻。浦江兄用他那招牌般的笑容冲我笑笑，这是浦江兄与我之间最后一次晤面，不曾料想竟然成了永诀。浦江兄的笑容也因此而永远定格在了本人的记忆之中，永远无法抹去，更会永久灿烂下去。

于我而言，浦江兄是真正意义上的君子，而自己则是再普通不过的凡人。姑且不谈其睿智而深邃的学术造诣。记得我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工作以后，偶尔会因会议、学术讲座等前去北大中古中心，当时浦江兄不到四十岁，意气风发，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自己擅长的专业领域。然而，他的日子并不好过，毕竟他是

少之又少的北大本科毕业生留在北京大学这样的高等学府任教，其处境是不言而喻的。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官儿大学问大，学历高学问大，等等，这些都是十分流行且被社会广泛接受的社会观念。那时见到浦江兄，他似乎永远只有那几件普普通通的夹克衫，多数时候都穿得极为朴素。事实上，浦江兄在学习和生活上的难处，我是道听途说过一些，但更多的是通过我个人与他的交往。据我个人的观察和了解，浦江兄的日子是最近若干年才逐渐好了一些。由于前些年，整个国家大学教师的收入就不多，加之浦江兄职称评得晚，且上有老下有小。他的日常生活是可想而知的，在我看来，浦江兄就是一个物质方面的穷人。有一件事情让我至今难以忘怀，2003年早春，北师大一个博士生要到中央党校工作，浦江兄的夫人张文女士被派来作外调。而我担任那一届博士、硕士的班主任，于是系里让我去说明情况。我在中国古代史教研室见到了张文女士，坐定之后，开始都很客气，甚至是拘谨，后来张文女士问我认识不认识刘浦江，她说是她的爱人。从浦江兄夫人朴素穿着打扮来看，我几乎可以肯定，他们的生活过得十分清寒。天道不公啊，浦江兄，您安贫乐道地走完短暂而又充实的一生，得非君子乎？

浦江兄的君子之质更在于其人格魅力。他之为人有如其语言风格，又快又真。浦江兄说话，铿锵有力，从不拖泥带水，同时又朗朗清脆，只是有时显得有些女性之音。坦率地说，浦江兄的人格便是如此，他说话率性而真诚，为人处事亦本于此。浦江兄不同凡响之处在于，他不会为了追求名利而损害他人，更不会不择手段地贪图一己私欲，这种现象在中国社会是相当普遍的。浦江不属于这一类小人，他是脱离了低级趣味的君子。余与浦

江兄相识相知很长时间了，真正见面的机会实际上并不是很多。多数时候相互之间的联系都是通电话讨论学术议题。我有不懂的辽金史问题时总会向他请教，他亦如此。当然也会因为私事而通话，记得我的日本老师近藤一成先生请他到日本早稻田大学去讲学。那时浦江还很少有机会到国外，于是他询问我要注意些啥，我告诉浦江兄，不用太担心，日本方面有人接待，应该不会有问题。我一直记着此事，倒不是因为其他的，令我感慨的是，平日率性的浦江兄竟然心细如斯，非常讲究礼节。还有一次，大概是前年，他打来电话，谈话中间，我问他在忙啥，他说在整理辽金史。其问他问他的项目是不是由我写的评议意见。我当时揶揄他说，你这家伙太抠门儿了，居然不请客。浦江兄嘿嘿一笑说有机会吧。浦江兄，您就是这么一个人，精于学术，不会投机钻营。愚本凡人，得遇亮节高风之士，何其幸哉。

浦江兄原本不善言辞，尤其是见了不太熟悉的人，他几乎是无话可说。但一旦你跟他有了交往，他就会打开话匣子，滔滔不绝地纵横古今中外，其思路之敏捷可谓罕有人能及。应该说，与浦江兄之间聊天是一种享受，更能感触到他那种常人很难具有的傲气。对那些他看不惯人和事，浦江兄会言辞犀利甚至是刻薄地加以挞伐，有好几次在谈到某些事情时，他非常气愤，话说得极其难听。当时我只好开玩笑的方式加以开导。说实话，本人是在学术上没有追求的大学老师，面对纷乱复杂的学界，我早已淡然。而浦江兄却是对学术精益求精的，也敢作敢为，敢想敢说。这种品质在当今学界是很罕见的，也是浦江兄一生令人敬畏之处。

浦江兄之文章，自可由今人或后人见仁见智。念兹在兹，惟

其品相。权为牺牲,敬奉灵前。且为铭曰:垫江名士高八斗,馈遗来者富五车。乐道安贫五四载,傲骨君子为士首。

2015年1月30日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 痛悼刘教授浦江兄鹤归

漆永祥

晨起闻刘教授浦江兄鹤归，英年凋落，惨怛至极！刘兄在中文系往届生中，为最受欢迎之历史系教师，其“中国古代史”课堂畅言“中文系学生没有学问，文献专业还说得过去”，激励无数学子，知耻向学，多有所成。

余与兄共事多年，为人治学，视如楷模。其卸职之日，欣欣然言自此可静心读史治学，以原初志。言在耳际，而斯人已矣。痛不能胜，因匆草一章，以舒悲怀，韵律工切，皆不在念念也。

燕园何寥落，凄风发悲鸣。  
昨悼田夫子，今失浦江兄。  
声似洪钟亮，手如吴钩擎。  
双目自圆鼓，面容透初樱。  
发覆辽金代，寄托松漠情。  
谨严能独断，博涉兼专精。  
多年相共事，携我八方行。  
时出惊人语，持义揭不平。  
最爱激扬课，赫赫有令名。  
中文无学问，文献略峥嵘。

高言勛多士，砚田苦耕耘。  
刘氏古代史，从兹成绝声！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 从此花开不见君

——刘浦江教授追思

朱玉麒

2010年9月，我调来北大中古史中心工作，办公室被安排在了朗润园西所的前院西厢，与浦江老师相邻。这个时期，他接受了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工程中《辽史》的修订工作，每周六的一个整天，都在中心计算机房与参加项目的学生一起做汇校。所以，长达三四年的时间里，在我的窗前，曾经反复定格过这样的一道风景：周末的午后，穿着蓝灰色西装的浦江老师提着条毛巾从办公室匆匆走到对角线方向的盥洗间里，用凉水抹了把脸，又匆匆返回到他《辽史》校勘的工作间里。

因此，2015年1月7日上午10点57分，当我突然收到凤凰出版社发来短信唁电，要我转达给历史系刘浦江治丧小组时，顿时茫然不知所措。我快步走到荣新江老师的办公室，确认了这个消息已经是无法撤消的事实：浦江老师已经于1月6日23点57分逝世。我在办公室里呆呆地坐了很久，看着窗外，想到浦江老师在中心院落里的身影就这样一去不返，忽然间悲从中来，失声痛哭。我自问与浦江老师并非深交，但一定是这几年的近距离接触，点滴积累，使我无法承受失去他这么一位谊兼师友和同事。

十四年前的2001年，中古史中心的办公场地刚刚搬迁到朗

润园西所的两进院落中，我在这里从事博士后研究。正是在这里，我第一次与浦江老师打了照面，向他问好。他也止住脚步，问我：“你现在做什么研究？我记得你写过《登科记考》的文章，现在还做不做这个题目？”他提到的是我在1994年发表于《文献》的《〈登科记考〉补遗订正》一文。我告诉他现在转到研究《登科记考》的作者徐松及其《西域水道记》的方面，而转过身来，心里却吃惊不小。在此之前，我曾与北大历史系的研究生们有密切的交往，从他们的月旦评论中，知道刘浦江教授年纪轻轻，已经是辽金史研究的翘楚。我很惭愧，自己从来没有看过他的论著；而他却能够记住并非其专业领域的我的名字和文章，让我对他的阅读面和学术记忆力佩服异常。

与浦江老师熟悉起来，如前所说，是从五年前调回北大之后。除了日常不定期的照面，听他语速快捷、倾倒四座的学术言谈之外，我们总会在周六的朗润园工作间隙见面。有时没有见到，下个周末相遇，就会问一句：“上个礼拜出差了？”这种寒暄，其实也三言两语，一两分钟，又各自忙自己的事去了。厉樊榭的联句：“相见亦无事，不来忽忆君。”说的就是这种感受。在中心，同事之间似乎是那样的一个共同体；我们习惯了各自忙碌的工作“生态”，但彼此恒常不变的一些互相见面方式，让我们感到安心。

2013年12月1日，我应邀前往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访问。行前一天，到办公室处理案头事务。正好是星期六，因此向正在工作的浦江老师辞行。他问：“去几天？”我说：“半年。”他皱皱眉头说：“去这么久？”我微微有些愕然，也许他也习惯了我们经常见面的工作方式？但我想，半年其实也快，不久我们又会



回到朗润园见面的生活常态中。还不到半年，荣新江老师来京都，告知浦江老师不幸罹患癌症的消息。这时我才觉得，离开中心的半年，确实太漫长了。

2014年6月回国，中心的院子里不再见到浦江老师的身影，但听说他积极配合治疗，因此有康复的消息不断传来，让我感到欣喜。7月12日，随邓小南、荣新江两位老师到医院探望在那里做第三次化疗的浦江老师。他仍然健谈，对于治疗中的反复与受难似乎并不介意，只说现在的治疗是最利于恢复的方案，使我觉得克服病魔，关键在于健康的心理。确实，9月27日的星期六，我又在朗润园的院子里见到了来参加《辽史》统稿的浦江老师。不过这一次，却是我与他的最后一面。此后，他又陷入到与癌症最后的抗争中，直到年底放弃治疗，在家乡垫江走向生命的终点。

已经有不少的同事，回忆到与浦江老师的交往，是纯粹的学术关系，我也深有同感。我们的办公室在西厢的同一条走廊上，但很少串门。我记得他只有三次到我的办公室来。一次是在他开设《四库全书总目》研读的课程、研究天津图书馆藏《四库全书总目》残稿的时候。就津图总目中崔子方《春秋经解》、《春秋本例》、《春秋例要》三书提要的馆臣眉端批语，他抱着书屈驾前来，与我讨论其中互相扞格的句子。事实上他对这些问题已经讨求甚详，我对这些句子的理解与他原来的想法基本相同，觉得那些不解，是馆臣下笔前后的矛盾所致。他虽有所释然，但在隔了很久正式行文的时候，又第二次来到我的办公室，抱着同一册书，翻到同样的一页，再次与我探求这些文字的含义。古人稿本有互相舛误的地方，并非孤例；对于关键内容的解释违背常例时，

不得确解而难以心安，又是每个真正的读书人共同的心态，而浦江老师显得尤其谨慎。他认真学问与尊重古人的精神，从这两次的枉顾下问中，可见一斑。他的《关于天津图书馆藏〈四库全书总目〉残稿的若干问题》一文，后来发表在《文史》2014年第4辑中。其中提及我的名字，是他觉得耽误了我的时间而礼貌的表示，我对此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贡献。浦江老师以辽金史的研究饮誉学界，学识而外，其实与他在文献学方面的精研独诣也有莫大的关系。

浦江老师第三次到我的办公室，是去年9月27日他最后一次来朗润园的时候。在工作开始之前，他特地跑到我的办公室来寒暄，告诉我现在《辽史》校勘定稿，他过来听听同学们的意见，自己不会多发言，而且不会再像平时那样坚持到下午。我感念他的好意，心里知道，他来找我说话，是为了答谢我到医院看望他的情谊；他是一个个性倔强的人，从来不需要来自别人的额外帮助。现在想起来，他的从容，哪像是一次诀别的谈话！“英雄生死路，却似壮游时。”浦江老师对待生死的淡定，成为朗润园里他留给我的最后记忆。

我在日本的时候，还曾经因为一位研究生入学的事，给他写过信。这个学生在从本科保研之后，英语学年考试出现失误，可能会影响到他的入学复试。系招生办公室的老师建议我与浦江老师协调一下，推迟上交复试材料，而等待学生重新选修补考之后的新成绩。浦江老师负责古代史研究生招生工作，他的严格在系内系外是出了名的，因此我也只是抱着试一试的方式，给他写信。但是很快，他在当天下午即回信来说：“玉麒：大四学习成绩的复审由各院系进行，上报复审结果不是一个必须的程序，有

问题才上报。因考虑到该生已经通过国家英语四六级考试(这是我系保研的一个门槛),说明他的英语水平本身并没有问题。我跟系里商量过了,此事应该不会影响他的录取。但请转告他:本学期重修英语务必要通过,不要给以后带来什么麻烦(虽然学期末出成绩已在录取之后,但要消除隐患)……祝好!浦江。”看了这个回信,我佩服他处理事务的迅捷利索,更感动于他的宽宏大量,有原则,也有包容,给了这个学生求学之路的重要机会。

朗润园西所的工作环境,总让我感到是今生莫大的幸运。开始觉得是幽静的院落、四时的花木给了我如此舒适的心情,但有一天忽然悟到:关键是同道间的比肩共事、无声关怀,让我的学问研求之路充满温馨。我曾口占小诗,叹此遇合。1月7日听闻浦江老师的噩耗后,我把它写在了我的记事本中:

#### 朗润园读书记

余到中心,研究室在前院西庑,右首为唐史家王小甫、荣新江(隔年荣师移后院东厢,则陆扬迁入),左首则宋史家邓小南、辽金史家刘浦江。一日晚樱飘落,憬悟伺坐大家之侧,得无好学为福之天堂?因有口占。今兹记录,以吊浦江教授。

西厢最见史家才,  
唐宋辽金一字排。  
左右逢源谁似我,  
心花到此逐书开。

浦江老师有一张他自己非常满意的照片,是在朗润园的辛

夷花前留下的。今年春夏院子里的鲜花再度次第开放时，我对浦江老师的追思不尽，再赋一绝：

吊浦江教授

警欵连珠江复海，  
松荫朗润幸相邻。  
辽东鹤去金瓯缺，  
从此花开不见君。

浦江教授辞世的三天以后，北大历史系在学校西北不远的东北义园为他举行告别仪式。从四方闻讯而来的吊唁者超出了原来的估计，以致告别厅的走廊里，从楼上到楼下都站满了人，场面感人，让我几度泫然。从告别厅出来，三三两两的人群走回北大。几个学生走过我的身边，听到有人小声说：“前两年我常到中古史中心的图书馆看书，还从来没有见过刘老师。”我一下子愣住了，两千多年前李广悲愤辞世，司马迁说：“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今天，浦江老师的去世，来参加告别的师生们，不正是“知与不知”“皆为垂涕”的写照么？

朗润园西所，浦江老师研究室的灯光虽然黯淡下去，他在这里从事学术研究的恢弘气象和奉献给学界的累累硕果，已经成就了一段历史，一直会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2015年8月28日

（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 江城子·悼念故友刘浦江教授

曹家齐

燕山杨柳吐青鲜。识君颜，晃十年。颐园北面，共度两旬天。纵论古今人与史，才气展，正翩翩。

重游故地泪涟涟。祭堂前，梦魂牵。未名冰冻，难诉北国寒。天妒英杰应有度，何解我，相知难。

附记：

家齐与刘浦江教授相识相处主要有两次。一次是2005年3月底至4月底，时值五部委在中央党校举办高校骨干教师第二期研修班，家齐与刘浦江教授俱为该期学员，始得相识。同期学员中尚有华中科技大学雷家宏教授等，亦主治宋辽金史。讲习班每天上午听讲座，下午讨论，晚上自由安排活动，最后一周外出考察。因出生上海之故，刘浦江教授选择赴上海浦东考察，家齐与雷家宏教授则选择去延安考察，故一月研修期间，与刘浦江教授相处有二十余日。因是同行，又意气相投，故三人常在晚饭后相约散步，聊天内容以学人、学术及学界趣闻为主。应是研史太过执著，故每遇讨论，三人皆能直言不讳，讥刺虚伪。因此，三人竟被人指责为“思想有问题”。

与刘浦江教授第二次相处，是在2012年8月中旬。时中大历史学系承担第七届宋史博士生讲习班，刘教授慷慨应邀，冒酷

暑南下广州，为博士生讲授《契丹人殉制研究——兼论辽金元“烧饭”之俗》一文之写作过程和心得，并逐场参加博士生的讨论。家齐每场相陪，得与相处数日，亦颇多交流。

其余时间，与刘教授或偶在学术会议相聚，或偶有邮件或短信沟通，无不倍感亲切。

刘教授铁骨铮铮，为人处世光明磊落，对于学术更是执著。其治宋辽金史，能以开阔之视野，深入解读史料，对一系列历史问题之研究皆有重要推进，是当今最杰出的中国史学者之一。其道德文章堪为楷模。家齐与刘教授虽来往不多，但觉颇能相知，亦甚有交情。惊闻刘教授英年早逝，悲恸之情久不能已，谨填词一首并附记交往经过以表对故友之追思与缅怀。

（作者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 一个学人的境界

——追念刘浦江教授

王善军

人生在世，在自己可以有多种追求，在别人也可以有多种评价。不过，不管是怎样的人生追求，不管是怎样的社会评价，在事实上总能区分出不同层次的境界。如果一个人既能在事业上又能在思想上达到令人敬佩的境界，这样的人生一定是有意义的人生。刘浦江教授尽管正值学术盛年而生命戛然终止，令人扼腕叹息，但他所走过的人生历程，却诠释了一个纯粹学人的人生意义。

在学术事业上，一个学人的境界既表现在追求学术事业的过程，也表现在其所取得的学术成就的价值。国学大师王国维曾云：“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这正是指个人在追求学术事业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境界。这种境界，虽然主要是学人的个人体验，但在其学术历程中也会有所表露。刘浦江教授将学术作为人生的追求，自然也经历了这种过程中的境界。尽管矢志于辽金史研究不算很早，但他的学术志向和学术体验却时常情不自禁地流露出来。他在《辽金史论》一书的自序中曾

说：“走上辽金史研究的道路，于我纯属偶然。1988年春，经邓广铭先生的全力举荐，我得以调入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当时担任中心主任的邓先生布置给我的第一项任务，是让我彻底解决《大金国志》一书的真伪问题。我把这部并不算厚的书足足读了半年，逐条查找它的史料来源。这是我接触辽金史的最初契机。此后几年，一度心有旁骛，荒废了许多时光。坐标的最终确定，是1992年8月的事情。那一年我31岁。而今回想起来，总不免有晚学之恨。然而不管怎样，那毕竟是我人生中的一次重要抉择，我越来越确信这一点。”这是他出版第一本个人文集时所说的话。随着他对学术事业的执着追求，后来他在家书中甚至曾表露出“为了能够做好学术事业，宁愿少活十年”的想法。万万让人想不到的是，正当他全心沉浸于学术研究事业之时，长期的高强度脑力劳动已不知不觉地侵蚀了他的健康，病魔竟无情地夺去了他约三十年的宝贵时光。这对辽金史学术事业的发展来说，无疑是难以弥补的损失。

刘浦江先生所取得的斐然学术成就，在学界有目共睹。仅就辽金史领域而言，他无疑可跻身于20世纪以来的学术大家行列。在许多重大、关键的学术问题上，他或是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或是提出新颖独到的见解。如正统观、捺钵、横帐、契丹的父子联名制等等。他的学术追求轨迹，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显示出一个辽金史学者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一是全面、准确地掌握前人的研究成果。他认为对于要研究的问题，首先应该“穷尽有价值的研究文献”。事实上他也确实这样做了。他在论著中对前人成果的分析或介绍，总是给读者留下精准和确当的印象。目前辽金史学者受惠于他的《二十世纪辽金史论著目录》（上海辞



书出版社,2003年)一书,那其实只是他为穷尽前人成果所做的第一步工作。可以说,全面、准确地掌握前人的研究成果,正是刘浦江教授取得辽金史研究成就的基础。

二是穷尽并深刻解读史料。刘浦江教授认为,穷尽史料对一个辽金史研究者来说,并不是一个难度很高的学术标准,而应该是一种基本的专业素养。他的辽金史研究,前期论著在使用汉文资料方面基本是搜罗殆尽的,后期论著由于大部分涉及辽代问题,则对汉文和契丹文史料均近乎穷尽。记得2002年11月初,在河北大学召开的“漆侠先生逝世一周年纪念大会暨国际宋史研讨会”上,我问及他近期的情况,他说正在自学契丹文,因为出土的越来越多的契丹文资料已经不容漠视。可见,他认为只要是相关资料,就要不畏艰辛地攻克难关。对于掌握的资料,他很少拿来就用,而总是精心校勘、深入阐释。他善于运用版本学、目录学、音韵学等传统方法考证史料,而在阐释资料时又严格秉承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原则,所以他往往能够创新性地抉发出史料本身所蕴含的各种信息。

三是贯通与旁通研究课题,提升学术认知。对于具体的研究对象来说,前后贯通即是纵向比较,明其流变;左右旁通即是横向比较,明其特色。在辽金史研究队伍中,不乏前后左右诸史兼治的学术大家,刘浦江教授在论研究方法的文章中曾列举过多位。他还说,这种治学路数也一直是他的学术理想与学术追求,可惜心向往之而力不能至。事实上,他在这方面达到的境界,已足可与诸位学术大家比肩。譬如他对辽金正统观的研究,即通过贯通与旁通的方法,高屋建瓴地提升了对相关问题的学术认知。他甚至将该问题贯通至近代,并专门发表了相关的研

究成果。

在品德修养上，一个学人的境界也会在学术活动及日常生活中充分体现出来。刘浦江教授为他人着想、宽以待人的胸怀，正是一个学人品德修养的至高境界。在刘浦江教授的传世文字中，不乏以犀利之笔锋对已有研究成果抉误揭偏之处，但那只是他虔诚对待学术问题的表现，其实他对别人总是抱着宽以待人的胸怀。在与同仁相处的过程中，他总是想着把机会让给别人，而不是首先留给自己。据说他在做北京大学历史系副主任期间，对各种学术奖励项目，自己均不参与申报，而是动员或推荐同事们申报。因此，尽管他取得的高水平学术成果甚丰，但得到的各种官方的学术奖励和学术称号竟然很少。这在今天大家都不得不去适应强势的社会评价机制的情况下，这种做法的学者的确已是凤毛麟角了。

刘浦江教授在治学过程中，总是想着将自己的各种积累贡献出来，以便使同仁们得以共享。目前海内外治辽金史者，几乎无人不在使用《二十世纪辽金史研究论著目录》一书，而新近出版的《契丹小字词汇索引》（中华书局，2014年）一书，也必将成为治辽史及民族古文字者的案头工具书。其实，这两部书均是他为自己研究相关问题而做的基础性工作。诚如他在前书的前言中所说：“当初编这份目录，只图自己检索方便，原本没有公诸于众的打算。”即使供自己使用已经很方便了，但真要公开出版，就会发现“这是一桩相当繁难的事情”。因为自己使用的目录初稿，“因系多年积累而成，来源非常复杂，问题自然很多”，为此必须认真进行补遗和正误。

刘浦江教授在教学的过程中，总是披肝沥胆，诲人不倦。对

于学人来说,能够造就大批品学兼优的弟子者,必定是思想境界很高的师长。当然,绝不能说未能造就大批品学兼优的弟子者,必定是思想境界不高的学者。据他的学生邱靖嘉说:“他生平有两个愿望,一是希望自己在辽金史研究上超越以前的学者,二是希望自己培养的学生在未来能够超过自己,后继有人。”刘浦江教授不但平时为培养学生呕心沥血,即使在弥留之际,也仍在为学生的学术成长付出最后的心力。时至今日,已有不少从刘门走出的青年学者,在辽金史研究领域崭露头角了。我相信,在今后的辽金史研究领域,刘门弟子一定会群星灿烂。

我与刘教授虽交往有年,但回想起来只是在两次会议上见过面:一次是2002年11月初在河北大学召开的“漆侠先生逝世一周年纪念大会暨国际宋史研讨会”;另一次则是2013年11月在西北大学召开的“中国古代国家治理与边防学术研讨会”,其中后一次会议时接触较多。记得在报到处相见,他久久握着我的手,询问我在西北大学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兄长般的关切让我终生难忘。会后,我们一起到秦岭中的一处国家森林公园考察,一边爬山,一边畅谈学界往事和趣事。临别时说起我们能够见面的机会很少,他还相约下次京城相见。谁能想到,这竟成了我们的永别。恸哉惜哉!造物主就是这样的无情,他使人生的遗憾无处不在,而且大多数的遗憾永远无法弥补。权以此文,寄托我对一位真诚学友的哀思。

(作者系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 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纯真与执著

王立新

我是在去年4月上旬获知浦江患病的消息，当时极为震惊，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当我把这一消息告知马春英时，她也是难以置信，连说两声：“这怎么可能？”我们无法理解一向意气风发的浦江怎么会罹患这样的疾病。他住院后，我给他发去一封短信，以我二十年前一位患同样疾病的研究生同学获得康复的例子安慰和鼓励浦江。浦江给我回短信说，“立新，非常感谢你和马老师的关心和鼓励，我会积极面对，淡然处之。”5月初，剑鸣到京，我与剑鸣和马春英一起去医院看望浦江，发现浦江除了有些消瘦外，其他一无变化，还是那样快人快语，精神饱满。我们在病房坐了近半个小时，一直在听他滔滔不绝地说话。从他的谈话中，才得知他长期失眠，身体早有不适的症状，但一直没有去看医生，直到身体突然消瘦20多斤后，才重视起来。因在北京看病不方便、诊断周期长，于是回老家做了全面的检查，最后诊断为淋巴癌晚期。浦江在谈论自己的病情时，感觉好像不是在说自己，而是在说别人，语气中看不出一点无奈和悲伤，对死亡似乎也没有丝毫的恐惧。

自那以后，为了不打扰浦江治病，我没有再去医院看他，但一直关注他治疗的进展，不时向陈捷了解浦江的病情，得知治疗比较顺利，心下宽慰不少。晚上散步时也常与马春英聊起浦江，

我们都希望他吉人自有天相，像我那位研究生同学那样，战胜病魔，度过此劫。但是12月30日中午，马春英突然接到陈捷的电话，称浦江病情突然恶化，已经无法可治了，浦江坚持要离开北京，回垫江老家。临行前，浦江特意嘱咐陈捷告诉我们一声。第二天凌晨5点半，我和马春英匆匆赶到医院，为浦江送行。到医院时，走廊里已经聚集了不少学生，在为浦江整理路上用的衣物用品。几分钟后，浦江缓缓从病房里走出来，精神已经大不如从前，身体瘦了许多，脸色发暗，神情憔悴。浦江看到我和马春英，嘴角微微一动，似有不舍，随即忍住。我强忍着泪水，上前与浦江握手，浦江轻轻地说了一声“谢谢”。浦江下楼后，上了从垫江医院开过来的救护车。我们知道这是与浦江最后的见面了，到救护车里再次与浦江握手，做最后的告别。那天早晨北京异常寒冷，还刮着大风，我在寒风中目送救护车载着浦江渐渐远去，知道永远也见不到他了，再也止不住泪水，马春英也不禁痛哭失声。

我与浦江的专业领域不同，又属于从外面调入北大的“外来户”，除了在系学位委员会里面就研究生培养有一些交流外，与浦江交往并不多。倒是马春英担任主管学生工作的副书记时与时任副主任的浦江有很多合作。马春英与浦江的合作非常愉快，浦江对她的尊重和信任，每每提起都令她感动不已，她对浦江的人格和能力也非常钦佩，跟我聊起很多浦江的故事。

浦江是一个极其纯真的人。他为人坦荡而真诚，说话直率，处事坚持原则，不讲人情。在他身上丝毫看不到圆滑、老到以及对权力者的乖顺。浦江对人情世故也很漠然，似乎丝毫没有受到当下世风的熏染。同时，浦江心中又极有主见，自己认定正确

的事情旁人极难改变，其性格甚至有些执拗，用东北话说，就是有点“拧”。我常常不理解，以浦江的经历和年龄，何以能保持那样一颗纯真的心。在担任副主任期间，他工作极为认真负责，像对待学术研究那样对待研究生和本科生的管理工作，制定一系列规章，对研究生的培养和论文的质量提出了很高的标准。在一次系学位分会上，他特别提到一些专业在答辩时对博士论文的评价有过多的溢美之词，评价为“优秀”的论文过多、过滥，说明评价标准太低。我对此也很认同，自那次会后，再有美国史专业博士论文答辩，答辩委员会拟定答辩决议时都非常慎重，对论文的评价慎用“优秀”一词，“比较优秀”已经是最高评价了。前些年，为了确保博士论文的质量，每年都有博士论文在系学位分会上投票没有通过而不能获得学位的情况，俗称“被毙掉”。有一次，一位论文“被毙掉”的博士生找到浦江，对学位分会的决定不服气，提出有外审评价不如自己的论文都通过了，为什么自己的论文“被毙掉”。浦江用一句话做了回答：“学位分会对论文可能有漏杀的，但绝没有错杀的”。这句话在学位委员会里广为流传，典型地反映了浦江的风格。

浦江坚持原则，不讲情面，对请托和说情之风深恶痛绝，这一点在学校是出了名的。有一年，一位低分进入历史系的本科生想转到热门的院系去，但因不符合转系条件，系里不同意他转系。该同学辗转托人来说情，都没管用。其父母来系里找浦江，母亲在马春英的办公室号啕大哭，甚至以“如果不让孩子转系，孩子跳楼怎么办”相威胁。但浦江不为所动，父母只得作罢，其父亲离开办公室时喃喃自语说：“早就听说在他这里根本就通不过。”还有一年，一位报考北大历史系研究生的考生入学考试成

绩通过了国家规定的最低复试线,但排名靠后,没有达到系里的复试线。高层某位大领导的秘书找到一位校领导,希望能通融一下,让该生参加面试。这位校领导很重视,也很慎重,向系里询问谁负责研究生录取工作,当听说是浦江负责此事后,赶紧说,“那就算了吧,不麻烦刘老师了。”显然,他对浦江的个性早有耳闻,知道找浦江通融是没用的。类似的请托时有发生,但浦江不为所动。浦江虽然在这些事情上不讲情面,但他绝非一个不近人情的人。实际上,浦江心地非常善良,曾对系里一位农村出来的身患骨癌的学生关照有加。这位同学以专业排名第一的成绩获得免试推荐研究生资格,研究生期间学习刻苦,成绩非常优秀。浦江常以这位学生为榜样督促其他同学好好学习:“人家身患癌症还学得那么好,你们这些身体健康的人更应该珍惜学习机会,好好努力。”这种直率而善良的话语,正是浦江个性与人格的体现。

浦江是一个坚定的理想主义者,对辽金史研究、对系里的发展,他都怀有高远的理想,甚至为了这一理想而不顾惜自己的身体。他对既定目标有着锲而不舍的执著,内心强大而坚定。那次去医院看望浦江时,浦江跟我们谈论最多的是他的学术抱负以及对自己研究生的培养。临终前对古代史同事的嘱托也是如何照顾自己的学生,让自己的学生把辽金史研究发扬光大。他没有把学术研究仅仅视为谋生的手段,而是视为一种事业,甚至是生命。他之所以不惧死亡,我想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事业后继有人,其自然生命虽然终结了,但他的学术生命在他的学生身上得到了延续,自己死而无憾。

在这样一个功利主义和犬儒主义泛滥的时代,浦江这样纯

真的理想主义者与当下的现实实际上是格格不入的。他对原则和理想的坚守,他的认真和执著,是以耗费自己的生命为代价的。如果在北京看病更方便一些,他的病或许可以早一点得到诊断和治疗。我有时在想,浦江英年早逝,固然是因为身患癌症,但我更愿意认为是他的纯真、他的执著和他的理想主义不容于这个时代。他本该在辽金史乃至整个中国史领域做出更大的成就,在系里担负更重要的责任,但他却在54岁这个黄金般的年龄离开了人世,留给人们无限的惋惜和无尽的思念。

(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 悼浦江

张帆

2014年12月29日21时53分，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时间，这是我和浦江最后一次通话，距浦江去世仅仅一周有余。当晚我在外地，刚刚获悉浦江病情严重恶化，已经决定放弃治疗，即将赶回垫江老家。不久，浦江的电话就打来了。通话持续了10分钟，主要是浦江在讲话。语速仍旧像平常一样急促，但因为身体虚弱，时而出现停顿。除简单陈述病情外，主要是把两个刚刚进入博士阶段学习的研究生托付给我。分别介绍了两位同学的性格特点，以及在学业上的优势和劣势，希望他们将来能够在博士论文选题和专业研究方面贯通辽金元史，嘱托我加以帮助。最后说：“两个学生交给你，我就放心了。”听到这里，我早已泪流满面，难以自制，只能不知所云地重复着几句苍白贫乏的安慰话语。

呜呼！每当亲友辞世，总是真切地体会到死神的残酷无情，为自己束手无策而悲戚。何况浦江正值盛年，遽遭恶疾，诀别之际，语不及私，唯谆谆以育人之责相付，念之能不哀恸！

### 一

浦江是北大历史系79级本科生，比我高三级。我们读本科的时间有一年重叠，我大一的时候他大四，但当时并不相识。记

得我认识他是在1992年春天。那年我即将博士毕业，浦江则早已从中央党校调回北大。他因为参与编写一套工具书，受主编委派，到博士生中招募作者。我们这届博士生正忙着改论文、找工作，无人应募，浦江扫兴而归。因为他是在邓广铭先生亲自过问下调回来的，我们对其大名已有耳闻。初次见面最大印象是浦江相貌的年轻，年过三十的他，外貌也就二十出头，说是正在读书的大学生也会有人相信。实际上，直到生病去世，浦江看上去始终比实际年龄年轻很多，英姿焕发，朝气蓬勃，精明强干，充满活力。谁能想到他会突然被癌症夺去生命呢？斯人而有斯疾，其命矣夫！

我留系工作以后，与浦江接触渐多，特别近十年间最为频繁。这首先是由于他研究辽金史，我研究元史，研究方向接近，在专业上经常需要互相咨询。说是互相咨询，其实大部分时候是浦江向我咨询。这并不说明我水平比他高。真实原因，是浦江勤于笔耕，频繁有论文问世，其间颇有涉及元朝内容者，往往不耻下问，垂询于我。而我秉性疏懒，撰写论文较少，因涉及辽金史而向他请教的机会就更少。

研究方向接近，还意味着在研究生培养上需要密切合作。从各自研究生的入学面试、资格考试、开题报告，直到论文预答辩和答辩，我们都会彼此参与。宋史（间或还有其他方向）研究生的上述培养环节，我们通常也会共同参加。就在浦江查出癌症前大约一个月，也就是2014年3月中旬，我的两位博士生，加上明清史方向三位博士生共五人，三人开题，一人资格考试，一人预答辩，约定同一天进行。浦江照例出席，晚上又一同吃饭。现在想起来，当时他已深受病痛折磨，但却略无异常表现，依旧谈笑风生。而

我们对他的身体状况也竟然一无所知，实在是太粗心了。

除去上述专业原因外，浦江与我在日常工作上联系尤密。2006到2010年，浦江担任北大历史学系副主任，主管人才培养，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教学及相关培养事务。2010年他虽然卸任，但由于各种原因，新一届领导中没有中国古代史专业的老师，因此系里的人才培养工作，凡涉及中国古代史专业事宜，仍由浦江负责协调。这段时间，我一直担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可以说直接受他领导，或与他配合工作。我们的协作是默契而愉快的。不管时间多晚，只要有事，都会随时拨通对方电话。虽然没有精确统计，但自2006年以来，与我电话通话总时间最长的人，极有可能就是浦江。至少在晚上10点以后打电话最多的人，肯定是他。凡是中国古代史专业人才培养事宜，诸如教学计划制订、课程开设、奖学金评定、研究生初试复试及研究方向名额分配、博士论文匿名评审，浦江通常都会与我商量。如果他有事外出离系，则会将相关工作委托给我代理。

2014年4月上旬，他自感病情严重，打算回老家做身体检查。临行之前，打电话将当年的中国古代史专业博士生入学复试事宜交给我，并且说：“复试的时间是4月19日。我检查要是没问题，此前一定赶回来。如果有问题没能及时回来，复试就由你负责安排。”我对他的病情殊无了解，听后大吃一惊，也隐约有不祥的预感。果然到中旬，接到他从老家打来的电话，查出了癌症，不祥的预感竟成事实。当时我瘫坐在沙发上，头脑一片空白，久久不能平复。我知道，浦江恐怕要长期甚至永远离开他的管理岗位了，我们多年以来的密切协作也将成为记忆了！

浦江去世不久，有记者向我采访他的事迹，提了一个问题：

“您是刘浦江教授的朋友,知道他有什么业余爱好吗?”我瞠目结舌,不知所对。想了好久才说:“似乎没什么业余爱好,他的爱好大概就是看书和搞研究。”这个问题让我猛然意识到,浦江和我几乎是没有私交的。在北大生涯的初期,我们并未相识,相识后也不太熟。后来虽然熟起来了,但彼此联系全都是由于工作,未曾因为私事互相沟通。我们没有到过对方家里,互不认识对方的家人,也从来没有因为公务以外的事情在一起聚会。或许我可以僭称是浦江的朋友,不过更确切地说,他对我而言,是非常尊敬、钦佩、信任的学长和同事。

## 二

浦江的学术生涯,以他出版的两本学术论文集为界,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治金史为主,兼及辽史。第二阶段,以治辽史为主,兼及金史。第三阶段,在治辽金史同时更多地向其他朝代拓展。他的学术贡献,因而也可以分为三个方面来总结。

金史是浦江较早涉足的领域。金朝为时略逾百年,地域仅及半壁,史料相对有限,民族特色又不像其他北方民族王朝那样明显,因而在中国古代史研究范围内是一个非常容易被忽视的朝代。20世纪后半期国内的金史研究,虽在猛安谋克等少数课题上有所收获,但大量的仍然属于低水平重复劳动,还经常陷入历史人物(例如阿骨打、兀术、海陵王)评价一类学术意义不大的争论。浦江异军突起,贡献大端有二。其一,是对金史领域中一些问题进行了开拓性研究,也就是他在《辽金史论》自序中所说的“垦荒”工作。这些问题主要包括户口、捺钵、财政税收、民族

政策等等,对于我们了解金朝十分关键,但在以往的研究中,竟然几乎无人问津,偶有也是浅尝辄止。到今天,浦江的上述研究,是任何一个金史研究者不管赞同与否都无法回避的,哪怕仅仅是为了教学,也肯定要在参考之列。其二,则是超越“垦荒”而进入“精耕细作”阶段的某些研究,其代表作为《关于金朝开国史的真实性质疑》和《金朝初叶的国都问题——从部族体制向帝制王朝转型中的特殊政治生态》二文。这两篇文章的特点,是对史料进行深入分析、批判为基础。或许有些孤陋寡闻,就我披阅所及,类似的研究在国内金史学界即使不是绝无仅有,也算得上凤毛麟角。浦江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并非偶然。据其自述,他调回北大之初,曾经花了半年时间研读《大金国志》,“逐条查找它的史料来源”。放到现在,电子文献检索十分方便,查找史料来源并非难事。但在二十几年前,能有耐心做类似工作的人实为罕见。稍后,他还用同样方法研读《契丹国志》,并且辅助邓广铭先生整理《三朝北盟会编》。前贤有云“自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窃谓浦江之于金史研究亦然。浦江通过他的研究提示我们,尽管金史史料匮乏,但对于这些数量有限的史料,仍然必须首先进行最基本的清理和辨析工作。这种意识,在过去的国内金史学界其实相当缺乏。典范之功,不可谓小。

与金史相比,辽史材料尤其贫乏,素称“无米之炊”。但因为史料过少,学者对其钻研较为细致,因此研究水平比金史似乎要高一些。浦江在将研究重点转向辽史时,选择契丹文字作为突破口,洵具卓识。在此以前,治辽史者大多谨守传统汉文史料,对契丹文字材料未能充分掌握;而人数本来就极为有限的契丹语文专家,对辽史的涉猎也通常仅限于墓志释读一类个案研究。

明乎此，就能知道浦江利用契丹文字资料（或兼用女真文字资料）讨论契丹父子连名制、辽朝国号、“横帐”、阻卜鞬靽等问题，其价值何在。下功夫编纂大部头的《契丹小字词汇索引》，则表明他的确是将契丹文字作为治辽史基本功来学习，态度非出猎奇，目的非为点缀。另一方面，浦江对于契丹文字资料的成功运用，又建立在熟谙汉文史料的基础之上。特别是他穷尽六七年之精力，率领弟子完成了中华书局点校本《辽史》的修订工作，其对辽代汉文史料的熟谙程度，恐怕当世已少能有人及之。不同文字的资料左右逢源，加上对文化人类学理论的借鉴吸收，如天假以年，于辽史之造诣何可限量？

浦江辞世，报章誉以“中国辽金史第一人”，是对他在辽金史研究方面成绩的充分肯定。但浦江的学术志向，殊非此称号所能涵盖。在学术生涯中后期，他涉及传统政治文化、史学史、四库学的一批重要论文，早已远远越出辽金史的藩篱，受到学术界高度评价。可惜的是，由于英年早逝，他“走出辽金史”的努力还仅仅处于开端。对断代史学者来说，从事贯通研究并非易事，而辽金两朝在中国古代历史长河中仅属支流，由支流入主流而贯通之，其难尤甚。事实上，浦江所作贯通研究，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其长年开设的史学史、四库学课程，相关成果也因而主要局限于德运问题、正统理论、华夷观念几个方面，尚未向更多方面开拓。由辽金史出发前后贯通，本来还有一个较好的桥梁，那就是元史，而切入元史的关键点又是金史。浦江在讨论辽、金联系时曾说：“辽、金虽是两个异姓王朝，契丹、女真虽出自不同的民族谱系，但它们有许多共性的东西，更不用说彼此之间还有各种无法剥离的瓜葛与纠结。”其实金朝和元朝的关系也是如此。前些

年海外学者提出“宋元明过渡”问题，并且逐渐受到国内学术界关注。但金朝和辽朝在这一过渡当中居于何种地位，具有怎样的影响，却几乎完全被忽略了。要想回答上述疑问，首先就要将金、元两朝联系起来考察。金史本系浦江早年治学重心，后来发展方向主要是上移而非下移，所以未能在金、元联系方面较多用力。然而毫无疑问，这仅仅是由于时间精力不能兼顾，并非思虑未及。他病危之际对于弟子贯通辽金元的期望，再好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浦江未竟的志愿，相信一定会由弟子们完成的。

### 三

我与浦江共事多年，深切体会到我们两人个性颇有差别。平时感受，不过觉得禀性各殊，亦属常事。然而在浦江辞世前后，精神恍惚，夜不能寐，“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念其行事，实多我所不及。古语所谓“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大概也有这层含义吧。略举数端，以表悼念，兼以自儆。

浦江做事认真细致，一丝不苟。印象最深的是2002年夏天，我指导的首位硕士生陈爽毕业答辩，请浦江参加。当时我初次以“导师”身份出席论文答辩，也曾花了不少功夫帮助修改论文，自认为质量尚佳，颇觉沾沾自喜。岂料浦江当场指出其中几处引文并不准确，逐字念出原文，加以更正，一时空气略显紧张。好在浦江最后宽容地说：“还行，错得不算太多。”——时隔10余年，远在美国的陈爽得知浦江逝世噩耗，在哀悼微信中忆及此事，其情其景，我也历历在目。陈爽是一位性格稳重的女生，我没有想到她会出这样的纰漏，因此修改论文时只注意文字表达，

并未提醒和督促她核对史料。对我来说，这也是一次深刻的教训。浦江对学生素以严格要求著称，如果是他的弟子出了类似问题，一定会当场严厉批评。实际上，他早就会将这类问题消灭在萌芽之中，不可能允许其发生。

浦江做事有计划，有准备。俗话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前半句完全可以用于描述浦江，后半句拿来形容我则十分合适。博士生发表论文就是一个典型事例。按照北大历史系的规定，博士生毕业时必须发表两篇学术论文。浦江自从博士生一入学，就会为之筹划此事，帮助拟定选题，督促写作，参与修改，联系刊物，推荐发表，因此浦江的博士生从未被发表论文的规定困扰，乃至常常超额完成任务。我和我的博士生，却大多是平日不用心，临时抱佛脚，离毕业没多久才把文章投出去，然后四处讨要用稿通知。浦江对于博士生发表论文的重视，与他对学生日常督责甚严一样，都反映了一种勤勉认真的工作态度；我对学生少加管束，放任自流，实际上是懒惰的表现。

浦江做事目标明确，精力集中，因而效率过人，这在他的学术道路上反映最为明显。除去教学和管理工作外，他一门心思从事专业研究，极少涉足与专业研究无关或关系不大的事情。在《辽金史论》自序中，浦江曾检讨说，自己调回北大初期“心有旁骛，荒废了许多时日”，就我了解，这大概指的是参加编著一些半学术的书籍，诸如“某某大词典”之类。如前文所述，我们初次碰面就与此有关。然而，此后20余年，他从未再参与此类工作，始终孜孜不倦，焚膏继晷，奋斗在学术前沿，终能撰写学术论文上百篇，编纂学术工具书两部，还完成了点校本《辽史》的修订。人徒羨浦江收获之丰，孰知其用心专一，持志恒定，殊非时辈所及。拿我来



说,参加“编著”各类书籍就有些多了,这类书籍不能说没有价值,但的确实实在在地挤占了时间和精力。加上业余爱好庞杂,阅读兴趣又常常转移,则成绩难望浦江之项背宜矣,思之赧然!

浦江做事原则性强,有时显得固执和狷介。偶尔交谈时言及某人,也往往用有无“原则”、有无“底线”来加以评价。浦江能够这样向我谈论别人,时而又把重要的工作委托给我,大概在他心目中我也算是“有原则”的。其实与浦江相比,我不及远甚。记得在2005年春天,当时我正做副系主任,主管本科教学,遇到一件棘手的事情。一位大学一年级的学生申请转系,按规定她并不符合转系的条件,但据说家里有些办法,已经搞定了接收院系的主管领导,并且取得学校默许,只要历史系放行,就算大功告成。她的母亲前来系里陈情,坐在办公室当场大哭,声彻云霄。我被哭得心烦意乱,暗想强扭的瓜不甜,既然实在不想学历史,或者放走算了,就表示要和班主任商量一下。这个班的班主任,正是浦江。浦江根本不为所动,毫不退让。他说:规则应该对所有人平等。该学生不符合转系条件,如果放走,无法向其他情况类似的学生交待。最终在浦江坚持之下,此事终于作罢。类似的事情还有不少。比如博士论文答辩,拟定决议书时通常要有一个概括性的评价,说“是一篇比较优秀的博士学位论文”或“合格的博士学位论文”。在一些人看来,既然已经同意答辩通过,将论文定性为“比较优秀”或“合格”,似乎也没多大区别。而浦江每每在这种场合较真,反对轻易给予“比较优秀”的评语,说服大家采纳他的意见。从结果来看,我们也算是坚持原则了,但这是以浦江坚持原则为前提的。

最后要提到浦江在行政管理方面的杰出表现。对此许多同

仁皆有体会，而我和他曾经担任同一个职务，感受尤深。我在做副系主任的时候，对相关工作大都是被动应付，得过且过，度日如年。而浦江在相同岗位上，却是如鱼得水，应付裕如。这一方面是工作态度问题，另一方面也与个人禀赋有关。浦江不仅学问精深，而且天生具备组织、管理能力，用古书中的话形容，属于儒、吏合一的人才。他对全国各重点高校历史院系的学科优势、师资储备几乎倒背如流，对于高校管理各项规定也都谙熟于心。我见过不止一个人调侃他说：“这么无聊的事，亏你也能记得住。”浦江总是笑而不答。还有上面所说做事认真细致、有计划有准备、目标明确、原则性强等等长处，对于管理者来说都是不可多得的优秀品质。上天赋予浦江过人的才能，却又剥夺了他充分发挥才能的机会，这是多么令人痛惜的事情！

#### 四

浦江治疗前期，我曾三次去医院探望，每次他都十分健谈，我只能偶尔插话，大多数时间洗耳恭听。面对死神的威胁，浦江表现得从容淡定，毫无恐惧之情。他说：自己的学术潜能已经发挥了百分之七八十，自信著述足以传世，弟子亦大多成材，因此可以坦然地面对死亡，没有太多遗憾。著述传世，弟子成材，确乎不易之论，然而浦江的学术潜能其实远远没有发挥到百分之七八十，那样说主要是为了安慰我们，也适当安慰自己。治疗过程虽然痛苦，但很长一段时里面似乎效果尚可，浦江也因此增加了与病魔长期周旋的信心。2014年10月17日，他发短信给我，说已向中古史中心申报2015年上半年课程，打算开一门研

究生选修课“《辽史》研读”。因为中古史中心开设的课程会汇总到我这里，所以叮嘱我注意复核，千万别把他的课漏掉。直到12月15日上午，我们还通了一个很长的电话，讨论正在进行的历史系党委、行政换届问题。浦江谈起他对历史系近年情况和发展前景的看法，滔滔不绝地讲了半个小时，直到我说“你别太累，下次再聊吧”，通话才结束。谁能想到，竟然没有“下次再聊”的机会了。浦江的心理素质异常坚强，重病缠身而能处之泰然，易箴之际，神智冷静，处分后事有条不紊。但我也深深地感受到他对生命的强烈留恋，他是多么放不下家人，放不下学术，放不下弟子，放不下北大和历史系！命运无情，将他的留恋轰然碾碎，但浦江的人格在我们心中永存。我们永远忘不了他的热情、坦诚、认真、勤勉，以及偶尔的天真和幽默。最后写几句话权充祭奠，兼表绵远无尽的缅怀之情：

呜呼浦江！今也长辞。天既生才，胡摧折之？  
 嗟我朋侪，痛失瞻依。临风陨涕，以寄哀思。  
 善不必福，前贤已言。孰料君逝，仅及盛年。  
 自疾至终，从容安闲。中心持守，于斯可观。  
 惟君事业，炳炳煌煌。培育桃李，充盈门墙。  
 德已洽众，文亦流芳。云汉昭垂，千载有光。  
 人生如寄，寿夭靡恒。功在学术，虽歿犹荣。  
 高岸成谷，深谷为陵。精神不灭，与天地同！

原载《文汇学人》2015年2月6日第5—6版

（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 刘浦江先生在四库学方面的成就

张 升

我对刘老师了解不多，见过两三次面，总共没聊几句，对其学问更是所知甚少。不过，最近一年，读到他一些关于四库学的文章，而且与他的博士苗润博有一些接触，对其在四库学方面的研究稍有了解，因此，我只能就这方面简单谈谈自己的一些粗浅认识。

首先，想谈谈他开的《四库全书总目》研读的课。我最近十年主要研究四库学，但是，很惭愧，我去年才知道刘老师一直研究《四库总目》，而且开这个课已经很长时间了。我觉得开这个课很了不起。现在学界开这个课应该不多。我是研究四库学的，但是也不敢开。曾经有一个学期，我试着开了《总目》研读的课，主要读《总目》的大叙，以及一些提要和提要稿，但是后来坚持不下去，就一直没开，感觉压力比较大，自己要有足够的积累，而且为上课要看很多书，准备很多。因此，我觉得刘老师能长期开这个课很了不起。其实，大家都知道读《总目》好，但是坚持下来确实不容易。当然，只要坚持下来就一定会有收获。去年刘老师发的三篇关于《总目》的文章，就是其坚持努力的成果。

其次，我就想谈谈刘老师最近发表的关于四库的三篇文章。不了解刘老师的人会觉得很奇怪，怎么突然一下子发了几篇关于《四库总目》的文章？其实，了解他的人都知道，这是真正的厚

积薄发。这三篇文章我只读到其中的两篇，一篇是发表在《中华文史论丛》上的《〈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再探——兼谈〈四库全书总目〉的早期编纂史》。这篇文章中心内容有两点，一方面是考证清楚《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是什么时候成书的，另一方面是据此书解释早期提要纂写的相关问题。另一篇是发表在《文献》上的《四库提要源流管窥——以陈思〈小字录〉为例》。主要是通过通过对各种版本提要的比对来分析提要系统的源流关系，解释其差异原因。以上这些方面都是关涉《四库总目》的重要问题。当然，文章不只是解决这些重大问题，其中也顺带解决了一些小问题。归纳来说，刘老师的文章有这样几个特点：

其一、多有重要创见。例如，关于四库提要的比较很多人都做过，但是刘老师选取的比较例子更典型，更有说服力。这对我们以后选择比较材料是个很好的示范。而且，他不是光比较文本，而是通过文本比较来揭示提要系统的源流关系，四库修书的运作过程等。也就是说，提要间的差异是如何造成的，他给出一个更合理的解释。又如，他对台湾国图藏的《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作了准确的定性，认为其是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以前初次进呈提要稿的汇编本。这一发现，有助于我们认清《总目》早期编纂史的相关问题。例如，姚鼐所作的《周易旁注图说》提要稿与阁本提要的关系不是很清楚，但从《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就能看清它们之间的渊源关系。如果断了中间这一层，也就是《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则两者的关系无法合理解释。刘老师揭示了这一点，有助于我们分析早期提要稿的渊源关系。

其二、一些小的考证，也是很有价值的。而且，从我的认识来看，都是完全可以成立的。例如，刘老师认为，《四库全书初次

进呈存目》的书名应是原称，即指存目以上之书，而不是总目中存目之意。校阅单是纂修官校阅后之进书单，而不是分派校阅任务的派书单。诸如此类的新观点还有一些，我在这不可能举得太多。我相信，这些观点一定会对四库学研究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其三、从他的论文可看出，刘老师既有深厚的文献学功底，又对四库学的研究进展有非常全面而准确的了解。例如，他利用胡适的材料来解读于敏中的手札，这是我以前就没有注意到的。这说明他很细心，很敏锐。另外，关于《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大陆方面还没有什么人专门研究，但是刘老师已经写出这么好的文章。这些方面都是我要好好学习的。

最后，我想说说如何继承和发扬刘老师的四库学研究问题。一方面，这么多年下来，刘老师肯定还有不少成果未发表，如果有可能，应该整理出来发表。另一方面，刘老师的研究，应该有继承，发扬光大。像苗润博博士，他的研究也多受益于刘老师的四库学课程，最近发表的论文就体现了这一点，写得不错，希望能继续做下去，以告慰刘老师。当然，我们作为四库学的研究者，也更应该向刘老师好好学习，学习他的吃苦钻研精神。就我来说，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够把《四库总目》研读的课开下去，这也是以实际行动学习和继承刘老师的治学精神。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 宽而栗，愿而恭，直而温

——回忆浦江

何 晋

浦江离开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我总觉得他还在，一想起他，脑海中立即音容毕现，宛若昨日才见过面，或者今天才通过电话。

算起来我们是快近二十年的同事，教学与研究又都同属中国古代史，现在回忆起来，最早真正有印象的事，是他1999年送给我《辽金史论》一书时，我阅读书中序言后所受到的触动，他给我留下了不媚俗、有风骨的士人形象，这样的学者，是我所敬佩的。浦江在副系主任的职位上之后，我们之间的联系多了起来，每学期的排课，课程的助教安排，研究生的招生、考试、面试、导师确定等等，他都会一一打电话询问、安排。浦江给我打电话往往是在晚上十点左右，大概他熟知本系的老师这时基本还在家工作，比较容易找到。有时比较小的事情，他也会在电话中说得很久，反反复复，给我的感觉有些絮叨。但正是这些絮叨，在他离开后，成了我最温暖的记忆。现在想来，不知有多少个这样的夜晚，别人或在休息、或在著书立说之时，浦江却牺牲了自己的时间，正在为系里的教学科研事务，一一沟通，事无巨细，妥妥安排。这种为公共事务无私奉献的精神，真非吾辈能比。

浦江卸任副系主任之后，不少人认为他应当担任系主任，虽

然后来事与愿违,但他没有赌气怀怨,而是继续在研究生招生、复试等一系列事务上一如既往的兢兢业业。我们常在一起面试中国古代史专业的研究生,每次面试学生时,他基本都会有如下的询问:“你读过XX书吗?”学生:“读过。”他会接着问:“作者是谁?”学生回答后,他又会问:“哪个出版社出的?”学生回答后,他会再问:“封面是什么颜色的?”没有读过此书的学生往往就在此卡住了;如果学生读过回答出来了,他还有更厉害的一问:“这本书大概有多少页(或者多少册)?”如果不是真正熟读此书的学生,坚持到此时往往也就崩溃了。北大历史系向来有强调读史料、读原典的传统,这种“刘氏考问”看似呆板,却是短时间内检验学生是否认真读了书的试金石。浦江这样做并非故意为难学生,对于那些表现优秀的学生,他会鼓励、称赞、欣赏。此外,在面试外校考生时,我发现浦江对国内其他院校历史系的专业、科研、学者等情况也十分了解,他常常会问一些外校考生对他所在院系某某老师某某著作的看法,可谓视野辽阔,胸怀全国。

无论科研还是教学,浦江都十分认真严谨。有一天晚上接到他的电话,却不是谈系务,而是问我先秦时期关于姓、名的问题,当时我有些诧异,不知道其时他正在撰写宏文《契丹名、字初释——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父子连名制》。还有一年我正在荷兰莱顿大学交流,突然收到我的硕士研究生李蜜的邮件,询问《战国策》某个版本的问题,她说她选的刘浦江老师“《四库全书总目》研读”一课,要她讲一次关于《战国策》版本的内容,当时我都替她有些紧张,担心她准备不好,怕浦江会说你怎么连你导师的研究都不了解?无疑,浦江对学生的要求是严格的。他在系里曾开设“中国史学史”一课,就有一些同学担心上他的课拿不



了高分而影响绩点，所以不太愿意选他的课，但其实上过他课的，最后都觉得收获很大。

去年在突然得知浦江患病时，我很震惊和悲痛，不知这样的事怎会临到他身上。当张帆说要去医院探望他时，我马上要求同去，但征求浦江的意见后，最终因为他所住病房空间太小，他当时的免疫力也因为化疗而处于极低状态，人去太多他的身体难以应付，而没有成行。后来给他去电话，他已回到家中静养，告诉我正在用一种国外的药，效果不错。电话中听他说还在看学生论文时，我说你现在应该好好休息，别太累了，他说就看看文章没事的。本以为他的病情被控制住，在向好的方面发展，不料今年1月初他竟突然这样离世了。他的告别会那天是星期五，我正好要上课，竟没能去向他告别。后来1月21日参加了由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和历史系主办的追思会，又听到了浦江的大学同学、朋友、邻居、学术同僚、学生对他的追忆和怀念，对这么好的一位朋友、同事、父亲、老师，如此英年早逝，所有人都感到十分悲痛。《尚书》中在说到一个人的才干和性格时，有“宽而栗、愿而恭、直而温”之语，宽宏而又严肃，忠厚而又有干才，正直而又温和，浦江真堪称其德。

（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 风物依旧，斯人不再：追忆刘浦江老师

史 睿

2015年新年刚过，突然传来刘浦江老师病逝的噩耗，顿令朗润园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小院笼罩在哀痛之中。当时我临时代管科研秘书的事务，强抑悲痛，含泪在中心的网站上发布讣告，刊登刘老师遗稿，接受各相关学术机构的唁信。此后不久，又随师友前往东北义园参加刘老师的追悼会。追悼会上，当邓小南老师谈到刘老师在病重时刻还申报新学期开设的“《辽史》研读”课程的时候，我不禁泪如泉涌。

我初识刘老师大约在2002年之后，那时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刚刚迁入朗润园中所，我常常到这里向荣新江老师求教，偶尔会见到同院的刘老师。然而真正与刘老师相知，则是我调入中古史中心之后。2011年秋季，我承乏管理中古史中心的图书馆，其后刘老师出任研究中心副主任，主管方面之一就是图书馆，于是往还渐多。以前仅仅知道刘老师是非常出色的辽金史专家，逮及逐渐熟识之后，才知道刘老师在文献学方面的造诣也极为深厚。

研究中心的图书馆是前辈学者经营三十余年，专业图书收藏极为丰富，然而面临学术出版物的快速增长，书库容量不足越来越明显。2012年开始，我建议淘汰副本书，其中有一些是早先的一些复印本，因为已经有了正式的影印本和整理本，也在剔

除之列。图书馆有两种复印本的《国朝诸臣奏议》，我记得邓广铭先生率领中古史中心多位老师已将此书点校整理，由中华书局出版，更为便用，故欲将复印本下架。刘老师得知马上召我到研究室，细致讲解复印本来自台北故宫博物馆，底本原是国立北平图书馆寄藏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善本书之一，是《国朝诸臣奏议》存世诸本中唯一未经修版的宋刻元印本，当年为点校整理设法复印，得来不易，且此本从未影印出版，另一部则复印自文海出版社影印的宋刻元明递修本，可补前者的缺卷，大陆也不易见到，皆不可下架。其后刘老师又亲到图书馆书库，为我指示两本的特征和差异。我虽曾供职于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然于宋元以后典籍的版本源流所知甚少，刘老师的教示无异于最好一课，促我痛下功夫，补习课业。

刘老师对于图书建设非常关心。2012年，研究中心的经费比较充足，于是计划多购入一些图书，我为此拟定了购书目录，刘老师过目之后多次增补，所增之书超过原目一倍以上，台湾重要学术刊物《大陆杂志》、新出《宋画全集》、最新考古报告、《故宫学术文库》、《文物考古通论丛书》、《明代通俗日用类书集刊》、朝鲜·越南燕行文献、历史地图等等，都是依照刘老师所定目录采入的。从中可见刘老师对于史学各个领域的出版动态都非常熟悉，常见史料和著作之外，于文物、考古、石刻、书画、域外文献、历史地图等方面尤所留意。2014年11月24日，我见有书店推荐书目有《彩图本契丹文献探秘》一书，但原书尚未寓目，不知价值如何，冒昧向病中的刘老师请教。刘老师当日立即回复，信中说“这是一帮专业造假的人做的一部伪书，这样的书居然可以在正规的出版社出版，从中可以折射出今天中国出版业的乱象”，

提醒我要辨别出版物中的假文物和伪学术，不啻醍醐灌顶。同日晚间，刘老师又发来一信，命我注意采入中华书局最近出版的《金代艺文叙录》。这封电邮是刘老师致我的最后一信，邮件显示刘老师是用 iPad 回复，左侧书名号误作两个折笔，一向严谨著称的刘老师想必此时正遭病痛折磨，已经虚弱无力，手写不能连续，然而即便这样仍旧关心图书馆添购新书之事，令我感动至深。不日我即购入此书，遗憾的是刘老师已经不及阅读了。

刘老师自 2000 年以来，一直开设“《四库全书总目》研读”课程，曾经力主购入人文渊阁、文津阁两部四库全书的影印本，收藏于朗润园的图书馆。课上，刘老师悉心指导学生精读《四库全书总目》，并对照文渊阁、文津阁两种版本的差异，搜寻四库底本，钩稽馆臣所撰提要底稿，研究《总目》编纂过程。刘老师的研究总是先于课程一步，不吝分享最新的研究心得。我曾经为刘老师的四库总目编纂研究做过一点小事。2013 年 11 月，我正在苏州博物馆参观，忽然接到刘老师的电话，当时他正在调查国家图书馆所藏某书四库底本，申请复制书后的提要底稿，但是馆员以为墨笔书迹是藏书题跋，依照规则不能复制，因为我曾在国家图书馆服务，故请我帮忙疏解。我马上和国家图书馆的旧日同事联系，说明刘老师申请复制的是提要而非藏书题跋，终于获得同意。能对刘老师的研究稍有助益，我深感荣幸。

往年刘老师总是在图书馆门前玉兰盛开之际与学生合影，这一传统已有十余年之久，而今朗润园风物依旧，而我们只能于纪念集照片中再见刘老师的灿烂笑容，可不痛哉！追忆昔日，春秋季节天气清爽之时，我喜欢傍晚朗润园的安静，闭馆之后再读几页书，而当我稍晚离馆时，总是遇到用过晚饭又返回研究室工

作的刘老师；寒暑假中来图书馆值班，也常见刘老师出入朗润园小院。他将学术当作生活乃至生命的一部分，并不外在于自身。刘老师的学生苗润博在追悼会上转述他临终的遗言，“生命不在长短，而在质量，有了一流的学术著作，教出可以传递事业的学生，此生可以无憾”，此语足以廉顽立懦，真有古贤山高水长之风。宋儒张载云“存，吾顺事，没，吾宁也”，今世惟于刘浦江老师见之。

（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副研究馆员）

## 怀念浦江教授

吴国武

在悲情和伤逝中，今天听了一下各位先生对于刘浦江教授的追忆和缅怀。就我的感触来说，浦江教授好像并不是遽然离去，而是历历在目、难以释怀的。

从人文学苑一号楼走到会场的时候，我有很多很多的感慨。记得去年4月的一个上午，就在历史系和中文系（即五号楼、六号楼）的会合处，我偶然碰见浦江教授。他说他正要去校医院体检，于是我们简单聊了一会儿。当时以为只是例行体检，我就说等您体检完，回头再找时间细聊。然而只过了三天，我就从古代史那边的老师听说他查出肿瘤。顿时间震惊不已，因为前几天还看不出他身体有什么问题。

这种震惊，一是觉得太突然。近些年，浦江教授在教书育人和学术研究上勤勉有加、成绩斐然，处于人文学者创造力最强的时候。加之，他的身体状况并无不良的征兆，应该会有平顺的生活状态。二是觉得他将来要面对非常多的艰难。癌症给他本人和他的家庭会带来巨大的打击，接下来的化疗和康复更是极大的煎熬，至于面对未竟之事业更是人生不能承受之重。

我和浦江教授熟识是从近几年开始的，尽管见面晤谈次数并不算多，但是彼此都有很好的印象。我为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开设“《四库全书总目》研究”课程之前，他在历史系开设“《四

库全书总目》研读”课程已经有好几年了。选修研究课的学生中有一些也上过他的课，选修他研读课的同学偶尔还跑过来问我刘老师的作业怎么做。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有了一些共同的话题。后来，他邀我评议过历史系的博士学位论文，我也赠送新书请他指教，我们的交往多了起来。

记得在2013年的一次会议上，我们聊了很长时间，谈及了讲授《四库全书总目》的体会，交换了对于史学界动向和古籍整理情况的看法。

来这儿之前，我又读了浦江教授在病中所写关于《四库全书总目》纂修过程的三篇研究文章，写法相当细腻，思虑相当周全，很有史家风范。他做历史研究，特别是辽金史研究，正是从考订文献史料、注重文献学训练开始的。与问题意识相比，这种素养在我们这个年代似乎不再被特别强调了。然而，问题意识从何而来？学术创新从何而来？答案其实是清楚的，这一切都必须建立在对文献史料的精熟、贯通和把握上。不光对文献史料本身了然于心，浦江教授对全国的古籍整理情况也相当熟悉，对近些年古籍整理重要成果的优缺点、古籍整理专业团队的优缺点也十分清楚。他所做的学问，一方面有像辽金史、契丹文这样的专家之学，另一方面也有立足于大文献、大问题、大格局的通人之学。其实，这种学术进路和志趣在我们这个年代也不太多见。我想，这些都是值得我们省思的。

浦江教授在历史学上的贡献，各位先生已经说了很多，而在文献学方面的贡献较少有专门论述。比如说，他对文献史料的考证旧史著作的整理，包括《大金国志》、《辽史》一类的史书，还有宋辽金史的其他史料，应该说非常之精到。不仅如此，有些文

章的论证过程也具有典范意义。又比如,他对契丹小字的全面整理,包括编制《契丹小字词汇索引》,应该说具有集成开拓之功。编制索引是重要的学术工作,高质量的索引可以引领研究风气,并非只是材料收集分类之事,可惜现在的史学研究者很少会花时间来。再比如,他对《四库全书总目》的研究,与文献学界、图书馆学界的研究有不太一样的思路。除了继续关注各书提要本身之外,他特别重视提要撰修过程的细节,他那一篇研究台湾所藏《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的文章就是一个例子。我想,他在文献学方面的贡献也需要传承和发扬,这一点非常重要。

和大家一样,我和浦江教授的交往也没有特别多的日常谈话。从他那里,我听到过他对历史学界乃至整个人文学界的一些感想和认识。大凡他所发现的问题都相当精准,他所发表的意见也相当中肯。作为历史学者,他不光对史部典籍很熟悉,对于经部、子部、集部文献也非常熟悉,这也是很难得的。我个人在研究宋代经学与政治之关系的过程中,也受到他的一些启发。比如,前几年我撰写一篇讨论宋儒“天下观”的文章,就参考过他有关辽金德运及正统问题的卓见。

前面几位先生说,浦江教授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学术引领者、组织者和研究者,同时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教师。他刚过世时,我曾写过几句话简述他的学术人生,概括成“考文究史真学士,熔古铸今是人师”十四个字。为什么说“考文究史”呢?大家知道,他学史是从文献史料开始的,是从对史料本身的考辨梳理而进入史学研究的。为什么说“熔古铸今”呢?除了授课带学生以外,他还会闲谈很多学术界的见闻掌故。但他的闲谈并不止于



闲谈,而是在宏阔的学术史脉络中有自己的提炼,有自己的判断,堪为同辈后学的良师益友。

我知道,浦江教授后来的化疗过程,开始是比较好的,中间经过一些反复,最后却出现了令人扼腕的情况,感觉非常痛心。回过头来想,他最值得我们纪念的就是他的为人和治学。他是一个待人真诚的人,也是一个视野开阔的人,这两点相当了不起。因为待人真诚,便会有平易之心、直言不讳之心;因为视野开阔,便会站得高、看得远。当然,他还是一个勤学精思的人,在承担那么多行政事务的情况下却能够持之以恒地做学术研究、想学术问题,这一点也很不容易。大家都说他是纯粹的学者,我非常认同。

最后,我只想说,浦江教授千古!

2015年1月21日口头发言

5月7日修订成稿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暨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副教授)

## 我与刘浦江教授的学术交往

周 峰

2014年1月6日午夜刘浦江教授与世长辞，当在微信中得到消息时，深感悲痛与突然。因为当天上午我还和刘老师的高足康鹏兄通过电话，得知刘老师的病情有所好转，准备明天从重庆垫江老家返回北京。1月9日在东北义园告别厅送别了刘老师，回顾与刘老师的十几年间的交往，确实是受教良多。

1993年大学毕业之后，我进入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工作。之后，由于该所发掘的曾列入全国年度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的金中都水关遗址要筹建北京辽金城垣博物馆，而博物馆正是由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负责筹建，因而我于1994年开始在该馆工作。由于工作的需要，开始接触辽金史并初窥其堂奥，先后也发表了几篇习作。这时，刘浦江老师的一些论文我已经拜读过，但是人还未见过。1999年，刘老师的第一部著作《辽金史论》出版后，我当即购得一册并认真学习，当时即觉得在当时的辽金史学界，刘老师已堪称是第一流的学者。大概也是在同一年的一天，当时我正在博物馆的展厅值班，北大中古史中心的老师来馆里参观，我第一次和刘老师得以见面。当时的第一感觉是刘老师真年轻啊，面相很像一个高中生。当时虽未过多交谈，但刘老师却提到了我于前一年发表的《金代近侍初探》，认为写得不错。这对于辽金史的初学者来说，是一个莫大的鼓励与提携。2003年，刘

老师的第二部著作《二十世纪辽金史论著目录》出版之后，题赠了我一部。此类论著目录，过去国内国外、公开非公开都出版过一些，如陈庆浩编《宋辽金史书籍论文目录通检中文部分（1900至1975）》（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1978年）、北京辽金城垣博物馆编《20世纪辽金史学论文目录索引》（内部，2003年），但是刘老师的目录无疑是收录最全，编排最科学的，为辽金史学人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此时，我已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专职从事辽金史的研究工作，因而对于辽金史论著目录的搜集与整理也比较关注，刘老师的著作出版后，我进行了一些搜集、补遗的工作，先后辑得刘著未收主要发表于各地文史资料等内部刊物的论著目录430余条，编成《二十世纪辽金史论著目录补遗》及《二十世纪辽金史论著目录补遗续》，发表于台湾中兴大学王明荪教授主办的《辽夏金元史教研通讯》2004年第1、2期上。当时特意说明“谨作为刘著续貂之狗尾。”之后，我又将这项工作持续下去，21世纪以来的年度辽金史论著目录都已发表，而2001至2010年的总的目录也已编好，共收录将近7100条，将由花木兰出版社于2016年出版，以此十年的数量与整个20世纪的9600余条相比，可以看出辽金史研究的长足进展与广大辽金史学人的奋斗历程。

2002年，拙著《完颜亮评传》出版之后，呈送刘老师指正，刘老师在予以肯定的同时，也指出了一些错误，最使我汗颜的是，还有一些硬伤。如有一条史料出自《三朝北盟会编》卷230所引的《崔陟孙准夫、梁叟上两府劄子》，我错标成了《崔陟、孙准夫、梁叟上两府劄子》，实际上崔准夫是崔陟的孙子，我却理解成了两个人崔陟和孙准夫。《三朝北盟会编》虽然我通读过一遍，但

由此也看出当时确实是读书不精，这是之后乃至将来都应该引以为戒的。

2004年，应刘浦江老师之邀，刘凤翥先生在北大开了一个学期的契丹文字课，刘老师和他的学生全程听讲，我也侧身其列，不时得其教益。正如刘先生所说：“他和他的学生不仅认真听讲，还课下认真讨论和复习。他从而掌握了契丹文字的有关知识。并把这种知识运用到教学和科研中去。从此之后，他教出来的学生个个都精通契丹文字。他和他的学生都有有创见性的契丹文字方面的论著发表。”2014年，刘老师和康鹏兄主编的《契丹小字词汇索引》（中华书局）出版，这是他们的阶段性成果，如果天假其年，刘老师肯定会在契丹文字研究领域做出更大的贡献。

2006年我评上副研究员之后，承蒙刘老师的抬爱，充当了刘老师一些学生的学位论文评阅人及答辩委员会委员，如2007年，评阅了阴善和的硕士论文《金朝俸禄制度研究》；2010年评阅了乐日乐的硕士论文《辽金郎君群体研究》及邱靖嘉的硕士论文《辽朝皇位继承制度研究》。2007年，担任了康鹏的博士论文《辽代五京体制研究》的答辩委员会委员。评阅这些论文，无疑也是一个学习、提高的过程。

我是在2010年开始在职师从史金波先生攻读西夏文史方向的博士学位，博士论文的题目是《西夏文〈亥年新法·第三〉译释与研究》，虽然是西夏方向的，但是论文中有些章节是就西夏的法律与辽金作比较研究。因此，刘老师是答辩委员会的当然人选。尽管论文写得比较仓促，存在着种种不足，但刘老师还是予以了充分的肯定，使得答辩得以顺利通过。

2014年3月底、4月初,我参加了由邯郸学院主办的“新发现元代夏汉文合璧墓志铭研讨会”,刘老师也参加了此次会议,这是我最后一次和刘老师见面。在会后组织参观响堂山石窟时,刘老师提到最近老是腿疼。之后不久,就查出了身患癌症。在他生病期间,由于化疗之后病人免疫力低下,以及他本人谢绝探视,因此未能前往探视,这不能说不是一个遗憾。

回顾与刘老师15年的交往,确实可以说是君子之交淡如水,没有更多的个人交往,有的只是学术上的交流。由于刘老师年长我11岁,不敢说亦师亦友,我是一直视其为师的。刘老师的学生康鹏、陈晓伟等也不但是我同院、同所乃至同一研究室的同事,也是很好的朋友,他们都活跃在辽金史、民族史研究的第一线。可以说确实做到了薪火相传,刘老师的学术事业也必将在众多的弟子身上得以延续。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 师教二十年杂忆

——怀念刘浦江老师

党宝海

刘浦江老师给我们历史系 91 级本科生上选修课是在 1995 年。我选了这门由刘老师和邓小南老师、张希清老师合开的“宋辽金史专题”课。三位老师各讲一部分，刘老师给我们讲辽金史部分的时候已到了课程的最后阶段，只讲了两大专题：“辽代的政治制度与契丹社会”、“女真的政治军事制度与社会经济”。在辽代部分，刘老师讲述了辽朝国号的变化、辽朝的政治体制、契丹社会的特殊性、辽代的民族融合问题、辽朝的灭亡。在金代部分，授课的重点为女真的封建化与汉化。刘老师讲课语速很快，有的时候我们甚至来不及做笔记。讲到高兴处，他偶尔会情不自禁地笑起来，对学生很有感染力。刘老师尽管是给我们本科生上课，但讲课内容并非纯粹的知识灌输，而是以问题为导向，在两个大专题之下，每周讲若干小专题，一般会介绍相关问题的学术简史、新近研究动态，最后通常会阐述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专题有征服王朝论的产生和理论局限，辽朝斡鲁朵制度、四时纳钵和行朝政治，五京的性质及其作用，勃极烈与汉地枢密院的执掌，金熙宗、海陵王之比较，辽金文化论等。在征服王朝论中，我们第一次接触到魏特夫(Karl A. Wittfogel)、冯家昇的名著《中国社会史——辽》(*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 907—1125)。关于斡鲁朵和四时纳钵，刘老师重点介绍了邓广铭先生和杨若薇博士的研究，指出杨若薇《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中的不少看法来自她的导师邓先生。在辽金文化论方面，刘老师梳理了历代学者的相关评论，重点谈了对“辽以释废，金以儒亡”这一传统观点的看法，关于前者，刘老师从崇佛与辽的积弱、崇佛的多方面影响加以分析；对于后者，刘老师比较了“征服王朝论”和女真全盘汉化说，从女真统治者对待汉化的态度、女真进士科的创立、女真贵族对儒学的崇尚、一般女真百姓对汉文化的趋同、传统尚武精神的沦丧、异族通婚等几个方面做了讲解。从后来刘老师发表的论文来看，他当时讲课的内容多包含自己的思考，有些是他当时正在研究的课题。就此而言，刘老师是在与学生一起分享他的新成果。

我的“宋辽金史专题”课成绩一般。除了上课之外，和刘老师没有更多交往。在读硕士研究生期间，我和历史系94级的谭星宇比较熟，知道他当时在刘老师的指导下做《太平寰宇记》的研究，刘老师对他督促较多。1999年冬，刘老师托谭星宇把他的第一本论文集《辽金史论》赠我，书上有刘老师的题字“宝海同学惠正”。我平时向刘老师请益不多，得到刘老师的赠书，知道这是对我的一种鼓励，很感动。2002年夏我存放在45楼2单元宿舍小仓库的一些书籍被维修宿舍楼的民工窃走转售，有些师长给我的赠书因此而失落。幸运的是，刘老师的这本《辽金史论》因寄放在北大微电子所友人于民家中而免遭此劫。

2002年，刘老师编写《二十世纪辽金史论著目录》的工作基本完工，对所收欧美学者的研究信息不太满意。我当时对德国学者傅海博(Herbert Franke)的研究成果有较多了解，愿意提

供一点补充。根据傅海博祝寿文集收录的论著目录，我译出了几种篇名提供给刘老师。一年后《二十世纪辽金史论著目录》出版，刘老师赠我一部。在书的前言部分，居然对我表示了感谢。我不过是提供了几条简单的论著条目而已，和全书的丰富信息相比，实在微不足道。刘老师的做法让我感受到一位长者的道德风范。

2003年我博士毕业，在本校做博士后，偶尔能在校园里见到刘老师，每次见面总要聊上两句。有时是在午饭时间偶遇于食堂，那就边吃边聊，基本上都是我听刘老师讲，内容通常是各种学界掌故，偶尔刘老师也会就某人某事问问我，但总体都是刘老师讲。记得有一次在老学三食堂，单是讲邓广铭、陈述两位先生的往事就讲了一中午。那时，刘老师对语言学的兴趣正浓，我们有时会在中文系本科生的音韵学课上相遇。因为刘老师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我和刘老师开玩笑，说学生们会把他当成来蹭课的研究生。刘老师听这门课很认真，老师给学生布置的课下习题，刘老师都会找来做。音韵学需要大量背诵、练习，我后来没有坚持听。出于对音韵学的重视，刘老师不仅自己努力学，后来还要求自己的一些研究生也学习这门课。应当说，有了音韵学的基础，对构拟用汉字记写的契丹语、女真语词汇很有帮助。

早在90年代末，刘老师对契丹小字已经有一定的学术积累，并能独立研究，1999年他在《考古》上发表了释读契丹小字的论文《内蒙古敖汉旗出土的金代契丹小字墓志残石考释》，但刘老师仍感觉不足。2004年上半年他邀请刘凤翥先生来北大讲契丹字，尤其是契丹小字。听课的人不多，有刘老师和他的研



研究生康鹏、尤李、王超，邓小南老师的研究生张祎等。刘老师把开课的消息通知了我，我和东语系的唐均差不多完整地听完了这门课。最初课堂是在中古史中心的报告厅，后来由于要放投影和张挂拓片，上课地点转移到文史楼。刘先生把他自己拓制的契丹大、小字碑刻拓片带到课堂，有时还带来他夫人李春敏女士按照原大誊录的契丹字碑文，令人大开眼界。这门课以刘先生的讲述为主，但永远坐在第一排的刘老师插话较多，很多提问是关于释读某个具体契丹小字词汇的。我感到当时刘老师对契丹小字的辨识已经相当熟稔，他的提问总能得到刘凤翥先生的积极回应，不查阅任何资料，刘先生常当即举出相关的词例加以解释说明，有时还在黑板上直接写出契丹字原文。用刘老师的话说，刘凤翥先生已经把当时已知的契丹小字资料尽数铭记于心了。在最后一讲，刘先生特意带来全套的拓碑工具，详细讲授拓片的制作方法。我对契丹小字纯粹外行，听这门课的收获远远高于预期。由于上课人少，有时两位老师也会从契丹字研究引申开来，谈些学界掌故。其中的部分故事在刘凤翥先生2005年出版的《遍访契丹文字话拓碑》中写到了，但仍有一些不便写出的未见于该书。一个学期过得很快，最后一课结束，大家走出文史楼，来到图书馆东门前合影留念（见附图）。课程结束后，我没有继续学习契丹字，更没有对契丹字资料做研究。可能因为我是当年“契丹文字研究”班的老学员吧，2014年，刘老师把他主持编写的《契丹小字词汇索引》赠给我一部。这门课是很值得回忆和纪念的：它很可能是中国高校中第一次系统讲授的契丹字课程，至少应是文革后北大历史系第一次开设民族语文课程吧。



契丹文字研究班结课合影 康鹏提供

2005年10月，中国民族史学会在重庆召开第十次学术讨论会。我和刘老师一起参加了这个会。刘老师说，他的老家在重庆垫江，他先走两天，利用这次开会回老家看看。开会的地点是在西南大学，我和刘老师虽然同屋，但常有与会学者到房间找刘老师谈话。我在旁陪坐而已，与刘老师谈得不多，只是注意到刘老师生活上很讲卫生，连洗漱用品和水杯都只用自带的。会议结束后，我们一起返回北京，路上和刘老师谈得比较多。他是北大79级本科生，而我对80年代的北大很好奇，问到很多当时学校和历史系的人和事，刘老师对各种情况的熟悉令我大长见识。他还向我谈起自己在大学本科时的爱好之一是体育。我很惊讶，因为几乎从未见过刘老师做体育锻炼。刘老师说，自己是纸上谈兵，喜欢看体育、谈体育、琢磨体育，但自己并不实践。他说当时的体育杂志和报纸种类不多，他几乎遍览无遗，自己订阅的报刊上有精彩的文章，还会剪下来分类收藏，到本科毕业时收

集的资料已经相当丰富。谈到高兴处,他说有一个简单的问题,考考我的体育常识:按现在的比赛规则,假定运动员水平相同,用4乘100米接力的方式跑完400米所需的时间短,还是按照100米的速度乘以4的时间短。考虑到接力的过程中交接棒需要时间,我当时回答,百米时间乘4耗时短。听了我的答案,刘老师说:你体育知识不过关,对田径比赛规则不熟,是4人接力快。根据比赛规则,短跑运动员是在奔跑中交接棒,省去了启动、加速所需的时间,可以用大致接近最快的奔跑速度跑完全程。如果按百米时间乘以4,每个单位时间内都包括了由静止状态到加速至最快速度所需的时间,跑完4段所用的时间一定多于接力的方式……就这样聊到晚饭时间,我吃方便面,刘老师的晚饭很别致,是一种自加热的咖喱牛肉饭,饭菜用厚的锡纸盒子包装,塑料包装袋里装着一盒能发热的物质,只要加水就能发出热量。刘老师一边热饭,一边笑着说:新事物,尝试一下。

2005年我刚留系任教,兼任系科研秘书。此后不久就赶上教育部的高校本科教学评估,全校上下总动员,准备各项评估资料。系里各方面的工作突然增加了许多。我被临时选做系主任刘老师的助手。这使我有机会和刘老师一起工作,对刘老师的行政才能有了直接的了解。刘老师心思缜密,系里的大事小情记得滴水不漏。由于方方面面头绪很多,时间又紧,刘老师常在深夜打来电话,交办各种事情。时间一长,我妻子也知道了刘老师的这个特点,遇到晚上11点之后的电话,她就说,肯定是刘老师打来的。基本不差。学科评审结束,我不再给刘老师做助手,但刘老师深夜来电的习惯依然如故,有时候讨论问题一聊就是很长时间。我这才知道,深夜工作其实是刘老师生活的常态。

刘老师对学生的科研和社会实践很重视。2005年系里对本科生课外实践的方案做了调整，常规的教学参观改为学生自由结组、自己设计选题做社会调查，2004级和2005级的学生们都写出了调查报告，合编为报告集《体国经野》和《云行》。刘老师把这两份报告集送给我，对其中的好文章多有赞语。了解刘老师的师生都知道，他对学生要求严格，有时对学生的批评极为严厉。但这只是一个方面，他对认真向学的优秀学生从不吝惜自己的褒扬。本系的本科生、古代史专业的研究生，谁学术表现好，有培养前途，刘老师了解得一清二楚。不仅如此，他曾对我说，北师大的研究生孙建权纠正了他关于金代纳钵研究的一处错误，读书细心，是可造之才。谈话当天，刘老师还把他与孙建权的通信转发给我。爱才惜才由此可见一斑。

由于和刘老师交往较多，也会谈到一些生活琐事。刘老师建议女儿如何填写高考志愿的事给我留下了很深印象。当时，刘老师的女儿正在准备高考，刘老师为了能够提出适当的建议，根据他女儿的兴趣、成绩、未来择业的方向、各高校相关学科的实力等，进行了综合研判，最后为女儿选定西南财经大学的金融专业。我对他的“工作”方法很感兴趣，一次特意请教。刘老师说，依他女儿的成绩，可以有两个选择，上一流大学的一般专业，或是上较好大学的一流专业。从学习的角度，他建议选后者。一流专业在各校的分布情况怎么判断，有个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看这个专业国家重点学科分布。刘老师对金融专业的国家重点学科在全国高校的设置情况如数家珍，一口气说出若干校名，显然是经过查询和思考的。这件事让我看到了一个父亲对子女的爱。

上面谈到，刘老师下了较大工夫学习契丹字和汉语音韵学，

目的是在民族史的研究中能够“预流”——利用研究对象的本族语言文字研究他们的历史。仅就契丹史、辽史而言，目前存世的汉文史料无疑是绝对的主体，但契丹字资料做为第一手的原始史料，直接反映了契丹的语言特征、思想观念、职官制度、社会习俗等，其研究价值是汉文史料所无法替代的。刘老师的名作《契丹名、字初释——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父子连名制》，只有在对契丹史料做深入的解读之后才能写出。《契丹小字词汇索引》的编纂和出版，为学界利用契丹字史料将提供很大便利。我参加工作之初，刘老师特意叮嘱我注意民族语文的学习，我想他对我要求同样是出于研究“预流”的考虑。2011年我的一篇文章和刘老师的《再论契丹人的父子连名制——以近年出土的契丹大小字石刻为中心》刊登在《清华元史》的同一辑上。一个傍晚我与刘老师在北大西门偶遇，一起推车步行，聊了一会儿。刘老师谈到我的那篇小文章，肯定了我使用蒙古文资料做研究的尝试，还说了一些鼓励的话。至今回忆，宛如昨日。北大民族史的研究重视民族语文的学习，刘老师应是开风气者之一。

近年来，刘老师多次表示，自己的研究方向将逐渐转向宋史。去年在出席博士生预答辩的间隙，我和他闲聊，他表现出对思想文化史的浓厚兴趣。继历代正统论的研究之后，刘老师把目光又投向了古代中国关于民族国家的思想脉络。我能感受到，刘老师已经形成了宏观的研究设想，并且在着手研究具体问题了。然而，随着病情的发展，他的研究计划未能实现。

得知刘老师生病住院后，我去医院探望。那是刘老师开始化疗的前一天，在一间多人病房中，刘老师平静地躺在病床上输液。他见张帆老师和我来了，就倚着被子和我们简单讲了自己

的病情和治疗的情况，仍是那种较快的语速，神采依旧。邱靖嘉、陈晓伟两位学生在病房陪护，尽心尽力，令临床一位北京某高校的老师颇为羡慕。刘老师谈了自己最近的一些感想，其中提到他觉得自己的研究能力发挥了百分之七十。虽然没有就此谈更多，但我们能从中听到一种莫名的遗憾。

刘老师去世后，我写了一副挽联，由于自己不满意，只给刘老师的学生苗润博看过。现在写在这里：“发轫三朝故典卅载耕耘硕学何止古史；立意千里宏图一世规摹远游竟在中年。”据刘老师回忆，他的学术道路真正始于协助邓广铭先生整理和研究南宋徐梦莘汇纂的《三朝北盟会编》，自那以后近三十载勤谨治学，上下求索，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学术视野上自先秦下迄当代。对于自己的学术事业，刘老师做过深入的思考和规划，他的学术抱负是极为远大的。可惜天不假年，早归道山！

元代文学家元明善五十四岁辞世。马祖常在为元明善撰写的神道碑中对他的诗文和影响做了这样的评论：“出入秦汉之间，本之于六经以涵泳其膏泽，参之于诸子百家以骋其辨刻而不见其迹，新而必自己出，蔚乎其华敷，鑽乎其古声。倡古学于当世，为一代之文宗者，柳城姚燧暨公而已。信乎，其必传也。虽然才用而未尽，积厚而施寡，征之于天，其善后也无疑。”

刘老师去世时与元明善同龄，“才用而未尽，积厚而施寡”，也大略相当。刘老师走了，但他的音容笑貌、嘉言懿行活在师长、亲友、学生的心中，他的学术贡献也必将超越生命的局限，传之久远。

（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 一位纯学者的生涯

——怀念刘浦江老师

余蔚

刘浦江老师想必是个非常严肃而高傲的人。在《辽金史论》的“自序”中，他所关注的层面，他的隐忧和期望，都令我耳目一新，也给我留下这样的第一印象。“我们处在一个价值判断力彻底沦丧的时代，人们不得不依靠序引、‘书评’或者获什么奖之类的名堂去衡量学术水准。这真是学者的最大悲哀。但无论如何，我的著作是决计不要名家作序的。于是我很坦然地写下这篇自序。”这是我第一次拜读他的作品，其中所收文章的风格犀利，思路清晰到了精确的程度，没有多余的词句。这样的作者，当然有资格不借名家之序确立他的地位，他完全应该如此自信。但他竟直截了当地把这个意思形诸文字，似乎和学术生态很有距离，或者他很不易接近吧？十来年间，篇篇发覆之作不断强固着我的印象。但是在首次拜会他之后，这个印象在某些方面便被颠覆了。

首次拜会是在2012年的东北学术考察之前，从第一句话开始，便觉得刘老师待人全无隔膜，见事甚明，却无城府，心中的真诚，在他年轻的面孔上一览无遗。首尾五天，数十个小时的共处，他几乎是无话不可说，这倒是很合乎我当时看到“决计不要名家作序”之时感受到的直接与锐利，但只谈学术之事而不及其

余——无论是宋辽金史的发展前景，还是高校学科建设，处处显示不同寻常的襟怀、眼界与穿透力。记忆特别深刻的是他细数历次学科评估的情节，对复旦历史学科的优势与不足条分缕析，并且一一指出改进之策。他对于大学科的了解之全面，令我非常惊诧。我丝毫不怀疑，他在北大历史学科的学术管理职务以及相应的全国历史学科的建设上，投入了无数的心力。学者和学术官员关心“差距”、“一流”，或者为历史学科整体地位的持续低落而忧心忡忡，然而像刘老师这样跳出所在门闾，实实在在做学科建设的，永远都嫌太少。而当我后知后觉地听说一级学科评估又被轻飘飘地取消了，心中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

高傲，即使是对我这个后学，也是看不到的。但也未必全然没有。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对学术的纯粹性的追求与维护，以及疏远名利的外在表现。一旦某条线被触及了，那还是会严厉到不留情面的。

考察期间某次与某县文保部门的交流，基层人员大多在强调本地有多少有价值的文物和遗址需要保护，而官员则滔滔不绝地讲述关于开发的思路，关于如何以文保工作促进旅游休闲的规划，刘老师脸上逐渐泛起不以为然的神色。直至思路活跃、能言善辩的主管官员提出宏大思路：“本县是否可以称为‘某族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他终于忍耐不住：“可否加‘之一’二字？”东道主充满期待地问：“能不能去掉这两个字？”刘老师眼镜后闪着精光，以罕有的慢语速答道：“我不认为这样可以！”对于一位纯粹的学者来说，若逢“价值判断力”之“沦丧”触及了学术的底限，便是“之一”也是不可退让的。

次年在津门再会，刘老师问我近况如何，我恰在不久前承乏



系里本科生教学管理职事,忍不住狠狠抱怨职事如何琐碎,如何搅乱了我的研究大计。刘老师很感奇怪,因为他以前同时承担本科生、研究生教学管理,并且这还不是全部职事,单单是本科生教学,何至于令我如此狼狈?我答以本校本科生教学改革向来走在全国前列,部门皆以改革为本身存在之理由,院系的工作量也由此水涨船高。他略略思考一下,大约觉得没什么可以安慰我的,说了句“习惯就好”。事后细想,愈来愈觉惭愧。现今学者,没有承担什么社会事务的,恐怕是很难找到了。但是因此而本末倒置、学术上不作为的,却也不多见。反而是事务最繁忙的前辈学者,倒不会处处申说自己太忙以致耽误了什么。在他们,忙碌应该是一种常态,而对我来说呢,很可能心底里已经说服自己,可以将忙于琐事当作是自己懒惰的理由。

而今我将刘老师的百来篇论文细细梳理一遍,发现竟没有出于捧场、塞责而降低学术要求的痕迹,而是将重要的议题一个个点过去,贡献给学界如此多的精品,不禁羞愧惶惑愈甚。承担其他职事,只要与学术相关的,都是责任,不可轻弃。而学术,是生命,更不可以敷衍对待。我想我现在更能理解他所代表的一流学者的人生态度。直至他罹重疾荼毒,仍在治疗间隙忙于《辽史》校勘之事,学术与生命几乎是同时走到尽头。一位纯学者的生涯,走出这样的轨迹应该是非常完美了——虽然这个生涯实在是太短了些。

2012年考察结束即将告别,我非常正式地提出请求:“刘老师,若您刚好有事在上海停留,我想顺道‘剥削’一场讲座。”他当时痛快地答应下来。仅仅一年多之后,便惊悉他为病魔所乘,仅逾二年,竟归道山!嗟恨痛惜之余,我偶尔也会想起这个未完成

的讲座，深憾复旦学子无缘亲睹这位纯学者的风采。但再想想，其实也无大碍。毕竟学子们——以及我自己——还可以一直读他的文章，读他的人生，一定能悟到很多。

2015年5月

（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 不仅仅是为了纪念

——追忆刘浦江老师

刁培俊

刘浦江老师远游了，获悉噩耗的1月7日凌晨和此后的几天，我都沉浸在莫名的悲戚和幽怨之中，似有更多的心绪难以排遣。而今，真的要写一篇追忆他的文字，打开电脑的一刹那间，千头万绪和千言万语都盘桓脑海，一时间却又不知写些什么。

获悉浦江老师患病的消息，还是陈晓伟兄告诉我的。那时的震惊与痛心，难以言宣。我随后给晓伟的言谈中表述：或许，我的悲戚似远逾于浦江老师自身患病的痛苦。我担心的，更多是我心目中学术丰碑的倒塌，邓广铭先生学术谱系中重要一环的断裂——浦江老师应该是邓广铭先生最年轻的学生，亦是传承与发扬邓先生学术最具品格的一位，尤其是在辽金史研究领域。随后的半年间，因为受制于他的静养所需，不能亲自前去探望，通过陈晓伟、赵永磊等几位学弟，我在不同渠道探询着他的病情，心中也不停地暗祷他能化险为夷，平安度过，继续为我心头“竖立”一个“真正学者的表率”，更长时段地延伸、薪传、光大太老师恭三先生的学脉。

我和浦江老师真正的交往并不是太多，面对面长时间交谈的次数不超过五次：2008年8月，中研院史语所主办的“传承与创新”会议；2013年9月初，北京大学举办的“宋代政治史研究的新视野”（这次会议中，浦江老师一定要我和他的几位学生一桌共餐，且在饭后和我们康鹏、林鹄、小林隆道、毛利英介等几个年轻人一起，在北大西门外的一家冷饮馆小聚）和2013年10月，南开大学举办的“宋元明国家与社会高端学术论坛”，这三次会议期间，是记忆中我和浦江老师交往最多的。2003—2007年间，我坚持参加邓小南老师组织的读书课，很多次都能见到他，间或都有一些简短的交谈，都属于礼节性的，通电话大约有六七次，也基本都是他打给我，先后询问学生（包括陈晓伟、苏显华、赵永磊及自厦门大学申请北大学位的其他几位，和南开大学入读北大的张良等）的情况和学术事宜（如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藏石刻梵文《故鉴公法师灵塔记》等），几乎每次通话的时间都是很长。更多的，我是从他的论著中了解他的研究，通过我感知的点滴记忆了解他的敬业精神。

追忆以往，最初真正熟悉刘浦江这个名字，那还是1997年我跟在先师漆侠先生身边求学的时候。记得1998年1月10日邓广铭先生辞世，此后的一段时间，漆侠先生一再谈及他跟随邓先生求学的诸多往事，感念邓先生的诸多恩赐，同时也就提及浦江老师。1999年暑假开学后，漆侠先生收到了浦江老师邮寄其《辽金史论》的一个邮包，我按照漆先生的叮嘱，将邮包中其他几本书一一送出，随后开始阅读漆侠先生所获的赠书。漆侠先生当时就说：刘浦江的论文风格和邓先生比较接近，都有一种“磅礴大气”在里面。读完一篇自序，即令我震惊和由衷钦佩。前辈

或平辈学者读到的也许是自傲，而我更多以为这里暗含着的是学术追求的境界，是自信，更是纯学术的一种精神。自此之后，我开始不间断地阅读他发表的各类文字，力争一篇不缺地阅读；他在日本《中国史学》和稀见论文集中发表的论文，我也多通过邮件，向他索求，而我尤其喜欢读他撰写的邓先生学术史类文章，和评介王曾瑜先生的《金朝军制》、李锡厚先生的《临潢集》，以及《正视陈寅恪》等文。我在2007年任教厦门大学后，也将他的几篇长文作为范本，选为必读，让自己的学生阅读、缩写他的论文。

随着苏显华、陈晓伟等学友前后赴北京大学历史系攻读学位，浦江老师几乎更多地给人说起刁培俊教学生如何如何用心和自有章法（据陈晓伟兄说，2011年8月我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表教学经验《知识、方法和能力》小文后，他还特意叮嘱晓伟等认真读一读），随后邓小南老师、李华瑞老师等也在不同场合再三褒扬。作为大学教师的本职所在，竟然被他多次褒扬，是出乎我意外的事。对我而言，在更多了解浦江老师自己对于培养学生的情况之后（他对研究生的培养极为用心，始终以高度负责的态度，殚精竭虑地给予深入指导，即便罹患重病，仍逐字逐句审订学生论文，用生命诠释了“师道”二字的深刻涵义。当我在追思会上读到《刘浦江教授生平简介》中的这段话时，热泪盈满了双眼），我越来越多地懂得了那是一种师长的鼓励，是一种惺惺相惜的理解，也是他多年来秉承的为师之道。

## 二

对于辽金史等学术领域，我只有初步了解，自没有资格评价浦江老师的学术；与浦江老师交往并不算多，也不敢妄论他的出处进退与为人处事，好在2015年1月21日追思会前后，包括邓小南、阎步克、荣新江、张帆、李鸿宾、李华瑞等前辈师长，和陈侃理、李鸣飞、苗润博等先进，都撰写文章，或评介浦江老师的为人和“吏才”，或发扬他的学术，都相当中肯，读来受益良多，也让我从更宽广的领域，了解到浦江老师的方方面面。这里，谨就个人对浦江老师的印象，略述一二。

我个人以为，虽然生活在20—21世纪的现代中国，浦江老师却是一位很“古典”的学者。我的印象，最为深刻的，大致包含以下三点。

第一，浦江老师对于邓广铭先生知遇之恩的感戴，对于师恩的追记，表现出他发自内心的“尊师”情节。一般以为，尊师重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何须赘言？孰不知，在当今中学、大学校园，“尊师”已如“敬老适所以贱老”一样，越来越成为一种“说辞”，越来越成为“远古”的“古典”。浦江老师是尊师的典范，值得我特别尊敬。他在十几篇文章中满怀深情地弘扬邓广铭先生的治学成就和学术精神，也一再对1987年10月8日那个“阳光灿烂的秋日”铭记难忘，对邓先生“总是心存一份深深地感激，刻骨铭心”，对于邓先生将“一个普普通通的青年，没有高学历，当时也还没有在学术上做出任何成绩”的他调回北大任教而铭感在心，并在邓先生去世之后，不但在学术研究领域，秉承邓先

生的教导,开拓创新,而且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各类报刊发表文章,发扬光大邓先生的学术精神。而浦江老师在去世前,特意叮嘱学生和家人们将他安葬在距邓广铭先生墓园的邻近处,更是饱含了浩瀚如烟渊深似海的旷世师生情谊。这已经不是单纯的感戴师恩,这已远远地超乎普通世人的所谓尊师。他自己曾经说:“我不是邓先生的入室弟子,从来不敢以门生自诩,恐有僭伪之嫌。甚至在他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我都没有勇气站到邓门弟子的行列中去。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我一生的学术道路中,邓先生是最重要的一位引路人,他对我的影响是决定性的。若是要编‘学案’的话,我自认为是邓先生的嫡系亲传。”记得2008年8月13日晚,在台北一同参加“传承与创新:九至十四世纪中国史青年学者研讨会”时,他兴致勃勃地跟我们几个年轻人说学界的趣事和奥运会的各个赛程,其中就有一句:你们看平田茂树他们日本学者很熟悉自己的学术谱系,我建议你们也编一个中国宋史研究的学术谱系。在我看来,漆侠先生“头白犹期序三千”,他一定也是想要自己编入“恭三学案”,从而“纪念我的恩师邓广铭先生”吧?!后来,厦门大学历史系的部分学生,在我的引导下,团队作战,搜求百端,曾经编写过20世纪以来的宋史研究学术系谱,惜乎并不成熟。

浦江老师撰写的纪念邓广铭先生的文章,不仅仅是对恩师的感铭,在我看来,更多的是对恩师的学术追慕,对恩师学术高起点、卓越追求的践履。我对史学史也浓有兴趣,但拜读浦江老师的这些文章,我更多地体悟到,这其中体现出中华传统师弟传承的诸多美德。漆侠先生和王曾瑜先生多次强调:对于老师最好的纪念,应该是发扬光大老师的学术,而在此基础上做出推进

性的研究。就辽金史和北方民族史等诸多研究领域而言，浦江老师切切实实地做到了，尤其是他以民族语文为解读取径的作法，更是引领和指示了学界未来的途径。《南齐书·文学传论》曾记载了南朝萧子显在回顾了汉魏以来作家作品时，曾言：“习玩为理，事久则渎，在乎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信矣夫？！

第二，浦江老师在教导研究生方面，也是颇为“古典”的做派，是传统师弟传承中的那种模式，令我敬佩。陈晓伟、苏显华等和我教学往还较多的学弟，报考他的（还有几位报考北大其他教授）研究生的时候，他都给我打来40分钟甚至更长一些的电话。在电话中，他会详细询问我对他（她）的了解，上过什么课，作业表现、学年和毕业论文、领悟能力、兴趣和爱好等等；有些他不清楚的问题，他会反复追问，几近穷追不舍，有些几乎令我难以更细致的回答。后来，赵永磊、张良两位具有南开大学求学经历的学弟报考北大，他同样也打来了电话或发来邮件，向我了解他们的各种情况。他的这种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无论是作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副系主任，还是作为研究生的导师，把好研究生推荐入学这个“卡口”，都可以视为对北大传统的固守，也自然是师辈优良传统的延续。信息资料易于获取、独生子女居多的当今中国，大学和研究生阶段的教育，须相应出现新的教学指导模式，既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又切实有效地在德智和言行出处进退等各个领域顺势引导，方可培养出21世纪的新一代优秀学者；传统教学模式不革新，将难以适应这一时代的要求。教师教导模式的更新，将会延续并影响到更下一代教育成效。我个人以为，浦江老师既承继了前辈培养研究生的优良做法，又适应



了新时代新发展新境况,2000年前后十几年内中国最优秀、最认真负责的辽金史领域的研究生导师,非他莫属。

2012年夏,我从厦门大学调回南开大学任教,陈晓伟数次从北京到天津找我聚会。两次很深的记忆是,在和我的对话交流过程中,陈晓伟不断地收到浦江老师的短信,不断地须第一时间回短信;即便是2014年上半年,浦江老师当时已在患病静养中,还是一如往常,不间断的短信,那一次还给晓伟打来时间较长的电话——是关于博士学位论文的具体指导,以及关于工作安排的叮嘱。作为一位研究生导师,传道授业解惑之外,还要对研究生的安身立命问题,一而再再而三地叮嘱、指导,浦江老师的人格魅力,也深深地感染了我。当初上学阶段,曾经有人说,漆侠先生是将对研究生的培养,当作了自己学术大厦的组成部分。而今,浦江老师又何尝不是如此,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后来,我也了解到刘浦江老师对于康鹏、邱靖嘉、苗润博等学友的教导和关切,几乎无一不是如此,也越来越敬仰浦江老师作为“人师”的伟岸和导师魅力。

第三,浦江老师的学术研究,也饱含着“古典”的因子。辽金等北方民族史的研究,自当属于“古典”的范畴,而将民族语文(契丹文、女真文、古突厥文、今古蒙古语等)作为这一领域研究的辅助,像他这种贯通北方民族史的视野和研究取径,已经使他跳出了传统辽金史学的藩篱,真正进入更为超远的学术境界。更重要的是,浦江老师还自己编著有《二十世纪辽金史论著目录》,与康鹏兄合作编著《契丹小字词汇索引》两部工具书,还引领着数位青年新锐修订中华书局二十四史之《辽史》;据我所知,此前,他和邓广铭先生一起,曾经将繁难不堪的《三朝北盟会编》

一书加以点校整理。此外，他还讲授如下研究生课程：《四库全书总目》研读、《三朝北盟会编》研读、《辽史》研读、契丹小字石刻研读。尤其是上述这些学术工作，在他人看来，或颇有“笨伯”的意味。在我看来，这也是很“古典”的，值得尊敬的。众所周知，当今中国高校的评鉴机制中，工具书和古籍整理，很多学校是不算数的，更不能作为代表作参加晋职和各类的评奖活动。或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在“为人之学”繁盛如斯的今天，这样的研究取径，自是很“古典”的。

浦江老师在治学、为师等诸多领域，都是我们的楷模。于我而言，不仅仅为了纪念和追忆浦江老师的风范，我更加追慕他那“古典”的认真负责的做事风格和高屋建瓴、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追慕他那坚持纯学术价值观的人生至高信念。他不仅是一位优秀的学者，一位令学生难以忘怀的教学名师，他更是不可替代的一代著名史家。

浦江老师英年辞世的那天，我曾勉力撰写“探蹟白马青牛运拓新境已有鸿文传百代，覃研长山黑水延展古今定存盛名谱千秋”（经赵永磊学弟润饰）；“恭三学脉殿军无，我恨天公收英才”。言不成文，谨此追忆我敬慕的刘浦江老师。

（作者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 刘浦江先生：从辽金史进入阿尔泰学

唐 均

我在 2013 年初受命编纂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学术集刊《华西语文学刊》第八辑“契丹学专辑”时，首先想到邀请熟识已有十年之久的刘浦江先生，希望他能在卷首设定的“学者访谈”栏目里，谈谈研究辽金史以及契丹、女真文字的经历和体会，以便给读者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东西，但被他以一句“为时尚早”干脆地拒绝了。我知道这是刘先生做人和做事的一贯风格，他从来不愿意在别人面前谈论自己在学术上的成就，因为这样会给人一种矜夸的感觉，所以即便是在受人邀请给学生讲授一些治学门径的时候，他也总是以年纪尚轻为由推掉。当时刘先生才 52 岁，我觉得时间还有的是，这次不成，将来总有再请的机会。谁知道就在 2015 年初，刘先生竟以 54 岁的盛年永远告别了他热爱的学术事业。

我从 1997 年起，就从当时就读于北大历史系和考古系的朋友口中，领略到了刘浦江先生为学与为人的一鳞半爪；但最早跟刘先生能够直接面对面，还是在“契丹文第一人”刘凤翥先生赴北京大学历史系开设契丹文研究生专修班期间。我自己是研究语言学的，学习契丹文，兴趣也全在语言学方面。而刘浦江先生学习契丹文，是为了深入研究辽金史，占有第一手的史料。正如刘凤翥先生在《刘浦江先生二三事》（《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2015年2月8日)里回忆的那样,刘浦江先生早在他的第一部专题论文集《辽金史论》出版的1999年,就投函刘凤翥先生,有意拜师学习契丹文。2004年上半年,由刘浦江先生一力促成的契丹文研究生专修班,终于在北大第一教学楼开展起来了。一个学期下来,刘浦江先生和他的几个学生(现供职于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的康鹏、圆明园管理处的尤李、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曹流等),还有包括我在内的几个来自北大外语学院的编外人员,大约有十多个人,从头到尾听完了刘凤翥先生讲授的契丹文大小字研究课程。从此以后,刘浦江先生所带的硕士生和博士生,都把掌握契丹文和女真文视为研究辽金史的必要条件。

当时我正在北大外语学院读博,那学期正好有一门必修课同这门契丹文字课时间冲突。由于第一次课时恰好必修课空,我就先抱着试试看的心里前去“蹭课”。刘凤翥先生因为长期在中国社科院民族所工作,平时给学生授课的机会是很少的,所以,这第一次课,他自己原本准备的两小时内容,一节课出头就讲完了,接下来眼看就要尴尬冷场。刘浦江先生马上召集大家,开始讨论刚才刘凤翥先生示范释读的契丹碑铭中的一个年号细节,并利用自己对辽金史汉文文献的熟谙,逐步引导各个求学者进行传世文献和出土碑铭资料之间的互证考察,有关契丹文字的问题也都汇总到刘凤翥先生跟前解决。课堂气氛不知不觉就变得活跃起来,第一次契丹文课程就这样圆满结束了。刘凤翥先生离开后,刘浦江先生还特地给我们讲,以后在听课时,大家可以随时提问,这样就可以延缓课程的节奏,使得刘凤翥先生能够逐渐适应两个课时的讲授任务。我们照此嘱咐办理,果然以后就很少再有类似的课堂冷场现象出现了。服膺于刘浦江

先生对课堂艺术的驾驭自如，这节课之后，我毫不犹豫把自己的专业课蹬掉了，整整一个学期，我都和刘浦江先生及其学生们一道，全程听完了刘凤翥先生的讲授；至于自己的专业课学分，我后来又多延宕了一学期的时间才将其补上，但我对此并无任何悔意。

还记得当时在课堂上，作为语文学家的刘凤翥先生和作为历史学家的刘浦江先生，常常就某一个具体问题，因考察角度的不同，发生针锋相对的讨论。但是，这种针尖对麦芒式的学术讨论，并未影响他们之间的友谊。我当时知识储备尚浅，对他们争论的问题，大多还是似懂非懂的；具体内容如何，如今也记不大清楚了。但是，两位刘先生在争论中表现出来的风度，以及当时课堂上的热烈气氛，却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当时刘浦江先生和他的学生通过手工摹录、机器复印、电脑处理等多种手段，复制、传播了很多刘凤翥先生提供的关于契丹文的第一手资料，又从日本等地辗转传回了不少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于契丹女真语文学研究最新进展的认识。

在掌握了契丹文之后，刘浦江先生很快就能把学到的知识应用于契丹文碑铭的整理和考订中去。无论是对汉文的《耶律元宁墓志铭》，还是对契丹小字的《耶律仁先墓志》和《耶律紉里墓志铭》以及金代《博州防御使墓志》残石等，刘先生的研究都已经远远突破了普通辽金史学者的旧有藩篱，而渐渐接近于国际东方学的一个重要分支——阿尔泰学(Altaic Studies)的模式。

所谓“阿尔泰学”，广义上指对使用阿尔泰语系古今诸种语言的民族、历史和文化的研究，狭义上仅指对阿尔泰语系古今诸语言和文字的研究。这些语言包括中国西北面的突厥语族、中

北面的蒙古语族和东北面的满洲—通古斯语族(有时也将朝鲜语和日语计入),它们构成了和中原王朝保持了长期交往的北方多个民族所使用的语言谱系。阿尔泰学诞生于19世纪中叶的欧洲,是欧洲人在对东方诸国的探险中获得的丰富语言资料和印欧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精密科学方法共同催生的,今天已经发展成一门极其重要而且牵涉面极广的国际性学科,在语文学、东方学和国际关系研究等方面都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不过这门学科在当代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基本上还局限于现今版图北部的新疆、内蒙等少数民族语言区域。

契丹人是辽朝的统治民族,已有多种证据显示,他们所操的语言应该属于蒙古语族,而女真人则是金朝的统治民族,他们所操的语言则属于满洲—通古斯语族,后来清朝的国语——满语,就是女真语的直系后代。因此,作为传统学科的辽金史,可以说与阿尔泰学的重叠部分繁多而复杂。若要在辽金史研究中取得超越前人的成绩,必须全面认识和深入了解作为国际显学之一的阿尔泰学。20世纪以来,契丹文和女真文的材料不断发掘整理出来,不少中国学者在这两种古文字的释读上做出过杰出的贡献。但是,就中国学界而言,不论是辽金史研究,还是契丹、女真文字的解读及其综合性的语文学,同阿尔泰学之间似乎一直没有什么明确而主动的交集。不仅如此,国际阿尔泰学界一直也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缺少同时对汉文文献非常熟悉的学者。

从知识的储备和治学的方向上审视,刘浦江先生无疑是打通辽金史、契丹女真语文学和阿尔泰学最合适的人选。就我所知,除了契丹文和女真文之外,刘浦江先生对其他古代阿尔泰语

言比如古突厥语和古蒙古语也有广泛的涉猎。2006年，他参加过北大中古史中心聘请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研究员乌兰女士开办的《蒙古秘史》读书班（主要研习最早的汉字记音古蒙语）；2007年，由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延聘的土耳其突厥学家涂逸珊（Isenbike Togan）女士开设的古突厥文读书班，刘先生也是积极的参加者之一。他曾把博士生陈晓伟送到内蒙古大学进修蒙古语，陈晓伟后来就利用学到的蒙古语翻译了已故蒙古学大家亦邻真的多篇蒙文论文。像刘先生这种上通突厥，下通蒙古的视野，已经使他跳出了传统辽金史学的藩篱，真正进入到更为宏大的阿尔泰学领域。由于熟谙汉文的辽金史料，学习过契丹女真文字，并且兼具阿尔泰学的宏观视野，使得刘先生在北方族名“阻卜”、契丹族“青牛白马”传说、辽朝国号、头下制度及契丹父子连名制等问题的探索和考证方面，都能发前人之所未发，不仅使中国的辽金史研究同国际学术接轨，同时也对国际学界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我在北大读博时，曾经和刘浦江先生通过两次长时间的电话（具体时间已不记得，大概是在2004—2005年间）。一次是讨论“阻卜”族名的解读，大约有40分钟，他跟我详细谈了他利用已故女真学大家金启孺先生所编《女真文辞典》解读出日本学者加藤晋平所作蒙古国女真文《九峰石壁记功碑》摹本中出现的女真文“阻卜”字样，由此大发感慨：利用契丹、女真语文学成果来拓宽辽金史研究范围的实践，的确行之有效。不过据我所知，刘先生并未系统学习过女真文字，但他却能够较好地利用女真文字的第一手材料，将自王国维发端的中国北方民族研究难题之一的阻卜和鞑靼族名研究进一步深化，个中缘由或许就跟他学

习契丹文字，同时悟出了如何利用解读成果更为丰富的女真文材料密切相关。另一次通话则长达1小时20多分钟，主要集中在他对契丹人父子连名制的解读上，他先是向我了解阿尔泰语系民族父子连名制的基本情况，在得到突厥人和蒙古人甚少父子连名制习俗遗存的回答之后，他抑制不住自己的兴奋，告诉我他在已经解读的契丹大小字人名中，发现了契丹人父子连名制的规律性表现，又说这个规律还可以辅助解释契丹人的名和字之间的有机联系，还感喟以前发现契丹语名词附加成分 \* -n 和 \* -in 变换规律的学者，可能由于历史文化视野的局限，距离他自己现在的发现就差“临门一脚”了。我当时的研究重心是西亚古代楔形文字，对阿尔泰语文学纯属业余爱好，只有在刘先生高亢而急促的兴奋语调中为他高兴的份儿，后来随着自己对阿尔泰学的逐渐深入，才愈来愈清晰地体味出刘先生进行学术探索的动力和魅力。

其实早在正式随刘凤翥先生学习契丹文之前，刘浦江先生就已经刊布过《二十世纪契丹语言文字研究论著目录》(2002)、《二十世纪女真语言文字研究论著目录》(2002)、《女真语言文字资料总目提要》(2002)、《近20年出土契丹大小字石刻综录》(2003)等系列论文，以及重要的工具书《二十世纪辽金史论著目录》(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10月)，对契丹女真文字解读和语文学的学科历史和现状可以说是做足了功课。他留下来的这些有关契丹文和女真文资料的目录和索引，相信必将继续服务于未来的阿尔泰学学者。在去世前，他和学生康鹏共同主编的《契丹小字词汇索引》(中华书局，2014年5月)也已正式出版了，这本书资料详赡，编排科学，可以说是体现了他在纯粹的契



丹语文学和阿尔泰学方面的最高成就。

作为辽金史这样的传统学科中培养出来的中国学者，刘浦江先生不仅第一个明确提出要利用契丹文和女真文史料来研究辽金史，从而有效突破了辽金史研究的瓶颈，还使得辽金史经由契丹女真语文学融入国际阿尔泰学之中。能有这样突破范式的见识和身体力行的实践，对一个已在中国最高人文学府——北京大学的历史系执教、且已享盛名的学者而言，实在是难能可贵、而又颇具启迪意义的。刘浦江先生虽然已经逝去，但相信由他引入的这种阿尔泰学理念，一定会在他辛勤培养出来的一批兼通甚至主攻契丹女真文的辽金史人才中，得到进一步的贯彻和实现。进一步理解，他这种自发与国际学术界先进水平接轨的视野和努力，更突破了单纯历史学科的局限，而具有提振我国学术研究态度的普遍意义。

本文以《怀念刘浦江先生》为题，刊于《南方都市报》  
2015年4月8日B15版“娱乐体育副刊·大家”栏目  
发表时有所删节  
(作者为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 亦师亦友亦家人

——怀念刘浦江先生

贾彦敏

不觉间浦江老师离开我们已经两个多月了，这段时间看了许多纪念文章，涉及刘老师的方方面面，心一次次被掀起，很痛的感觉……暗暗感慨他英年早逝的同时，也深深敬佩他坦诚的人格和严谨的态度。

说起和刘老师的交往，大部分还是在他任历史系副主任期间，因工作关系时有交集，他工作之细致、待人之真诚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记得2009年秋季，我刚刚接管研究生教务工作不久，研究生排课结束后，我从教务系统中将新的执行计划（课程表）下载并发给全体老师，请大家核实各自的课程信息。一般情况下任课老师看到上课信息没问题就不回复邮件了，其他诸如课程类别、学分和总学时是否匹配等因为都是事先报课时所确定的，所以也都不会太留意。但刘老师很快就回复了，问我个别课程学分和学时不符是怎么回事，我一愣，首先想到是否因为工作疏忽把老师的报课信息弄错了，赶紧在系统中检查，发现以前年度报课时就是这样，又电话咨询研究生院相关老师，得到的答复是以前学校对于学分和学时没做特别规定，院系老师怎么报就怎么录入课程库，如果想修改，只能以报新课的形式重新提交。弄明白后，我赶紧致电刘老师向他解释，刘老师语气非常

坚决地说，老师不可能这样报课，你赶紧改过来，学分和课时不符是你们录入课程信息时出现的失误。我感觉委屈，不服气地争辩说我已经查过老师的原始报课信息，并且已咨询研究生院，这种情况也不止我们院系存在。刘老师不为所动依然让我再向研究生院说明并修改课程信息，我赌气说研究生院说不能改只能重新报课怎么办？刘老师说你搞不定明天就别来上班了，我说好，就挂断了电话。然后继续其他工作，根本没有再咨询研究生院。第二天早上上班后打开电脑发现刘老师一封邮件，大意是说他又问了研究生院，正如我所说，系统无法修改只能重新报课云云，并说这件事误解了我，我心头一热。就在这时，电话响了，刘老师的！我抓起话筒还没来得及说话就听刘老师说：“小贾，我给你发了邮件看到没有？”我说看了，刘老师顿了一下说：“……嗯昨天的事我也问了研究生院，正如你所说……那就通知相关老师重新报课吧，学分和学时不匹配太不严谨了！”我马上照刘老师的话去做后续工作，感动之余也为自己的不成熟感到汗颜，更为刘老师的认真和近乎苛刻的严谨态度所折服。

每年的研究生复试工作也是刘老师极为重视的，因为这不仅关系到历史系的招生质量，也关系到莘莘学子的前途命运。这项工作既重要又非常琐碎，至少得提前一个礼拜就开始做准备，作为主管领导刘老师虽然对学校的政策了如指掌，但即使这样他也从不懈怠。每次面试大到人员分组、材料分类、面试规则、面试地点、时间的确定，小到纸张甚至各种颜色的笔和橡皮的分配等细节都不放过。有时候觉得自己够细心了，却还是会被刘老师在很细节的地方指出毛病，心里不免有些沮丧，刘老师却总是安慰似地说，幸亏是提前发现还来得及。正是刘老师这

样细致的考虑，才让历史系的招生工作能做到尽善尽美。

2014年3月间，我见到刘老师，发现他瘦了，就问怎么回事，他轻描淡写地说胃不好，接着问我：“听说你小孩今年高考，怎么样啊？”接着又告诉我高考应该注意什么等等，让我好生感动。再后来就传来了刘老师生病的消息，但我一直坚信以他平时的精神状态以及乐观的心态，肯定能闯过这个难关。在一段时间的治疗后，刘老师打电话告诉我们，病情已得到控制，很快就能回来上班，还电话叮嘱给他排上下学期的课程。这就是刘浦江先生，一位时时刻刻牵挂学生和北大历史系的老师，而这种关心与牵挂从他的言行中很自然地流露出来，毫无违和与造作，我坚信这就是刘老师高尚人格的真实体现。

不幸的消息在1月6日深夜传来，极其震惊，总觉得那个和我说要回来工作的刘老师是这么的有活力。直到1月9日的追悼会，虽一次次泪崩……仍然无法接受这个现实，不敢相信他已离我们而去。哪怕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刘老师依然有条不紊地坦然地打理着一切，包括对自己学生的安排，甚至自己生命最终的安息地……

幸甚至哉！在我的生命中能同这样一位至真至纯的老师有交集。对我而言，刘浦江老师亦师亦友亦家人。唯愿天堂没有病痛，还能继续他钟爱的研究，浦江老师，永远怀念您！

2015年4月

（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务办公室职工）

## 怀念哥哥

刘源远

我是刘浦江的妹妹，排行老三，也是家中的老幺。1968年出生时，妈妈说生了三个孩子，就让幺女儿随她姓吧。文革年代的取名都流行从诗词中选取，爸妈斟酌一番后，选中了毛主席的七律“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诗句中的最后两字，全名“罗翠微”。刘源远是为了纪念哥哥取的笔名。记得刚上小学一年级时，作业本封面自个儿写名字，因笔画太多，“微”字少写“反文”偏旁是常事，每次都是细心的哥哥发现后替我添上。长大些，为了让“轻淡青葱的山色”更翠绿，还嫌笔画不够多，非正式场合，自作主张将“微”字加上草字头。工作以后，常常每天需要签名几十次，心里头直呼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下一代一定取单名。

“我的儿子从小就很乖……”妈妈总是这样开头讲述哥哥。父母当年在北京部队工作，1959年妈妈在301解放军总医院工作时生下姐姐，取名“刘京”，两年后，即1961年的8月12日，妈妈调往上海空军医院工作时生下了哥哥，遂取名“刘浦江”，他俩都是按出生地取的名。怀上哥哥的时候，正值全国大搞爱国卫生运动，部队更甚。妈妈说挺着大肚子，整天和同事们一起整理清扫，抹呀抹呀，直到洁白的纱布块抹上去一尘不染才算过关。正是在这样的胎教作用下，哥哥自打出生起就爱整洁爱卫生。

同样是胎教的作用，出生在文斗武斗全国上下一片混乱文革时期的我，在物品整理、清洁卫生这方面远没有哥哥细致。“我们家男孩比女孩还爱整洁……”妈妈总是这样比较我和哥哥的差距。的确，哥哥的心很细腻，无论是学习还是生活，事无巨细，事必躬亲。

从我记事起，童年就是在哥哥的陪伴下度过的，正值文革时期幼儿园停办。那时，爸爸妈妈已转业回到家乡垫江县五洞区镇（当时隶属四川省），分别在学校和医院工作，我们家住在医院的家属院。五洞区镇地处川东平行岭谷丘陵地段，出门就是不高的山丘，一个连着一个，正是孩子们玩耍的乐园。听外婆说，武斗真枪实弹打得最厉害的时候，大人小孩都停产停课躲在家不敢出门，我那时还没有出生，哥哥也只有6岁，他把家里所有的棉被叠成堡垒，砌成门洞，让家人钻进去躲避流弹。哥哥也有男孩爱玩的一面。他是我们家属院里的孩子头。一到假期，一大群学龄前儿童叽叽喳喳跟在他后面，组织我们捉迷藏，比赛爬树、赛跑，一群玩猴在弯曲的山道上撒着欢儿，穿过树木的枯枝落叶，看路边花木荣枯转换，无数小小的收获、小小的喜悦，都是童年好奇心和梦想的起点，孩提的记忆里都是和哥哥在一起的点点滴滴往事。哥哥高中阶段，父母陆续调入垫江县城。2010年春天，80岁的父亲身患肺癌，已到晚期，趁回家乡探望父亲的机会，哥哥和家人一起时隔30年故地重游，就像探索历史的印迹一样，哥哥和我们一点一点努力找回儿时可以凭吊的记忆，那些斑驳的墙体，逶迤的山道，都是岁月的留痕，五洞桥上留下了全家人的合影，静谧的山峦赠与我们故乡温暖的记忆。

隔三差五，五洞区医院露天球场会挂上白色幕帘放映电影，

我们常常钻到幕布后面去玩，感受那心惊肉跳的战争场面，常常玩到都忘记了回家吃饭的时间。父母规定，女孩不能玩得太野，每餐饭前，只能听见哥哥唤我一声，就必须回家赶上吃饭的点。所以每次我估摸快到吃饭时辰，就只能在家附近玩耍。哥哥奉命出来唤我，明明就在眼皮底下，他却视而不见，两手合在嘴边，做成喇叭状，运足丹气，摇晃着脑袋，故作“远山的呼唤”：“翠微——翠微——”第一声我赶快应答，可他故意来上两声，三声，我知道是有意唤给爸妈听的，回去免不了遭到大人一顿责骂，他却在一旁做鬼脸。以后我吸取教训，一边高声应答一边飞一样奔进家门，让他的诡计不再得逞。临上小学，隔壁大几岁的小容神秘兮兮地告诉我：“你快穿牛鼻了……”回家悄悄问哥哥怎么回事，他一本正经告诫我：“你要上小学啦，就像给小牛穿鼻一样。”“疼吗？”“嗯——有点疼，每个小孩都这样，我们都穿过。”既然他们都这么说，每个孩子都要经历，那我必须勇敢面对。上学后每一天，暗地里既期待又害怕“穿鼻”那一天的到来，悄悄追问过他们，“快了，你等着吧。”一年后，悬着的心才放下来，敢情他们是在合伙欺骗我，我真是一个懵懂的小女孩，哥哥取笑我傻得可爱。哥哥还有一能事儿，那个年代食品供应奇缺，孩子们基本没什么零食可吃。妈妈想法弄来胡豆、黄豆炒熟，每天给三个孩子每人发放一小捧，可要不了十分钟就吃没了，又盼着第二天妈妈供给。可是奇怪，哥哥随时随地兜里都有剩余，拿出来往嘴里塞，我和姐姐很狐疑，他却狡黠一笑，一口咬定：“都是妈妈发的呀，你们俩不节省着吃……”这其中肯定有猫腻，时间一长终于露馅了。原来为了计划着吃，妈妈把零食装进小坛锁进柜里，可她万万没想到，柜子上面连着抽屉，哥哥正是取出了抽屉，用厨

房里的长勺伸进柜，把小坛里装的零食舀出来。终于“破案”了，但使用“作案工具”长勺却是他自己交待的，还自鸣得意“是受电影里特务搞情报活动启发后智取的”。当然，我生病的时候，哥哥也会拿出“智取”的零食慰藉小妹妹。那个年代没有丰富的娱乐工具，大人和小孩都盛行玩“甩2”、“升级”的扑克牌，4人玩，2人对边，哥哥姐姐他们大小孩玩，缺人的时候叫上我，所以4岁多我就和他们一起凑合着玩扑克牌，在牌桌上哥哥是一副据理力争，当仁不让的模样。后来在大学每逢寒暑假回家期间，哥哥还和我们一起玩儿时盛行的这种扑克牌游戏。但自从调入北大从事中古史研究以后，回家的次数就少了，一度时间里我们想见哥哥，只有依托他在电视频道播出的历史探索节目中的偶尔出境，永远是一身淡蓝色的西服或深蓝色夹克，普通话夹杂着乡音，他谈古论今，点化当下，展现出一个历史学者的博学与严谨。好容易回家乡一趟，也是随身携带着书籍，在有限的时间内见缝插针地读书、钻研，更别提和家人休闲娱乐了。

我2岁多一点，哥哥就用纸壳剪成方块写上汉字，教我识字，3岁我就能认识上百个汉字，经常有大人向我竖起大拇指：“不错”，上小学以后才弄明白“不错”是赞美的意思。我家饭桌的墙壁上并排张贴了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3岁开始，哥哥就抱我踩上板凳，教我看地图，了解中国，认识世界，各省的省会名称、各国的首都我都能一一背下来。当时流行小人书，我们四川叫画画儿书，上面是图，下面是简要的文字说明。有《小英雄雨来》、《南征北战》、《跟踪追击》、《看不见的战线》、《新来的小石柱》、《小兵张嘎》、《地雷战》、《地道战》等等，虽然自己能识字看懂，但不满足于文字的苍白注解，总是一遍遍缠着哥哥讲述，先



要问是“好人”还是“坏人”？他会讲解故事发生的背景，能把画面故事描述得绘声绘色，我百听不厌，一次又一次身临其境感受故事情节：公安抓特务时我哆嗦紧张，解放军打胜仗了我雀跃欢呼，旧社会童工受欺凌我跟着眼泪滴答……调动我不同的情绪是哥哥的能事儿，利用小孩爱憎分明的立场逗得我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也是他最开心的事儿。小院里画画儿书就数我们家的最多保存也最完好。哥哥把新买来的书在封面盖上“刘浦江”私章，按照购买时间先后顺序编号并整齐放置于用废弃木板装钉的简易书柜里，同院里小伙伴经常是排队借阅，但哥哥规定每次只能借一本，丢失了或归还时有损坏的坚决不再借给。不管是专业书籍还是其他书籍，哥哥都非常爱惜，他这一生看过的书，都不会出现卷角儿的现象。

哥哥从小爱读书，可以说是与书为伴。上世纪70年代高考尚未恢复，还是“读书无用论”盛行的时代，为了不增添大人的经济负担，他常常瞒住父母，在学校午餐时饿上一顿省钱去买书，课间、体育课都回到教室看书，连上厕所时也要悄悄揣上一本，蹲上半小时，以至于妈妈不得不敲厕所门或在他去厕所前实行搜身。学校里有些极左的老师甚至把他当成“白专”典型与“白卷英雄”张铁生相提并论比较批判。他博览群书，博闻强记，所以从小文科成绩就很好，作文写得特别棒，每次都是班上或全年级的范文。哥哥的恩师垫江一中教学语文的龚百堪老师，曾经这样评价他高中时代的作文，“文静的外表下面内心却似一团火，写出来的文章表达的思想感情却那么淳朴炽烈……”常常在凌晨一两点，睡梦中一次次被哥哥抑扬顿挫的诵读声惊醒，原来是他在创作、锤炼语句，欣赏自己的作品，或诗歌，或散文，后

来他撰写出一本一本的学术专著正是得益于他深厚的文学功底。哥哥中学毕业后，他的作文本我一直保留着，上小学时有一次摘录了一段用于作文中，大意是描写路边景色的。可能老师觉得与我的写作水平不相称，遂让我自己念读，我结结巴巴的怎么也念不通这一段，因为有许多生僻字不认识，有很多词语不知其意，结果这次写的作文跑题了，以后再不敢随意抄袭哥哥的作文。哥哥的高中阶段，缝纫机盖板一直是他的专用书桌，随着生长发育，缝纫机的高度已远远不能适应哥哥的坐姿，加上长时间伏案读书，哥哥的“驼背”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四川的夏天，房间里异常闷热，也没有电扇，晚上他却从不出去乘凉，穿一件无领套头的白色汗衫，脖子上搭了一条毛巾不停擦汗，排除干扰苦读不辍，直到夜深人静。没有能够给哥哥提供更好的读书条件，爸爸妈妈每每提及此事常常自责。

哥哥是恢复高考后垫江一中第一个考入北大的全县文科状元，那年我小学毕业，对高考的事儿懵懵懂懂。记得公布分数的那天，妈妈激动地推开家门，高声宣布：“浦江是全县最高分……这个分数可以上北大。”当时我年纪太小，对“北大”没有概念，更不知它的价值所在，还以为是湖北的一所大学。后来我高中也进入哥哥的母校就读，尽管时间推移，他却一直是母校的骄傲，所以我是笼罩在哥哥的光环下学习。不过还好，由于兄妹俩不同姓，部分同学还不知晓我是刘浦江的妹妹。记得有一堂历史课，任课老师因病缺席，临时代课老师是哥哥的高中同学，大学毕业后回母校任教。他站上讲台，第一句话就迫不及待地宣布：“同学们，你们知道刘浦江的妹妹在你们班上吗？”“是谁呀？”同学们非常惊奇地面面相觑……只可惜，我的成绩不是很冒尖，真

是有愧于“刘浦江妹妹”的称谓。

哥哥小时候皮肤白白净净，圆圆的脸蛋，机灵的眼神，大家都说像极了当年热播的电影《闪闪的红星》里小主人公潘冬子。姐姐大哥哥两岁多，他俩都遗传了妈妈的相貌轮廓，长得非常相像。从小姐弟俩手牵手一起上幼儿园，有好吃的姐姐会给弟弟留着，一直到小学、中学，他俩都在一所学校就读，相互照应。有一段时间，他俩在县城上小学，住外婆家。哥哥长相斯文，守秩序，从不打骂人，在学校受同学欺负也不还手，姐姐回家告诉了外婆，为此外婆还偷偷抹过眼泪。同学给他取绰号“假妹儿”，意思说像文静的女孩，哥哥天生一副文弱书生的模样。其实哥哥从小胸怀远大理想，孜孜不倦地读书，心无旁骛，信念执着，对读书不用功，“不学无术”的同学不屑于结交。凡告知他的事宜，他会按照这个逻辑思考下去，思维从来不会发生混乱，大事小事了然于心，毫不混沌，绝不含糊。这种评判性思维的特点，更是体现在中国古代史学术研究中，正如他的同行评价他一样，远不满足于做一个辽金史艰辛的垦荒者，而是从宏观角度把握历史走向，探寻历史规律，力图突破王朝断代史隔离的界限，进入一种通达的学术境界——从专注到执着，这是何等专一的心境，他简直就是研究历史的天才。

中学毕业我上了卫校，后来从事临床护理工作二十几年，切身体会到顺应“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然规律作息就是生物体恢复体能的根本，是人类自身对大脑和神经系统的有效调节。辛苦工作了一天，抛开所有的烦恼、琐事，像冬眠动物一样美美地睡上8小时，因为高质量的睡眠可提高免疫力，恢复体能，起到祛病延年的功效。珍惜生命，储存健康，这是平衡的生活哲

学，长寿的养生之道。哥哥 18 岁离开家乡，到北京开启了他最重要的一段人生，全副身心沉浸于学术领域，潜心典籍，惟日孜孜，他不愿意，也做不到“没有任何思想地呼呼大睡”，几十年的失眠一直困扰着他，精神和体能从没有得到很好的放松和恢复。其实，从他小时候节衣缩食买书，中学时代玩命地读书，到中年通宵达旦地钻研，其中就可看出端倪：长期的生活无常态，饮食无规律，极尽自己所能及之事，凡事难得糊涂以致彻夜失眠，反复摧残着人体的淋巴防御系统，过早透支了一个生物个体一生的全部能量，这样的常态播下了危及健康甚至生命的隐患，这也一直是家人的担忧。超出常人的忍耐力让哥哥确诊淋巴瘤时已属晚期。在家乡医院，每一项辅助检查结果的相互印证，令我们一次比一次错愕，一次比一次踉跄。病魔来势汹汹，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没有一点回旋的余地，他已经失去了手术治愈的机会。我们姐妹两家人，既要瞒住年迈的母亲，又要瞒过对任何事都要一探究竟的哥哥，曾经设想了无数合适的告知方式，但我们知道任何善意的谎言在他面前都是苍白的。商议的结果，最终采纳了哥哥最知心的同事牛大勇老师的意见，实言相告，因为他坚信“浦江是坚强的，能直面自己的病况，也便于他在人生的最后阶段，明明白白做好生前身后事的安排”。所以我们一反医学界对癌症患者善意隐瞒的常规做法，由医生身份的姐夫与之谈话。果然，哥哥表现得异乎寻常的冷静，和我们详细地探究自己病情的来龙去脉，并认真听取家人的建议，当即决定回到医疗条件一流的北大肿瘤医院治疗，临别还顾虑到妈妈获此消息的感受，一再叮嘱我们：“回去慢慢告诉妈妈，劝慰妈妈……”其实从医多年的老母亲早就读懂了我们为哥哥所做的一切。我们全家都清

楚，无论选择当今何种先进的治疗方法，依凭多年的临床经验，哥哥的人生已进入倒计时。要知道哥哥非常信任家乡医院，这次和往常一样寄望于回家通过手术治愈疾病。目送哥哥通过机场安检口，动作还是一如既往的从容、细致，看不出一丝一毫的慌乱，我不敢想象，这个充满睿智思想的鲜活的生命，学生眼里“依然年轻、一点儿不显老的刘老师”会被病魔击倒、吞噬，但理智又告诉我，除非奇迹发生……从否认、愤怒、抑郁到坦然接受，这其中有多少情绪需要释放，又有多少事宜无法放下呀。经过了几次化疗和一次干细胞移植的折磨，这种煎熬常人实在难以想象。所以姐姐毫不犹豫丢下还需要奶奶照顾的小孙子，在哥哥生命的最后时日赶到他身边，像小时候一样心疼她的弟弟，照顾她的弟弟，她怎么舍得弟弟的离去呀！因为打小姐弟俩感情就最好。

哥哥曾经说过，他找到了真正投身的事业，是人生之幸福，宁愿少活十年，也要追求视为生命的学术价值。奈何天嫉其才，正当学术盛年、厚积薄发的时刻却被病魔击倒。到肿瘤医院接受治疗的头天晚上，他一夜未眠，在家里赶课件批作业。乃至后来拖着虚弱的身体，在病榻上完成了《辽史》的修订工作，全然忘却了医生家人给出的休养建议，反而变本加厉，殚精竭虑，在病中一件一件安排着身后事，交代着种种事宜，人生最后之驿站，舍不下他心爱的事业，舍不下北大历史系，更抛不下跟随他的弟子们……直至奄奄一息。几十年来事无巨细亲力亲为的秉性，决然不会转变于旦夕之间，这哪里是减法的十年，这十年简直是加速度穿越时空隧道飞奔而来，让不到54岁的生命戛然停止在了2015年的那个冷酷冬日。他就是这样理解生命，面对死亡，

对人生取向做出的选择。我们家人从医的很多，却没有能够为哥哥的健康保驾护航，这是全家最大的遗憾，哥哥的英年早逝，令人嗟叹与沉思，我们心疼，更感心碎，犹如努力在，成功就在的道理，只有健康在，事业才在。爱之，怜之，泣之……

哥哥的每一部著述，都是考辨精详，论说透辟，向世界证明了学术的价值与尊严，在喧嚣的尘世中用生命诠释着这一学术境界，读后让人掩卷叹息。他心地纯粹，生性不善表达自己的情感，用含蓄、内敛的方式答谢他的恩师——中学时代的龚百堪老师，每次回家都会第一时间上门探访。还有北大对他有知遇之恩的邓广铭老先生，引领着他走上了辽金史研究的学术道路，他又是何等的感激，自己的墓地也选择和邓老先生在一起，到天堂再与恩师相聚。正是北大宽容大气的校风和历史系轻松自由的氛围让本科学历的他在辽金史研究领域如鱼得水，如沐春风，全身心沉醉于那旁人难以体味的乐趣之中。他把对父母的爱，对妻儿的愧疚都表达在《辽金史论》的自序里。他与学子共同把辽金史研究推进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令人欣慰的是，他一手栽培、精心呵护的下一代辽金史研究新军，在学术领域甘于寂寞，辛勤耕耘，勇于承担，敢于挑战，传承了他的严谨与执著，笃定与坚强的治学精神，他们正肩负着老师未竟的事业，寄予着老师殷切的厚望，刘门弟子定能团结一心振翅高翔，北大期待着，我们期待着，刘老师在天之灵更企盼着……

“我儿子活出的是生命的质量……”妈妈是位坚强的母亲，这样总结哥哥的一生，她为养育出如此优秀的儿子而骄傲，她最能理解哥哥毕生的追求。天下再华丽的筵席终有散场的一天，但哥哥的骤然离去，突如其来的离别将亲人伤得措手不及，流年

似水，太过匆匆，人生的壮丽画卷刚刚呈现展开，就被写成了昨日……生命是场轮回，来来去去，我们都清楚生死不可违的规律，一个人文学者给后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可以传世的著述，在他不长的生命里不曾有过丝毫的停歇，哥哥活出的是生命最璀璨的质量，不辜负一世韶光。

哥哥已融入历史离我们渐行渐远，这份怀念永远割舍不了那份绵长的手足之情，那些温暖而真实的感觉总也无法诠释，特别沉重，哀婉，感叹生命的无奈，唏嘘之余，祝愿哥哥在静谧的天堂卸下肩上的重负，抛却尘世纷扰，携一抹清风流云，歇息着，健康着，淡然着，在平静和安宁中一切便已从容，唯心独醉，书斋静读，祥云缭绕，感受生命的自在。

惟愿浦江之水，在天际之间源远流长，怀念到哭泣……

（作者系刘浦江妹妹，现任重庆市垫江县人民医院  
手术室护士长）

## 怀念刘浦江老师

谭星宇

早上还没起床，收到一条短信：“北京大学历史系刘浦江老师昨晚去世，永远离开了我们，敬悼先生！”惊得我坐起身来。

刘老师身患重病，此前我知道一点消息，听说是癌症晚期，做了手术，在家静养。我想着现代医学已经足够发达，癌症病人存活率也在不断上升，我想等刘老师身体好一点再去看看他，哪里会想到突然就走了呢？

屈指一算，其实我也有十多年没见过刘老师了。

毕业之后，我印象中只有一次回到北大见到了刘老师，当时和几个师弟一起说说笑笑，具体的内容已经完全不记得了，只记得那天天气晴好，刘老师语速本来就很快，满口的四川普通话旁人或许听不清楚，但对我来说就是乡音，现在闭起眼来，还能感觉当时他的音容笑貌犹在眼前。

刘老师的专业领域是辽金史，跟我的学业有点关系，但当时我正耽于游乐，很少跟他请教，他也不以为忤。他曾跟我说过，如果是他的学生他就要严格要求，而我不是，所以不跟我谈论学问。当时我很高兴不用被他折磨——现在我还是这么想，做他的学生不是件轻松的事情——但是不妨碍我们两个老乡叙叙乡谊。

其实，在这之前，有一段时间我曾经跟刘老师走得很近。大



三的时候，我发神经想做点学问，当时小屁孩懂啥呢？刘老师手把手教我怎么找选题，怎么找资料，最后他帮我定了一个文献学的题目，就是考证《太平寰宇记补阙》的真伪问题。说是手把手，真的就是手把手啊，他告诉我《永乐大典》残卷里有相关资料，我就动手去找出来。这么写了一段时间，慢慢摸到点窍门了，我自己从北大图书馆的旧藏里找到了日本宫内厅藏书的一些证据，当我把我找的材料给刘老师看的时候，他很惊讶我能发现这么偏僻的材料。在他支持下，我那篇文章最后获得了北大当年“挑战者杯”学术论文的一等奖，那也是我在读书时获得的最高奖项了。后来刘老师还劝我修改一下拿出发布，可惜当时我已经决定不做学问了，就没有当回事。几年之后，我看到有人发过类似的论文，收集的材料还没有我当年这篇文章齐全。

那时刘老师家住中央党校，我经常晚上骑自行车到他家去请教，师母和刘老师的女儿都休息了，只有我跟刘老师在书房里低声聊着论文，还有各种学界八卦。他抱怨着对当时学界的种种意见和牢骚，我也纯粹当成八卦来听，时光过得很开心。一转眼，那也是将近二十年的事情了！

当时为了指导我的论文，刘老师还曾跑到我的宿舍来找我。我们一个宿舍只有我选了他的课，所以其他同学不认识他，那时刘老师非常年轻，长了一张娃娃脸，又是一口川普，大家都以为是我老乡，所以也没人招呼他。他也没吭声，就安安静静坐在我们乱糟糟的宿舍里等我。我回来发现刘老师在宿舍等着我大吃一惊，同宿舍的同学得知他是我的老师更是大吃一惊，说没见过这么年轻的老师，而且一点架子都没有，完全就像是我的老乡一样。

我曾经隐约感受到他对我做学术抱有期望，但我决心不做学问之后，他也从来没有说过什么。毕业之后我一直庸庸碌碌，变成了一个自己当年最讨厌的那种人，所以也不敢去叨扰他。我想，对于沉浸在学问中的刘老师来说，我大概也就是个他教学生涯中的一个过客而已。如今，这个当年看起来跟我差不多大小的老师、老乡已经驾鹤西去，我只有深深的感慨。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对于亲友的离去，我不是第一次经历，只是刘老师才54岁，真是天不假英年。不过，人生就是这样的吧！在年轻时代老师对学生真诚的指导和培养，我唯有感念，纵使不成器，我也深深感恩刘浦江老师留给了我美好的学校生活记忆。

写下这些记忆的碎片，作为我对刘老师的怀念。

2015年1月7日

（作者系北京中道公益基金会秘书长）

## 追悼刘浦江教授

饭山知保

今年1月7号早晨，跟往常一样，我起床后查收电子邮件，骤然看到刘浦江教授过世消息，我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去年初夏第一次得知刘浦江教授患病，几次去中国参加研讨会，每次都听说刘老师状态已经安定了，目前正接受辐射治疗，治愈的希望很大。去年秋天以后，我一心想，等过一段时间，我就能够在会议上又见到老师，又能继续向他请教了。

我并非刘老师的门下弟子，也不是在刘老师指导下的留学生，只不过在留学北京期间有幸上过刘老师一年半的课。尽管如此，刘老师是影响我最深的学者之一，在我学术人生的每一个重要关口都给与我无可比拟的鼓励和动力。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又一次翻开手头刘老师的大作《辽金史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刘老师的亲笔签名和“2003年11月11号”的落款。当时我刚确定博士论文的研究课题为科举制度的演变对金元时期北方社会的影响，刚开始在北京留学。刘老师是金史研究的大家，我在去北京之前，就已经拜读过刘老师的许多大作，深受启发，特别期待在北京能有机会见到他。所以，2003年秋天第一次跟刘老师见面的紧张感，虽然已过了近12年，至今仍记忆犹新。那个学期，我每周上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邓小南教授的课，当时中心的老师和研究生们去保定、霸州考察宋辽遗址，我有幸能够

参加。路上，蒙邓老师的介绍，我终于有机会向刘老师当面请教。刘老师对我的问题都一一作了清晰的回答，虽然当时我的中文听力还很差，不能完全跟上刘老师超快的语速，但我能明白无误地感受到刘老师对学生的热情，哪怕是像我那样初出茅庐的留学生！回北京后，我再拜访刘老师的办公室时，就拜受了《辽金史论》一书。

当然，访华留学之前，我早就购买了《辽金史论》，并仔细拜读了每一个章节。我确定金元北方社会史的研究计划，也是深受刘老师跨朝代研究视野的影响。2005年10月后，平均每两年有一次机会拜见刘老师。2008年8月在台北召开“传承与创新：九到十四世纪中国史青年学者研讨会”时，刘老师作为资深学者参加会议，并评议了我的文章。刘老师开头毫不留情地指出了我文章中的史料误读、统计错误等问题，并对辽金元史的研究状况做了精辟的分析评议，令我汗颜的同时，又有大开眼界的激动。会议结束后，在去晚宴会场的车上，我有幸坐在刘老师旁边，刘老师又对我说了一番激励的话，我这辈子永远都忘不了。直到现在，每当我在学术研究中遇到困难，我就会回忆当天晚上的对话，就会发现自己能因此重得勇气，静下心来继续看史料、写文章。

最后拜见刘老师，是2013年9月4日，在北大召开的“宋代政治史研究的新视野”国际学术研讨会的闭幕典礼上。我坐在刘老师旁边，刘老师对我的新书提了很多建议，并鼓励我进一步跨越朝代，扩大研究视野。在当天晚上的餐桌上，我和刘老师及其学生分享各自对于辽金史研究的想法，讨论将来要关注的研究课题。那一晚，我过得特别愉快。我一直以为，以后我会有更

多那样的机会，得刘老师的指正。没想到，那晚的团聚，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刘老师。

在日本东京，研究辽金史和北方社会史是一项孤独的工作，因为周围很少有同道。虽然现在通过 email 可以随时跟海外的学者们进行交流，但大多时候，我总是—一个人在办公室，总是忍不住自问：“我的研究对学界、社会有如何贡献？是否只是毫无意义的自我满足？”这个时候，我会想起刘老师，他对学问的热情、认真和执著，总是能鼓励我坚持信念，继续进行自己的研究。

从第一次拜见刘老师以来，刘老师在我的研究世界中就是巍然耸立的标杆，是我学习的榜样，至今未变。以后我在受挫的时候，还是会读刘老师的书，回忆和刘老师的对话，从中获得突破和前进的勇气。刘老师离开了这世界，但我想，我应该永远都离不开刘老师。

（作者系日本早稻田大学高等研究所招聘研究员）

## 追思刘浦江老师

毛利英介

我现在还是不能相信刘老师不在了。

我认识刘老师，是2004年的事情。同年夏天，刘老师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老师们来到京都，参加日本河合教育文化研究所主持的会议。会后晚餐的时候，我坐在老师身边的座位，一直和老师交流。那时候，我提请老师允许我去北大留学，他欣然允诺。

第二年我如愿至北大留学。虽然我在北大的时间只有一年，非常短暂，然而每天都非常充实。上刘老师的课、研读契丹文字、讨论刘老师论文的日子，我现在也感觉好像昨天的事情。我认为，那一年是我研究生涯乃至人生的一个很大的转折点。

回国之后，我很少有机会去北京，也很少有机会见到刘老师。可是，我会拜阅老师发表的每一篇论文，而且康鹏先生也会常常告诉我老师的近况，所以我一直怀有紧随刘师身侧的感觉。

最后一次见到刘老师，是2013年9月我去北大参加“宋代政治史研究的新视野”研讨会的时候。会议结束当晚，刘老师、我、还有刘老师的学生们一起在咖啡厅喝着咖啡、吃着甜点，谈书论学。那时候，刘老师对我说话时高亢的声音，我还想得起来。

我不愿相信刘老师不在了。现在只能说，老师，我非常感谢您。

（作者系日本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非常勤研究员）

## 黯淡世界中的一道光

陈侃理

几天前，润博兄给我发短信，说要把纪念刘老师的文章收进集子里，让改个题目。犹豫着一直没回复。按道理，我没有这个资格。刘老师走后，难以平复心中的悲痛，写下这篇文章，隐去姓名，发到网上，是想与跟同样上过刘老师课的三千弟子一起表达怀念。现在得到刘老师门生的邀约，幸莫大焉，惶恐不已。但愿老师在天之灵，看到小子厕身其间，还能默许我留下听这节课吧！

最后一次见到刘老师，是去年9月，在医院。当时正准备做第三轮化疗。他坐在病床上，盘起一条腿，青丝落尽，面色蜡黄，精神却很好。见面先聊了几句治疗方案。能听出来其间有些波折，预后也不算十分乐观。但他转述医生的意见，好像评述熟悉的史实，冷静而准确。随后，话题迅即转移到学界近况，语速还是如机关枪扫射，我们照例插不上什么话。听他突然提到我身边的人事，不由得心中暗想：怎么连这您都知道，一点儿不像病人啊！演讲过一个小时，他毫无征兆地说：“时间不早了，你们走吧！”我看了看表，下午五点，现在回去可以躲过晚高峰。

从医院出来，雾霾笼罩，心情却舒展开来。我想象着，有一天他回到中古史中心报告厅，给同学们讲课。

他一定也经常这样想象。



去年5月,第一轮化疗结束,转移到腿骨的病灶开始缩小,他刚能站起来走路。刘老师便通知系教务,下学期要开课。这个疯狂的想法当然很快被叫停,但在那个时刻,他肯定相信病魔就要被击退,自己很快将回到课堂。

刘老师爱上课,也喜欢在课上训学生。这一点在历史系是出了名的。据说他参加的答辩预答辩,答辩人很少不被说哭。但不知为什么,我一直不怎么怕他,反而觉得温和可亲。因为研究方向不同,唯一一次上他的课是2006年秋天的“《四库全书总目》研读”。当时,文渊阁四库电子检索系统正在流行,是他告诉我们四库本不能随使用,书前提要跟总目提要不是一回事,文津阁本和文渊阁本也不相同。第一堂课,他提问:四库全书有几套,分别藏在哪里?在座的博士、硕士研究生们不敢吭声,被他点到的几位也都支支吾吾。这时,有个旁听的本科生举手,起来把北四阁南三阁说了个门儿清。刘老师说:你们看,这是我们历史系本科生的水平!后来,知道他每年给中文系新生上课必有厉斥“中文系没文化”的套路,我疑心,这问答多半也是设计好的,给自命不凡的研究生们一个下马威。不过,真正吓到我们的,是他的学问。就像李鸣飞说的,他骂学生的时候旁征博引,把如何查书,为何出错,提要有哪些是非,如连珠炮似地一气打出。座中如同听得一出好戏,浑身冒汗,痛快淋漓。所以,我们害怕被“骂”,又总盼望他“骂”别人。可惜这样的机会其实不多,印象中只记得第二周课上有过,几次课后大家都渐渐上路,刘老师语气放缓,我们也就如沐春风了。如今,没被骂过的我,心里只觉得遗憾。

念研究生期间,他正好当副系主任。据说系里从招生到教

学、培养流程，现行的规矩大都是他定下的，此外还做了很多事务性工作。别人避之不及，他以此为乐，直到卸任后多年也念兹在兹，放不下。系里也好像请他继续帮着管研究生招生的事儿。中国人崇尚“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一向狷介的刘老师在这方面却并不遵守古训。对系务的热心，正说明他爱历史系之深。

去年，我听到一位老师批阅完招考试卷后，给教研室主任打完电话，又打给他：老兄，阅卷的事向你汇报一下，计划招生几个，报考几个，笔试及格几个，及格率多少。你老兄还满意吧？那头说，好，好，然后又是拉拉杂杂一大堆话。挂了电话，那位老师说：浦江关心这个，得给他说说。此时，距离他查出得病不到一个星期。

听说刘老师去检查，是因为实在扛不住了：突然消瘦十几斤，身体弱到撑着两边扶手才能从椅子上站起来。从他治疗期间发表的文章可以知道，检查前他一如既往，在拼命工作，完成《辽史》点校的修订，总结《四库提要》的考订，还写文章发在了《近代史研究》上。其实，看到那篇文章时，我一点儿也不意外。刘老师本就不以断代自限，他从目录学入手，博览群籍，气象贯通。2012年春乘飞机去陕西考察，有幸坐在他旁边，听他谈起当时指导一位博士生邱靖嘉，学位论文以天文分野为题，准备从先秦一直写到近代，言谈中甚为赞许和得意。后来，靖嘉兄果然写出了非常漂亮的文章。刘老师曾经写过一篇雄文，评出新史学诞生以来中国五位一流的史学大师：王国维、陈寅恪、陈垣、钱穆、顾颉刚，认为他们的共同点是超越了断代，可以称得上是“通儒”。我想，他一定也是以通儒自期的。

新史学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已不同于草创时期。掌握各断代、各领域积累的学术成果，在多方面作出一流的突破，已经超

过任何个人的能力范围。但刘老师以他的天赋、信念、勤奋和成就，为后来人指示了一种学问的崇高境界。在“陈寅恪热”席卷全国之时，他冒天下之大不韪，写了一篇《正视陈寅恪》，道出大师的伟大与不足，也指出了再次产生大师的可能与难以产生大师的现实。他说：“学术功利化的时代可以陶冶出一大批兢兢业业的专家学者，但终难铸就器宇磅礴的鸿儒。”所以，他的学术与“功利”绝缘。他求学不问名利，也证明了才识不取决于学位。他佳作迭出，每篇都极具分量。但他说，更多的想法要慢慢沉淀，等到学问成熟，50岁以后再写。

而今，他却走了，刚过知命之年。

我满以为，往后的日子还会不断读到他的新著，还能时常在中心的院子里被他叫住，享受一番教导和提点，或者从窗外看见他神采飞扬地给学生讲课，隐约听见“机关枪扫射”，哒哒哒，哒哒哒……

他，却离开了。

这离开，让我强烈地感到生命中有一部分从此失去。不仅是因为受过他的教诲，得过他的关心，更因为他是一位伟大的学者，是一个纯粹的人，是这黯淡世界中的一道光。

刘老师走后，网上流传他的照片，都身着一件天蓝色的西装。惊人的是，搜索记忆，印象中的他似乎永远是这个样子。那蓝，像晨风清冽，拂过冬日的天空。

2015年1月7日草

9月17日修改补记

（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研究员）

# 博大之爱中的一丝微光

——怀念刘浦江老师

李鸣飞

清早惊闻刘浦江老师去世的消息。

上午看到一篇篇悼念文字，好几次忍不住流下眼泪。更看到阿瑶震惊大哭，说“不能接受！不能接受！”这也是我和大动物的感觉。

去年听说刘老师查出淋巴癌，我虽然震惊难过，但还觉得医学昌明，淋巴癌存活率在癌症中也还不低，完全没想过最坏结果。当时正在整理博士毕业论文，重找出刘老师写的评审意见又读一遍。内心时时祷祝他痊愈。

年底听说经过治疗，情况不错，还在计划下学期开课等事，更加放心。心里暗想：《辽史》还没整理完，不是说了最少要整理十年么，且不必着急。

上周忽然惊闻情况恶化，最多还有一个月，已经放弃治疗，要回重庆老家。竟然清早出发，乘坐救护车回去。临行前与学生好友见面，将必要事项一一交代清楚。我非常死心眼地问：《辽史》不是还没做完么！大动物回答说：听说在检查出来的时候，已经自己做完了。

我愚顽不明，竟然还在幻想，医生总是夸大其词，说什么一个月，多半总是能再有半年多，也许竟然好转，在山明水秀的家

乡，慢慢癌细胞就没有了等等。

今天呆坐家中，脑中一团乱麻。慢慢回想整个经过。老师到底是怎样冷静面对了自己即将到来的命运。有条不紊地处理好一切。最后匆匆又默默地离开。这冷静令我生恨，而我所恨者何，又终于茫然，如果不写点什么，始终难以平静。

网上流传着不少关于刘老师的文字，但竟然大多出自中文系之手，澎湃新闻更名其曰“中文系最敬爱的老师”。历史系的学生们不知道心生何感。

我本科和硕士都不在北大历史系。虽然常年混迹于中心，但更像个北大历史系编外人员，博士期间才算转正。对刘老师，耳闻早于见面。最常听到的就是他如何严厉，对学生批评多而赞扬少，内心中颇有些怕他。然而我的博士生面试、博士中期考试、博士论文答辩竟然都有刘老师，每次我出于耳闻种种造成的印象，都格外紧张，他却对我颇为温和，温言勉励。我博士期间申请去伊朗交流，本来颇多阻力，刘老师也大力支持，认为机会可贵。据说刘老师记得系里每一位学生。这是不是因为，几乎每个人都上过他的四库课？刘老师的，永远也上不完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书课，和他的辽史课一样，漫长无垠，其速如龟。我在07年参加四库课时，读到史部杂史类，到10年时，据说终于读到地理类了。在他的课上，大概不止我一人学会如何一个学期只读一条提要还天天跑图书馆，更绝不止我一人是经过四库课的洗礼才写出了人生中第一篇像点样的文献考证文章，甚至不知道还有没有人像我一样，是因为四库课，才开始真的去看古籍。

其实我见过刘老师如何骂学生。跟我同一年进入北大的一

位师妹，是刘老师那一年的硕士新生，跟我一起上四库课，轮到她发表时，因为该查的资料没有查到，全班的人听刘老师旁征博引的骂了半节课。不得不说，如果挨骂的人不是自己，听刘老师骂学生是非常精彩的。这个女孩子被骂的满眼含泪，下了课来问我该如何查资料等等，言辞之中还是对刘老师充满感激。

据说她保研最初未能通过。她的妹妹给北大历史系写信，有“老师啊，我们为什么读书，不就是为了改变命运么！”一句。刘老师非常感动，决定招收这位学生，但要求她在暑假中手抄一遍《辽史》。最初我们谈论这则传闻，并不都觉得很正能量。毕竟想改变命运的太多，谁能眷顾谁多些？又觉得刘老师当真苛刻，一部辽史三十万字，六十天的暑假每天需写五千字，若有一天没写，第二天可得抄上一万字了。

今天我看到 tiant 于 07 年写刘老师文中，提到他曾在课堂上说：“你们在北大读书觉得平常，这却是人家再不能实现的梦想。你们不要以为自己的痛苦才是痛苦，把其他人的痛苦都不当回事。”我的眼泪顿时再次滑下来。刘老师真的非常爱北大，爱历史系，爱学生。因为他这样深切的爱，所以多责备，常批评，偶尔的赞赏又让人觉得格外珍贵。我们其实都多少感受到他的严正与温柔，tiant 和中文系的孩子称他为“浦江哥”，因为他治学颇传统，我和大动物私下聊天总是更恭敬又带点好笑地称他为“浦江公”。我曾得到他的博大之爱中的一丝微光，令我温暖，却无从回报，因而在今天，在此物是人非的时刻，我内心生恨，生茫然，生感激，生不平，不得不写点什么，以纪念，以感怀，盼他此时安好。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 不是恩师,更似恩师

——悼念刘浦江老师

孙建权

初次知道刘浦江老师,是2008年读研第二年时在《历史研究》上看到的一篇文章,名字叫《关于金朝开国史的真实性质疑》。那时的我,认为这篇文章写得实在是太好了!这委实是一篇振聋发聩的论述,逐字逐段中无不透漏着作者的细心与魄力!当看到作者名字的时候,我便深深地记下了“刘浦江”这三个字。

初次和刘老师交流,是在2009年。刘老师的文章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了,以至于我认为博士阶段学习辽金史,必须首选刘老师作导师。于是我在联系考博导师的时候给他发了封电子邮件。刘老师并没有直接回答我可不可以,而是说:“请将你的个人情况、学术简历及学术代表作(论文或札记、已发表未发表均可)发给我看看,我必须对你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才知道你考我的博士生是否合适。”刘老师在看过我的材料后,认为我专业基础不好,英语也有问题,所以不建议我报考。我虽遭拒绝,但仍不死心。半年后,随着几篇论文陆续得到发表,我自问有更足的底气成为刘老师的学生,于是我再次把这些“代表作”发给刘老师,希望他能看到我这半年来的进步,同意我报考他的博士生。然而刘老师还是一如既往地拒绝了,甚至话语有些直接。他对我说当年报考他博士生的同学已经有四个,为了不耽误我的前

途，建议我慎重考虑。坦诚地说，当时的我内心受到了挫伤，甚至有些埋怨这位“不近人情”的老师。我以为我只是一个高考志愿填报失利的考生，我的高考成绩并不差，本科的学校并不足以证明我天资不足，本科非历史出身也并不能注定我日后不会追赶上来。第一次与其交流，就遭到了刘老师如此直接地回绝我，对我的打击是巨大的。

但是打击与愤懑不久变成了认同与感激。我最终听从了刘老师的建议，没有报考北大，而是考取了北师大。于是，利用同在北京的机会，我与同届的刘门弟子有了些许交流。在交流中，我深刻认识到了自己与他们之间的差距。当初刘老师那番刺激我的拒绝之语，并不是有意为之，而是事实的表述，并且蕴含着对我负责的态度。释然之后，我对刘老师的人品更加欣赏。我开始认真地研读刘老师的两本论文集——《辽金史论》和《松漠之间》，而且我自鸣得意地竟然发现了其中不少问题，有的甚至是刘老师所擅长的考证方面。我继续通过电子邮件与刘老师交流，希望得到刘老师的认可与支持。令人高兴的是，刘老师对我指出的问题非常认真地回复，并不乏争论。刘老师最后坦然地在 Email 中感谢我指出他的讹误（其实是很小的），称呼上也把我的姓氏去掉了。然而我们仍然只是停留在邮件交流，并未谋面。

初次见到刘老师，则是在 2011 年夏天 6 月份的时候。那是在北大历史系李鸣飞博士的学位论文答辩会上。我第一次见到的刘浦江老师，是一位身材微胖，穿着朴素，谈吐有些口吃的人。如果以貌取人，他实在并不出色。然而从他对论文的评价中，可以看出他看问题的深度，可以证明他是一位一流的学者。给我



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刘老师喜欢批评人，例如他说某某文章里有“口水滴答”之类的文句。乍听到此，我不禁哑然失笑。刘老师当时应该并不知道我，我也没有自我介绍。不可否认，我是一个懒得主动把自己介绍给名人的人。

2011年秋，在征得刘老师的同意之后，我去北大中古史中心旁听他的课程。这是我第一次听刘老师讲课。开课伊始，令我略感失望的是，他并没有讲，而是召集了门下弟子们集体讨论修改任文彪同学的《“担床”考》一文。文彪的文章在经历了同门师兄弟和风细雨式的指点之后，又遭到了刘浦江老师疾风暴雨式的抨击与痛斥。然而在我听来，尽管话语直截了当，但都是中肯的。我在旁听的座位上总结了刘老师提出的六条修改建议，六条对我日后撰写论文影响很大的建议。它们是：1、检索完研究概况后再研究；2、论文章节题目需要认真琢磨，节标题应简练明目；3、写文章要说清楚，令读者明白；4、写文章一定要紧扣主题；5、同类型合并，避免重复繁琐；6、写文章抓住主线，勿以偏废主，与主题关系不大者，应尽量简略。北京大学历史系刘门这一帮助学生提高的方式方法，也给我留下了良好印象。回到学校之后，我向我的导师王东平先生力陈这一方式的优越性，从而促进了北师大北方民族史方向师门的学术交流。也是从这一堂课开始，我愈发认识到了刘老师的一个人格特点：直言不讳（事实上刘老师的文风也是如此，这无疑给他带来了许多不必要的误解）。

随着交往日多，刘老师与我也慢慢熟悉起来，陌生时期的种种拘谨也渐渐打开。2012年春，当我再一次去旁听《辽史》读书课的时候，刘老师看到我的不期而至，高兴地说：“建权来了！”课

间打水回来，他又在我的位置停了一下，突然问了我一句：“你是有一篇文章写《族帐部曲录》的吧？”他说话口音略带垫江方言，我竟一时没听清说什么。正在茫然之际，文彪兄在一旁补充说：“就是你那篇关于《金虏图经》的文章！”我这才恍然，连连点头说：“是的，投给《文献》杂志了。”刘老师露出一丝得意，笑着说：“那篇文章是我审的稿！”说罢，刘老师转身坐回了位置。我有些羞愧地笑了。从这一刻开始，我觉得我和刘老师的距离更近了。

博士毕业前夕，我正忙着找工作，暂无着落，颇为苦恼。5月的一天傍晚，忽然接到晓伟的电话，说刘老师很关心我的就业问题，恰好有一个还算可以的工作向我推荐。我当时特别感动。老实说，为了尽快完成博士学位论文，我已经很久没和刘老师交流了，而他居然还挂念着我这一个并非他门下弟子的外校学生的就业问题！这是怎样的一种关怀！我立即给刘老师拨了电话。在电话中，这位老师花了半个多小时的时间为我介绍这份工作，并允诺，如果我有意去，一定为我推荐。挂断电话后，我感到心里有股温暖在涓涓流动。

我特别请游彪老师邀请了刘浦江老师参加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会。说实话，我对我的毕业论文是很不满意的，刘老师能够欣然出席，我除了感谢，别无他言。答辩当天，我本来说要在师大主楼门前恭候刘老师光临的，岂料刘老师竟提前自己坐电梯上来了。我迄今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他就站在主楼600会议室的门口，右肩背了一个小包，神情爽朗，悠然地望着我和陈凌以及一帮师妹们在忙碌着准备会场。我回头一瞥，忙请刘老师入场落座。今天刘老师已不在人世，回忆起他当时的音容笑貌，宛在眼前，不禁潸然。答辩中刘老师问了我一个问

题：辽朝对元朝有什么影响？我见识浅薄，竟没能答出一二。后来听刘门的几位朋友说，刘老师是希望他的弟子可以打通辽金元史研究的，他此时也向我提了这个问题，或许也是向我表达了这个愿望吧！答辩会后刘老师还深入地为我分析了就业去向的问题。直至我来辽师试讲，也是刘老师的高足康鹏兄提醒的；最后得以顺利入职，也是承蒙刘老师大力推荐。这次答辩，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刘老师。

在选择去杭州还是大连工作，我一时颇费踌躇。困惑之下，我打电话给刘老师征求意见。这应该是我们聊天最久的一次通话，时间很长，接近一个小时。在电话的另一端，刘老师仔细地分析了我的情况。他对我说：这是你的第一份工作，很重要，应该充分听听家人朋友和师长们的意见。他还说：一个人能够有幸从事自己喜欢的事业，是很难得的。他又认真地为我分析了两份工作的利弊。可以说，我最终选择来辽师，也是因为刘老师指路。要知道，一个年轻人，能够在重要的人生选择关键，在自己彷徨不决之时，得到一位有识之士的指点，是何等幸福之事！

毕业工作以后，在2014年元旦晚上，我给刘老师挂了个电话。电话接通后，还没来得及等我说出“祝老师元旦快乐”之类的话，刘老师就反客为主地先问起我的近况来了，包括生活、工作和家庭。他最后指点我说：“你以后做研究，不要再局限于文献考证了，那样写出来的论文影响力不大。要做就做一些大问题，比如政治、经济、制度、民族等等。”这是刘老师对我真正意义上的唯一一次学术指导。

2014年10月，我赶赴北京开会之机，希望可以拜访病中的刘老师。但其时他已在准备做手术，需要隔离，所以不便见客。

刘老师在电话里不无抱歉地如是说。我最终没能见上刘老师一面。

今天凌晨1点多，在北大的师弟新元微信告诉我刘老师辞世的消息，4点多康鹏兄也通过短信发来了这一令人心裂的消息。我是6点多出门要去西山校区监考的，乍然听闻这一噩耗，再回想起以往与刘老师的点滴交往，不禁眼眶噙泪欲落。我竟再也无缘投入刘老师门下了！我竟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我想哭，但不能哭，因为我要给学生监考，不能眼睛红红的。在公交车上，我不敢再回忆刘老师，只是望着远方逐渐明朗的天空，唯恐眼眶再次湿润。可惜今天的朝阳，刘老师已经看不到了。

2013年秋，在入职辽师的欢迎晚宴上，我向田广林院长敬酒，田院长端起酒杯说：“刘浦江对你的评价很高啊！”我想，我虽无缘成为刘老师的学生，但刘老师对我的关心指导，显然已超越了他的本职；从事辽金史研究，我受刘老师的影响也最深。所以，尽管不是刘老师的学生，但我依然会踏着刘老师开辟出来的道路，坚决地走下去，将刘老师的学术精神与做人品格，传承下去，发扬光大。因为刘老师是我的楷模。这也是我对刘老师的唯一报答。

斯人已逝，世上再无刘浦江！挥泪题挽词：

垫江、浦江、扬子江，滔滔江水泣别学林典范，  
燕园、静园、朗润园，缕缕园风追挽松漠英杰！

书于辽宁大连解放路天颂阁

2015年1月7日晚21时46分

附：

转眼之间，刘浦江老师已经离开我们半年多了。近二十年来的，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逐渐变得疏远起来。即使是原本很熟识的人，在地域距离拉开之后，也都各自忙着各自的事情，有着自己的新朋友圈，彼此的沟通也就比以往稀少了许多。不过偶尔的电话、微信，也在努力证明着友谊并未远去。这种新的社会关系同样会带给人另一种感觉：故去的人似乎还活着，我们似乎还能在某天听到、看到他的最新动态。王瑞来先生在他的博客中说：“在节奏很快的现代社会，大家都十分繁忙，朋友之间，难得经常从容相聚，除了偶尔匆匆一见，大多是从其他朋友的口中，或是从报纸杂志，乃至网上，可以获得一些对方的信息。因此，朋友就像是一处固定的景点，似乎会永远存留在一处。即便是真的走了，也就犹如平日都在各忙各的而难得见面一样，不相信已经永远地离开我们，去了另一个世界。仿佛在某一天、某一个学术会议上，还能像以往那样，偶尔再见。”对此，我深有同感。

目下中国大陆的审稿制度，无形中也在强化我们的这种错觉。因为一篇文章从投稿到刊出，短则一两个月，长则两三年，所以我一度期待着某天可以在新出版的期刊上再次看到刘浦江老师的新作。这种新作会给人一种感觉：刘浦江先生还活在我们中间，他还在笔耕不辍地引领着辽金史学术研究的潮流，他并没有离去。我甚至想象着刘老师的高徒会把他未竟的论文草稿完善后发表，使我们还能够再度领略刘老师那种犀利的文风和敏锐的目光。

然而刘浦江先生还是真的走了。2015年1月以来,我再也没有看到他的新作。对于自己的想象,我内心也是十分明了: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是唯一的,他人无法取代。无论何人模仿,也终究不能完全像刘老师所写的文章一样,就算是他的高足们。如同高鹗无法完美续写曹雪芹的《红楼梦》一样,他们毕竟是两个人。况且,纵令刘老师有未竟的论文草稿,也终究有用尽的一天。

令人高兴的是,刘老师的门下弟子们已经在茁壮成长,他们中间许多人俨然已经接过了刘老师的衣钵。然而即便是这样,我依然期待着有一天,能够在某个期刊上再次看到刘浦江老师的大作问世。希望这一期待能够实现,希望这一天的到来不会太晚。

2015年7月30日星期四晚

大连市,天颂阁

(作者系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讲师)

## 刘浦江，他一直那么年轻

孙 明

初识刘浦江老师，是大学三年级在邓小南老师的宋辽金史专题课上。这门课的宋史部分由邓老师主讲，辽金史部分由刘老师担任，科举、武官等题目则由张希清、赵冬梅等学有专攻的老师分别讲述。之前我没有接触过刘浦江老师，曾听中文系同学说他“很有个性”、戏谑“中文系学生没文化”，但大三也算见过世面，过了为老师的“个性”震惊的阶段。然而，就是这一相逢，寥寥几节课，他的有趣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如他会问：“某某某，大家听说过吗？”座下一众青春少年懵然答曰“不知道。”他就用南方口音普通话抬高一个八度介绍：“很有名哦，是某某的老师，留洋回来，第一个在北大主讲××史，在中国的××史研究中非常有地位的哦！”少年顿时瞪大了眼睛，绵延着拉长了对大师的惊呼：“噢！……”期待的眼神正等着他继续爆料“吹捧”时，大转折来了，“但是，资质在中等以下。文章的名字还都起得很长，一本书都可以起几个字的名字，他的文章名字却那么长，很难选出来好的。”少年们毫无准备地从云端跌落谷底，彻底晕掉，不知说啥好。当然，接下来他又把我们拉回辽金历史中

去了。辽金史料很不好读，“捺钵”、“猛安谋克”这样面目狰狞的名词，他从翻译字义进而还原到制度安排、社会生活，抽丝剥茧、条分缕析，却不故作玄虚，我们跟着他，安静地、一小步一小步地迈进那个陌生的世界。我想，这老师骂人骂得狠，却是很朴实的学者。后来，读到周一良先生自评“中人之资”，我也能理解刘浦江老师对那位前辈学人的评价也许没那么低。但他的率性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籍贯重庆垫江、生于上海，说话的平仄口音和机关枪一样的节奏，我也觉得很有趣。

这样出于敏锐的学术辨别力，而又不世故的，率性、批判的态度，甚至过于“苛刻、犀利”，是我们不一定喜欢，但又追忆不已的“学术月旦”。

1998年初，邓广铭先生逝世。作为弟子，刘浦江老师此后写下了一系列怀念和学术述评文字。他对史学有纵横开阔的视野，对乃师的评价不做虚幻溢美的拔高，文字也好，我很爱读。特别是刊于《历史研究》1999年第5期的《邓广铭与二十世纪的宋代史学》和刊于《读书》1999年第3期的《不仅是为了纪念》。前者使我在二十世纪史学的总体格局中，对宋史，对邓广铭之史学有了一定的认识；后者则更感性，更动人：

一九八七年十月八日，记得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秋日，我忐忑不安地叩响了北京大学朗润园十公寓二六室的房门。举手之间还犹疑不定，虽说我在北大历史系念书的时候，正好是邓广铭先生做系主任，但恐怕我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印象。当时我并未意识到，在我面前敞开的，是一扇通往学术殿堂的大门。



大学毕业后,我在一所说是机关又不是机关说是学校又不像学校的学校任教,游离于学术界之外。后来有一天,心中涌动着对学术的向往,于是就这样莽莽撞撞地敲开了邓先生的家门。老实说,在这之前,不曾想过像我这样一个没有高学历的人能够跻身于北京大学的教席,我此行的目的,原本是想请邓先生介绍我去中华书局。没承想,待他仔细听完我的自我介绍后,当即决定要把我调到由他担任主任的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然而校方人事部门对此发出质疑:北京大学权威的学术研究机构,调进这种人合适么?他的回答是:不可以资格取人。据说他还为此找过当时主管人事的一位副校长。半年后,我相当顺利地进入了北大。

尽管刘老师自认“不是邓先生的人室弟子,从来不敢以门生自诩,恐有僭伪之嫌”。但与恩师的初见,总是生命中深深的烙印;对这初见的回忆与描述,也最能见出师徒的学术品格。这个因“不可以资格取人”而留下的年轻人,果然以其超众的勤奋和精审,焕发出超强的学术潜力,不到三十年,写出一百多篇高水平的论文及各类学术文字。邓先生是胡适之、傅斯年先生培养出来的一代学人,像他们一样爱才惜才护才。这位傅斯年的山东老乡,还有着和“傅大炮”一样的高明独断的气魄。据说当年田余庆先生评教授时有人质疑文章少,时任历史系主任的邓先生即以“一篇《说张楚》就值个教授”作答,后来的发展也证明他是正确的。没有像其他老师那样继续在职攻读学位,刘浦江老

师一直是本科毕业，看着他，多少有点儿学术和学历的反差感，想想，我也觉着是一种有趣。但若干年后，在历史系换届前后，在与老师们的闲谈中，却发现“资格取人”还是主流。刘老师2006至2010年任历史系副主任，兢兢业业、工作突出，换届时也是大家属意的人选之一，“没有博士学位”却成为一些人的反对意见。学有代嬗，历史系开始不那么有趣了。

## 二

我研究生毕业后曾留校工作，与刘老师接触渐多其实是在这个时期。也就是在共同为学校服务的接触中，我对他的勇于任事和处事能力有了认识。2007年的历史系迎新茶话会，我有幸参加。席间，他按照职责分工介绍了过去一年历史系的本科教学成绩，井井有条、侃侃而谈、认真依旧。他调侃学术先进曾让我惊讶有趣，他的行政长才再次让我惊讶钦佩：刘浦江老师这是“更成熟了”？再后来，陆续听到一些对他行政能力的好评。我总是会说，你们还不知道刘老师上课的神采。另一边却在想，这样懂学术、懂管理、有热忱的人才进入学术建设事业中来，该是多好。须知，傅斯年建设了史语所，他的学生邓广铭创建了北京大学中古史中心，都是学术共同体的不二之选。

这时，我已是史学的票友，见面时刘老师却也会和我聊聊历史学方面的事情，特别是我还能插上话的清以后历史。记得一次在食堂偶遇，他就问我怎么看一位思想学术史前辈学者，本校中文系某老师治学与其有交集，告有瑕疵，我大概是说细节考证或有问题、但不损其格局论断云云。我暗想，那么专精的刘老

师,原来对清代学术史也有兴趣。

看看著述目录就知道,虽然担任历史系的行政工作,刘浦江老师的学术脚步从不曾停歇。从行政岗位上退下来之后,他又让我们惊喜,把辽金史研究推向了更高的水平,治史境界也更加深广。对辽金史的实证研究在语言文字领域深化的同时,他的文章更不断追问一些重大的思考,触及政治文化,触及中国历史上通贯性的大问题。2014年5月,无意中读到他在《近代史研究》发表的《太平天国史观的历史语境解构——兼论国民党与洪杨、曾胡之间的复杂纠葛》,我眼前一亮,赶紧分享同好。这是一个很好且“很好玩”的题目,他以一贯的精密手法出之,论述则更见开阔通达。一位“古代史学者”写出这样的文章,真值得近代史从业人员“警惕”。文下注明,这是他“历史学视野中的正统论”研究的系列文章之一。上网一搜,《南北朝的历史遗产与隋唐时代的正统论》等文章已先行发表。而《德运之争与辽金王朝的正统性问题》则刊于《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从前后的文章中间,可以领略一位学者不懈的努力,看到学术静静的生长。

刘浦江老师1961年生。五十出头,正是一位历史学者最好的时光。在对人生多了体认之后,对往昔政治社会也就多了冷暖之感。回归学术与兼理系务,认真劲儿和决断力一以贯之,也会在回环往复中更加醇厚。学术的积累、人生的阅历逐渐可以供养成熟的文章。“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这正是由“变”而“大”的时期。刘浦江老师晚近文章中的通达、圆润,都是一种成熟,都是向“大”迈进的步伐。

而我愈发感到,他始终是一位“年轻学者”。在他身上,看不

到老去的感觉。他那么年轻、纯粹,充满学术生长的活力。又正是这样一个阶段:成熟的人生和学术,也逐渐可以供养年轻的思考。曲折淬砺而出的火光,才是真的火。写到这里,刘浦江老师的音容笑貌就在我的面前。他的认真,他的率性,他的年轻。你看他的照片,真的不曾老过。

(作者系共青团北京市委宣传部长)

## 他的目光如手术刀般锐利

陈恒舒

我是在今天(编者按:1月7日)早上上班的路上,突然得到刘浦江老师去世的消息的。起初是不信:不是说情况没有原先想象得糟吗?不是说上次化疗之后有所好转吗?怎么突然就撒手人寰了呢?后来才听说,浦江老师一个月前病情突然恶化,于是放弃治疗,安顿好自己在校的学生,回到重庆老家,安静地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

我并非浦江老师的及门弟子,只不过是一个修过他两门课的“门外汉”,对浦江老师的学行修养、学术造诣都没有说半句话的资格。大约十年前,我曾经有过一篇写浦江老师的文章(《陈恒舒:记北大中文系的几位先生》,澎湃新闻报道《刘浦江:北大中文系同学最热爱历史系老师》一文中曾节选刊登——编者注)。那时候我还是一个懵懵懂懂、不知学术为何物的本科生,对浦江老师的了解也有限得很,只是上过一门中国古代史,记住了一句“中文系没文化”。那篇文章据说昨天又开始疯转,虽然我对自己这篇“少作”颇有不满,但现在动笔修改也不合时宜,只好任由它引发大家对浦江老师的怀念,并在这里补记我在浦江老师另外一门课上的经历,以寄托我的哀思。

第一次听浦江老师的“《四库全书总目》研读”是在2006年秋天,当时我研一,并未选课,只是旁听。开课的地点在中国古

代史研究中心的报告厅，因为经常要开投影，灯光不能太亮，所以在我的印象里，这里总是昏暗甚至略有一点压抑的。第一堂课是介绍《四库全书》和《总目》的概况。浦江老师说：“大家知道，《四库全书》一共有七部……”然后对旁边一个瘦瘦的男生说：“陈冠华，你知道这七部《四库全书》的情况吗？”冠华兄很流利地回答了。浦江老师说：“很好。”然后向四下里扫视了一圈说：“看看，这是我们历史系的本科生。”言语中流露出一丝得意之情。这话大概是说给在场非历史系的同学，特别是“没文化”的中文系同学听的，或者说，这就是“中文系没文化”的翻版。起初听到多少有点不舒服，但随即就释然了，因为中文系文献专业的学生，但凡修过目录学的，都能回答这个问题。这恰又应了那个后半句：“文献专业还算有一点儿文化。”

浦江老师对于历史系的优秀学生从来都是赞誉有加的。比如冠华兄，又如我常常在图书馆古籍部见到的一位拄拐的男生，2009年秋天又在浦江老师的课堂上见到，浦江老师在他做报告之前特地介绍说，他叫马清源，是历史系非常优秀的一位本科生，与骨癌斗争多年，刚刚做了截肢手术，但这些年来一直苦读不辍，已经以专业第一的成绩保送读研云云。至于其他学生，如果有学术方面的专长，浦江老师也会在他们做报告前向大家介绍，而且从不吝惜赞美之词。

当然这只是事情的一面。浦江老师在学术上对学生要求之严格也是出了名的。这门课的要求是每个同学轮流做报告，内容是讲一篇提要。讲提要，绝不是止于宣讲大意，而是要句句落实，考查源流，辨正讹误，必要时还会旁及其他。最“可怕”的是，浦江老师会在你讲的过程中随时“发难”，而且往往是连珠炮般

的咄咄逼问，常让人有喘不过气来的感觉。如果准备充分，对答如流，自然可以给老师留下不错的印象；但如果不幸出糗，老师也绝不会顾及你的颜面。有一次，浦江老师突然问一个刚刚考博来到北大历史系的女生：“你是宋史方向的博士，《隆平集》该读过吧？”女生迟疑了一下，说：“读过。”浦江老师紧接着问：“读的什么版本？”女生又迟疑了一下，说：“中华书局点校本。”浦江老师紧接着又问：“中华书局出过《隆平集》的点校本吗？”女生无言。答案当然是“没有”——中华书局 2012 年才出版了王瑞来先生的《隆平集校证》。虽然屋内光线昏暗，但我依然注意到了浦江老师手术刀般锐利的逼视目光。整个课堂沉默了许久。浦江老师才缓缓地说：“作为宋史方向的博士，《隆平集》还是要读的。”声音有些嘶哑，失望之情溢于言表。

为了不被浦江老师问到卡壳，一篇百余字的提要可能都要花上几个甚至十几个小时来准备。你需要查阅大量的史料，经过审慎的比较、分析，最后得出结论。博学、审问、深思、明辨，一个都不能少。这个过程是很锻炼人的。一门课下来，我深深感到，历史系的学问，特别是中国古代史方向，其扎实程度，在全北大是数一数二的。我 2009 年做的那次报告还算顺利，历史系的朋友私下告诉我，浦江老师对我的评价还不错，但那大概是因为我领到的《绍陶录》这部书确实比较简单，我甚至一度觉得浦江老师是有意照顾我们这些“没有文化”或是“只有一点儿文化”的中文系学生——他的得意门生雷博兄领的可是《历代名臣奏议》和《庆元党禁》这两块难啃的硬骨头。后来我也曾几次试图组织《四库全书总目》的读书会，按照这个方法读《总目》，最近一次努力是在去年四月——我毕业已经快一年了，都未能成行，至今

仍是个遗憾。

如果说浦江老师当年中国古代史课那句“文献专业还算有一点儿文化”影响了我的专业取向，那么这门“《四库全书总目》研读”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的学术兴趣和学术方法。我的博士论文几经周折，最终确定在“四库学”领域内，主要的功夫也都下在史料的爬梳、考证上，很显然，都和这门课有着直接的联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浦江老师对我北大生涯的影响是贯穿始终的，而且绝不亚于中文系的老师们。

这门课之后，我和浦江老师见面并不太多。我曾在文史楼内和他探讨过中学历史教育问题（那会儿我们都在参加北大自主招生阅卷），在中古史中心和他聊过《通鉴辑览》和《永乐大典》，在物美超市门口和他说起过我的论文，更多的则是在未名湖畔和骑着自行车去吃饭的他擦肩而过……最后一次是在2013年春天，那时正是我博士论文的攻坚阶段，我在图书馆古籍部见到他，向他请教有关清代钦定《三史国语解》的问题，他说，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一句半句说不清楚，你去看我的论文吧，“中国知网”上就能找到。

斯人已逝，言犹在耳，言犹在耳！

（作者系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



## 怀念我的班主任刘浦江老师

李怡文

第一次见到刘老师是 2004 年八月末的一天。应该是新生报到的当天吧，刘老师就来到去年刚被拆迁的 29 楼看望我们这群初入燕园的小孩儿。记得当时刘老师挎着深蓝色的包，大概就是中古史中心的那一个。他站在门口，说我是你们的班主任，我来看看大家。

现在想来，刘老师应该是我们见到的第一位历史系的老师。但是当时看着刘老师，我和我的室友们及我们的家长们，都以为刘老师刚刚毕业留校不久。很年轻，很平易近人。直到随后全班同学见面自我介绍，有同学比大家小一两岁，刘老师笑着说你比我女儿还小呐。引起全班一片惊呼。

对于 04 本的我们来说，关于刘老师的传说，都是后来才知道的。当时我们只知道他是为了我们忙前忙后的班主任。入学没多久就是中秋节。刘老师大概是想到新生过节很容易想家，就准备了月饼等等召集大家一起过节。很多细节都已模糊，但清楚地记得刘老师让大家做的一个游戏。当时班里男女生基本还处于不认识的状态，过节也自然变成了男生坐一堆，女生坐一堆。刘老师就让男女生一组组站起来互相说关于对方的三件事，说不出就演节目。随后的场景大抵是，抓耳挠腮搜肠刮肚后

还是要演节目的大有人在。当时的刘老师应该完全不在乎我们知不知道四库全书有几套，只是希望我们好好了解同一个班的同学，快快乐乐地过本科这四年吧。

04 本的大家对刘老师的爱称是“阿浦”。这个爱称好像是源自大一暑假的军训。现在依然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刘老师把本该用来做研究或陪家人的时间，都花在我们这群当时估计还是不知道四库全书有几套的小孩儿身上。整天地站在怀柔军训基地，顶着烈日看我们踢正步。刘老师也换上了指导员的制服。不知道是不是跟我们的军训制服一样不舒服，但刘老师穿上特别精神。刘老师很快就细心地发觉了军训基地水果短缺，小卖部供应的水果总是在上午第一次休息时就被抢光。于是在我们训练时，不知他用了什么方法从附近的农民老乡手中给我们买到了许多水果。军训期间，我们总是隔一两天就能收到刘老师送来的新鲜水果。有一次的桃子超级甜，甜到我事隔六年，还把它写到了硕士论文后记中。好像也就是这样，大家开始渐渐地吧军训时和我们同甘共苦的刘老师，亲切地就称作“阿浦”。

由于《宋辽金史专题》课在我们大三大四两年都没有开，所以班里正式上过刘老师的课的人其实并不多，但刘老师学者的风采时时影响着我们。大二时的一次班会，刘老师当时正在研究契丹的父子连名制。他神采飞扬地对我们这群连专业还没有分的小孩儿讲了很久。我听得似懂非懂，但深深感受到了一名学者对专业的热忱与从中收获到的喜悦。后来班里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同学继续在系里读了硕士，读古代史的四人，除了一名攻读文献方向外，其余三人，包括我自己，都读了宋辽金史。不知是不是也是受了刘老师的影响。

从本科入学到现在已十年，我还在继续攻读中国古代史的学位，是与刘老师最初的鼓励和支持分不开的。大二下学期在中古史中心图书馆看书，正好刘老师也来了图书室。当时本科生到中心看书还需要提交申请，所以刘老师见到我很高兴，捧着书在我对面坐下，跟我聊了好一会儿，其中一句，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刘老师说，我听班里同学说你挺爱看书的。那好像是我第一次单独和刘老师讲话，所以得知老师居然有注意到自己，喜出望外也倍受鼓舞。随后不久，申请学校的本科生科研基金，因为邓老师期间出国，我的报告暂时由刘老师把关。一天晚上，突然收到刘老师发来的一条短信，写着自己家里的电话号码，让我给他打电话。电话拨过去，刘老师很快就直入主题地说，你的学术综述从盘古开天地写起这哪能行。这么多年过去，现在坐在这里写下这句话，刘老师的声音犹在耳畔。这是我最喜欢刘老师的地点，直接、利落，所以作学生的也记得深刻。之前读到的回忆文字不止一篇提到，刘老师对学生严格但也不吝表扬。在保研面试的时候，刘老师作为班主任向其他老师简单介绍我的情况时，最后加了一句：这是我们班英语六级考得最好的，比世界史的同学分数都高。刘老师一直希望学中国史的同学也可以同时注重外语，所以当时言语中能听出还是很欣慰的。想来自己令刘老师满意的时候实在不多，仅有的这么一次还不是因为历史，很是惭愧。不过当时好像连受宠若惊都没来得及，光顾着惊讶刘老师还留意了全班同学的六级分数。

刘老师对04本同学的关心是延续到了我们毕业后的。硕士刚入学时，刘老师问我宿舍分到了哪里。我说在畅春新园，刘老师很高兴，直说咱班女生本科住宿条件太差了，硕士应该让你

们住好一点。我当时还在怨念不能继续住在校内，但刘老师说，等写硕士论文的时候，你就知道两人间的好处啦。后来，直到我硕士毕业，刘老师还总会时不时问问本科班同学的近况。

我在北大的七年，从入学到硕士答辩毕业，刘老师出席了每一个重要的时刻。所以刘老师对于我早已不止是本科班主任。刘老师也是我在美国留学的讨论课上和聊天中最常引用、最常提及的老师。每每有人问我为什么这么崇拜刘老师的时候，我的回答永远是：因为他是我的班主任啊。这里“班主任”包含很多意思。他不仅仅传授给我们知识，而且，更重要的是，从我们踏入大学校园的第一刻起，身体力行地教给我们在将来的人生道路上如何成为一个正直的人，一个受人尊敬的人，一个无愧于自我也无愧于社会的人。

我见刘老师的最后一面是13年的夏天。我恰好放暑假回国，回中古史中心参加期末总结并送两位师兄毕业。坐在中古史报告厅时，刘老师进来接水。他出去在外面关门时，隔窗看到我坐在里面，就在门外朝我挥了挥手。那天要离开中心去聚餐时，我觉得刘老师好像在办公室里，很想去和刘老师说说话。但是当时因为在美国的前两年只是修课，自己的研究还没有头绪，而且开始转向做中日交流史，没有好好继续原来的研究方向，内心觉得很愧对老师。报告厅门前踟蹰了一下，想着来日方长，等有点成绩再去打扰老师吧。一念之差，现在已经成为一生的遗憾。

现在我的手机里还留着和刘老师发的短信。很久都不再敢去看。一条是11年的夏天，我在首都机场飞美国之前发给刘老师信息，刘老师很快就回复了，字里行间满是鼓励和期待，使我

在离国前最后一刻放下了觉得自己硕士论文写得不好的包袱，信心满满地飞赴异国。另一条是去年的教师节，我告诉刘老师自己刚刚通过考试成为了博士候选人，并约好等刘老师身体好一些就去看他。

我在硕士毕业答辩通过后，因为要离开呆了七年的校园，离开老师们，在本该致谢的时候，站在那里哭得一句话也讲不出来。事后有同学告诉我，当时刘老师一直在笑着看着你。

不知道刘老师现在是不是又在什么地方笑着看着我，看着我们。我，我们，都想请您继续看着，您的期待，我们对您的承诺，一定，都会实现。

2015年1月17日

(作者系耶鲁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

## 追思与怀念：忆刘浦江老师

李根利

2015年3月22日上午，第十一届北京大学史学论坛正在热烈的进行中，休息的时候我对身边的同学说：“一年前的此时刘老师正在给咱们做讲座。”大家一阵沉默，相对无言，之后同学们讲了什么已经不大记得，但那种物是人非的隐痛直到今天仍常常在心底泛起。那天离刘老师在北大历史系做的最后一场讲座是整整一年的时间，而离他的葬礼仅仅是刚过了一天，世事的安排真正是让人感受到了生命的脆弱和无常，但我真的不愿意相信刘老师已经远去，常常会想去年教师节才给他发过邮件啊，依然是秒回，短短三个月怎么会阴阳两隔了呢？刘老师去世后一个同学发了条状态说电脑另一端再也不会秒回的邮件了——只有我们这些被刘老师秒回邮件爱护过的学生们才知道其中的深情与哀痛。每到这种时候我就非常想写一篇怀念刘老师的文章，但每次都是心中汹涌澎湃，到了下笔的时候千万种思绪一起袭来，却茫然不知道该从何写起。

现在回忆起多年以前我第一次见到刘浦江老师的时候，他那略带口音却又犀利逼人的语言风格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如有同学所言他那如手术刀般锐利的目光好像能把心底的一切都看穿，让人在七分敬重之外还带着三分畏惧。所以从那之后就对这位老师格外留意。2012年秋季学期我旁听刘

老师开的“中国史学史”，这门课是刘老师近年来常开的两门课之一，或许是刘老师严厉的名声在外，此课被许多学生视作畏途，但是从上课的效果来看却是极好，许多修完这门课的同学都认为是经过这门课的洗礼后才真正探寻到了史学的门径。对我而言，从此课也是获益良多。刘老师讲这门课有其独特的风格，他上此课时一般是先把要讲的史籍提要念一段，因为他的课件做得十分简略，这个念白很快过去，之后滔滔不绝地讲解就让我们这些学生知道了刘老师绝对是一个“有文化”的人，他对所讲的任何一部史籍都很熟悉且能旁征博引海阔天空地说开去，思维和内容完全是发散式的，你完全想不到下一步他会讲到哪，但却都是大家之前不知道的知识，对学生而言这样信息量就很大，记笔记就成了一个累活，现在看看我当时所做的笔记，其细心、精致和用功绝对是我诸种课堂笔记中的上佳者。刘老师除了对每种史籍的编纂和价值优劣做出一个总结外还会讲到相关的学界最新动态以及治学门径，如讲到宋代的方志学的时候，他向上追溯了方志的两个源头和之后的发展脉络，向下一直讲到了近年来出现的《中国方志库》这个网络资源，并且特别强调使用网络资源一定要核对原书。再如讲到《四库全书》时，刘老师告诫说此书里面除了四库馆臣当时从《永乐大典》摘抄的独有史料外其他应该慎用。提到当下盛行的电子书时，刘老师教会了大家使用“读秀”查阅北大图书馆馆藏的电子资源……现在回头看看这都是些许小事，但却都是刚开始学习史学的学生们所迫切需要的知识，刘老师的稍一点拨便让学生们少走了许多的弯路并受益终身，他真正是一位传道授业解惑的“师者”。从此也可以看出刘老师教育学生真的是毫无保留，全心全意。

刘老师所讲授的知识也不仅限于书本，他对全国各高校的专业设置、实力强弱都有深刻见解，对于历史学科尤其熟悉，我曾经不止一次听他谈起过高校历史学一级学科评估的情况，他对北大历史系和兄弟高校历史系的优缺点了然于胸。而对于北大各院系的情况他更是十分熟悉，他曾经饶有趣味的给我们分析了北大外院学生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学生的优劣势。这些我们平时听不到的知识再加上穿插在讲课中间的学林趣闻轶事，让我们这些每天只能看到北大四角天空的文科生大感过瘾。

在此课上还有两个有趣的小故事，一个是关于那个广为流传的“中文系学生没文化”的段子。我记得事情是这样的，在讲到《资治通鉴》的时候，刘老师说《通鉴》适合阅读，至少要读一段时间，因为文化底蕴都是在年轻时打下的基础，这时他话锋一转批评了中文系的学生没有文化底蕴。是的，确实是说的“没有文化底蕴”而不是“没文化”，所以结合刘老师讲这个话的背景来看，我认为刘老师并不是真的认为中文系的同学“没文化”，而是要求学生多读书读好书，书读多了“底蕴”有了，也就有“文化”了。另一个小故事是关于“中国史学史”这门课的。因为之前一直有这门课挂人厉害的传言，所以很多上课的学生都心有惴惴焉，在最后一次课上刘老师站出来辟谣，我记得大意是说本课挂人厉害是没有的事情，上一次只有一个韩国学生没有过，那是因为他从来都不来上课……这些事转眼已过去了将近三年，现在回忆起来却再也感受不到刘老师的丝毫严厉，反倒全是那久违的亲切。

现在回想这门课，第一次上课的时候刘老师讲的哪本书，我坐什么位置，之后的日子里讲的什么内容，我坐什么位置，刘老



师上课时候的很多表情动作，下课时刘老师和我在门口聊天的内容，以上种种我全都记得，现在都历历在目清清楚楚，仿佛就在刚才一样。他的声音真的就在耳边回响，每个字都不会错，次序都不会差。记得那年选课的主要是历史系 2011 级的本科生，在刘老师去世之后，我曾经对 2013 级本科生说：“你们再也没有刘老师的‘中国史学史’上了。”一声叹息。

再次跟刘老师上课是在一年后的 2013 年秋季学期，在中古史报告厅上“《四库全书总目》研读”。刘老师简单介绍了一下课程之后说：“《四库全书》是分七阁的，但是以前很多学生连这都不知道，你们知道是哪七阁么？”接着环视了一下大厅，目光落在了我身上说：“李根利你来回答一下吧。”我当时万万没有料到刘老师会在一屋子学生中选择提问我，全无准备的我只觉得心扑通扑通跳紧张极了，下意识的站起身来随口报出能想到的七阁的地点和名字，刘老师打断我说：“太乱了，你按顺序说。”我稳稳神，整理了一下思路按照从北到南的顺序依次报出，但到最后还是卡壳了一下，刘老师提示了一句才得报全。我坐下之后刘老师说：“说的大致不错，他叫李根利，是学明史的。”此事我印象很深但也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在刘老师去世之后看到师兄们写的怀念文章才知道他在这个课上固定要提问这个问题的，回答得好的学生也会得到诸如“这就是我们北大历史系学生的水平”之类的表扬，而这次课上他把这个机会给了我，而我回答的只能说是差强人意，虽然后来我师弟写回忆文章讲到当日情形时对我说：“刘老师那就是表扬了师兄你啊。”但我一直有些懊恼，后悔自己当时为什么不回答的“七全七美”。当然我所懊恼后悔的更大原因是我当时没有跟着刘老师好好上这门课，这门

课的作业对文献和考证校勘之学要求较高，亦很费时间，而那学期我选课较多怕忙不过来，所以就想先试听一学期，下次开课再选不迟。所以我一直懵懵懂懂的混在人群中听课，虽然领略了刘老师和诸位同学的精彩演讲，但是自己没有亲手去做一遍毕竟使效果大打折扣。没有交一份给刘老师点评的作业成了我人生很大的一个遗憾，而这个遗憾却再也无法补全了。

刘老师在课堂上是一位好老师，在课下对学生的生活等事情也十分关心。2013年6月我在畅春新园食堂门口偶遇刘老师，刘老师问我在这等谁，我说等我师兄一起去吃饭，刘老师说：“我之前推荐了你师兄去北师大出版社，他最终去了没有？”我说此事我还不清楚最新情况，等知道了再告诉您。讲完后刘老师颌首和我道别。现在想想，刘老师也不是主管就业的老师，学生的就业也不是他分内之事，但他却对一个普通的毕业生如此关心，他是真正地把学生放在了心上。

而对于学生办的各种活动，刘老师也都会尽力帮助和支持。拿北京大学史学论坛来说，论坛创办至今已办了十一届，开办的最初那几年正是刘老师当历史系副主任的时候，我虽然不知道最初那几年的具体情况，但是根据现在能看到的照片资料可以肯定刘老师给予了很大的支持。2014年3月22日第十届论坛要开幕的时候需要找一位老师来做开幕式讲座，但那个日子正好赶上博士生开题，很多老师都无法抽身参加，我急得团团转，无奈之下又想到了刘老师，因为我知道刘老师那天是有读书课的，而以前请他来过多次，总不好意思再次麻烦他，所以之前并未去找他。但现在也只好再次麻烦他了，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给刘老师写了一封邮件，不一会刘老师就给我回信说可以来，开

幕式报告大概讲十五分钟左右，因为还要赶回去给学生上读书课。我大喜过望，有刘老师大力帮助，此事遂得顺利解决。当天刘老师早早来到会场参加了开幕式并且做了一场《汉学与宋学》的精彩讲座，这是他历史系做的最后一场讲座。开幕式后合影的时候我坐在了刘老师的旁边，刘老师还是那身标志性的蓝色西装，淡淡的笑容凝视前方，当时开心兴奋的我们哪里又知道此时刘老师已经患病了呢。合影完毕之后刘老师对我说：“没有其他事了吧？”我说：“没事啦，没事啦，谢谢刘老师！”他微笑转身离开，赶去上读书课。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刘老师，以后每当回忆起刘老师我的眼前都常浮现出那天他慢慢离去的背影。

我得知刘老师患病的消息是在史学论坛一个月后的4月19号晚上，那天偶然从同学那听到了这个消息，当时只觉得如晴天霹雳一般，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又心想刘老师平日里精神饱满充满活力，这或许是误诊，抑或并不严重，做个手术就好了，当时只能如此安慰自己。此时很多同学还不知道这个消息，第二天晚上班级聚餐的时候有同学讲到此事，晓慧当时便情绪失控大哭出声。此后刘老师住院治疗，传来的消息总体是趋好的，到了八九月份的时候据说身体恢复得已经不错，选课系统上还出现了刘老师要开的课，同学们都很受鼓舞，觉得不久就可以在课堂上再次看到刘老师了。虽然课终究没有开，但之后的两三个月还算平静，我们也都以为刘老师吉人天相自当在逐渐的恢复过程中。2015年1月5日晚上我在系里参加期末考试的时候却得知了刘老师病危已经回垫江家中的消息，当时一下子就懵了，不是说已经好转了吗，怎么会这样？当时只能在心里默默祈祷，希望能有奇迹出现。一天之后的1月7日早晨醒来却看到

了那个不愿面对的消息，刘老师已经走了，永远地走了，永远地离开了他所钟爱的三尺讲台和他关爱的学生们。我坐在床上一遍遍的刷新微博，看着大家铺天盖地的转发和怀念，认真看完每一个人的怀念文章，再把它们放进收藏夹。看完这些文章愈加心痛鼻酸，脑海中以前的点点滴滴逐渐汇拢，往日的回忆逐渐清晰却又缥缈模糊再也抓不住了。

刘老师去世的时候墓地尚未完全安排妥当，也就没有合适的地方开告别仪式，经过系里多方努力才在临近北大西门的东北义园找了一个小厅，东北义园是九一八事变后设立的专门安葬东北籍人士的墓园，刘老师一生主治辽金史，身前结缘东北，文集亦以“松漠”为名，身后告别仪式又在此园，一生辽金史，松漠情，此始又此终，怎能不让人感慨冥冥天意。1月8日下午我去东北义园帮忙布置灵堂，各位师长和同学献来的花圈、挽联布满了厅堂又延伸到走廊上，我将历史系研究生会敬献的挽联挂上后，看着空旷的灵堂，鼻子一酸不由泪落。1月9日的告别仪式上我站在门口引导，看着大家从四面走来，各个表情严肃，偌大的广场无一丝声音，进入灵堂之后很多人看着花圈就忍不住泪水，很多人哭着从灵堂里面出来。很多学生，男生在抹眼角的泪水，女生痛哭失声不已。一名受人尊敬的师者应当如斯，刘老师用他的一生践行了这个词。

在忙着治丧的那两天曾经和诸位老师聊起刘老师生前的种种，卫老师说：“当年刘老师主管系里的招生工作的时候我特别省心，他总是会把考试的各种分数综合统筹算完之后再给我。”孟老师在一旁长叹一声说：“好人不长命，好人太操劳了。”管老师说那天他编辑刘老师的简介时是一边打字一边流泪。这就是

刘老师，一个甘于奉献，燃尽了自己的师者。他一直关心系里的研究生招生工作，2014年3月底还最后一次参加了系里的硕士研究生面试。说到面试，刘老师是挑学生的，对学生的要求很高，但他的这种挑剔完全是出于对学术的传承和发展的责任，他有一种使命感，也完全把自己奉献给了学术和工作。但就是这样的一位专心于学术和工作的老师生前却少有什么荣誉称号，我所知道的一个“北京大学优秀共产党员”称号还是在他生病住院后系党委全票通过授予他的。淡泊名利，任事为公这就是刘老师的处事风格，也因此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的敬佩和认同，无愧是真正学者的表率。邓小南老师回忆刘老师时曾写道：“他有思想，有风骨，有干才，有境界，在喧嚣的环境中能够出淤泥而不染。他是非判明，勇于是是而非非。借用宋人的话说，就是‘质犹近古，纯正笃实’，‘天然清流，不杂渭泾’。”诚哉斯言。

大节落落，高文炳炳。永远怀念刘浦江老师！

（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硕士研究生）

## 不一样的感受,同样的关怀

——追念刘老师

马清源

最后一次见刘老师,大约是去年的4月1日,在校医院意外碰见他,闲谈之中,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最近胃有点不舒服,来拿药。简单问了几句我最近的学习、身体情况以及博士论文写作方向,然后说还要到中古史中心图书馆去查点资料,就骑上他的自行车走了。不想这竟是我见刘老师的最后一次。

上天真的是给刘老师开了个巨大的玩笑,不到一个月,我从乔老师那里得知刘老师病了,具体情况不明了,但好像还挺严重,虽然我们都忌讳用那个词,但都有些心理准备。不过印象中刘老师身体一向还不错,觉得这也可能是“谣言”或者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严重,其实那时,我真的是希望这只是一个“谣言”。第二天去刘老师学生陈捷老师那里核实的结果是刘老师真的病了,很快要开始化疗,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很快我就想和陈老师一起去看望一下刘老师,因为听陈老师说,刘老师病了还提起过我。不巧,当天准备好了之后刘老师没让我们去,陆续得到的消息也是刘老师不希望大家都去看他。不料,事一搁置,以后终究也没能见到刘老师,每念及此,追悔何及!

一直心存幻想,以为刘老师贤人天助,每次碰见他的高足,得到的消息也是说刘老师状态还好,正在康复,甚至都传出有要

继续开课的准备。直到田先生去世,系里设悼念会那天早晨,听说刘老师状态还不错,只是身体有点虚弱,我马上“现身说法”,说虚弱是正常的云云。不想1月5日我开题,和几位老师一起吃饭,言谈中有老师提到“刘老师已经回老家了”,当时还不曾想是放弃治疗了,以为就是治疗间隙思乡亲切,虽然隐隐有不祥的预感。7日一早,就传来刘老师去世的消息。

因为我个人的原因,在历史系也算一个“麻烦制造者”,不断受到各位老师的关照,其中刘老师对我关照尤其令我难忘。本科入学以后,虽说平时也常听说刘老师的大名,但机缘不遇,一直也没能去听过他的课。第一次见刘老师是09年秋天,当时我刚恢复正常行走能力,选了刘老师著名的《四库全书总目》研读课,现在还记得很清楚,第一节课是由深为他欣赏的陈冠华师兄领读,随即分配我下次读《东家杂记》的提要,经过向冠华师兄请教,突击了两周,终于战战兢兢地在课堂上“开讲”。其实作为一个初学者,准备的能好到哪里去,不过竟然被刘老师在课堂上谬赞一番,令我汗颜,细节的错误,也被刘老师和风细雨般的指出。那节课给我留下的印象极为深刻,现在想起来,仿佛刘老师的话还在耳边萦绕。读一篇《四库》提要,要涉及其中许多诸如版本目录学等方面的知识,现在我都庆幸当初去上了四库课,正是在这门课上,我对《四库》及其涉及的相关文献知识有了大致的了解,为我以后继续学习文献专业打下了基础。记得他当时还说,那篇提要可以写个一两万字左右的文章,不过由于我生性慵懒,直到现在也没写完,如今斯人已去,倍感愧疚。

不久,就面临保研的事情,为了我能顺利继续读书,主管学工和教学的各位老师都为我的事费心,刘老师更是为此多方协

调，最终我顺利保研，能在历史系继续赖下去。保研的事过去之后，为了我能走出宿舍多与同学交流，同时也为我提供一定的生活补贴，刘老师又出面为我安排了助教的工作。我发邮件向他表示感谢，他回信称赞道听说我助教工作做得还不错。硕士一年级的時候，又为我争取到一次去台湾中研院学习交流的机会。我最后读博士班，当年名额紧张，后来听说也是刘老师为我争取了名额。读研期间，断断续续还上过他的《辽史》研读课，现在回想起来，偶有发言，多是胡说八道。这些天，看到师长、同学回忆刘老师的文章，基本都提到刘老师对学生很严格，甚至严厉，批评起人来毫不留情。初读感觉很诧异，因为和我对刘老师的印象差别很大，记忆中，无论是上他的课还是平时的交流，给我的感觉都是温和随意，即便我上课胡诌，也没有批评过我。每次见面，关心的多是我最近的学习、身体情况，常说读博士累、要注意身体。后来我释然，两者并不矛盾，无论是对学生高标准、严要求，还是照顾学生，最终展示的都是刘老师对学生的关心与爱护。

回想这么多年以来，虽然受到刘老师很多关照，但实际上与他面对面的交流屈指可数。自忖学识低下，有负关照，很少主动去请益。有什么事，多是通过他的学生居中转达，翻翻手机，竟然没有他的手机号。刘老师病了之后，虽然通过他学生要他的手机号很容易，但一直不敢联系，而现在，再也没有机会体验传说中他秒回短信的感觉了。回想起来，真的后悔没有去医院看望刘老师，哪怕一次，甚至哪怕最后像系里牛老师说的那样，在重症监护室外边默默地看一眼也好。悼念会上，放出刘老师生前在医院的照片，看到那么多老师同学其实也能去看望，真是痛



感消息闭塞。尤其是其中一张照片,刘老师脸颊凹陷,颧骨突出,和印象中的样子完全不一样,真的能够想象刘老师在治疗期间受了多大的痛苦。

21号的追思会上,王春梅老师提到刘老师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托她在万安公墓买一块墓地,因为他的老师邓先生葬在那里,作为学生,他要永远陪在邓先生身边!相信听过王老师的发言的师友,没有一个不感动流泪的。固然,刘老师的学生有他这样的老师,堪称幸运;可是,邓先生有刘老师这样的学生,又有何憾?师生情谊如此,堪称楷模!

一年前,在中古史中心,还能碰见刘老师,一年后的今天,刘老师已经和我们天人两际。人人网上看到何老师发的状态“以后要再想听他的絮絮叨叨,竟无可能了”。最后的印象是他穿一身蓝色的西装,骑自行车向西去中心图书馆。如果真的有西方极乐世界的话,愿刘老师骑他钟爱的自行车能顺利抵达那平静的世界。

(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 形骸有尽而精神不灭

——怀念刘浦江老师

闫建飞

今天下午参加刘老师的追思会，是在人文学苑1号楼报告厅。想起上一次到这个报告厅，还是2013年9月份“宋代政治史研究的新视野”会议上。记得最后的总结发言时，刘老师也讲了话。他非常期待辽金史学者能突破辽金断代史的限制，打通宋辽金或辽金元的区隔，做有气象的学问。这是刘老师一贯的想法，也是对学生的期许。再次置身此地，又是在刘老师的追思会上，此情此景，不由让人黯然神伤。

追思会上，大家的发言均肯定刘老师是一个纯粹的学者。他的时间基本都用在了读书写作上。记得以前听大家提起，有次刘老师为了写一篇论文，曾经二十多天没有下楼（未知确否）。刘老师也是一个负责的老师，对学生严格要求，他指导的学生都很出色。他认为国内辽金史的整体研究水平在整个古代史领域是偏低的，一个断代的研究水平要想提上去，至少需要一批一流的学者才有可能。他不仅努力使自己成为一流学者，也一直在为培养一流学者而努力。可堪告慰的是，他的付出已有了回报。

但追思会上，大家没有太提到刘老师的另一个贡献，即他开设的课程，包括《三朝北盟会编》研读和《四库全书总目》研读。

可以说,这两门课打开了很多人的学术大门。尤其是《四库全书总目》研读课程,是很多学生第一次严格接受文献学的基本训练,课堂作业也成为很多人的第一篇扎实的学术论文。在受惠的众多学子中,我也忝列其中,这是我一直感念刘老师的重要原因。

第一次见到刘老师,是2010年9月份的研究生面试上。记得刘老师提的问题是我读的《资治通鉴》是什么版本,今本《资治通鉴》中的注释由哪几部分构成,正文与注文何时合并在一起。我当时既不懂版本,读书也不细,只是根据自己的印象做了回答,不知道当时的回答是否让他满意。2011年入学之后,第一次选课,师兄们纷纷推荐刘老师的《四库全书总目》研读,均表示此课获益良多。于是我就选了这门课程。课程的任务分配是《总目》的提要。当时读到《史部·地理类》,我分到的是《元丰九域志》。在课堂上,刘老师亲自做示范,向我们展示如何进行研读,需要去查哪些工具书,如何查对版本,手把手指导我们进行学术研究。也正是在刘老师的悉心指导下,我完成了自己的第一篇正规学术论文——《新、旧〈九域志〉考》。后来文章发表,在附记中也向刘老师表示了感谢。可以说,我的学术道路上,有刘老师很大一份功劳。

课程结束后,我就再也没有上过刘老师的其他课,但还是会经常得到刘老师的指教。有一段时间,我关注周必大文集的版本问题,写成的草稿曾向他请教。我虽然不是他的学生,但他改得还是很认真,文稿修改之处甚多。当看到他指出的低级错误时,不禁羞愧万分,对刘老师的感念也多了几分。

后来我不再关注文献学的东西,向刘老师的请教少了许多,

但平时仍能经常见到他。有一两个学期，在中古史中心上课较多，每周要在中心待五六天，刘老师常年在中心指导学生，所以每周都能见到两三次。每次见到他，总是会恭敬地问候一声“刘老师好”。每个周六，我们会在中心图书馆做 CBDB，刘老师则与他的学生在计算机室一起上读书课。如果恰逢荣老师的读书班也安排到周六的话，三波人汇聚，周六反而会成为中心最热闹的日子。这样的日子，想来总是让人怀念不已。

去年三月份，我们计划清明节去万安公墓为邓先生扫墓。当时刘老师说要与我们一帮学生骑车过去。但到了清明那天，他却没有来，当时只是听说他身体不太好，却并没有多想。过了半个月，听说刘老师得了胃癌，当时就觉得晴天霹雳一般，但尚未确诊，因此心里还抱有一丝希望。接着复查出来，不是胃癌，而是淋巴瘤，虽说到了晚期，但是有特效药可以控制病情。后来又听说特效药没有效果，刘老师继续化疗，决定干细胞移植。在干细胞移植前夕，刘老师又一次来到中心，和他的学生一起上读书课。当时我们在做数据库，看到刘老师后，都很开心。等到他们读书课间歇的时候，就一起去看望刘老师。记得当时刘老师因为化疗，头发已经全没了，但精神很好。我们当时都在心里默默祝愿他早日康复。只是没想到的是，这竟成了与刘老师的最后一面。

刘老师干细胞手术后，就没了消息。去年 12 月 31 号中午，我去见赵冬梅老师。在赵老师处得知，刘老师身体已经不行，回到了重庆垫江老家。次日，见到邓老师，邓老师提到刘老师手术失败，决定放弃治疗。邓老师提到了刘老师的后事安排，说刘老师嘱托王春梅书记在万安公墓为他买一块墓地，说要葬在他的

老师邓先生身边,这样也方便他的学生去看他。说到这里,邓老师眼里已经噙满了泪花,我们也特别伤感。紧接着的几天并无消息。1月6号的晚上,刚刚过了十二点,就得知了刘老师过世的消息。当时转告尹航兄,我俩久久无语。次日醒来,看到网上一则则悼念的微博,想起刘老师的点点滴滴,终于忍不住泪流满面,一个人坐在床上哭了起来。

1月9日,在东北义园举行了刘老师的遗体告别。哀厅肃穆,悼乐低回,入室想所历,望相思其人。感伤之余,也听到了刘老师病情中的更多细节,对刘老师也有了更多的认识。告别仪式上,润博兄转述了刘老师在邮件中说的话:“一个人文学者,有一流的作品可以传世,能够培育出一流学者来继承他的事业,还有什么可畏惧的呢?顶多有一点遗憾而已。”听到这话,对刘老师的敬佩又多了几分。是呀,刘老师有第一流的作品,他的生命虽然短暂,却完成了许多人一辈子也写不出的东西;他虽然故去了,但有他的学生继承他的遗志。“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其斯之谓与?

2015年1月21夜

(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 远去的“絮叨”

——怀念刘浦江老师

袁晶靖

与09级本科历史系的同学相比,我和刘老师的相识说不定更早一些。2009年的新学期,我进入元培学院,刚刚摆脱按部就班的高中生活,就要面临选择专业,这种突如其来的自由让我有些不知所措。在得知周围文科出身的同学基本上都选择了社科类专业之后,原本对历史学有意的我也有一些动摇和不安。第一次和刘老师见面,是由于一位元培的师姐准备放弃当时的专业转入历史方向,有一些问题想咨询刘老师,顺便带上我一起,以便我具体打听历史系的情况。然而当时我却并不知道刘老师是副系主任,更不知道他是辽金史和四库学的名家,但见他滔滔不绝,有问必答,心想眼前这位看起来很年轻的老师,或许是历史系负责本科生教育的教务人员吧?回想起来,除了想笑那时自己的幼稚无知之外,我发觉,刘老师最初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热情而可亲的,不带“严厉”的标签,也不是耿介严谨的学者,我最初认识的刘老师,就是一位耐心倾听并解答着一个大一新生天真幼稚的疑问的“教务人员”,即使这个新生可能并不会进入历史系。那天的具体谈话内容我已经记忆模糊了,当时的焦虑和疑惑,无非来自于一个门外汉对历史与学术的认识肤浅,唯一印象深刻的是刘老师听说我的意向后很高兴,并说出了以

前由元培进入历史系的同学的名字。那天天气很好，时间在老师急促的语速中流逝得飞快，见面结束后我走出二院时，恐怕并没有想到，我后来成了元培 09 级唯一选择历史方向的学生。

再次跟刘老师打交道，是在大一下学期，学校要开设“古典语文学”项目，类似人文科学实验班，最初的宣传虽然有导师制、自主拟定课程方案、独立开课等等美好蓝图，但是由于正处在草创阶段，一切尚无定论，更有坊间传闻，一旦进入这个项目就要一直读到博士毕业，让人不得不谨慎考虑。而我作为“一人专业”的学生，在本院可谓十分的“非主流”，并不知道应该和谁商议，而刘老师恰好是历史系此项目的负责人，于是我又联系了刘老师，希望得到一些意见。刘老师收到我的邮件后，很快挤出时间和我见面。当时上述项目的建设是由几个院系合办，各种制度尚未成形，因此老师也不能确切地回应我所有的疑问，但是在我所关心的参与项目的问题之外，刘老师却给出了培养学术能力的许多建议，其中关于打好文献学的基础，老师讲了很多，还举了《四库全书》的例子，当时的我听得半懂不懂，现在想来，不管项目、制度如何，但凡有志于学术者，都离不开最基础的功夫，刘老师所讲，正是我没有意识到，却又最需要的东西。

转眼间到了 2010 年的秋季学期，这一年的“中国史学史”课程由刘老师讲授。选课之前，我才听说刘老师课程要求严格的“威名”，不少同学因为传闻老师给分“不厚道”，而选择留待下一年再选修这门课。起初我并未将刘老师和“严厉”一词联想在一起，心想反正早晚也要修，不如早些选过。不料开课之初，刘老师讲了一会，便拿出名单，逐个叫人回答问题，搞得台下一片紧张。还记得有一个问题，大概是出自某碑刻拓片抑或是某写本，

老师指着其中一个字问我们为什么这个字并非繁体形式，而是和现代简体字一样，一连问了好几个同学（其中也包括我），回答都不得要领，老师最后忍不住说：“就是俗体字啊，怎么连这个都不知道。”“这个历史系的应该知道啊”、“这都不知道啊”这样的话，刘老师常常挂在嘴上，和他那著名的“中文系没文化”的理论交映成趣，也常常使我们自愧。tiant 师姐《燕园七年之师友杂忆之浦江哥》一文，那时在我们之间流传着，“中文系没文化”一度脍炙人口。然而，哂笑之后扪心自问，却也觉得心里发虚，笑不出来了。对于刚刚接触到历史学的我们来说，在低年级遇到刘老师这样的学者，也是万幸也是不幸，幸运之处自不待言，不幸之处则是如此高的起点，让我们觉得高不可攀，而且时时还有雪上加霜的发现，每堂史学史都是一次头脑风暴，下课后彼此对视一眼，无不灰头土脸，自信心碎了一地。

“周二的上午啊，阳光灿烂；三教的铃声，响起来了；刘浦江的头发啊，竖起来了。（出自 tiant《燕园七年之师友杂忆之浦江哥》）”前辈们的描述真是准确又传神，大三时候的“《四库全书总目》研读”每每让我想到这句歌词。早上的中古史中心会议室，还飘散着些许睡意和早餐的味道，但是随着脑后竖有一绺倔强头发的刘老师开讲，困倦和懒散很快就烟消云散。刘老师略带口音的普通话语速飞快，思路清晰敏捷，我上四库课的感觉，就像从外面扒在一列飞驰的列车上，稍有松懈就被甩下，若能紧紧把握，便可领略沿途风光，感受风驰电掣的刺激。还记得在中心翻文渊阁《四库全书》，需要签字备案，中心图书馆的老师一边看着我填写记录，一边笑着说：“你们多来翻翻这个书是有好处的，刘浦江老师会抽查这个记录，看看谁来看过。”庆幸之余，我更惊



诮刘老师对学生学业的关心竟到达如此细腻的地步。就像小动物师姐在回忆刘老师的文章中所猜测,我也是经历了刘老师的四库课,才真正去看古籍,并写出像样的文献考证文章的学生中的一员。那时分给我的是一部《永乐大典》本的提要,可供查阅的资料很少,我在看过能想到的资料之后,鼓起勇气给老师写了邮件去询问,最初只是罗列了自己看过的书,提出了几个笼统的问题,老师很快回复了我,对于所参考的资料汇编给出了评价,但又说目前“不宜给你提示太多,你还是自己去查吧,这是一个很好的学术训练机会。”过了几天,刘老师又写信来,询问我调查版本时的某个时间落款情况。几次向老师汇报和讨论,刘老师几乎都是即时回复邮件,言语简洁,一针见血,正是他平时说话的风格。

刘老师之严厉,是出了名的,不过真正接触之后不难让人感受到,刘老师对于敷衍塞责的行为是态度严厉的,对于我们(或许是因为还是本科生,或者因为并非他门下的学生),老师并不吝于表扬。四库课上一位外院系的师兄由于本专业的繁忙,没有充分准备,很快就被刘老师识破,老师当场生气地说:“你这个样子,是不行的,我是要给你不及格的。”反复说了几遍,痛心疾首。我的男友原本是近代史方向,恋爱之初为了献殷勤,也跑来听课,一听之下顿时被课程之精彩所吸引,特地正式选修,并认真地做了很多准备,报告当天对答如流,刘老师非常高兴,多次夸奖他花了功夫,做得清楚。保研之际男友虽打算读法硕,也硬着头皮向老师请求推荐信,老师不仅慨然应允,还在邮件中说:“你不准备搞学术,真是可惜了。”令我羡慕嫉妒了好久。

此后与刘老师便无持续的交流和接触,只是常在学校和中

心的图书馆遇到他。在我印象中，刘门的读书会似乎无穷无尽，在中心和新楼总能听到、看到刘门济济一堂，相比之下我虽然已是一个路人，却也曾受到过老师的教诲，现在想来，真是有幸。最后一次看到刘老师，是去年的史学论坛，老师出席了开幕式并发表演讲，会前我作为工作人员在楼梯口遇见刘老师，连忙上前问好，老师微笑着点头示意。当时的我隐约觉得老师有些憔悴，但想到他平素工作辛苦，面容疲惫也应无大碍，谁知此去竟成永诀！刘老师罹患癌症的消息传开后，相熟的几个同学都很忧心，见面后问过“你知道了吗？”就又不知如何是好，相顾无言。我们小心翼翼，不敢谈论过多，仿佛只要稀释了这个话题，就能让老师的病减轻几分。之后陆续听说的都是好消息，下一学期的课表里还能查询到刘老师准备开设的研究生课程，我还幻想着即使课业繁重，也要去听上一听。本科时大家常常议论刘老师长相年轻，且一贯气色很好，想必将来年过百岁也并非难事，哪知造化弄人，刘老师正值学术生命的盛年，就离我们而去。噩耗传来时，我在台大交流学习，1月7日早上在图书馆无意中打开微信，映入眼帘的消息让我不愿相信我的眼睛，我不能想象帮我打开历史系大门的人，竟再也不能回来他所深爱的历史系了，也不能想象明明还写在课表里的“《四库全书总目》研读”，竟再不会由刘老师来上了。这一切都显得遥远而不真实，整整一天，我都带着难以忍受的哽咽，看着陆续发布的文章，描述着刘老师生前是如何与病魔斗争，如何坚持指导学生，如何将自己的工作有条不紊地收尾，一次又一次地泪流满面。在师生们深切的怀念、哀悼中，我看到何晋老师在人人发布的状态：“昨夜惊闻浦江去世，十分悲痛。在他生病治疗期间，电话里他告诉我还在看学生的

论文,我说应多休息,他说看论文不费心力。音容犹在,但斯人已去,以后要再想听他的絮絮叨叨,竟不可能了。”是啊,想到那音调略高,带点口音,语速很快的“絮叨”,再也听不到了,我才真切地意识到,刘老师已经不在。

在与刘老师有限的接触中,他的率真和纯粹,让我感到可敬又可爱。老师讲话时,他的眼神永远坦诚而犀利,这神采来自于无私无愧的心地,来自就事论事的襟怀。正如一位友人写的那样,“他的人格折射的光芒有时那么耀眼,让人误以为灼热逼人,其实最是温暖不过”。与刘老师的师生缘分虽然短暂,却已让我受益终生,并将永远怀念。刘浦江老师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真正学者的严谨、耿介与勤勉,且让我们期待能够成为他那样的人,老师虽然已经不在,他的精神却和他的学术成果一样,将被铭记和流传下来,激励着我们朝前去。

(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硕士研究生)

## 脊 梁

——我眼中的刘老师

吴淑敏

自大四起，每个清明节我都会和同门师兄弟一起赴万安公墓为邓广铭先生扫墓。而今年的心情尤为复杂和沉重，因为刘老师也将长眠在这里，长眠在他的敬爱的恩师身旁。站在刘老师的墓碑前，刘老师的音容笑貌，与刘老师相关的一件件往事浮于脑海。清明，给了我们一个静静缅怀的机会。

刘老师一生率直纯粹、棱角分明，讲话往往直抒己意、毫无机心。鲜明的性格往往容易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早在刘老师生前就有一些学生写关于刘老师的文章（一句“中文系的学生没文化”更是在学生中届届相传）。在大多数同学的认识中，刘老师以要求严格、言辞犀利著称。记得在刘老师的第一节课上，他就打趣道，自己被称为“四大杀手”之一。我并非刘老师的门内弟子，在燕园求学的五年中却与刘老师有过不少交集，学问的增进，人格的砥砺也从刘老师身上获益不少，刘老师在我心目中的形象远比“严师”二字丰富的多。

本科大二、大三时曾先后选过刘老师的“中国史学史”、“《四库全书总目》研读”两门课。刘老师学识渊博，又长于文献目录学，讲课时一个简单的知识点往往能够牵连出很多名人轶事，也常常忘情发挥一阵子后突然停顿，“讲到哪儿了？”引来一阵笑

声。刘老师教学最大的特点是注重实践。“中国史学史”的课程要求学生从往期《历史研究》中选择一篇，逐条核对史料，分析逻辑，寻找文章的毛病，写出评论。刘老师则会认真检查每个同学的作业，并请几位作业优秀且选题具有代表性的同学走上讲台作报告，刘老师现场讲析。我们清晰地看到即使是代表历史领域最高水平期刊的文章，也并非是无瑕的，也有或大或小的问题。什么是学术研究，学术的标准又在哪里，这或许是所有在史学领域尚未入门学生的困惑。不少学生在走出校园时也未必明白其中真谛。刘老师用这种让学生亲自“解剖麻雀”的教学方法告诉了我们答案。一门课程，学生获益多少，各个不同。就我的感觉而言，刘老师的教学方法是远胜过那些照本宣科的课堂讲述和有去无回的论文安排的。

如果说“中国史学史”的课程在引导学生认识史学的话，“《四库全书总目》研读”则是手把手地教授有志于史学的学生治史路径。每个选课的同学，都会分到一或两则四库提要，学生们被要求从不同版本的提要核对入手，进而围绕提要内容，厘清版本源流、作者信息等等。刘老师则是要亲自考查所有该学期所要读的所有提要，每节课有两三个同学作报告，刘老师进行评析。与其说是评析，倒不如说是所有选课的同学挨个和刘老师就一则提要进行对弈。刘老师目光如炬、思维敏捷，往往犀利地点到问题的要害，学生被质问到哑口无言、面红耳赤也是常有之事。课堂如同战场，刘老师和学生们挨个过招。当时我大三，被分到了两则提要，《钓矶立谈》和《吴郡图经续记》。为了避免在课堂上难堪，我花了近两个月来研读一则提要，报告前的一夜更是彻夜难眠。第二天的报告中，在《钓矶立谈》作者的考订上依

旧未能突破前人之说,心情沮丧至极,刘老师宽慰道:“这个问题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以后的读书过程中可能会发现新的证据。”不少同学害怕刘老师的严厉甚至“不讲情面”,但我记忆中刘老师总是温和而耿直的。他可能不会让“混日子”的学生及格,但对认真和努力学生总是关爱有加。

刘老师在每个学期的第一节课都会说自己课程压力很大,任务不小,让选课的同学慎重考虑。回头来看,刘老师的课绝对“课超所值”。我第一次大范围翻阅古籍是因为刘老师的课程,第一次对史料进行不同版本之间的比对是因为刘老师的课程,第一次翻阅自宋以降的藏书目录是因为刘老师的课程,第一次跑到国图翻阅古籍珍本、查看缩微胶卷是因为刘老师的课程,第一次了解古籍上的各种印章也是因为老师的课程……想必一届又一届的北大古代史方向的同学,都是经刘老师这样的引导步入史学殿堂的。

对学生而言,刘老师课程的压力确实不小,而大家常常忽略的是,刘老师的负担却是学生的几十倍。因为按照课程设计,他需要单独考订所有的提要。刘老师的教学方法是有效和高明的,但支撑这样教学方式的是刘老师对学生高度的责任感和超强的学术能力,更是刘老师对学术事业坚定的追求。在无涯学海中上下求索时,遇到刘老师这样的先生,得聆教诲,实在是一种大幸。

刘老师对学生的关心和帮助决不仅仅体现在课堂上。大二时,鉴于我班同学对未来的选择比较迷茫,对系里保研政策不是很了解,我决定请系里的老师来为我们做一场讲座。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曾经分管过系里教学工作的刘老师,于是便给刘老师发了邮件。刘老师数日没回,我也颇感沮丧。一周后,我正和同

学们在餐厅吃饭，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我询问对方是谁，“我是刘浦江呀！”我猛地一怔，这是我在北大第一次接到来自课程老师的电话，而且是一向以严厉著称的刘老师。原来刘老师那一段时间在外地，一时未能查看邮件，所以回复完我邮件后又特地打电话来解释，并且欣然应允我的邀请。讲座那天，我特意刘老师准备了两瓶矿泉水，而他却自己带了水杯，桌子上的矿泉水从来没被动过。

2012年的暑假，我随邓老师和刘老师赴吉林考察辽金故地。一路上，刘老师谈笑风生，从人文典故聊到历史知识，滔滔不绝。有一次，在阿城的金源历史博物馆，刘老师突然惊喜地对他身边的学生说：“看到海东青了没？”那一刻，俨然没有了严师的架子，更像是和我们在知识海洋里一起遨游的朋友。在我的印象里，刘老师更多的时候是平易近人的。

刘老师已经走了，但每当经过刘老师的办公室，我脑海中总能浮现出一个场景：刘老师身着一套蓝色西服，和他的一个学生并肩坐在一台电脑前，电脑中打开着学生的论文，他在一字一句的读着，评论着……

刘老师的墓碑后刻着两行字：“大节落落，高文炳炳；天然清流，不杂渭泾。”我想这十六个字是对刘老师气节、学识、品格的绝好概括。刘老师一生并没有获得什么奖项，什么称号。可学校离不开这样的老师，学生也离不开这样的先生，我想，刘老师这样的教师才是默默支撑北大的脊梁！

2015年4月于朗润园

（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硕士研究生）

# 师恩未谢，岁月已晚

——怀念刘浦江老师

张晓慧

从今年1月6日刘浦江老师去世到现在，过去了三个多月，在这段时间里我时时想起关于刘老师的事情。我只是北大历史系一个极其普通的学生，没有资格与能力来评论刘老师的学术功业，我也并非刘门弟子，知晓刘老师学术生涯的点滴。但是师恩难忘，我想写下这篇文章，也可以作为怀念刘老师的一种方式。

我第一次见到刘老师是在2009年5月，那时我正读大一，打算从外院转专业到历史系，负责转系面试的正是刘老师，不过那时候我还不认识刘老师，只记得他问了我几个诸如转系原因之类的问题。后来真正认识刘老师是在2010年秋天，大二第一学期的专业必修课“中国史学史”由刘老师来讲。第一堂课刘老师之严厉真的把我吓坏了，尽管他并没有像在中文系教古代史时，直言你们“没文化呀没文化”。正巧那时我的好友PP有志于辽金史学，欲向刘老师投牒自进，向我询问刘老师的情况。第一堂课刚一结束，我就发短信给PP，胡乱地诉说了一通刘老师如何如何犀利严苛，害得他差点打消来京与刘老师见面的念头（后来PP成为了刘老师门下高足，向我回忆起这件事时犹带嗔怪，羞愧得我无地自容）。



上课时最可怕的，当属刘老师的提问。在历史系的诸位老师中，刘老师恐怕是课堂提问频率最高的。而且刘老师提问的特点是直筒筒的，绝不拐弯抹角，加上刘老师的川味普通话语速很快，就像一挺挺大炮轰进心窝里，造成一种紧张凝重的气氛。比如在讲先秦史学的时候，刘老师讲着讲着突然提问“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这句诗写的是什么史事，我印象中他常用的提问方式是，在第一位中枪的同学表示不知道之后，又接连扫射，几个“你说”下来，一片人低下了头，每当这个时候，我的心都会扑通扑通跳着，低头试图避开他扫射的目光，但实际上这一招并不十分奏效。回答不出问题，刘老师就会惊讶地溜出这句口头禅：“啊?! 这都不知道!?”孰不知这句话有着极大的杀伤力，其效果无异于在伤口上撒盐，使中枪者因自己的无知而羞愧至极。

但就是如此，那时的我，又是多么期待上这门课呀！是多么期待见到刘老师呀！每周三个小时的课上，刘老师讲着滔滔不尽的学术八卦、书林漫语，讲到激动处神采飞扬，他的批判，是猛烈的批判，无所避讳，一针见血；他的得意，是淋漓的得意，舍我其谁，毫不掩饰。在座的我们，跟着他批判、跟着他得意，我曾多次暗下决心一定要把刘老师所讲统统记下，但一到精彩之处，反而“得意忘言”，顾不上奋笔疾书，可惜时过境迁，现在竟大部分内容都记不得了，想想真是惋惜。一场八卦的高潮往往以“噢……我讲到哪里去了”戛然而止，刘老师略不好意思地笑一笑，拉回正题。就这样，中国史学史在刘老师的口中变得生动有趣，这当然是以刘老师上下通贯的视野、考镜源流的功力为基础的，而且唯有出于率真耿直、敢言敢为的秉性，才能在一群初入史学的本科生面前毫无顾忌地评古论今、臧否人物。

像我这个年龄的人，还未曾历遍万般世相，却也体会到刘老师这种秉性的可爱可敬。就在刘老师为我们上课后不久，作为同窗好友的L君、G君和我，如同迅速结成的小团体一样，分享交流着对他的崇拜（或者说花痴），竭力搜集一切关于他的信息。已经成为刘门弟子的PP是我们重要的信息来源，刘老师的行事风格、对人对事的看法等等小道消息经由他之口不胫而走，被我们如饥似渴地相互交流。我们甚至可笑地在他出现的场合进行围观，据L君回忆，有一次我俩特意去围观有刘老师参加的自主招生考试，刘老师忽然在人群中看见了我们，有点奇怪地问我们为什么到这里来，我们俩支支吾吾地说不出话来，面面相觑、一脸尴尬。这段经历，使我青涩而庸碌、庸碌得甚至有些愚蠢的大学时光，带上了一点浪漫主义的色彩。

在我懵懂无知的求学岁月中，刘老师的中国史学史，甚至具有一种能激发起平庸生活的英雄梦想的力量。半个多学期过去了，刘老师给我们布置了这门课程的期末作业，内容是根据自己的兴趣找一篇《历史研究》上发表的文章进行批判，具体而言，首先要将该文章精读，核对文中的所有引文、出处，然后对文中的观点进行辩驳。事实证明，这是一项让全班同学都认真对待、获益匪浅的作业，让我们真切地体会到破除迷信、脚踏实地是史学研究必需的态度。我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老老实实地对一篇文章的史料逐条核实、反复揣摩，直到能够对其进行言之有物的逐条辩证，切入要害将其打倒。有破无立本来并不是一件很值得称赞的事，也许是我认真的态度打动了刘老师，他选择了我们几个同学在课上向大家汇报我们做作业的情况，然后逐一点评。他习惯使用Word软件的文字标黄功能，凡是他认为有问题的

地方，都要进行标黄，以此为依据对发言的同学集中火力，直陈其误。他把标过黄的文稿投影到屏幕上，印象中有同学的文稿明晃晃一片，直令人发怵冒汗（有意思的是，凡与刘老师接触过的学生，很多人后来都渐渐习惯于使用这个标黄功能，对自己和别人的文章进行无情的标黄）。轮到我发言的时候，因为紧张，我开始边讲边胡乱比划起来，引得讲台下的刘老师发笑，回想起来，我那一番长篇大论，按照他平常的话讲，有一点“口水滴答”的感觉。不过，令我惊讶的是，发言结束之后，刘老师竟对我不吝赞许，使我听了之后备受鼓舞。其实不仅是我，我们几个同窗好友，都因刘老师的中国史学史而坚定了学习古代史的信念，从这一点上讲，尽管我们后来没有选择学习辽金史，但都在心底里将刘老师奉为我们的入门恩师。遗憾的是，由于这门课刘老师给分比较公正严格（比如当年的考题之一是默写出二十四史的全部书名和作者，这道看似简单的题目横扫了一大片同学），在我们的学弟学妹中盛传刘老师是绩点杀手，在我们这一级之后选择刘老师中国史学史的同学稀稀拉拉，听 PP 讲，刘老师当时看到这番光景心中很是难过。大学生态本来不是要紧的大事，但是连这种事情上像刘老师这样不阿于世、不媚于俗，何其难也，直教我们唏嘘不已。

于是当我们大三时看到刘老师的研究生课程“《四库全书总目》研读”可以对本科生开放，我们六个同学兴奋地选了课。课的内容是每位同学分到一两条提要，对其内容进行逐字逐句的辨析。刘老师似乎对这次选课研究生的平均情况并不十分满意，印象中有一位外系的同学，准备得不够充分，被刘老师厉声训斥，直言照这样下去要给他不及格。但刘老师对表现优秀的

同学一如既往地大加赞赏，有一位中文系的师姐相当出色，下课之后，刘老师和门下弟子一起骑车去食堂吃饭，一路上对她赞不绝口。印象特别深刻的一幕是，那次由 PP 主讲，他和刘老师两个人就提要里的问题反复争论了一个多小时，刘老师完全沉浸在讨论的世界里，在座的我们其实并不能跟上他们俩辩驳的思路，大家只好安静地坐着，低头不语，默默地捱时间，刘老师自己则浑然不觉。

其实刘老师除了给我们上课之外，还分管系里的教学、招生等诸多事宜，即使已经从副系主任的位子上卸任，也丝毫没有减退他对系务的热情。他给班里的同学开会时曾谈到流行的经双、法硕之类，总会言辞激烈地给予抨击，其实很多同学心里明白，刘老师这样讲是言过其实了，但他就是这样坚持以学术为衡量一切的标准。

大三结束的时候，我们要着手保研的事情了，作为保研材料必须要上交一份个人陈述。其实我的学术经历本来是乏善可陈，但是回顾本科以来的学习时光，可以说对我影响最深、引我入学术门径的，还是刘老师，于是我将这段经历写在了个人陈述里。三年之后，在准备刘老师追思会的一个中午，间歇时我和同学聊着关于刘老师的事情，意外地得知在我保研之后，刘老师曾在给我的学弟学妹上课时念出了我个人陈述里关于刘老师的那一段话，我才惊讶地发现原来刘老师心里是如此在乎。

刘老师的病程几乎令所有人感到意外。去年四、五月份的一天我正好与同学一起外出春游，赏玩了一天大好春色之后，我们意犹未尽，停下来歇歇脚准备打牌寻欢，这时候突然听说了刘老师生病的噩耗，而且最初传来的消息是胃癌晚期。那一刻，我

大脑一片空白，然后放声大哭。北京，入夜已深，灯火通明，人生如梦四个大字在我心头沉重起来。之后我急急打听刘老师的消息，得知并不是胃癌晚期，而是淋巴癌，相对而言有比较高的治愈率，心里顿时放松下来。之后传来的消息都很乐观，甚至下学期的课表上都出现了刘老师的“《辽史》研读”一课，便以为下学期他就能回来上课了，以致于2015年年初听说刘老师回老家，也并没有意识到情况有多么严重。可是就在1月7日一早醒来，打开手机，铺天盖地地涌来刘老师去世的消息，我躲在被子里面，泪水流了下来，可是长歌痛哭都难解心中之恨。用小动物姐在微博里写的话说，就是一种深深的失去感。这种失去感不仅仅根源于刘老师对周围的人有多么深刻的影响，而且对于我而言，人生中可能很难再有遇到这样的恩师的机会、遇到这样纯粹的人的机会。是的，刘老师在我心中不仅是一生难忘的恩师，还是一个活得纯粹的人、一个干净得透明的人，他就这样遽然离开人世，怎么能不让人感到人生的悲苦和命运的无常呢？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刘老师病中曾对弟子们发邮件说：“告诉你们我为什么不畏惧死亡？……一个人文学者，有一流的作品可以传世，能够培育出一流学者来继承他的事业，还有什么可畏惧的呢？顶多有一点遗憾而已。”我看到这段话时心中震动了：人生百年如寄耳，能够如此，又有何憾呢？

2015年4月

（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硕士研究生）

## 余悲未已，薪火不灭

——怀念刘浦江老师

包晓悦

我是今日凌晨得知刘浦江老师去世的消息的。一个人坐在黑暗里，看着微博上铺天盖地的悼念文字和蜡烛，我却只感觉到巨大的茫然和不真切。刘老师生病之初，我听闻情况不大好，难过得大哭一场，一面担心他的病情，一面期盼奇迹出现。但近一年来，时时听到的消息都是他本人心态乐观，病情稳定之类的话，之前还在选课系统里见到他下学期将要开设“《辽史》研读”的课程，所以也略感宽心，实在没有想到噩耗竟是如此突然降临。今天看到讣告和小动物学姐的悼念文章，才知道刘老师一周之前病情恶化，已经放弃治疗回到了家乡，临行前还与学生好友见面——作最后的交代。而我什么都不知道。

大二第一学期，刘浦江老师给我们班上必修课“中国史学史”。第一节课，刘老师就拿起尚未最终确定的选课名单，点人起来回答问题，大概都是他认为历史系学生必备的“常识”，可惜我们无知，有时以沉默相对，刘老师就毫不客气：“这都不知道啊？”“学历史的这怎么能不知道呢？”那时候他已经知道网络上流传着他“中文系没文化”的典故，于是搬出这个故事敲打我们不要辱没历史系的名声，变成没有文化的人，还似乎很自豪地宣称当年在中文系被称作“四大杀手”之首。我们大一感受了一整

年历史系老师们的和蔼可亲，那时坐在下面只觉得心惊胆战。等到正式上课，倒是顾不得紧张了。刘老师讲授正式课程内容时，需得运笔如飞狂记笔记，因为他不像其他一些老师那样提供详尽的课件，却在讲授时旁征博引。讲到激动之处，他就会宕开一笔，开始臧否人物，评论时事，往往言辞激烈。我和同学最初只觉得他好犀利，时间久了，渐渐觉察到所谓“犀利”背后，是刘老师对纯粹学问的追求和作为读书人对人格尊严的坚守，也渐渐从最初的畏惧之心中生出许多景仰与感动。

大二的时候，班里资质比较好的同学大概都能够写出像模像样的史学论文了，但我总感觉自己入不了门。刘老师布置的课程作业是选择一篇发表于《历史研究》的文章，查找其所有引用文献原始出处并找出错误，再写一篇学术评论。刘老师说这个作业目的有二：一是使我们沉潜下来好好接触一下史料，二是破除我们对学术权威的迷信——即使是在《历史研究》发文的大牛们也是不可避免犯错的。我不知他人如何，至少于我而言，这两个目的都达到了。那一年的秋天和冬天，伴随着一教窗外银杏叶黄了又落，我终于觉得自己隐约窥见史学研究的大门。

大三时我毫不犹豫地去选修刘老师开设的“《四库全书总目》研读”。刘老师照旧一来就给我们下马威：“我这门课可不能随便选，如果你们达不到要求我是要给不及格的，你们要想好啊，这两周还能退课。”因为见识过他的严格，我也丝毫不敢懈怠，来回跑国图古籍馆，查对所有能找到的版本和四库总目编纂史料，用功了一个月。轮到我发表那日，虽不敢说信心满满，却还是略有底气的。待我讲完，刘老师例行补充，我一听之下便暗自心惊，自己的结论大方向虽不错，但始终有一个细节问题思之

不得，刘老师不仅从我冗长发言中准确地抓住了这个问题，还简练明晰地将其解决，真使我有醍醐灌顶之感。更让我惊讶的是，刘老师说由于时间紧迫，他只是在家中用读秀检索了一番史料，需要校内IP的几个数据库都无法使用。当时切身感受到一位优秀学者的敏锐度与洞察力所带来的震撼，至今犹存。最终这门课我算是有惊无险地过了关，和我一起选课的一位男生则非常出色，刘老师对他大加赞赏，后来这位同学选择去外系读研，刘老师还专门问起，言语中甚是惋惜。

大三保研时，我斗胆请刘老师为我写一封推荐信，他爽快应允。其实当时心里很忐忑，后来读到他的推荐意见，篇幅很短，但字字基于对我的了解，没有一句虚美之词。

读研之后，我与刘老师的交流和接触反而减少了，只是往往在中心或系里甚至食堂里遇见他。最后一次见到刘老师，是在历史系新楼门口，我向他问好，他回给我一个温和甚至是灿烂的笑容，我们错身而过，却竟成永别。

今天很多人在转 tiant 的《燕园七年之师友杂忆之浦江哥》，我大一大二时还很八卦，常常以在网络上搜索关于老师们的陈年老帖为乐。这篇文章是从中文系 tiant 学姐的博客上搜到的，当时非常喜欢，读了一遍又一遍，还转到豆瓣上。文中那些活泼有趣的小细节，让我很多次会心地笑出来。今天再点开这篇文章，只读了一段就落下泪来，再也读不下去了。

在我和刘老师有限的接触里，深切感受到他的透明和纯粹，他的人格折射的光芒有时那么耀眼，让人误以为灼热逼人，其实最是温暖不过。作为受益于他的万千学生中的普通一员，我有幸感受过这种温暖，并永怀感念。罗新老师在微博上放出的照



片里，刘老师穿着他常穿的那件浅蓝色西服，面容一如既往的年轻，笑容温和，阳光正好。昨夜我见到这张照片时，终于从震惊与恍惚中回过神，而后潸然泪下。

人世无常，命运不公。作为生者，惟愿他安息。

2015年1月7日夜

（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硕士研究生）

## “幸”与“不幸”

——怀念刘浦江老师

张晨光

在我学历史的近六年时间中，一些学者先后去世，其中刘浦江老师是唯一一个教过我的老师。我虽不是刘门弟子，和刘老师的直接交流也不算多，但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刘老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刘老师在2006年至2010年任历史系副主任，不知从哪一年起他就一直是古代史研究生招生的主要负责人。一直听说他很严厉，经常有人因为他的提问而录取不了。我本科就读于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大四保研面试时，主要问题都是刘老师问的，没想到坐下后他说的第一句话竟然是“你也参加XX的复试了？”那年我听说北大本校有两个同学和我报了同一方向，我被录取的可能性不太大，就同时也报了其他学校。听到刘老师这么问，我更是感到希望不大，没想到最后被录取了，听民大的老师说刘老师曾专门打电话问过我的情况。1月7号晚上，我吃饭时感受手机震动，一看是刚毕业的师兄用支付宝转账，稍后他在微信上写到“硕士面试由刘老师主持，应算他把我招进来的，这次理应过去悼念”，但8号晚上有课，9号赶不回来参加告别仪式，让我帮着买花。两个小时后，他又发微信说已经买了飞机票，9号凌晨到京。其实这个师兄没有上过刘老师的课，去南

方读博也没请刘老师写推荐信，毕业答辩时刘老师因病也没有参加，他们之间的关系好像只有当初面试这一层。有个同学曾说：按照古代门生座主的关系，刘老师都是我们的座主，系里老师都说刘老师挑学生，但他是完全出于公心，挑出来的学生也大多都很优秀。确实如此！当然，我深知自己不够优秀，但我同意刘老师选拔了很多优秀的学生，这也得到了众人的认可。

研一上学期，我选修了“《四库全书总目》研读”课。第一节课，刘老师发了书单，逐一介绍上面每本书的优缺点与如何利用，直言某书是脑力劳动、某书是体力劳动，我还是第一次见有老师这样手把手地教学生做研究。在下课前，他布置下次汇报任务，除了自己的学生外，他叫了三个人的名字，其中有两个师兄，而最后一个竟然是我！当时还没有选课名单，坐在下面的也有同一方向的其他博士和硕士，没想到刘老师还记得我的名字。我当然是尽力做准备，在国图看缩微胶卷时，本不晕车的我竟也看吐了几次。好在汇报还算顺利，刘老师说本来以为这本书没多少问题，看来还是发现了一些细节问题。尤其是我发现了文津阁《四库全书》影印本有两种，国图藏的十二合一本和中古史中心藏的四合一本由于影印过程中的原因并不完全相同，这一点被刘老师在后面的课上提到过几次，我很受鼓舞。这是一门真正的讨论课，老师和同学都会提前准备，相互讨论，刘老师除了能提出一些更合理的观点外，也经常问学生问题并做记录。

刘老师天性率真，为学为人都是如此。有次，一个外校学者来中心做讲座，讲的几乎都是社科理论。一个女生在提问环节提问，他回答得仍有些绕。一直一言不发的刘老师忽然插了一句：她问的是××，不是××。那个学者一惊，又继续说下去。

主持人后来请刘老师发言，他直言有些研究做得太小，看不出有什么大的关怀，尽管方法新，但过一些年后不知道还有没有意义。他的发言是我在那次讲座中听到的最中肯的话，也是现在还记得的关于那次讲座的仅有的话。“《四库全书总目》研读”课在上午9点到12点，恰逢冬天，每次早上老师和同学都要在上课前接报告厅里的热水，而饮水机又比较小，所以水经常不开。有次刘老师要接水，发现不开，就坐在旁边等，过了一会儿有个女生拿着水杯过来正要接水，刘老师忽然说“我在这儿都等了这么长时间了”。那个女生赶忙道歉，然后就回去了。后来水还是不开，刘老师看了看表，就拿着杯子出去了，应该是去后面院子里的图书馆接了吧。

作为领导，他有极强的行政能力；作为老师，他手把手地教学生如何做研究；作为个人，他率真纯粹；作为学者，他既能做细微的考证又能提出宏观的认识。刘老师走了有一段时间了，很多老师和学生写了回忆文字，这些文字都已提及以上这些方面。任何单一方面都值得尊敬与怀念，而他竟能在各个方面都做得如此好，真让人不得不发出“天妒英才”之叹！在求学路上能够遇到刘老师，是我莫大的幸运；刘老师的不幸早逝则使我黯然心伤，同时也激励着我在这条路上不断攀爬。言犹在耳，哲人已逝；我等后人，唯有努力！

大三下学期，我在人人网上看到有学长转发北大宋辽金史方向博士答辩后和老师的合影，其中写到前排右起第一个就是刘老师。第一次发现刘老师原来这么年轻，穿着白色格子短袖衬衫、青灰色裤子、黑色皮鞋，戴着眼镜，一双眼睛炯炯有神地看着前方。大四保研面试那天，我第一次见到他，他好像也是穿的

这身衣服，这一形象便永远定格在了我的记忆中。每次想到刘老师，我眼前总是浮现出他的这一形象，仿佛他在盯着我不断前进！

2015年1月7日初稿

2015年4月25日改定

（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硕士研究生）

# 天之高处，魂之所栖

——怀念刘浦江老师

李思成

刘老师已经走了两天，两天里也已读到无数学长学姐写的悼念文字。我并非是刘老师的门下弟子，但在曾受教于刘老师的学生中，是最晚的一届，选修的“中国史学史”与“《四库全书总目》研读”也已是老师留下的绝响，加之老师还是我们组本科生科研的导师，因此总自感有些许幸运与特殊，不由得想要写点什么，赶在老师最后的告别仪式之前，算作是纪念与告别。

初识刘老师，是在大二的上学期。那一学期老师给本科生开了一门必修课，即为“中国史学史”。于是不知哪里便传出了声响：刘浦江老师为人严苛，给分不高，建议大二同学等明年选另一位老师开的同一门课。听到这样的意见，很多同学为了保险起见，便放弃了选课。我这人一向有点逆反心理，便保留了选课，一心想要看这位传闻中“挂过人”“不讲情面”的老师究竟如何。

现在想来，那时的第一节课，刘老师面对大半空荡荡的教室，心中必定是有些失落了，这是老师以往从未遇到过的。但那时我什么也不知道，刘老师也并没有表现出不高兴的神色，只是半调侃地对我们说：“我以前哪挂过人，给分也和其他老师没两样啊。”之后的课上刘老师旁征博引，妙趣横生，只是性子稍急，

并未看出严厉之处。

刘老师是重庆人，我是四川人，算半个同乡；老师说话微微带点口音，于我却完全不是障碍，反倒有点如鱼得水的感觉，也更下定决心要把课程作业做好。当时的课程助教赵宇师兄，也是四川人，和我比较亲近，也正是师兄在期末之后告诉我，我的作业得到了刘老师的好评。这大大激励了我，真正产生了希望走上学术道路的念头。

大三时，听闻刘老师开设了“《四库全书总目》研读”，是本研组合上的课，我又义无反顾去了。其实说来惭愧，我那时对《四库全书》的了解趋近于零，只是单纯地相信，刘老师的课一定值得去；我这样懒散的人，只有在刘老师的课上，才不敢懈怠。其实不了解四库，倒没有什么，上课的目的就是为了学习；真正让我羞愧甚至耿耿于怀的是，第一堂课上，刘老师专门点了我的名，让我指出一段材料中存在的问题。或许是出于紧张，更大的可能则是我自己学识尚不足，我没能回答上这个问题。至今我能感受到老师当时饱含的期望！老师并未责怪我，但那份自责却不由得督促我去努力。这是刘老师的人格魅力，说他严厉并不正确，老师不会厉声呵斥，他只会让你发现自己的问题和不足，进而有种无地自容之感——这可能是刘老师被认为是严厉的原因所在吧。陈恒舒师兄的纪念文章说刘老师的目光“如手术刀般锐利”，我却认为不确。刘老师的目光其实并不锐利，而是闪烁着光芒——我窃以为那是睿智和执著，无论是谈笑或是严肃，都是一样明亮。但如今，这道光芒熄灭了。

最后一次见到刘老师，是在去年的三月份，我从家乡带了川味香肠去看望他。刘老师看到我也很高兴，记得那天的他和平

日里并无二致，还是十分精神，只是脖子上长了一个肿块，我不由表达了我的担心，希望他能够去医院做做检查。刘老师用他一贯的爽朗回答我：“去北医三院做过检查，那里医生不负责，医疗资源又紧张，查不出什么，准备过段时间回家去看。”谁料没过多久便从师兄处得知消息，刘老师所患的竟是最为险恶的淋巴癌！

此后便再也没有机会看到刘老师，只听说做了手术，情况还算不错，有望恢复健康。我还和师兄开玩笑说，刘老师的病多半就是操劳过度，这次康复后他要开课可一定要拦住。孰料突然听到噩耗，我们竟真的成了刘老师教过的最后一届学生！

刘老师曾撰文纪念他的恩师邓广铭先生，文中称邓先生提携后进，不遗余力，是继承傅斯年先生的传统。刘老师自己何尝不是如此！我和其他许多撰文纪念刘老师的学长学姐，都是很普通的学生，甚至都不是他的门下弟子，但刘老师对待我们，是一样的认真，一样的全心全意。师兄曾言，刘老师担任历史系副主任时，是把这个工作当作学术一样做。我相信这绝非虚言——因为刘老师对人、对事，都抱持着对待学术的认真态度，他是一位纯粹的学者，更是一个纯粹的人。

没能见刘老师最后一面，未尝不是一种幸运：这样，记忆就永远定格在那个春光明媚的下午，刘老师穿着一身天蓝色西装，在中古史中心的小院落里同我挥手作别。

（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本科生）



## 刘浦江先生的学术历程与治学思想

邱靖嘉

刘浦江先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祖籍重庆垫江，1961年出生于上海。2015年1月6日晚23时57分不幸在家乡病逝，享年54岁。

纵观刘浦江先生的学术生涯，他的专业领域十分广泛，长期致力于宋辽金史、中国北方民族史、四库文献学及思想文化史的研究，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文史》等一流刊物上发表各类学术文章百余篇，并出版《辽金史论》、《二十世纪辽金史论著目录》、《松漠之间：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契丹小字词汇索引》四部论著<sup>①</sup>，在国内外史学界赢得了很高的学术声誉。同时，他又富于思想，对自己的研究方向和学术道路始终有清醒的认识和深远的思考，并对其毕生追求的学术事业怀有由衷的敬畏和深切的体悟，最后，他的那些点滴之思凝聚成了一套独具先生风采的治学思想。

作为受业弟子，在蒙受先生言传身教的日子里，时常会听他向我们说起他的学术经历和所思所想，其中很多心曲是不为外界所知的。如今斯人已去，遽归道山，学生谨在此对恩师的生平

---

<sup>①</sup> 刘浦江：《辽金史论》，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二十世纪辽金史论著目录》，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松漠之间：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契丹小字词汇索引》（与康鹏合编），中华书局，2014年。

学术做一全面的梳理和评述，希望能够比较客观地呈现他这一生的学术历程与治学思想，以缅怀我们心中最为敬爱的导师。

## 一、别开生面的辽金史学研究

刘浦江先生自幼酷爱读书，学习十分刻苦。1979年，他从垫江一中考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中国史专业，在求学期间，就已展现出对文献的浓厚兴趣<sup>①</sup>，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任教，但对他而言，这并不是是一份理想的工作。1987年10月，他忐忑不安地来到邓广铭先生家，本想请邓先生介绍他去中华书局，可未曾想到，他叩开的是“一扇通往学术殿堂的大门”，在晤谈两小时之后，邓先生对这位年轻人格外赏识，当即决定要把他调到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经邓先生竭力争取，他终于半年后顺利进入北大<sup>②</sup>。

刘浦江先生调入北大中古史研究中心后，师从邓广铭先生，长期担任其科研助手。据刘师自述，当时邓先生布置给他的第一项任务是彻底解决《大金国志》一书的真伪问题，于是他花费了半年时间，逐条查找此书的史料来源，并写出《再论〈大金国志〉的真伪问题》一文<sup>③</sup>，这是他接触辽金史的最初机缘。但此后几年，他一度心有旁骛，直至1992年才最终确定了其学术坐

---

① 《走出辽金史——刘浦江先生笃行而未竟的事业》，《光明日报》史学版2015年1月21日第14版。

② 刘浦江：《不仅是为了纪念》，《读书》1999年第3期。

③ 此文发表时题为《再论〈大金国志〉的真伪——兼评〈大金国志校证〉》，《文献》1990年第3期。

标,说来不免有晚学之恨<sup>①</sup>。就在这一年,邓先生命他协助自己完成《三朝北盟会编》的点校工作<sup>②</sup>,在之后的五六年里,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此书的整理与研究之中。据他后来回忆,那些年,他基本上是每年上半年做金史方面的专题研究,下半年则要点校数十卷《三朝北盟会编》,其深厚的文献功底及对宋代文献之稔熟主要就是在此期间奠定的,同时这也更坚定了其从事辽金史研究的信念,所以这项工作可谓令他终生受益。就这样,正是在邓先生的鼓励与引导下,刘浦江先生逐步走上辽金史学研究的道路。

先生生前常跟我们说:“要做一流学者必须得有一门拿得起来的断代史或专门史作为看家本领,首先要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然后才能谈得上向外拓展。”对于他而言,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无疑就是他最主要的学术阵地。

在先生看来,辽金史在中国史学传统的断代史研究格局中素以冷僻著称,“直到今天,我国辽金史研究的总体水平还没有超过战前日本学者曾经达到的那种高度,辽金史研究至今仍未走出萧条”。在这种学术氛围之下从事辽金史研究是一桩很寂寞的事情,“不时有一种垦荒的感觉”<sup>③</sup>。他早年以研冶金史起家,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将注意力转向辽史,此后长期在辽金史学领域耕耘开拓,至今已有二十多个年头,发表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引起了海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被公认为当今辽

① 《辽金史论》自序,第1页。

② 刘浦江:《邓广铭先生与辽金史研究》,《想念邓广铭》,新世界出版社,2012年。

③ 《辽金史论》自序,第2页。

金史界的领军人物。在我们学生草拟的《刘浦江教授生平简介》中，称他“将辽金史研究推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并非是一句溢美之辞，对于长期沉寂萧条、只有数量增长而缺乏高质量精品的辽金史研究现况而言，先生的研究成果可以称得上是别开生面，在前人基础上取得了重大的突破。愚以为，具体来说，刘浦江先生对于辽金史研究的学术贡献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对辽金史上诸多关涉重大的核心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并解决了许多悬而未决的重大难题。先生的辽金史研究完全是以问题为导向，据其自述，他对于研究课题的选择，向来有两个基本原则：“一是追求重大题材，即关注重要的、关键的、核心的问题；二是追求难度系数，偏好难度较大的、前人没有发现或者未能解决的问题。”<sup>①</sup>翻开先生的论著目录我们会发现，他所研究过的辽金王朝开国史、民族政策、宗教政策，辽朝国号、部族制度、头下军州，金代户口、捺钵、财政税收制度等等诸多问题，无不是辽金史上最为核心、关键的重大议题。这些题材基本上都是前人研究十分薄弱，甚至长期无人问津的，而先生则穷尽史料，对其做了迄今为止最为彻底的清理，使我们对辽金王朝核心层面的诸问题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从根本上推动了辽金史整体认识水平的提高。

追求难度系数也是先生辽金史研究的一大亮点。他长期关注辽金史领域内那些悬而未决的疑难问题，并曾总结有“辽金史

---

<sup>①</sup> 《松漠之间：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自序，第2页。

上的十大难题”<sup>①</sup>，他的许多文章就是专门为了破解这些难题而做的实证研究。其中，最令先生满意的两文当数《再论阻卜与鞑靼》和《金中都“永安”考》<sup>②</sup>。阻卜与鞑靼之谜是困扰自王国维以来中外学人的一道世纪难题，先生通过全面考索宋辽金元文献及契丹、女真语文资料，证明辽金史中的阻卜（阻鞑）绝非元朝史臣凭空杜撰，该词源出契丹语，后为女真语所因袭，终于解开了这一百年谜团。金海陵王迁都燕京之初，曾改燕京析津府为永安府，这是清代学者施国祁精心考证而得的一个重要发现，这一结论虽已被辽金史、历史地理和北京史研究者视为定谳，但在先生看来，这个问题仍存有很大疑点，果然他的研究最终推翻了前人成说，证明“永安”一名乃是海陵天德三年所改的燕京新地名，所谓“永安府”事实上是子虚乌有的。类似这样的问题在辽金史研究中是具有较高难度的，而先生却均能将其彻底解决，眼光之独到，考证之精审，论述之缜密，在辽金史学界实数少见。他的研究堪称是辽金史学“精耕细作”、向深度发掘的典范之作。

第二，拓展辽金史研究的手段和方法，充分利用民族语文资料和跨学科知识进行历史研究。先生在谈及辽金史研究的困厄与出路时，曾说辽金史学要想走出困境必须在材料和方法上寻求突破，前者除了指大力发掘传世文献史料之外，更要充分利用

---

① 据先生自己解释说，所谓“几大”难题，绝不是有意凑数，其中并没有什么噱头可言，其所开列的都是他在研究过程中认为最为重要、最具代表性的一系列难题。而且随着学力的增长，这些难题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多，起初只有“八大”，后来增至“十大”、“十二大”，据我所知，目前他列出的题目已有十五个之多，其中有些是他业已解决的，而更多的则仍有待探索。

② 刘浦江：《再论阻卜与鞑靼》，《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金中都“永安”考》，《历史研究》2008年第1期。

民族语文资料，而后者则是指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sup>①</sup>。他本人的研究就向我们全面展示了此二者对于推动辽金史研究的重要价值。

在辽金汉文史料严重缺乏的状况下，契丹、女真文字资料的出现无疑给辽金史研究带来了新的机遇。然而诚如先生所言，“长期以来，辽金史学界与民族语文学界彼此十分隔膜：一方面，辽金史研究者大都不能掌握利用契丹、女真文字资料；另一方面，民族语文学家又未能向历史学家充分展示这些资料在历史研究方面的价值”<sup>②</sup>。于是先生就力图打破这两者之间的隔阂，将民族语文资料真正应用于历史研究之中，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如上文提到的阻卜与鞑靼问题的解决，即全赖契丹小字和女真字石刻材料所提供的关键线索。而最能体现契丹语文资料之于辽史研究价值的，就是先生关于契丹人名、字问题的研究<sup>③</sup>。他通过对契丹大小字石刻材料所见契丹人名、字的考释，结合相关汉文史料，揭开了从不为人所知的契丹族父子连名制的奥秘，这一研究是运用契丹文字资料研究契丹史的力作，代表着辽金史研究的学术前沿。因此，著名契丹文字专家刘凤翥先生总结刘浦江先生在辽金史领域的贡献，其中之一就是“用契丹

① 刘浦江：《穷尽·旁通·预流：辽金史研究的困厄与出路》，《历史研究》2009年第6期。

② 《松漠之间：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自序，第1页。

③ 刘浦江：《契丹名、字初释——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父子连名制》（与康鹏合著），《文史》2005年第3辑；《再论契丹人的父子连名制——以近年出土的契丹大小字石刻为中心》，《清华元史》创刊号，商务印书馆，2011年。

文字研究辽史，刘浦江先生开风气之先”<sup>①</sup>。

先生曾指出：“今天的辽金史研究，尤其需要跨越语言学、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屏障——不仅仅是吸取这些学科的材料及其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要掌握各个学科不同的研究方法。”<sup>②</sup>在他自己的研究中，就不乏运用跨学科知识和方法解决并升华问题的成功案例。如关于契丹人名、字问题的研究，除了利用契丹语文资料进行探索之外，它还是运用跨学科方法研究中国民族史的作品。其文通过考释契丹文字发现契丹人父子连名的现象之后，又结合中外民族志资料与文化人类学理论，进一步分析了这一父子连名制的具体类型和语言学、民族学特征，其学术意义和旨趣已超出了辽史研究本身，而为中国民族史研究探索出一条新的道路。又如《契丹人殉制研究——兼论辽金元“烧饭”之俗》这篇长文<sup>③</sup>，在钩索宋辽金元及域外文献的基础上，充分结合考古学材料以及古今中外的民族志资料，对契丹社会的人殉制及北方民族的殉葬传统进行了系统研究，并引入文化人类学中“割体葬仪”的概念分析述律后“断腕”故事的原型，同时又从民族学和民俗学的角度，对辽金元“烧饭”之俗的涵义界定及源流情况做了深入考察，其所涉学科之广泛，面向之丰富，令人耳目一新。先生在采用跨学科研究方法方面所做的开创性工作，对于辽金史研究的“学术突围”而言，具有示范性的

① 《刘凤翥谈刘浦江的五大学术贡献》，中国社会科学网，2015年1月9日，见 [http://www.cssn.cn/zx/bwyc/201501/t20150109\\_1473248.shtml](http://www.cssn.cn/zx/bwyc/201501/t20150109_1473248.shtml)。

② 《穷尽·旁通·预流：辽金史研究的困厄与出路》，第27页。

③ 刘浦江：《契丹人殉制研究——兼论辽金元“烧饭”之俗》，《文史》2012年第2辑。

意义。

第三,能够将具体的辽金历史考证问题升华为牵涉全局、观照面广的中观或宏观议题。先生平日常常教导我们,在做微观具体研究时,绝不能仅仅就事论事,而要时刻有“上层次”的问题意识。所谓“上层次”主要是指在考证具体问题的基础上,能够以小见大,在一个更高、更广的层面申发其历史意义。这种能力正是先生的过人之处,他在做学术研究时,总能见微知著,“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由微观实证牵引出一系列中观或宏观的重大议题,从而大大提升了其辽金史研究的整体层次。如关于金朝初叶国都问题的研究<sup>①</sup>,他首先对金上京会宁府的国都地位及其真实形态做了细致的考证辨析,然后又将其置于女真政权从部族体制向帝制王朝转型过程中所存在的一种特殊政治生态下去加以解读,进而揭示出北族王朝政治体制变迁的某些共性,其思路之开阔,眼光之高远,令人叹服。又如《德运之争与辽金王朝的正统性问题》一文<sup>②</sup>,以论证辽金两朝的德运之争为基础,进一步系统剖析辽金元明清历代对北族政权的政治定位问题,从而勾勒出近千年来华夷观念的演变轨迹,充分彰显出先生高瞻远瞩、把控全局的宏观思辨能力。他的这些成果将辽金实证研究升华为层次更高且具贯通性的历史问题,为辽金史研究整体水平的跃升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以上三方面来看,刘浦江先生在辽金史领域所取得的研

---

① 刘浦江:《金朝初叶的国都问题——从部族体制向帝制王朝转型中的特殊政治生态》,《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

② 刘浦江:《德运之争与辽金王朝的正统性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究成果,别开生面,为长期沉闷的辽金史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他对辽金史上诸多重大问题均有相当精深的系统研究,并拓展了辽金史研究的手段和方法,推动了辽金史整体研究水平和层次的提升。就这些非凡的学术成就而言,他不愧为当今辽金史学界的中流砥柱。先生曾对我们说,他毕生有两大心愿,这第一就是希望他所做的辽金史研究能够超越此前所有的辽金史学者。不知在他心中,这一学术目标是否已经遂愿了呢?

## 二、“旁通之道”:从宋辽金到辽金元

刘浦江先生研治辽金史二十余载,对于这一断代史的总体状况始终有着全面的认识和深刻的思考。史料匮乏是辽金史研究一道永恒的难题,这也是辽金史在各断代史研究中处于相对落后地位的根本症结所在。辽金史研究要想走出困厄,改变辽金史学的冷落局面,就必须想方设法地寻求突破,这就是先生所说的“学术突围”。那么,究竟应当如何突围呢?其实,先生对此已有很成熟的考虑。

上世纪末,他在撰写王曾瑜先生《金朝军制》的书评时,就已对20世纪的辽金史研究做了深刻的反省,并首次提出21世纪辽金史研究的新出路,他概括为“必须从上下、左右两个方向去寻求突破”<sup>①</sup>。据他解释,所谓“左右”,主要是解决史料不足的问题,辽金史研究的史料范围应该扩大到五代十国、两宋、西夏、

<sup>①</sup> 刘浦江:《〈金朝军制〉平议——兼评王曾瑜先生的辽金史研究》,《历史研究》2000年第6期。

蒙元、高丽、日本，尤其是宋、元文献，史料发掘的余地还很大。所谓“上下”，主要是解决研究方法的问题，比如研究辽金汉制，不妨着眼于唐宋；研究契丹、女真制度，不妨从东胡系民族或满清历史中去寻求答案。后来，他又将上下、左右这两个方向进一步阐发为“穷尽史料”与“旁通之道”这两条可能的出路<sup>①</sup>。关于“穷尽史料”，先生素以文献见长，尤精于宋元文献，故对他而言，这可以说是一种学术自觉，勿需赘言。在此，我想结合先生的学术经历，重点谈谈他个人的“旁通之道”。

先生指出，“旁通之道”的要义之一就是“突破断代史的藩篱”<sup>②</sup>，这其中又包涵两层具体的含义。首先，辽金史研究绝不能就《辽史》论辽史、就《金史》论金史，而应该兼治辽史和金史、契丹史和女真史。先生起初主攻金史，后由金史入辽史，并始终坚持二史兼治，自不待言。其次，辽金史研究者最好能够兼治宋史，或兼治蒙元史，或兼治民族史。他解释说：“兼治宋史对于扩大辽金史的史料范围最为有利，兼治蒙元史或民族史则可拓展学术视野，以收触类旁通之功，前辈学者在这方面不乏成功的范例。”先生自称这种治学路数也一直是他的学术理想与学术追求，“可惜心向往之而力不能至”。实际上，“旁通之道”不仅是他心向往之的学术理想，而且更是其努力践行的学术追求。

从先生的学术背景和实际研究来看，他始终与宋史有着不解之缘。他最初就是在邓广铭先生的引导下，通过在宋代文献

<sup>①</sup> 前揭《穷尽·旁通·预流：辽金史研究的困厄与出路》。以下关于“旁通之道”的解释，皆出此文。

<sup>②</sup> “旁通之道”的另一层含义是指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关于这一点上文已有论述。

中查找《大金国志》的史源以及点校《三朝北盟会编》这部宋人史籍，而进入辽金史研究领域的。此后，他一直对宋史有着长期的关注，并致力于宋代文献及政治文化的研究。在他的论著中，就有若干篇研究宋代文献的作品，比较有代表性的如《范成大〈揽辔录〉佚文真伪辨析》、《〈三朝北盟会编〉研究》、《宋代使臣语录考》等<sup>①</sup>。在他所研究的宋代文献中，大多都含有辽金方面的重要史料，所以他说“兼治宋史对于扩大辽金史的史料范围最为有利”，可谓其研治宋史的经验之谈。

政治文化史一直是先生很感兴趣的一个研究领域，因宋代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变迁中具有重大的转型意义，故他对宋代政治文化关注尤多，且做出了极为重要的研究成果。其中，影响最大的非《“五德终始”说之终结——兼论宋代以降传统政治文化的嬗变》莫属<sup>②</sup>。此文对历代王朝用以阐释政权合法性的五德终始说之消亡过程进行了深入的探索，结果发现五运说之终结其实是宋代儒学复兴、道德教化的结果，并进一步指出其在宋代所面临的危机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种共同境遇，宋代知识精英对五运说、讖纬、封禅、传国玺等传统政治文化均做了全面的清算，从学理上消解它们的价值，从思想上清除它们的影响，宋儒的那些政治伦理观念后来成为元明清时期的普世价值观，这向我们指引了宋元明清时代思想

<sup>①</sup> 刘浦江：《范成大〈揽辔录〉佚文真伪辨析——与赵克等同志商榷》，《北方论丛》1993年第5期；《〈三朝北盟会编〉研究》（与邓广铭先生合著），《文献》1998年第1期；《宋代使臣语录考》，张希清等主编：《10—13世纪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sup>②</sup> 刘浦江：《“五德终始”说之终结——兼论宋代以降传统政治文化的嬗变》，《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

史的基本走向。该文视野宏阔,卓有识见,论证分析鞭辟入里,解决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核心问题,故一经发表即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强烈反响,先后被翻译为英文、日文,如今更已成为中国古代史研究生的必读篇目。此外,先生还曾对宋代宗教的世俗化与平民化、宋太祖誓约及誓碑之真伪等问题做过专题考察<sup>①</sup>,亦为其宋史研究的精品之作。

由此可见,先生的学术领域实不限于辽金史研究,而是一直将宋史作为兼治的对象。尽管他曾谦称自己“没有打通宋辽金史的野心”<sup>②</sup>,但邓小南教授认为,其实“他心中是真正要把宋辽金进行通体研究的”<sup>③</sup>。在先生《松漠之间: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一书勒口处的作者简介中,他将自己的专业领域界定为“辽金史、民族史,兼治宋史”,这或许才是先生对自我学术定位的真实反映。

不过,随着先生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他逐渐认识到,兼治宋史固然对扩大辽金史料范围及借助唐宋制度研究辽金汉制方面有所帮助,但仍存在明显的局限性。这主要是由于宋代文献中的辽金史料大多出自宋人的转辗记载,容有许多以讹传讹乃至演义杜撰的内容,莫辨真伪,而且缺乏涉及契丹、女真传统民族制度及核心政治议题的史料,故仅仅打通宋史,还不足以使辽金史研究全面走出困境。近年来,先生日渐意识到“旁通之道”

① 刘浦江:《宋代宗教的世俗化与平民化》,《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2期;《祖宗之法:再论宋太祖誓约及誓碑》,《文史》2010年第3辑。

② 《辽金史论》自序,第2页。

③ 《邓小南追忆刘浦江:“质犹近古,纯正笃实”》,中国社会科学网,2015年1月9日,见 [http://www.cssn.cn/zx/bwyc/201501/t20150109\\_1473102.shtml](http://www.cssn.cn/zx/bwyc/201501/t20150109_1473102.shtml)。

的另一个突破方向——打通蒙元史的重要性。

契丹与蒙古同属北方游牧民族，两者在民族传统、部族制度等诸多方面都有着天然的共性，女真与契丹、蒙古的民族谱系虽有所不同，但金元政治制度之间的内在联系尤为密切，加之元代文献中也保存着不少辽金史料，因而打通蒙元史对于辽金史学者而言，或许是更为迫切的事情。对此，先生早就心知肚明，不过由于他最近几年的研究重心主要放在政治文化及思想文化史上面，故而未能集中精力开辟蒙元史这一新的专业领域。不过其实，先生近年也已开始尝试朝蒙元史方向寻求新的学术突破。譬如，他从文献学的角度，对元代治河文献《河防通议》一书的源流及其内容做了详细探讨，并从中发现了金《泰和律令·河防令》的十一条令文<sup>①</sup>。其尚未发表的遗著《历史是怎样写成的？——郝经雁帛书故事真相发覆》，则更是一篇纯元史的作品。此文对流传甚广的郝经雁帛书故事进行抽丝剥茧般的辨析，最终探明了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及其产生的社会背景，为我们还原了“历史”的书写过程。先生的这两篇文章仅仅是他涉足蒙元史的尝试之举，若天假以年，他或许会在这一领域开辟出一片新的天地。

在我印象中，大约自2010年以后，打通辽金元是先生训诫我们学生时反复强调的一个问题。他希望这个学术理想能够在学生身上得以实现，故思之深，责之切。出于这一目的，近年来，他指导博士研究生论文选题时，首先考虑的就是要找一个能够

<sup>①</sup> 刘浦江：《宋、金治河文献钩沉——〈河防通议〉初探》，《舆地、考古与史学新说——李孝聪教授荣休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2012年。

贯通辽金元史的题目。例如，他让陈晓伟博士研究北族王朝的行国政治，这就牵涉到辽金元时代的捺钵、斡鲁朵、行朝等方面的核心问题。至于目前正在读的两位博士生苗润博和赵宇，先生对他们的论文选题也有同样的要求，这也是他患病期间始终难以释怀的一桩心事。先生临终前，特意将二人托付给张帆教授，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在张帆教授的指导下，顺利地进入蒙元史领域，最终实现打通辽金元史的目标。先生生前的第二大心愿是希望他培养出来的学生将来能够在学术上超越自己，在他看来，贯通辽金元史是超越他的一条可行之路。

纵观先生的学术生涯，他虽以辽金史名家，但并不满足于在该领域内所取得的现有成果，而时刻思考着辽金史研究的出路在何方。为此他朝各个方向努力践行着他所谓的“旁通之道”，从兼治宋史到打通蒙元史，他的这些探索为后来的辽金史学人指明了方向。

### 三、“入于汉学，出于宋学”

刘浦江先生不仅学问精湛，而且还具有十分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对历史学界的整体面貌及发展趋向都了若指掌，并时刻反省自身治学路径所存在的问题，不断调整自己的学术目标。近几年来，他思考最多的就是当今史学界普遍存在的“碎片化”问题。自上世纪80年代新史学兴起以来，历史研究日益陷入碎片式的微观实证研究。一方面，研究议题越来越琐碎，大多热衷于史事的细节考证和个案考察，缺乏全局性、整体性的观照；另一方面，专业分化越来越精细，各断代史或区域史之间壁垒森严，

研究者往往穷其一生仅在某一领域内钻研探索,缺乏跨断代、跨区域乃至跨学科的贯通意识。这种倾向虽有助于史学研究的深度掘进,但也导致整体史学的衰微,宏观重大题材研究的缺失,从而呈现出一种“碎片化”、“边缘化”的现象,引起了史学界许多人士的诟病。

在这种状况下,历史研究者也逐渐分化为两类治学取向截然不同的群体。一类学者毕生皓首穷经,以繁琐考据和微观基础研究自矜,其学问深度虽无可挑剔,但整体器局未免过于狭隘。另一类学者则仍坚持“宏大叙事”主题的研究,擅长阐发义理,关注大理论、大关怀、大问题,格调虽高,但往往流于空疏。在有关史学“碎片化”的论争中,上述这两类学者经常互不入眼,彼此责难,前者讥后者疏阔,经不起推敲;后者讽前者细碎,上不了层次。这一现象颇类似于清代的汉学与宋学之争。几年前,有一次先生向一位考据学家请教问题,当谈到某位以义理见长的著名思想史家时,那位学者对这位思想家的学问予以严厉批判、全盘否定,言辞颇为激烈。先生听后大为吃惊,目之为当代版的“汉宋之争”,并对这种做法很不以为然,他认为正确的学术态度“应该是取其长而弃其短,追求互补,若是矜己之长而攻人之短,势将不利于学术的进步”<sup>①</sup>。

此后,他就时常思考史学“碎片化”及“汉宋之争”的问题,并考问着自己历史研究者究竟应该追求怎样的学术境界。在他看来,要成为一流学者,既不能陷入“碎片化”的史学而不可自拔,

---

<sup>①</sup> 此为2012年1月25日先生的邮件内容,见《收获丰厚的青春——刘浦江致弟子书》,《北京青年报》2015年1月12日第B2版。

也不可执拗于汉宋门户之见，而应兼容并蓄，博采众长。2014年3月22日，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第十届史学论坛的开幕式上，先生就此话题发表了一通主旨演讲，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公开谈论学术的讲话。在这次演讲中，他将其认为最理想的学术研究路径精辟地概括为“入于汉学，出于宋学”的治学主张。这可谓先生对其一生学术经历及思考心得的高度提炼，需要加以详细解读。

先生所说的“汉学”是指清代乾嘉以来形成的考据之学。他认为一切历史研究都必须建立在扎实考证的基础之上，对于历史学者而言，也惟有做实证研究才能真正进入史学的大门。由“汉学”入门给我们带来的好处是：其一，可以充分接触历史文献，接受全面的文献学训练，打下良好的文献基础；其二，养成实证研究的习惯，今后即便研究宏观问题，也能在具体论证时脚踏实地，避免天马行空般的自说自话。这两点意义是先生十分看重的，他本人的学术研究就是这样一种路数。他早年通过文献考证研究走上史学道路，练就了极为深厚的文献功底和考据功力<sup>①</sup>，他的所有研究无不是以扎扎实实的考证为基础的，同时这也是他在培养学生时，对我们的一个基本要求。

“入于汉学”一语比较容易理解，这其实也是大多数学者进入历史学领域的一般路径。不过，或许对不少人来说，一旦入门

---

<sup>①</sup> 他不仅熟谙宋元文献，而且还在四库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长期为研究生开设“《四库全书总目》研读”的课程，最近又发表《〈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再探——兼谈〈四库全书总目〉的早期编纂史》（《中华文史论丛》2014年第3期）、《关于天津图书馆藏〈四库全书总目〉残稿的若干问题》（《文史》2014年第4辑）、《四库提要源流管窥——以陈思〈小字录〉为例》（《文献》2014年第5期）三篇四库学佳作。



可能就意味着学术畛域与路数的基本定型,今后不会有太大的改变。但在先生看来,长期浸淫于一个学术领域或重复一种学术路子未必是什么好事,可能意味着学术创造力的枯竭<sup>①</sup>,因此他时常思考如何突破自己的学术瓶颈,追求更高的目标,“出于宋学”就是他认为最理想的一种学术境界。

这里所说的“宋学”可泛指与考据相对的阐发义理之学,然就具体的史学研究而言,主要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研究全局性的宏观问题,二是研究跨断代、跨区域甚至跨学科的重大题材。先生认为,当一名学者进入学术成熟期之后,就不能再把全部精力都用于做鸡零狗碎的繁琐考证,而应尽量做有分量、有影响的“大文章”。那么,怎样才能做出“大文章”呢?这就要求史学研究者,一方面要“小题大做”,在从事微观研究时,注意其背后能否牵引出更高层面的中观或宏观问题,此即上文提到的“上层次”;另一方面又要“大题大做”,突破断代史、区域史以及传统王朝格局体系的藩篱,关注和研究中国整体历史发展脉络中重大的、关键的、核心的问题。不过,对于青年学人来说,因学力尚浅,恐不足以把握牵涉面广的大问题,故可先从“小题大做”入手,但中年以后就必须朝“大题大做”而努力<sup>②</sup>。以上谈到的这些就是所谓“出于宋学”的基本内容。尽管先生明确提出这一主张时间较晚,但事实上,他早已在其学术研究中默默实践着这个治学理想。上文谈到,先生的辽金史研究多具有“上层次”的问

① 此语出自《松漠之间: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自序,第1—2页。“重复一种学术路子”系笔者所加。

② 此即严耕望先生所云:“青年时代,应做小问题,但要小题大做;中年时代,要做大问题,并且要大题大做。”(《治史三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54页。)

题意识,就是一个很好的反映。在此,我想着重介绍一下他在拓展学术视野、研究宏大问题方面所走过的心路历程。

大约自2000年以后,先生逐渐开始有意识地突破辽金史的束缚,开辟更为广阔的学术领域。他一直对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史具有浓厚兴趣,通过研究辽金王朝德运之争与正统性问题这一契机,他敏锐地抓住了历代正统论、德运说、华夷观念等涉及传统政治文化及思想观念变迁的重大核心问题,进行长时段、系统研究,产出了一系列高水平的研究成果。除上文提到有关辽金正统及“五德终始”说终结的两文之外,还有《正统论下的五代史观》与《南北朝的历史遗产与隋唐时代的正统论》<sup>①</sup>,若将这四篇文章整合起来会发现,他为我们勾勒出了以王朝正统论为核心的传统政治文化自魏晋以降直至明清的整部发展衍变史<sup>②</sup>,展现出其宽广的学术视野与宏阔的学术气局。近年,先生又申报了题为“历史学视野中的正统论——以华夷观念为中心”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并将其研究议题转向思想文化史方面,对宋元明清乃至民国时期的民族主义、华夷观念及政治遗民等问题亦多有关注,并在远离他自身专业之外的领域做出了很有影响的研究成果。他最新发表的文章《太平天国史观的历史语境

<sup>①</sup> 刘浦江:《正统论下的五代史观》,《唐研究》第1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南北朝的历史遗产与隋唐时代的正统论》,《文史》2013年第2辑。需要说明的是,后一篇文章的初稿大约写成于2008年,正式发表较晚。关于此文的详细评析,可参见李鸿宾:《旧时的痕迹——刘浦江的生活与学术》,《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5年2月8日第B07、08版。

<sup>②</sup> 据先生说,他以前本打算对秦汉时代的德运、正统问题亦加以考察,但读了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这篇长文之后(收入《古史辨》第5册),觉得研究余地不大,故而作罢。

解构——兼论国民党与洪杨、曾胡之间的复杂纠葛》，竟是一篇近代史研究的作品。此文深入剖析和解构了太平天国民族革命色彩被不断涂抹的经过，以及国民党对洪杨、曾胡政治立场的复杂纠葛<sup>①</sup>，颠覆了人们对此问题的传统认识。该文发表后，赢得了近代史学界的广泛好评。一位中国古代史学者能够做出这样既有深度又有思想的近代史研究论文，殊为难得。这篇文章再加上他病中刊出的另一篇《元明革命的民族主义想象》<sup>②</sup>，共同为我们揭示出自明代以来中国民族主义思想的生长过程，这种研究思路正符合先生“出于宋学”的治学理念。

先生在做学术研究时，习惯将自己的研究进展和心得体会随时记录下来，以备日后总结反思，从中我们得以了解他学术探索的轨迹。前些年，先生曾摘录了几段日记，总题为“心路”，分享给我们学生参考，当时他正在着手做明清华夷秩序方面的研究，在2011年10月10日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

近两日反复考虑，决定先做两个题目，一是“从明代的华夷之辨到清代的华夷秩序观”，二是“文化认同与政治忠诚——遗民问题研究”。主要是考虑到这两个题目都涉及元明清时代，有些问题还有交叉或关联，所以在读书搜集材料时不妨一块做，既可以提高效率，又能相互观照。

---

① 刘浦江：《太平天国史观的历史语境解构——兼论国民党与洪杨、曾胡之间的复杂纠葛》，《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2期。此文原有二千余字的内容讨论民国时期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对曾胡的态度立场问题，但在《近代史研究》发表时，因编辑有所顾忌，故将其删去，十分可惜。先生临终前，已嘱咐我们学生今后整理出版其文集时要将原稿公布。

② 《元明革命的民族主义想象》，《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3期。

这真是一次很大的挑战，尤其是前一个题目可能需要一直梳理到民国时期，材料、问题、学术史都很陌生，不过这对拓宽自己的学术视野是非常有利的。准备拿出半年时间来读书找材料，寒假能动笔就不错了。

研究这样宏大的问题既有意义，又有意思。符合严耕望先生中年时大题大做的主张。一定要坚持几年，把这本书写出来。

从这则日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先生敢于挑战陌生领域的勇气，“大题大做”、研究宏大问题的意识，以及坚持不懈、持志恒定的决心。后来，经过几个月的摸索，他最终选定乾嘉时代“倒错”的夷夏观问题作为切入点<sup>①</sup>，开启他的系列研究，此后的《元明革命的民族主义想象》、《太平天国史观的历史语境解构》等文章都是由此生发而来的。可惜先生列出的研究题目还有很多，但天不假年，他永远无法完成这部最能体现其学术高度的书稿了，这不啻为一个巨大的遗憾！在了解了先生学术生涯中的这些心路历程之后，我们就知道他提出“入于汉学，出于宋学”的治学主张绝非信口开河，而实为其苦心孤诣得来的至理箴言<sup>②</sup>。

先生虽由“汉学”进入史学殿堂，并长期在辽金史领域耕耘，但他始终认为学无止境，一名优秀的学者不能将自己限定在某

<sup>①</sup> 此文题为《“倒错”的夷夏观？——乾嘉时代思想史的另一种面相》，尚未发表。

<sup>②</sup> 荣新江教授称“既要有实证性的硬功夫，也要有史家的识见”是邓广铭先生创建北大中古史研究中心以来的“家训”（《垫江洒泪送浦江》，《文汇报·文汇学人》2015年2月6日第4、5版），先生提出“入于汉学，出于宋学”的主张或许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此“家训”的影响。

一固定的畛域,复制着同一种学术路数。所以他毅然决然地开始走出辽金史,努力探寻多元的研究路径和恢弘的学术格局,并通过“出于宋学”,进入一种通达的学术境界。邓小南教授这样评价先生的学术:“浦江一方面学术敏感性、悟性突出,另一方面学术自觉性、自律性很强。他对学界整体脉络、演化趋势的把握,以及对个人治学目标、学问路径的认识都了然于胸,毫不混沌。……他希望挑战重大题材,追求更为恒久的学术价值。”<sup>①</sup>陈侃理博士则称“刘老师一定是以通儒自期的”<sup>②</sup>。这些评论对于先生而言,是十分允当的。他可以称得上是一位悟性突出、自律性强、对自我学术路径有长远规划的“通儒”。

#### 四、学术的尊严与品格

刘浦江先生在学术事业上成就斐然,不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他绝不是一个只待在书斋里的学者,而是对这个社会、对这个时代都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王子今教授即回忆说:“作为胸怀正义的学人,他对于社会情状和民众生活,对于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内心在应当关切的时候是关切着的,热血在应当沸腾的时候是沸腾了的。”<sup>③</sup>尤需值得一提的是,先生对当今的学术环境更是有着十分透彻的观察和深刻的反思,这也深深影响着他的学术品格。他的这些思想在其所写的学术随笔中表露无遗。

① 邓小南:《天然清流,不杂涇泾:忆刘浦江教授》,《文汇报·文汇学人》2015年2月6日第2版。

② 陈侃理:《黯淡世界中的一道光》,见本书。

③ 王子今:《老泪独吟忆浦江》,《文汇报·文汇学人》2015年2月6日第3版。

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叶，先生就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唐突历史》<sup>①</sup>，对现代中国的整体学术环境以及历史学家的价值取向做了深入分析，可谓入木三分。他指出，历史学家在讲述历史时几乎不可能毫无介入政治、国家、民族利益，乃至个人感情。对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政治，从武则天的历史评价到岳飞的种种是非之争，皆可描摹出一个时代的政治风云，这其中还牵涉到国家和民族的价值评判问题。尽管近三十多年来，历史学与政治虽拉开了一定的距离，但与此同时，历史研究中的各种非历史倾向则呈现出更加复杂的面貌，往往牵扯到许多经济利益、地方利益，从而渐渐失去了学术的味道。最后，他抛出了一句掷地有声的话语：“作为一位历史学家，我想说的是，尊重历史，应该成为每一位历史学家的职业信条。”基于尊重历史、尊重学术的精神，他呼吁历史研究者都应该做“独立的历史学家”。在他看来，历史学家的理想境界应该是站在人类的立场上，“超脱于政治、民族、种族、国家、宗教信仰以及个人情感等等”<sup>②</sup>，研究客观真实的历史，惟有如此才能真正成为“独立的历史学家”。

说起独立的史家，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著称于世的陈寅恪，而先生也写过《正视陈寅恪》一文<sup>③</sup>。在这篇文章中，他着重从学术与政治的角度，进一步阐述

---

① 刘浦江：《唐突历史》，《读书》1996年第12期。

② 刘浦江：《第三只眼睛看中国历史——评〈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中国文化》第19、20期合刊，2002年。

③ 刘浦江：《正视陈寅恪》，《读书》2004年第2期。

了其“独立的历史学家”的看法<sup>①</sup>。他认为，陈寅恪带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学术必须疏离政治，史学一旦沦为政治的附庸，就无异于宣告它的灭亡，所以他一向不赞成史学为什么什么服务、与什么什么相结合的口号，“服务史学”、“应用史学”必然沦为庸俗史学。知识分子应具有在严酷的政治环境和令人窒息的学术空气中，仍能保持自由思想和独立人格的胆识。至于历史学家如何养成独立的学术品格，他的宣言是：“不盲从于政治，不盲从于时代，不盲从于权威，不盲从于习惯。”同时，他还严正指出如今的史学界之所以再难见到陈寅恪这般气象恢弘的大师，问题的症结就在于今天的学术太功利了，“学术功利化的时代可以陶冶出一大批兢兢业业的专家学者，但终难铸就器宇磅礴的鸿儒”。这一席宏论至今读来仍可振聋发聩，扣人心弦。在他眼中，史学研究是一项神圣的事业，不容许为政治所左右，这就是学术的尊严。置身于当今的时代氛围之下，固然需要社会给我们提供一个相对自由和宽容的学术环境，但更为重要的是，历史学家要努力抵御各种各样的诱惑，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维护学术的尊严，做“纯粹的学者”。

先生曾说，一个人文学者的最佳境界是“能够完全凭着学术的感觉去选择自己感兴趣的研究课题，而不必有其它任何功利的考虑搀杂其间”<sup>②</sup>。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同时也以此要求我们学生。去年，我与陈晓伟博士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当时先生正在接受化疗，他对我俩放心不下的是，担心我们今后处理不好

<sup>①</sup> 先生对学术与政治的思考，另见《不仅是为了纪念》及《书生本色》（《中华读书报》2002年12月11日第5版）两文。

<sup>②</sup> 《松漠之间——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自序，第2页。

学术研究与申报项目之间的关系,于是特命我们将今后若干年内准备研究的课题以及申报项目的名称、时间逐一胪列出来,发给他过目把关,并于2014年10月7日发来邮件,告诫我们说:

有一点要特别提醒你们,以后无论申报什么项目,一定是自己做过的或是近年打算做的真正有学术价值的题目。绝不能为了拿到项目,什么题目容易获批就报什么题目,项目要服从自己的研究计划,而不能让自己的研究计划去迁就项目。不能为钱活着,学术事业才是第一位的。

这番话是先生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他为学术而生,为学术而活,学术事业高于一切,他的所有研究都是他认为最有学术价值的题目,毫无任何功利之心的驱使,而是完全出于对学术的敬畏和尊重。如今先生仙逝,再次读到这封邮件,顿时令我热泪盈眶,感动不已,我想我一定会将这番教训永远铭刻于心,终生奉守不渝。

先生对学术的尊重与执著,还表现在他平日的为人处事之中。无论是研究生招生,学位论文答辩,还是各类评奖评审,处理行政事务,他都始终坚守学术原则与道德底线,坚持纯学术的价值观,这在他去世后许多师友的纪念文章中已多有提及<sup>①</sup>。在此,我想不妨再多举一些例子。2006年至2010年先生受命担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主任,他见到每次学校公布的中标重

<sup>①</sup> 如张帆:《功在学术,虽殁犹荣》,《文汇报·文汇学人》2015年2月6日第5版;阎步克:《追念刘浦江君》,《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5年2月8日第B05版;李华瑞:《畏友浦江》,《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5年2月8日第B06版。



大项目及各类科研奖项获奖名单中,各课题组成员排名前列的大多都是学校各职能部门及院系的行政领导,他对此极为厌恶反感,认为这种领导挂名的做法纯属投机行为,严重妨碍了学术的公正性。因此,他以身作则,严正声明自己在任期间绝不参加任何评奖评选。而每当历史系需要参评校内外各级奖项时,他总会按照学术标准,积极主动地在系里物色最有实力获奖的老师,千方百计地动员他们参评,故凡经他手参与的评奖活动,历史系老师几乎都能获奖,无一失手。他用事实证明,学术可以不趋炎附势,学术标准是必须坚持的原则和底线。

谈到先生的学术态度,还有一点不得不提,那就是他对自己学术事业的自尊、自强与自信。众所周知,先生只有本科学历,没有继续攻读研究生学位。据其亲友回忆,他之所以没拿学位,并不是能力不济,而是对现行专业人才培养体制的不满和抵制<sup>①</sup>。他坚信凭着自己的资质、勤奋和汗水,照样能够在学术上出人头地,要靠自己的实力正名,而不需要用高学历来装点门面;同时他也认为这个社会毕竟尚未沦丧到学术标准尽失的地步,他相信至少在北京大学不会以学历取人而埋没其学术事业。正因如此,所以他在《正视陈寅恪》一文中,不禁流露出对陈寅恪游学欧美十余年上过众多名牌大学而没有拿一个博士学位的艳羨,以及清华国学研究院竟肯给这个既无博士头衔、当时又没有什么著述的白丁发导师聘书的赞赏。邓小南教授在回忆文章中提到,她曾劝先生趁年轻时在职申请博士学位,但他却简洁明了

---

<sup>①</sup> 先生在《不仅是为了纪念》一文中曾说:“在邓先生身边工作整整十年,虽然没有听过他一堂课,但不知怎么的,一来二去,你就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学者。我对专业人材的生成机制发生了怀疑。”

地回答：“谢谢小南。我不相信北大也没有学术判断力！”<sup>①</sup>后来，果不其然，他凭借着自身的学术实力，跻身一流学者之列，顺利晋升为教授、博士生导师。在当今的学术评价体制下，或许惟有北大才能做到不以学历取人，不消说这是北大值得骄傲和坚持的优良传统。

另外，还有一事也能鲜明地反映出先生自尊自强的学术品性。在他第一部论文集《辽金史论》自序的结尾，有这样一段令人振奋的话语：“曾有人建议我请一位前辈名流为这部论文集作序，被我断然拒绝了。我想，既然是学术著作，何须来这种俗套？如果连这点自信都没有，即令有名家捧场又能怎样？我们处在一个价值判断力彻底沦丧的时代，人们不得不依靠序引、‘书评’或者获什么奖之类的名堂去衡量学术水准。这真是学者的最大悲哀。但无论如何，我的著作是决计不要名家作序的。于是我很坦然地写下了这篇自序。”言辞中充满了对学术的自信和内心的坦荡，显露出未来辽金史研究“舍我其谁的霸气”<sup>②</sup>，这就是先生的个性。

其实，在先生身上还有许多优秀的品质，如治学严谨精益求精、工作认真一丝不苟、处事公正严明、耿介不阿、淡泊名利等等。这些纯正的品格归根结底，大多都源自于他对学术的那份尊重。我想说，他用自己的生命守护着学术的尊严，同时也为自己赢得了应有的尊重，有人称他为“真正学者的表率”或许就有褒扬其学术品格的涵义。

---

① 前揭邓小南《天然清流，不杂涓涔：忆刘浦江教授》。

② 前揭李华瑞《畏友浦江》。

## 五、学脉相传

如果一个学者仅仅为了个人的名山事业而不懈奋斗,那顶多称得上是敬业,恐算不得什么“大师”。真正的“大师”除了将自己的学术研究做到极致之外,更多考虑的则是学科的建设、人才的培养和学术的传承,如傅斯年、邓广铭先生就属于这样的“大师”。当然,刘浦江先生由于英年早逝,学术能力尚未完全施展,自当不起“大师”之名,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他其实并不是一位普通的学者,他把学术当作一门师徒相传的手艺,在努力将其发扬光大的同时,时刻思考的是它目前有什么问题,将来如何才能更好地发展,以及他个人能否培养出合适的学生来传承这门手艺。他常说“学术研究是一项薪火相传的事业”,所以他把自己仅仅看成是学术脉络中的一环而已。谈到他的这条学脉,自然要从邓广铭先生说起。

先生曾在《邓广铭先生与辽金史研究》一文中梳理过北大辽金史学的学统。目前北大的辽金史学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经邓先生一手扶植而创建起来的。虽然邓先生的学术专长主要是宋史,其辽金史的研究成果并不多,但他对辽金文献史料极为稔熟,曾探讨过《辽史·兵卫志》史源及《大金国志》与《南迁录》真伪等问题,并对《三朝北盟会编》做了系统整理和研究,这对建国后北大辽金史学传统的恢复和光大具有开创性意义。1983年,杨若薇投到邓先生门下主攻辽金史,她完成的博士论文《契丹王

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sup>①</sup>，堪称 20 世纪中国辽金史领域第一流的研究成果之一。1988 年，邓先生又慧眼识珠，将浦江师调入北大中古史中心，从事辽金史研究，从而使北大的辽金史学统赓续不坠。这是邓先生对辽金史的最大贡献。

从邓先生手中接过辽金史学的火炬之后，通过先生的努力，他将北大的辽金史研究提升至世界一流的水平。不过，他始终认为辽金史学的全面振兴仅靠他个人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得培养出几个优秀的学者来共同支撑，才能推动这个学科的整体发展，并把他手中的火炬接着传递下去，赓续不坠。因此，他将培育新一代的辽金史学人视为其学术事业的一部分，在指导学生方面极为用心，倾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先生培养学生可以说是全方位的指导、手把手的教学。凡是他的学生，只要研究生复试一通过，先生就会在第一时间找来面谈，讨论今后几年的学习计划，开列阅读书单，布置眼下任务，并指定旁听课程。正式入学之后，每个同学每学期选修哪些课程、有什么具体的学习任务、今后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什么以及读书课的进度计划等等，先生都要一一交代。平日他也会针对同学们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疑惑进行单独辅导。

最能体现他教学风格的事情莫过于指导和修改论文。先生非常鼓励我们在平时阅读过程中发现并解决问题，撰写有含金量的学术论文。一旦某个研究题目被他认可之后，他就会让我们去穷尽相关史料和论著，列出详细提纲与他讨论，有时仅仅一个提纲就要讨论一整天，直至文章架构梳理清晰、解释论证圆满

<sup>①</sup> 杨若薇：《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年。

之后,他才会让我们开始动笔。待写出初稿后,他首先要仔细审阅一遍,指出有问题的地方让我们修改返工。当我们收到这个批阅本时,看到的都是密密麻麻的各种批注和涂黄显示,小到标点符号、错别字,大到史料理解、论述逻辑、文章结构等他都会逐一标识,极为细致,我们常常需要改上好几稿才能让他基本满意。等他觉得我们的修订稿具备进一步深度修改的基础之后,他就会找我们去办公室,两个人对着电脑从早到晚,逐字逐句地改定论文,期间如遇到问题还会随时讨论,一起绞尽脑汁地想恰当的文字表述,所以这样改文章的进度一般都比较缓慢,一篇文章短则五六日,长则十数日才能全部改完。印象中,改的时间最长的是某位师兄的毕业论文,前后共花了二十多天。有时如先生不来学校,还会把学生叫到家中继续修改文章,常常改至深夜才放归,其费心劳力的情状让我们都觉得于心不忍。不过,令先生感到欣慰的是,他这种手把手的指导模式可以说是卓有成效的。我们这些学生经过他的严格训练之后,写作能力都有大幅度的提升。仅以我个人为例,我记得当初第一篇文章写得十分幼稚,连最基本的论文写作规范都不清楚,初稿被改得面目全非,不忍直视,当面修改时也大多是先生口授,我惟有执笔而已,但在这过程中我也收获了许多写论文的心得体会。后来,我再撰写论文时,明显感到自己的写作能力正在不断进步,我的初稿文字可被采用的渐渐多了起来,当面讨论时我也逐渐能够主动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获得了先生的赞许。直至先生去世前一个月,我将一篇新作呈请他审阅,他看后对我说:“你现在的写作能力还可以,一般的文章写作应该可以应付了。”在我听来,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和认可,其实这些点滴的进步都要归功于先

生的悉心指导和谆谆教诲<sup>①</sup>。

在先生看来，他培养学生最成功的一个机制就是《辽史》读书课。2007年，他承担了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工程之《辽史》修订项目，并坦言：“我之所以接受这项任务，主要是想把这项工作用来作为培养学生的一个重要手段，对于学辽金史的学生来说，这是进入专业领域的一个最佳途径。”此后每周六上午九点至下午五点是固定的《辽史》读书课时间。同学们在课前要对自己认领的《辽史》各卷做重新点校和全面研究，必须穷尽所有文献、石刻史料及相关研究论著，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发现问题，并通过自己的分析考辨加以解决，拟写出文字简练、表意清晰的校勘记以供课堂讨论。在课上，先生带领我们逐字逐句地研读《辽史》，讨论其中遇到的问题，共同改写校记。这样几年下来，经过一番严格的学术训练，我们学生都得到了丰厚的收获，打下了良好的文献基础，养成了实证研究的习惯和严谨的学风，在学术上非常顺利地入门，具备了独立的研究能力，还发表了不少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同时也将整个师门紧紧凝聚起来，加深了彼此之间的感情<sup>②</sup>。看到这些学术成长的轨迹，先生感到由衷的高兴，他希望在《辽史》修订工作结束之后，我们仍能延续每周读书课这种有效的学习方式，即便他因病

<sup>①</sup> 先生向来以写作能力见长，他认为我们这些学生经他训练之后，都能具备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但写作能力普遍较弱，这将成为我们学术发展的致命短板，所以他在这方面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希望我们能有所提高，弥补这一缺陷。而且尤为可贵的是，他所做的这一切完全都是无私的奉献，虽然他为修改学生论文付出了许多心血，但他从来不要求署名，反而帮学生推荐发表，令人十分感动。

<sup>②</sup> 详见拙文《一部倾注生命的〈辽史〉——记刘浦江教授的〈辽史〉修订工作》，《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5年2月8日第B09版。

不能参加,也要让我们坚持。2014年11月18日,当时先生刚做完干细胞移植治疗出舱,他得知我们的读书课最近因故暂停了一次,于是马上发邮件说:“希望我们的读书课不要因为我的缺席而受到影响,希望这个读书课能够成为促进大家学术进步的一个最佳平台。”在他生病治疗期间,类似这样的邮件、短信还有不少,其反复强调的就是今后读书课的内容、形式和频率都可以灵活调整,但这一机制一定要保持下去,即便他不在了。由此可见,读书课对他培养学生而言是多么重要。我想为了先生,为了学术的进步和传承,我们一定会听从他的教导,让师门读书课持续不断地进行下去,不辜负先生的期望。

在接受了上述这一系列的学术训练之后,我们快速进入了辽金史学的大门,具备了独立发现并解决问题、撰写文章的能力,将来也能从事学术研究,这本已功德圆满。但对于先生而言,他培养学生的目标绝不仅限于此,而是有着更高的期许和更长远的学术规划。

一方面,上文提到“入于汉学,出于宋学”的治学主张不仅是先生个人的学术理想,这也是对我们学生的基本要求。近年来,他日益感觉到我们学生目前所做的研究也明显呈现出“碎片化”的特点,尽是些微观考证,宏观思辨能力严重不足,故而在这三四年中,他指导学生时说得最多的话题就是要努力“上层次”、提高思辨能力,以至于到了耳提面命的程度。这也是先生对我们最为不满和揪心的一件事情,甚至病中他还群发短信训诫大家说:“《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5期连续刊载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的笔谈,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翻一翻。虽然我本人的学术路子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我在反思,是否我培养

学生的方法比较容易导致这种倾向?你们都应该警惕这一点。”可见这件事确实是他难以释怀的一块心病。我想在这世上,恐怕只有先生才会如此直言不讳地指陈我们的缺陷,他培养学生方法当然没有什么问题,主要还是由于我们自身的学术视野不够广、人文关怀不够深、思辨能力不够强所导致的。言犹在耳,先生的这一番话会一直鞭策我们努力提升学术研究的层次,调整学术路子,最终成为先生所期望的那一类学者。

另一方面,先生对于学生的学术发展方向也有着深谋远虑的规划,他认为我们最理想的学术路径是,首先必须成为辽金史的专家学者,然后根据个人兴趣打通宋史或者蒙元史,最后再开辟一个能够贯通整个中国古代史的全新领域作为兼治对象。要培养出这样视野广博的学人,需从研究生阶段就开始为之全盘谋划,所以他在指导学生论文选题时,要求硕士生尽量做纯辽金史的题目以顺利入门,而博士生则应走出辽金史,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因此,他命陈晓伟和目前在读的两位博士生,一定要选择能够打通辽、金、元三史的题目作为博士论文选题,其目的就是要让他们在三史兼治的学术道路上先行一步。而我因为花费了一年时间做《辽史·历象志》的研究,对中国古代天文历法有所涉猎,并发表了两篇与此有关的文章,所以先生觉得我可以趁热打铁,选择与科技史相关的题目作为博士论文选题。后来几经周折,最终确定天文分野这一研究主题,并给我订立了三个基本要求:其一,一定要从历史学的视角出发,利用尽可能丰富的各种文献材料;其二,做长时段的通代研究,但不要面面俱到,突出问题意识;其三,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将科技史与历史地理、政治文化等相结合。他希望我通过做这篇博士论文,拓宽知识



面,扩展学术视野,锻炼思辨能力,熟悉各个断代的基本文献史料,且在古代科技史领域站稳脚跟,将来作为自己长期的兼治对象。不过,他又建议我说,由于我此前主攻辽史,所以希望我毕业之后先花几年时间把金史做透,并伺机朝蒙元史方向发展,如能打开这一学术局面就十分理想了。先生就是这样一位令人肃然起敬的导师,他不但手把手地指导学生,而且还为我们描绘着未来的学术蓝图,为师之道尽乎此矣!

在外人看来,先生素以“严厉”著称,坊间多传为“名捕”,以致于不少本科生被吓得不敢选他的“中国史学史”课。然而在我们弟子眼中,先生可谓严师、慈父兼具一身,训练学生时固然严格,但在日常交往中却完全是一位尽职尽责的家长,他为学生考虑的事情真的很多很多。除了上面谈到的那些与学术相关的种种事迹之外,例如对家庭困难的同学,他会想方设法给予接济;如有外地同学前来参加读书课,他会主动提出解决路费,等等。尤其是学生求职期间,他更是四处帮忙联系推荐,分析就业形势和去各个单位的利弊,去年我与陈晓伟毕业求职,先生就为此操碎了心。他患病之后,又面临一位即将毕业博士生的工作问题,此时他已自顾不暇,但仍时常念及此事。有一次他发邮件对我们说这位师弟的出路“一直是我萦绕于心的一个问题,常常令我不能入眠”。其实,不光是先生自己的学生,其他老师的学生如果求职困难,他也会热心地给予帮助,大力推荐,有不少同学都因此受益,从而对先生更多了一份敬重和感激。他确实就是这样一位古道热肠、慈爱负责的老师,我们跟随先生多年,名为师徒,情同父子。我永远不会忘记博士论文答辩前一天收到的这封邮件:

靖嘉、晓伟：

明天你们就要进行博士论文答辩了，遗憾的是我无法参加。从七岁上小学，当了二十多年的学生，终于等到了这一天，你们即将获得博士学位，从学生变成教师，这是你们人生中的一大转折。

本来很想在你们举行毕业典礼那天，与身穿博士服的你们一起合影，可惜难以如愿了。如果那时候我在家，你们可以来我家合个影，不过我的头发也已经快掉光啦。

刘浦江

2014-5-27

当时我与陈晓伟正在上张帆老师的“元史研究”课，忽然看到这封邮件，顿时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如今读来更是格外酸楚，不禁噙噙泪。我想我之所以能顺利地走上学术道路，取得一点点的成绩，完全是拜先生所赐，如果没有他的悉心栽培和倾力指导，这一切都无法实现，我很庆幸自己能有这样一位杰出的导师。

在先生的价值观中，他把培育学生、传承学脉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对他而言，其实，自己的学术研究计划有没有完成并不是什么遗憾，他在病中曾说，到了他这个学术阶段多发一篇或少发一篇文章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但如果自邓先生开创的学术事业因他的离去而中断，这才是他人生最大的遗憾。所以他把一门心思都放在培养学生上面，直至易簧之际，仍不忘向其他老师托付学生，希望我们将来能够顺利地接过他手中的火炬，继承他的学术事业，甚至超越自己。正如先生所言：“我未竟的事

业有人传承,是对我最大的安慰。”<sup>①</sup>

记得刘师在评价邓广铭先生时称,邓先生属于“大师无师”的那一类学者。据他解释,所谓“大师无师”,“不是说没有师承,无师自通,而是不囿于家法,没有一定不变的路数,亦即博采众家之所长,能得前贤之真谛,而不只是仿佛其形式”<sup>②</sup>。其实,如果拿这个定义套用到先生自己身上恐怕也是恰如其分的。他虽在邓先生的引导下走上辽金史学道路,但他后来的学术成就和学术气局则完全是通过个人的悟性和努力而探索出来的,他的那些治学思想也来自其多年从事学术研究的心得体悟,再加上他对学脉传承的高度重视,为培育新一代辽金史学人的呕心沥血,所有的这一切作为即使称不上“大师”,恐也不无“大师”的风采。因此,我想在文章最后,以先生自己对“大师无师”的定义来概括他这一生的学术生涯,或许是对恩师最好的总结和追念。

记于 2015 年 2 月 11 日

改定于 2 月 28 日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讲师)

<sup>①</sup> 《犀利仁师憾未竟功》,《新京报》2015 年 2 月 1 日第 A09 版。

<sup>②</sup> 《正视陈寅恪》,第 97—98 页。

# 一部倾注生命的《辽史》

——记刘浦江教授的《辽史》修订工作

邱靖嘉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刘浦江先生于2015年1月6日晚23时57分因病辞世，学界一片痛悼之声。刘浦江教授是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之《辽史》修订项目的主持人，在先生生命的最后几年中，他为《辽史》修订倾注了大量心血。作为受业弟子及项目组成员，我全程参与了这项任务，见证了先生学术生涯中的这段心路历程，谨将刘浦江教授主持修订《辽史》之目的、经过及其背后的故事记述于此，以志纪念。

## 一、以培养学生为宗旨的《辽史》修订

据先生生前回忆，因2006年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工程已在酝酿之中，并已邀请他承担修订《辽史》的任务，故在2007年初，他已有让学生研读《辽史》的计划。至2007年5月中旬，中华书局在香山召开第一次修纂工作会议，整个修订工程正式启动，《辽史》修订工作亦随之全面展开。5月19日，我们在北大中古史中心上了第一次读书课。时至今日，我还清楚记得当时的场景：先生与我们六个学生挤在中心办公室讨论他初

拟的《〈辽史〉修订工作体例》，并围坐在一台电脑前开始研读《辽史》卷一《太祖纪上》。在那次课上，先生开宗明义地说：“我之所以接受这项任务，主要是想把这项工作用来作为培养学生的一个重要手段，对于学辽金史的学生来说，这是进入专业领域的一个最佳途径。”这番话后来在很多场合又被先生反复强调，令我印象十分深刻。如今回首这些年我们所做的工作和得到的收获，愈发能体会到这其中的深刻含义与先生的良苦用心。

与其他二十四史修订组不同，先生主持的《辽史》修订项目成员并没有什么“大腕”，都是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学生。整个修订工作由先生拟定体例，总揽全局，而由学生承担具体的点校工作。早在正式开始修订前，他已让时为硕士生的高宇全面搜集订正《辽史》阙讹的各类文章，汇编成《辽史勘误》，并附上各卷勘误索引以便检阅；又将保存于《永乐大典》残卷中的十五卷完整《辽史》及若干零散的残章断句统统汇集为《〈永乐大典〉引用〈辽史〉汇编》，以供版本校勘；此外又彻查各种金石文献及新刊布的考古资料，将《全辽文》、《辽代石刻文编》没有收录的辽代碑刻全部整理出来，并尽量参照拓本核对录文，集为《辽代石刻新编》，供大家使用。这些前期准备工作不仅为《辽史》修订的全面展开提供了重要保障，而且对学生而言，这也是一种很好的文献学训练。

《辽史》共有一百一十六卷，我们的修订程序大致可以概括为十二个字——分头点校，集体研读，先生审定。首先，由先生将各卷陆续分配给学生，诸位同学先要仔细核对通校本和参校本，在校勘专用的大字本上，用不同颜色的铅笔标明版本差异。然后是对各卷内容的全面研究，包括文字错漏、标点断句、原校

勘记的修改以及新校记、长编的撰写等诸多方面。在这过程中，我们必须穷尽所有文献、石刻史料及相关研究论著，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发现问题，并通过自己的分析考辨加以解决，拟写出文字简练、表意清晰的半文言体校勘记以供课堂讨论。

自2007年9月以来，先生与我们长年坚持于每周六上午九点至下午五点，在中古史中心的计算机室一起研读《辽史》，同学们分头点校的各卷修订稿都要拿到读书课上集体通读讨论。所谓通读绝非一般的翻阅浏览，而是由各卷负责人对着投影，将本卷内容（包括标点符号）逐字逐句地念出声来，每念一段先生还要重新审读一遍，并就其中的标点修改、文字校勘及所拟校记、长编的内容与大家进行深入讨论，统一意见，最后再改定校记与长编的文字表述。有时遇到复杂的问题，我们常常会针对一条校勘记反复琢磨两三个小时之久，所以一卷《辽史》往往要几次课才能读完。故从2007年5月开始修订，至2013年6月所有分卷点校工作全部完成，一部篇幅不大的《辽史》我们竟读了整整六年。

在这六年时间里，我们先后有十二位学生参与了《辽史》修订点校工作，并从中得到了巨大的收获。据先生总结，这项任务对于培养学生主要有以下四点意义：其一，通过校订《辽史》，使大家对宋辽金元时期的传世文献和石刻材料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具备了穷尽史料与追踪史源的能力，为今后的学术成长打下了坚实的文献基础；其二，在研读《辽史》的过程中，大家对各种史料仔细考辨，撰写校记时锱铢必较、反复斟酌，从而养成一个实证研究的路子和严谨求实的学风；其三，

大家通过《辽史》研究,可以很快找到历史的感觉,顺利进入辽金史学领域,并迅速占据学术前沿;其四,借助《辽史》修订这个机会,大家掌握了古籍文献整理的基本路数和学术规范,接受了最严格的学术训练,以后遇到其他文献都可以从容处理。

先生向来淡泊名利,在他看来,《辽史》修订在培养学生方面所带来的这些意义才是这项工作的真正价值所在。仅以我个人为例,我本科所学并非历史专业,自研究生拜入师门,我能快速进入史学大门,最终走上学术道路,就完全得益于参加《辽史》点校所学得的本领。

需要指出的是,《辽史》修订组虽然没有豪华的团队阵容,但这并不意味着修订稿学术品质的降低。事实上,经过诸位同学的精心校订、读书课上的集体讨论以及先生的严格把关,修订稿的校勘质量较之陈述先生的点校本有大幅提升。不仅纠正了原点校本的许多错误,改写了原校勘记,推进了前人研究,而且还发现了不少新问题,增补了大量新校记。这些最新的研究成果,集中反映在修订组成员撰写的各种考证文章之中。据初步统计,我们目前已发表与《辽史》辨证相关的札记及专题论文有近二十篇之多,并出版一部专著——林鹄《〈辽史·百官志〉考订》。这些研究作品既是《辽史》修订的直接产物,也是先生培育学生的重要成果。

## 二、呕心沥血:最后阶段的统稿及审订工作

整部《辽史》的分卷点校工作虽已于2013年6月全部完成,但由于这些修订稿成于众人之手,校记表述不尽统一,加之整个

校订工作持续时间很长，前期撰写的校勘记相对比较粗糙，有待改进，且在后期研读时又时常会对前期所读各卷的校记内容进行增删修改，因此在正式交稿之前，还必须经历一个统稿的过程，即将各卷文字校勘、标点修正及每条校记、长编重新梳理一遍，统一体例，以求整齐划一。这项繁重的任务完全是由先生一人独自承担的。

恰在这时，先生的身体渐显病兆，每况愈下，终至2014年4月确诊淋巴瘤晚期。面对病痛的折磨和死亡的威胁，他并未因此消沉，而是毫无畏惧地接受现实，其所展现出来的豁达乐观令人敬佩。不过，始终萦绕于先生心头、难以释怀的一桩未竟之事就是《辽史》修订。病魔的侵袭反而使先生催生出加紧完成统稿工作的愿望。

在第一次化疗回家休养期间，先生高效地完成了约五十卷《辽史》的统稿。之后的两个化疗周期，先生虽体力渐渐不支，但仍继续勉力工作，遇到比较棘手或有疑惑的问题，他还会通过邮件或电话与我们学生进行讨论，反复斟酌校记文字，一丝不苟的态度丝毫未减。例如关于卷一六《圣宗纪七》太平二年的月日错乱问题，先生在5月30日至31日两天之内，先后给康鹏和我发了数封邮件再三商讨，最后才达成一致，定为校记，其工作之认真细致由此可见一斑。凭着先生惊人的意志，整个《辽史》统稿工作终于在7月全部完成，并于当月22日正式向中华书局交稿。

交稿之后，先生的修订工作并未结束，而是马上又着手编辑修订凡例、前言及引用文献三个文件。其中，引用文献由我代为整理，而凡例与前言则由先生亲自执笔。7月24日，先生将其



草拟的《修订凡例》发给大家征询意见，随后又根据我们提出的建议做了若干补充和调整。相比而言，修订前言的撰写任务更重，它需要对整部《辽史》的编纂过程、内容体例及流传情况有全面的研究和通盘的把握，其工作强度无异于写一篇专题论文。尽管先生病情有所反复，甚至一度出现肺损伤的症状，但他仍不畏繁难，利用化疗间隙坚持写作，并让学生代为核查材料，断断续续地花了两个月时间终于完成了一篇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修订前言。此后，先生又精益求精，征求我们意见对这篇前言做了一些补充修改。直至11月才最终将定稿后的前言、凡例及引用文献正式提交。

与此同时，先生又收到了第一批送审《辽史》样稿的反馈意见。当时他刚刚做完干细胞移植治疗，身体十分虚弱，但他对蔡美彪、刘凤翥两位先生指出的修订稿问题非常重视，很快就将两份审稿意见清理了一遍，并将需要集体讨论的问题列出来，让大家发表意见。

12月4日晚，他给大家发信说：“各位，我把大家反馈的意见做了一个汇总，从中大致可以看出诸位的学力及学术判断力。从反馈的情况来看，意见比较纷歧，等中华书局把所有审稿意见发来之后，我们有必要在读书课上将有纷歧的意见讨论一下。”信中流露出先生对学生学术能力的关切和对《辽史》修订稿高度负责的态度。这时离先生去世仅有一月，这封信竟是我收到的最后一封先生邮件。

此后，先生病情反弹，肿瘤复发，身体状况急转直下，已无力继续伏案工作，但他仍对《辽史》审订念念不忘。就在先生离世的半月前，他还打来电话，与我讨论耶律俨《皇朝实录》的流传过

程及《辽史》的史源问题，并说道等来年春天做完第二次干细胞移植身体恢复后，要来参加读书课，跟大家一起讨论《辽史》审稿意见。可惜天不遂人愿，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在我们心中留下了永恒的遗憾！

在刚开始化疗时，先生曾说：“我的学术研究计划只能暂时搁置了，但《辽史》的统稿工作不用去图书馆，我还可以在家接着做。”就这样，始终对学术事业难以割舍的他，将生命最后阶段的所有精力和心血都倾注在了这部《辽史》之上。乃至病危之际，他还不忘将《辽史》后续的审订及出版事宜托付给我们学生，并叮嘱我们将来还要把《辽史》修订长编及人名、地名索引也整理出版，以便学界利用。他为辽金史研究、为学术事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的拳拳赤子之心实在令人动容敬佩。

### 三、付出青春的六年，倾注生命的《辽史》

2013年6月14日，我们收到先生的来信：“各位，历时六年的《辽史》修订工作将于明日结束，今晚翻看这些年来的修订档案，感慨良多，把最早的两封邮件分享给大家分享。”次日，我们读完最后一卷《辽史》，历经六年多的分卷修订工作暂告一段落。那天先生非常兴奋，在读书课上兴致勃勃地总结起过去六年的收获与感悟，当时的情景被我们用摄像机记录了下来，这也成为先生生前最后一段影像资料。

在那次总结会上，他回顾了这些年修订《辽史》的大致经过，清点了每一位参与同学所点校的卷数以及发表的文章，并再次重申他接下这项修订工作的首要目的就是为了培养学生。随

后,他又谈到辽金史研究的现状,并指出辽史研究对于《辽史》这部史籍的依赖性达百分之七十以上,而我们通过这些年的研读,对《辽史》一书有了最全面彻底的了解,其学术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他还着重分析了《辽史》读书课带给我们的收获和每个人的学术成长轨迹,大家经过《辽史》点校的严格训练,打下了良好的文献功底,养成了实证研究的习惯和严谨的学风,在学术上非常顺利地入门,具备了独立的研究能力,这正是先生所希望看到的结果。不过同时,他也敏锐地指出了我们的局限与不足。因这些年我们大多浸淫于辽史,以致眼界过于狭窄,缺乏通史的训练与知识面的拓展,长期来看,这将严重制约我们的学术发展。先生就是这样一位令人敬佩的导师,他既为学生的进步与成长而欣喜不已,又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及时指正我们存在的问题,尽量不走弯路。在他看来,培育出能力全面、视野广博的新一代辽金史学人,才是训练学生的终极目标。

此次课后,陈晓伟博士给先生覆函,列出诸位同门参与《辽史》修订的起止时间,并称“这就是我们的青春”。很快,先生再次发函称:“这是收获丰厚的青春,这是无怨无悔的青春!”诚如先生所言,对于我们学生来说,六年青春光阴的付出换来的是学术上的巨大收获。然而对于先生而言,这部《辽史》牵扯了他太多的精力,从起初拟定工作体例,到后来每周一天的研读讨论,再到最后阶段繁重的统稿与审订工作,先生为培养学生、为修订《辽史》一直倾注着大量心血,并最终燃尽了自己。不过,正如我们付出的青春是无怨无悔的那样,我想先生为学术事业所做的一切也是无怨无悔的。

如今回想那付出青春的六年,面对这部倾注生命的《辽史》,

我等弟子惟有秉承先生遗志，传承先生学术，尽心尽力地完成余下的《辽史》修订工作，顺利出版，才不枉负我们逝去的青春，才能告慰恩师不朽的英灵！

记于 2015 年 1 月 23 日

改定于 1 月 25 日

原载《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5 年 2 月 8 日第 9 版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讲师）

## “难以置信”的学术故事

——泣念恩师刘浦江先生

赵宇

刘师离世已经过去五日了，但直至此刻，仍然感到无法相信这一结果。自2012年有幸成为刘门子弟，两年多来时蒙恩师耳提面命，其间种种点滴历历在目，但恩师却已不能再见，不免潜然。

认识恩师是在2012年春——说是“认识”，其实是刘师主动询问。我本科并非历史专业，在大四毕业之际，出于兴趣，选报了北大历史系宋辽金史方向的研究生，当时虽已过初试，但对于专业的历史学研究，却无疑仍是门外汉。因北大考研复试需要提交论文代表作，我仓促写完一篇小稿，连同复试材料一道寄送之后，便又接着准备面试事宜，并未以为意。而正在紧张准备时刻，手机忽然收到一条陌生短信：“赵同学你好，由于你今年报考了本系宋辽金史方向的研究生，请你将论文代表作的电子版发送至我邮箱。”落款则是“刘浦江”。

我看到这条短信后的感觉完全只能用“诧异”二字来形容：我不明白为何要再次发送电子文档；而更惊奇的是，我与这位老师素昧平生，一位北大知名教授竟会为这样的“小事”来主动联系一名普通的外校学生，以至当时我甚而一度怀疑这条短信的真实性。在发送电子稿后不久，便很快又收到刘老师的另一条

短信，要求我在复试之前至北大见他，此时我的心态从意外转至忐忑，觉得自己的复试材料是否出现了什么问题，需要提前询问。

见到刘老师之后，我很快打消了所有的疑虑。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刘老师，当时他身着灰色大衣，端坐在中古史中心办公室的椅子上，平和的神色中隐约闪露出一丝锐利。招呼过我之后，刘老师便开门见山说道：“对于一个非历史专业的本科生来说，这篇稿子写得还不错，但现在一些年轻人习惯于不劳而获，我担心这是否是抄袭别人的文字，为防万一，所以让你发送电子文档。在仔细检核后，我相信这确实是你自己写的。”接着，刘老师指出了那篇草陋小稿中的诸多阙讹，其细微程度甚至具体到数处标点的使用问题上。现在回忆当时发生的那一幕，仍让人觉得有些难以置信；而恩师对于学术和学务的责任心，正是体现在一桩又一桩这样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当中。

自2012年9月正式进入北大之后，我也逐渐从师兄和同学处耳闻到刘师的严厉之名。但在和老师相处的两年多来，坦白说，我并未感受到老师有多么严苛——在学术方面，刘师对我们的要求无疑是极其严格的，大至篇章，小到句读，不容丝毫马虎；但在师生相处方面，我更多感受到的，却是老师的慈爱与呵护。或是我入门较晚，年龄相对较小，在师门例行的讨论课上，开始常有不少幼稚散漫的行为，恩师虽然屡屡犀利地批评我“懵懵懂懂”、“缺乏自制力”，但一直未有过严厉的呵斥，反而是给予了最大程度的包容。

有一次，轮到我在讨论课上做报告时，因为未用心准备，我的报告中出现了不少简单的引文错误。这次老师明确指出我的

问题，而语气也颇为严厉，当时的我竟然不知所以地赌气反驳。对于我这样桀骜不驯的态度，老师当时虽然有些生气，但仍然包容了我，只是当晚师门聚餐时微笑着对大家说：“你们看这小孩儿，真是太不懂事。”类似这样，刘老师对于学生的深切照顾与爱护，相信感受到的也绝不止我一人。

去年4月，老师被检查出癌症之后，我们门下弟子无不感到担心和焦急。但是，老师一如既往地谈笑风生，从未在学生面前流露出任何的恐慌或忧虑，反倒是一再劝我们安心学习，告诫我们万不可因此耽误学业。老师在患病入院后的9个月时间内，反复关心我们的学习状况，要求我们将写作的论文发给他，并均进行精心修改，这直至去世前的一个月仍未停歇。我自己的论文在写作过程中出现了不少问题，已经身患重病的老师操心的首先不是自己的病体，而更多是作为学生的我那篇未改定的论文，他多次强调“这篇文章不能再拖了”，嘱咐师兄们多给我建议，并为论文设计新的修改方向。

令我深深愧疚的是，直至老师离去，我仍然未将全文修改完毕，而老师在离别前一天仍将我叫至隔离病房窗口外，平素风趣幽默的他，此时却只能借助电话说话，他用吃力微弱的声音叮咛我：“你的论文我改了一半，后一半我没办法再改了，我让家里人将已经修改的部分发送给你，剩下的部分你要自己好好修改。”这篇未改完的论文，竟成了刘老师对学生的最后一次指导！紧接着，老师又嘱托在一侧已经毕业的师兄们：“以后师弟们毕业求职的时候，你们要多多帮助师弟们。”一直尚自觉坚强的我，这时脸颊上两股水流不受控制地窜动，横流而下，而喉咙里反复蠕动，无法说出话来。

言及于斯,刘师学术上的严格要求,生活上的细心呵护,此刻又屡屡浮现,只是或责或护,以后都无法再听到恩师亲身教诲了!

2015年1月

(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 痛悼浦江师

——告别仪式上的发言

苗润博

1月6日晚23时57分，刘浦江教授在家乡重庆垫江与世长辞。在过去的五十多个小时里，与在座所有的刘门弟子一样，我经历了整理遗容、通宵守灵、遗体告别、火化回京的全过程。本以为身体的劳累会麻痹痛苦的神经，谁料想任何一个与恩师相关的细节都可能引得涕泪纵横。头脑中不时出现的空档、断片，让此时的我根本不可能理清思绪，来全面回忆、温习恩师的教诲，只能选取他生命最后一段时间里的言行片段以寄托哀思。

从去年四月中旬确诊癌症晚期，直至逝世，刘老师共进行八个疗程的化疗以及一次干细胞移植。在此期间所经历的折磨与痛苦，常人难以想象，但他表现出的却是异乎寻常的坚强。据肿瘤医院的护士及老师家人说，在整个治疗过程中，刘老师几乎从未因为病痛而发出过呻吟。移植期间的一次短信中，刘老师就曾这样说道：“现在是最难受的时候，惟有咬牙坚持！人的一生是要吃很多苦的，这算不了什么。”

究竟是什么能让刘老师拥有这样的笃定与坚强？我的内心深处不止一次这样问道。第二次化疗结束后，因药物原因引起了严重的肺损伤，刘老师的身体状况一度十分糟糕，连基本的吃饭、休息都受到影响。面对可能的死亡威胁，他在6月21日的

邮件中对我们说：“这一周来，晚上睡觉不能平躺，否则通宵咳个不停，完全不能入睡。我坐着睡，下半夜还能睡一小会。白天也没法睡觉，只要躺下就一直咳，只能坐着，所以只要不发烧，脑子清楚，就可以坚持看看东西，也不觉得困，反而觉得不怎么咳了，今天已经在做《辽史》统稿工作……告诉你们我为什么不畏惧死亡？上次住院时听一位病人家属讲，她邻床一位中年男人整天哀怨，我要死了我挣下的钱都是别人的了，我老婆也是别人的了，我的儿子也要跟别人姓了。这就是因为没有精神寄托，而我和他不同。一个人文学者，有一流的作品可以传世，能够培育出一流学者来继承他的事业，还有什么可畏惧的呢？顶多有一点遗憾而已。”痛哉斯言！伟哉师言！正是这份纯粹的精神寄托，这种对于学术的执著，造就了浦江师的刚毅卓尔！

或许也正是这种纯粹、执著，使得刘老师在治疗过程中面临选择时表现得那样决绝。干细胞移植前的最后一次治疗效果评估，发现病情有所反复，当时要么保守治疗，用普通化疗来维持生命，要么用存在一定风险的移植放手一搏，可能彻底治愈。刘老师断然选择了后者。到上周一最后一次评效结果出来，移植失败，病情全面扩散，失去了治愈的可能，如采用温和化疗，还可维持一段时日。刘老师当即斩钉截铁地宣布放弃治疗。他说过，与其苟且地活着，不如尊严地死去，旁人首先考虑的可能是寿命的短长，而他所在乎的则是生命的质量……

他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即便在这段最难熬的日子里，刘老师也从未搁置过学术。在最后的大半年中，他发表了四篇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完成点校本《辽史》修订稿的统稿工作，并撰写出学术价值极高的修订前言。同时，对于学生的指导和培

养,也从未因生病而有一丝一毫的减少。半年中刘老师共为我们四位学生修改完成六篇论文,这里所谓的修改绝非一般意义上的提提意见,而是逐字审定,大到篇章结构,小到字词标点——这样的指导一直持续到12月10日左右,此时距离他的辞世已不足一个月。现在,真的不敢再打开刘老师修订过的文稿,其中标志性的涂黄显示,密密麻麻的批语注解,以及浦江师特有的犀利点评,都已定格为催人泪下的遗物。

相比其他断代史,辽金史研究的发展长期滞后。刘老师曾不止一次地说过,一个断代史的兴盛繁荣,至少需要五六个一流学者来共同支撑。他希望他的下一代学人能承担起这一重任,故而也一直在为实现这一目标不懈努力。现在这种努力本已初见成效,刘门弟子正待振翅高翔,奈何天道不公,折其头雁!造化弄人,弟子失怙!我们好恨!

刘老师,学生们还有太多的迷茫需要您指点,还有太多的不足需要您鞭策,还有太多的话语要向您诉说,可您就这样去了,刚刚展开的宏图究竟该如何继续书写?方才奏起的乐章怎样才能不成绝响?我们好难!

刘老师,您慢些走……刘老师,您慢些走……

2015年1月9日晨

(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 挽联、唁电选录

### 【一】

二院燕园未名湖隽秀少年追曩昔同窗四载  
辽史金史大小字遨游松漠叹今日痛失英才

——北大历史系中国史 79 级全班同学泣挽

### 【二】

天公何忍夺才俊 垂范燕园 取径四库 丹心赤诚培玉树  
斯学自此失主盟 著史松漠 会通三朝 正统夷夏成绝响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研究生会

### 【三】

谆谆教诲 谁解严师启蒙意  
殷殷关怀 皆念先生知遇恩

——北京大学历史系 09 级本科生

### 【四】

悼浦江兄  
著述留于后世读  
挚友还在梦间交

——二零一五年元月七日徐寒挽

【五】

三朝会通四库提要示学生治史门径  
听言则厉即之也温树我辈为人楷模

——学生李全德与众师弟师妹

【六】

智潜松漠尽精虑三十余载终不悔  
声播遐荒遗鸿篇千百万言有知音

——曹家齐

【七】

花开彼岸犹可采 路行尽处是更生

——同窗段晓东

【八】

契丹字女真文习得好去天上著新书  
四库目辽金史讲罢不绝人间响余音

——赵冬梅敬挽

【九】

辽海春秋太史 松漠名山垂范 逝者如斯

——晚辈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辛蔚

【一〇】

天妒英才 先生不寿 我辈失良师益友  
地下有知 大德安息 后进续往圣绝学

——佚名

【一一】

浦江兄兰玉之资，瑚璉之器，学问一流，人所共知。其无乡愿恶习，尤为难得。听其臧否之语，观其评论文字，无不殷切恳

挚，切中肯綮，略无狷急偏颇之处。人或误会“天低吴楚，眼空无物”，余谓兄实今世之真董狐也。接其人，知为君子矣！诵其文，非君子不能也！清酌庶羞，伏惟尚飨。

——江小涛

## 【一二】

### 哭刘教授浦江君

我哭浦江君，涕泪相和流。君貌其清古，君才高八斗。君书辽金史，君写松漠悠。君言声激越，君歌行云笛。君实谦君子，君怀志士忧。君励我不弃，君怜我困囚。君今驾鹤去，我失君长佑。惜哉浦江君，痛哉塾江刘。人生若几何，五十胜百寿。

——黄春高

## 【一三】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刘浦江先生治丧小组”并转其家属：

惊悉浦江先生不幸去世，我们万分悲痛。谨对浦江先生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家属表示诚挚慰问。

浦江先生乃兰玉之资，瑚琏之器，实当今史坛之翹楚，于辽金研究之贡献，少有出其右者。始考金源文献，复校中华《辽史》。探白山文献之真伪，析青牛记忆之故事。研小字成索引之编，述德运为华夷之匙。于辽金史迹了然于胸，而所著鸿文皆称经典。先生治学之勤超乎常人，思虑之缜逾越等伦，视野弘阔，为文精妙，而心怀忠纯，情系学术，从无乡愿之习。观其臧否，亦无不殷切恳挚，切中肯綮，略无狷急偏颇之处。接其人，知为君子矣。诵其文，非君子不能也。其道德文章，堪为典范。

先生春风化雨，桃李遍布，于鄙室之事责无旁贷，不辞辛劳，关怀备至。其绵绵盛意，让吾人感佩。

今先生西归道山，学界失此巨擘，我室失此师友，曷胜痛悼！  
端此敬请转达我们对家属的诚挚慰问。

刘浦江先生千古！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  
全体科研人员

## 家人致谢

浦江走了，他把悲痛留在世间。

拿到这本书，看到各位先生、师友对浦江的怀念，我感动莫名。

感谢各位对浦江的珍爱、对浦江业绩的珍视。

感谢各位在浦江病中、特别是辞世后为他倾心操劳、奔忙。

还有先生、师友，帮助浦江治病、料理后事，为实现浦江遗愿尽心竭力，他们待浦江的情谊没有形成文字，我同样敬重他们、感激他们。

恶疾以及治疗产生的副作用，使浦江遭受难以想见的折磨。他一直表现出超常的坚强与尊严，但也实在让我太伤痛。

毋庸讳言，在陪伴浦江治疗的八个月中，我有伤心不能自己的时候，始终经受着重重精神重压，特别是经常遭遇体力消耗的极限。追随浦江的几位已经毕业和在读的学生，伸出有力的援手，让我的坚持成为可能。我从浦江与他们的关系中，看到过异彩。他们所做的一切，当然是为了刘老师，但他们是在我和女儿困难的时候慷慨地帮了我们。请允许我在这里感谢他们。

各位所行大义，浦江在天有知，他的家人也会铭记。



最后,我感谢相识与并不相识的人们给我关爱和善意。这其中,有我已经深切领受了的,有我尚未省悟的,还有我可能永远都无从知晓的。

我向上天为各位祈求福报。

张文

2015年9月16日

## 后 记

刘浦江教授于2015年1月6日不幸逝世，学界一片痛悼。在此后短短的几天里，不少同仁自发撰写、发表了多篇悼念文章。1月21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举行“大节落落，高文炳炳——刘浦江教授追思会”，来自全国各地的友朋同道齐集一堂，以交流、发言的形式表达对刘老师的纪念与追怀。出版纪念文集的计划在追思会上确定下来，而其中的发言记录与先前的纪念文字也构成了眼前这部书稿的最初基础。

追思会后，纪念文集的编纂工作正式启动，截至2015年9月，共收到文稿77篇。在此过程中，邓小南、荣新江、张帆三位老师在宏观原则、总体方向上加以掌控、指导，并对纪念集初稿作了细致审订。具体编集工作由刘浦江教授的学生共同承担，苗润博负责联络作者、征集稿件以及初步的汇总编排；康鹏、曹流、陈晓伟、邱靖嘉、任文彪、赵宇、张良则对文字进行了反复校核。

这部纪念文集得以顺利问世，首先要感谢中华书局，徐俊先生在得知我们的编集、出版计划后，毫不犹豫地慨允，并承诺免去此书的出版费用，这样的义举令人动容。我们还要感谢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相关领导的关心和帮助，

如此坚实的后盾，让失怙学子在过去一年里得到了太多的温暖与慰藉。感谢所有赐文的作者，大家用学术界独有的仪式诠释了一个学者的尊严与荣光。感谢责编胡珂女史，她认真细致的工作着实令本书增色不少。感谢刘老师的家人，特别是师母张文女士的鼎力支持，但愿这本小书能给她们带来一丝宽慰。

纪念文集行将付梓，对恩师的感念、追怀却永远不会完结，“沉潜于学术是最好的纪念”，我们一直努力着……

受业弟子共书

2015年9月24日



ISBN 978-7-101-11369-3



9 787101 113693 >

定价：62.00元